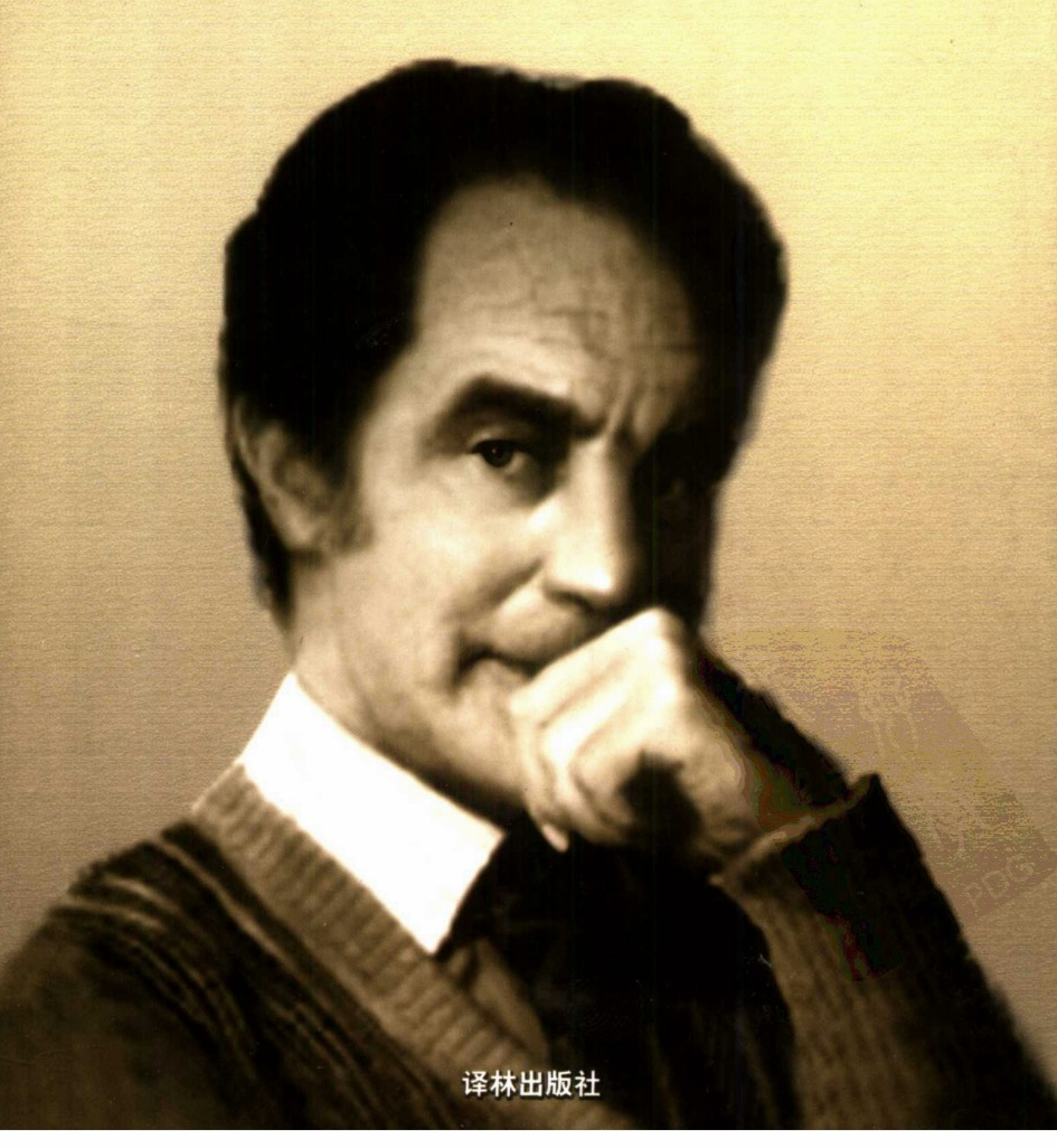
Italo Calvino

卡尔维诺文集

[意大利] 卡尔维诺 著　吕同六 张 洁 主编

通向蜘蛛巢的小路
烟云
阿根廷蚂蚁
短篇小说八篇



译林出版社

Italo Calvino ·

卡尔维诺文集

[意大利] 卡尔维诺 著 吕同六 张 洁 主编

通向蜘蛛巢的小路

烟云

阿根廷蚂蚁

短篇小说八篇

Ringraziamento al Ministero italiano
degli affari esteri per il gentile contributo
感谢意大利外交部对本丛书的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尔维诺文集:通向蜘蛛巢的小路等/（意）卡尔维诺（Calvino, I.）著;吕同六,张洁主编.-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9
ISBN 7-80657-277-5

Ⅰ.卡… Ⅱ.①卡… ②吕… ③张… Ⅲ.文学-作品综合集-意大利-现代 Ⅳ.I54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60746号

书　　名 卡尔维诺文集:通向蜘蛛巢的小路等
作　　者 [意大利]伊塔洛·卡尔维诺
主　　编 吕同六　张　洁
责任编辑 陆元昶
原文出版 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S. p. A., Milano, Italia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8.75
插　　页 4
字　　数 210千
版　　次 2001年9月第1版　200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书　　号 ISBN 7-80657-277-5/I·240
定　　价 (精装本)16.3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总　目

伊塔洛·卡尔维诺(1923-1985)是意大利当代最有世界影响的作家。他在四十年的创作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力求以最贴切的方法和形式表现当今的社会和现代人的精神，以及他对人生的感悟和信念。他的作品风格多样，每一部都达到极高的水准，表现了时代，更超越了时代。他于一九八五年猝然逝世，而与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但他在国际文坛上的影响与日俱增，他的创作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本文集收录了他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近二十部，是国内迄今为止对卡尔维诺作品的最全面的介绍。

本卷收录卡尔维诺发表于一九四七年的《通向蜘蛛巢的小路》，是他的成名之作；以及发表于一九五八年的《烟云》、发表于一九五二年的《阿根廷蚂蚁》，和各个时期的优秀短篇小说八篇。

ISBN　7-80657-277-5
I·240　定价：(精装本) 16.30元

目　　录

通向蜘蛛巢的小路

献给吉姆和其他所有人

一

阳光紧贴着冰冷的墙壁垂直往下照，一直照到小巷尽头，一些拱形建筑使得深蓝色天空看上去像是被分成一段一段的。

阳光垂直往下照，照在墙上杂乱无序的窗户上，照到放在窗台上的锅子里栽着的罗勒和牛至等植物上，照到绳子上晾晒着的内衣和衬裙上，一直照在台阶和卵石铺的路面上，路中间有一道骡子尿排泄沟。

皮恩只要一喊，或是开始唱歌前在小店门槛上鼻子朝天的一喊，或是皮匠彼埃特罗马格罗的手打在他后脑勺之前他发出的一喊，各个窗台上就发出抗议和辱骂的嘈杂声。

“皮恩！这么早你就来折腾我们了！给我们唱一曲，皮恩！倒楣鬼，皮恩，他们把你怎么了？猴相的皮恩！但愿你有一次口干舌燥！你和你的那个偷鸡贼老板！你和你那个献床垫的姐姐！”

皮恩站在小街的中间，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衣服对他太大了，他一个一个地看着这些人，面无笑容。“喂，切莱斯蒂诺，你消停一会儿，你穿了一件漂亮的新衣服。说吧，有人偷了莫利·努奥维的布，还不知道是谁干的？好吧，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你好，卡罗利娜，那次还不错。是的，那次你丈夫幸好没看床底下。还有你，帕斯卡，大家告诉我说确实发生在你的小镇。是的，加里波第给我们带来了肥皂，你的同乡却把它吃了。吃肥皂的帕斯卡，坏小子，你们知道肥皂卖多少钱吗？”

皮恩的声音沙哑，像个老小孩似的，说每句话都很低，表情严

肃，而后，突然嘻嘻大笑，像吹口哨一样，红黑色的雀斑像黄蜂似的集中在眼睛周围。

皮恩总是有歌可唱：他清楚小街的所有事情，谁也不知道他要说出什么事来。早晨晚上他在窗下又唱又喊，而在彼埃特罗马格罗的修鞋店里，磨破底的鞋子堆成山，不一会儿就盖满了皮匠的工作台，流到街上来。

“皮恩！倒楣鬼！丑家伙！”有的女人对他喊，“不要在那里整天折磨我们，给我换换鞋底！破鞋在那里堆了有一个月了。我要问问你的老板，什么时候修完！”

彼埃特罗马格罗每年有一半时间在监狱中度过，因为他生来不幸，每次附近失了窃，最后总是把他抓起来。回来的时候看到堆成山的破鞋，店门开着，里面空无一人。于是，坐到工作台前，拿起一只鞋，翻来覆去地看看，又扔回鞋堆里，然后用消瘦的双手抱着汗毛特多的脸开口骂人。皮恩吹着口哨进来，还什么也不知道；就这样他来到了彼埃特罗马格罗面前，见他双手已经举起，瞳孔周围发黄，脸上的黑胡子像狗毛一样。他大喊一声，彼埃特罗马格罗抓住他不放开，打累了，把他留在店里，自己钻进酒馆里。那一天，再没有人见到他。

每隔两天，那个德国水兵晚上来皮恩姐姐家。每次他上岸的时候，皮恩在小街上等他，向他要根烟抽。开头，他还很大方，甚至一次给三根、四根。戏弄德国水兵很容易，因为他不懂，用他那张一直刮到太阳穴上、像牛奶皮一样凝固的毫无轮廓的脸东张西望。他离开的时候，可以在他后面做鬼脸，因为肯定他不回头看。从后面看他很可笑，从水兵帽垂下来的两条黑带一直垂到屁股上，外套太短，像女人一样肥硕的屁股露在外面，上面带着一支德国手枪。

“拉皮条的……拉皮条的……”人们从窗户里冲着皮恩说，声音很低，因为和那类人最好不要开玩笑。

“戴绿帽子的……戴绿帽子的……”皮恩反讥道，吞下一口烟，

再从鼻孔出来。香烟对他这个小孩子的喉咙来讲还很厉害。但他还是吞烟直到拼命地流泪咳嗽,不知为什么。然后,嘴里叼着烟,走进酒馆,说:"无赖们,谁请我喝一杯,我就对他讲一件事情,再谢我一声就行了。"

在酒馆里总是那一帮人,多年来,整天泡在里面,双肘支在桌子上,托着下巴,毫无目的地东张西望,或是看着杯底的酒。

"怎么了,"法国人米歇尔说,"你姐姐降价了?"

其他人笑起来,敲着桌子:"这次的回答你满意了吧,皮恩?"

皮恩在那里,通过额头上的刘海儿从下向上打量他。

"坏小子,和我想的一模一样。你们看看,他总想着我姐姐,我告诉你们,他一直在想,从未断过。他爱上她了。爱上我姐姐,多勇敢……"

其他人放声大笑,拍他的脑袋,给他倒上一杯。皮恩不爱喝酒:喝了嗓子不舒服,起鸡皮疙瘩,使人想笑想喊想干坏事。尽管如此,他还是喝了,像吸烟一样一饮而尽,像夜里偷看姐姐和裸体男人在床上一样令人恶心。看见她这样就好像是受到一种粗鲁的抚摩,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欲望,男人们要求的事情:烟,酒,女人。

"皮恩,唱吧。"大家嚷道。皮恩用他那沙哑的孩童声音,挺着胸,唱得很好,很认真。他唱的是《四季歌》。

> 当我想到未来我将失去自由时
> 我要吻她,而后死去
> 而她去睡觉……一无所知……

男人们静静地听他唱,像听教堂颂歌一样眼睛向下看。所有人都蹲过监狱,谁没蹲过监狱就不是个男人。这首拉皮条的老歌充满了那种沮丧,那种在监狱中,晚上看守过来用铁杆敲门时,从骨子里产生出的沮丧,慢慢地,大家停止了吵架和漫骂,就剩一个

人唱这支歌，就像皮恩现在这样唱，没人让他停下来：

夜里我爱听哨兵的喊声，
当月光照亮我的牢房
我爱月亮慢慢地过去。

皮恩还真是没蹲过监狱：那次有人想把他和无赖们关在一起，他逃跑了。每次城市警察因袭击菜市场顶棚抓到他，他都会大哭大叫闹得警察没办法只好放掉他。但是他蹲过拘留所，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唱得很好，很有感情。

皮恩会唱酒馆里的男人们教他的所有那些老歌，歌曲讲述的是流血事件，如那首讲“卡塞留，回来吧”，和那首讲被中尉杀死的佩比诺的故事。当所有人都心情悲伤，看着紫色的杯底咳痰时，皮恩突然在酒馆的烟雾当中做了一个轻巧的旋转动作，高声唱道：

“我摸她的头发，她说不是那些，越往下摸越漂亮，亲爱的，你若爱我，就应该再往下摸。”

男人们用拳敲桌子，女用人收拾好杯子。他们喊着“嘘……”，并用手打拍子。酒馆内的女人们，一些满脸通红的老年女酒鬼，比如“女阻击兵”，迈着蹩脚的舞步跳起舞来。皮恩满脸通红，疯狂地咬着牙，声嘶力竭地唱歌，直到激起大家的热情：

“我摸她的小鼻子，她说你这个小傻瓜，再往下摸有一个花园。”

男人们用手为跳舞的老“女阻击兵”打拍子，齐声唱道：

“亲爱的，如果爱我，你就往下摸。”

那一天，德国水兵也上岸来，心情很坏。他的故乡汉堡每天遭轰炸，他每天都等妻子和孩子们的消息。这德国人有多情的性格，一种移植给北海人的南方人性格。家里子女很多，现在，战争使他远离家乡，他就竭力享用占领地的妓女来满足自己的性欲。

"没有烟。"他对迎上来对他说"你好"的皮恩说。皮恩斜眼看着他。

"好啊,同志[①],今天还留恋这地方? 呃?"

这时,德国人看着皮恩;他不懂问话。

"来找我姐姐吧?"皮恩漫不经心地问。

德国人说:"姐姐不在家?"

"怎么,你不知道吗?"皮恩虚情假意地说,像是教士抚育大的孩子一般,"你不知道,她被送进医院了。可怜的人! 她病得很重,但发现得早,看来还能治。她肯定病得很久了……你想,住院了,可怜的人!"

德国人的脸变得像凝固的牛奶一样,急出了汗,结结巴巴地说:"医—院? 重—病?"这时从一、二层间夹楼的一个窗户里伸出一个长着长脸和黑人一般的头发的年轻女人的上半个身子。

"别听他的,弗里克,别听那个无耻的家伙,"她喊道,"这回,你付给我钱吧! 傻小子,差一点你毁了我! 弗里克,上来,他在开玩笑,别听他的! 让他见鬼去吧!"

皮恩向她做了一个鬼脸。"同志,出了一身冷汗吧!"他对德国人说,突然拐进一条小巷。

有时候,开一个坏玩笑会给人留下苦涩,皮恩独自一人在街上转悠,大家都喊着骂他,赶走他。他想和一帮伙伴在一起,或者告诉他们蜘蛛做巢的地方,或者和他们一起在沟里用棍棒打仗玩。但是这些男孩子不喜欢皮恩。皮恩是大人的朋友,知道对大人说什么会让他们喜和怒。不像他们,大人说话的时候,一窍不通。皮恩有时候想和同龄的男孩在一起,求他们让他玩掷硬币猜正反面的游戏,求他们告诉他去市场的地下通道。但是孩子们把他晾在

---

① 这是皮恩在摹仿法西斯党徒的称呼。法西斯党成员互称的"同志"(camerata)与游击队员互称的"同志"(compagno)在意大利语中不是一个词。

一边，有时候，还揍他。因为皮恩的胳膊瘦长，是他们中间最弱的。有时，他们去找皮恩让他解释男人和女人之间发生什么事情。皮恩就满街喊，拿他们开玩笑。母亲们喊着自己的孩子：科斯坦佐！贾科米诺！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和那个没教养的孩子在一起！

母亲们说得对：皮恩只会讲男女之间在床上的故事，被杀男人和被捕男人的故事，大人们教给他的故事，尤其是大人们之间讲述的寓言故事，假如皮恩不添油加醋，不加一些大家听不懂猜不到的事情，这些故事听起来也很美。

于是，皮恩只能留在大人的世界里，尽管大人们也不欢迎他，大人对他来说和对别的孩子一样，是不可理解的，是有距离的，但是，利用他们喜欢女人和惧怕宪兵的心理，开他们玩笑也很容易，直到他们玩累了和要打他的后脑勺时为止。

现在，皮恩只能进到烟雾腾腾的酒店，对那些男人说些下流事情和从未听过的骂人话，直到弄得他们变得疯狂，打起架来。唱些动人的歌曲，折磨自己，甚至哭起来，使他们也哭起来。编些笑话，做些鬼脸，使他们开怀大笑，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减轻晚上积郁在自己心中的孤独感，像那天晚上一样。

但是，在酒馆里，男人们都是背朝着他，其中有一个新来的，又瘦又严肃。男人们看着进来的皮恩，然后看着陌生人，说着什么。皮恩看到气氛不同以往，手放在口袋里慢慢往前走，说道："无赖们，你们该看看德国人的脸部表情。"

男人们没有像往常那样说些玩笑话来回答他。一个一个慢慢地转过身来。法国人米歇尔第一个看到他，好像从来没见过他似的，然后，慢条斯理地说："你是个拉皮条的混蛋。"

皮恩的脸色马上变了，然后又静下来，瞪着小眼睛说："跟我说为什么。"

"长颈鹿"转过头来说："你走吧，我们和与德国人打交道的人没有任何关系。"

“你和你姐姐依靠你们的关系，”司机基安说，“最后会变成法西斯大人物。”

皮恩尽量装出开玩笑的表情：“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我和法西斯党没有任何关系，和法西斯少先队也没有任何关系。我姐姐愿意跟谁就跟谁，没惹着任何人。”

米歇尔挠了挠脸：“当改变一切的一天来到时，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要像烤去毛鸡一样把你姐姐脱光拔毛翻转着烤起来……对你嘛……我们会研究出你做梦也想不到的一种服务。”

皮恩没有慌张，但看得出他心里难受，咬着嘴唇：“当你们变得更狡猾的一天来到时，我会告诉你们是怎么一回事。第一，我和我姐姐之间谁也不知道对方的事。如果你们愿意可以去做拉皮条的人；第二，我姐姐没有和德国人站在一起，那为什么和他们保持联系，因为她是国际主义者，如同红十字会一样。今天和他们，明天和英国人、黑人，以及后来的所有人。（这些话都是皮恩从大人——就是现在和他谈话的那些人——那里听来的，学来的。为什么现在轮到他向他们解释？）第三，我和那个德国人做的就是骗他的香烟，作为交换，我给他说些笑话，就像今天你们对我做的使我晕头转向，我再也不向你们讲这些了。”

但是，他转移话题的企图没有奏效。

司机基安说：“开什么玩笑！我到过克罗地亚，在那里，一个德国傻瓜只要在某个地方和女人在一起，就连尸体也找不到了。”

米歇尔说：“迟早有一天让你在坟墓里找到你的德国人。”

那个始终在那里一言不发，既不笑也不表示同意的陌生人轻轻拉了一下他的衣袖，说：“现在不是说这件事的时候，记住我跟你们说的话。”

其他人表示同意，还看着皮恩。他们想要他干什么呢？

米歇尔说：“你说，你看见德国水兵有手枪吗？”

“他有支手枪。”皮恩答道。

“好，”米歇尔说，“把那支手枪给我们拿来。”

“怎么拿？”皮恩问道。

“你自己想办法。”

“他总是挂在屁股上，我怎么拿，你们自己去拿吧。”

“好吧，我告诉你，某个时候他不脱裤子吗？那时他也摘下手枪，你肯定行。你去取来手枪。你会有办法的。”

“如果我愿意的话。”

“听着，”长颈鹿说，“我们在这里不是开玩笑。如果你想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你该知道怎么办。否则……”

“否则？”

“否则……你知道什么是‘加波’[①]？”

陌生人用胳膊肘触了一下长颈鹿，并摇摇头：似乎不满意那些人的做法。

对皮恩来说，新词总是有一种神秘的光环，好像是影射某种被禁止的秘密行动。“加波”？“加波”是什么东西？

“我当然知道是什么。”他说道。

“是什么？”长颈鹿问。

“是在你……你全家的那个……”

男人们没有听他说下去。陌生人做了个手势让大家凑过来，小声说着什么。像是训斥他们，大家示意他说得有道理。

皮恩完全被排除在外。什么没说就要走了。手枪的事最好不要再提了，这件事毫无意义。他们可能已经忘了。

但是，皮恩刚到门口，法国人抬起头，说道：“皮恩，那件事我们就说定了。”

皮恩想再次装傻。突然觉得自己在大人中间是一个小孩，他的手把住了门框。

---

① 指爱国行动小组。

“否则,你就别再露面了。”法国人米歇尔说道。

现在,皮恩走在小街上,天色已晚,万家灯火。远处,开始听到小河中青蛙的叫声。这个季节,青年人晚上都到湖边来捉青蛙,抓在手中的青蛙使人感到黏糊糊的,滑溜溜的,使人联想到女人,滑润而赤裸的女人。

一个戴眼镜穿长裤的少年走过来,是巴蒂斯蒂诺。

“巴蒂斯蒂诺,你知道‘加波’是什么吗?”

巴蒂斯蒂诺眨眨眼,好奇地说道:“不知道,你告诉我,是什么?”

皮恩开始嘲笑他:“问问你妈‘加波’是什么! 对她说:妈妈,送我一个‘加波’做礼物,行吗? 告诉她:我以后给你解释!”

巴蒂斯蒂诺怏怏不乐地走了。

皮恩走在小街上,天差不多黑了。他感到孤独无援,迷失在那个流血的和裸体的故事也就是男人们的生活中。

二

在他姐姐的房间里，以那种方式观看，总觉得是置身在云中：一条垂直的带子上挂着不少东西，周围带着黑影，从缝隙中近看或远看，好像一切东西的大小都会变。像是通过女人的袜子看东西，气味也相同，就是木门那边传过来的他姐姐的气味，从那些皱衣服和那张从来不整理不通风的床上发出来的气味。

皮恩的姐姐在家做事总是马马虎虎，从小就是这样：抱小皮恩时弄得他总是哭闹不止，满脑袋痂皮。于是，她把他放在洗衣盆边上。自己和一些调皮鬼在人行道上用粉笔画的长方格内跳格玩。爸爸的船不经常回来，关于父亲，皮恩只记得他的胳膊，粗大，什么也没戴，把他抱起来抛向空中时，紫黑的血管显出他胳膊强壮有力。但是，自从母亲去世以后，父亲回来的时候越来越少，最后没有人再见到他。听说他在海那边的一座城里又有了新家庭。

现在，皮恩住的地方，说是房间，倒不如说是个储藏室，是木隔板那边的一间小房，窗户又窄又高，像个天窗，开在老房的斜墙上。隔板这边是他姐姐的房间，隔板上有缝隙。通过缝隙斜着眼可看到周围的一切。对世上所有事情的解释都来自于那块隔板后面。皮恩从小在那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使他眼睛变得像胸针一样尖。里面发生的一切他全知道，尽管他并不了解其中的原因。这使得皮恩每夜双手抱胸在床上缩成一团。储藏室的各种影子变成了怪梦，两个全裸的身体互相追逐，互相厮打，互相拥抱，最后他感到自己的那个东西也莫名其妙地燥热骚动，抚摩它，使它保持亢奋。这

就是对一切的解释。对已忘却的快乐感的回忆。

现在德国人披着短袖毛衣在房间里转来转去，两只胳膊像大腿一样多肉红润，他不时地走过来盯住缝隙。有时能看到姐姐在空中转动或是放进床单的双膝。现在皮恩要弯曲身子以便观察手枪和皮带放在哪里。在那边，像一个怪水果似的挂在椅子背上。皮恩但愿自己有一只像眼光一样细的胳膊，能从缝隙中伸进去抓住手枪，拉向自己。现在，德国人已脱光衣服，微笑着，每次他脱光衣服时总是笑，因为他还有一种女孩子贞洁感的残余。他上床关灯。皮恩知道，在床开始嘎吱作响之前，要在黑暗和安静中过片刻时间。

现在是时候了，皮恩应该光脚进到房间里，爬着前进，不得出声，从椅背上拉下带枪的皮带，这一切可不是为了开玩笑，然后又笑又唱，而是为了某种严肃而神秘的事业，这是人们在酒馆对他说的，他们的眼白里有种捉摸不定的眼神。皮恩总是喜欢和大人做朋友，愿意大人们与他开玩笑，信任他。皮恩爱大人，喜欢捉弄大人，捉弄那些强壮但愚蠢的大人（他知道他们的所有秘密）。他也爱那个德国人，但现在这是一件不可弥补的事情。以后可能再不能和那个德国人开玩笑了。但和酒店里的伙伴们就不一样了，有某种事情将他和他们连在一起，跟他们不能嬉笑和讲下流故事，他们将会总是用笔直的眼光打量你，会小声问你一些越来越奇怪的事情。皮恩想躺在自己的床上，睁着眼睛胡思乱想。此时，德国人在那边气喘吁吁，姐姐像是腋下发痒似的发出嘘嘘声。他想像一帮孩子推举他当头领，因为他知道的比别人多，大家一起去反对大人，打他们，做出一番惊人的事情来。让大人们也不得不佩服他，并让他当头领，让大人们喜欢他，抚摩他的脑袋。而现在，他却要在夜里单独行动，大人们恨他，就让他去偷德国人的手枪。这可不是玩铁皮手枪和木剑的那些孩子干的事情。谁知道明天他到他们那里，他们会说些什么。他慢慢地打开，向他们展示一支明亮的令

人害怕的真手枪,好像能自动开火。他们可能害怕。皮恩把枪藏在衣服里面也有点害怕:他有一支小孩玩的枪就够了,射出的红色闪光,足以使大人害怕,使他们倒地求饶。

现在皮恩爬到门槛上,光着脚,头已伸过了帘子,闻到了刺鼻的男人和女人的气味。他看到房内家具的影子,床,椅子,带支脚的特长洗下身盆。好了,现在开始听到两人的呻吟声了。现在可以慢慢地匍匐前进。可也许皮恩还希望地板嘎吱嘎吱响,德国人听见,突然开灯,他不得不光着脚逃跑,姐姐跟在后面骂道:混蛋!皮恩也希望邻居也能听到此事,并在酒馆里谈论,他可以向司机和法国人讲述这件事的经过,许多细节让人心服口服,使他们说:够了,事情做的不好,不要再提它了。

地板真的响了,而同时许多别的东西也嘎吱嘎吱响了,德国人却没有听到。皮恩终于摸到那条皮带了,不是想像,是真的触到皮带了。皮带从椅子背上滑下来,令人难以置信,竟丝毫也没有磕在地上。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起初的假怕现在变成真怕。现在要赶紧把皮带卷在枪套上,藏在衣服里面,还不能绊住腿和胳膊。然后按原路爬回来,慢慢地慢慢地,不能将舌头从牙缝中抽出来,如果将舌头从牙缝中抽出来会有可怕的后果。

一旦出来了,就不能想回到自己房间里将手枪藏在床垫下面,就像藏匿从水果市场上偷来的苹果。过一会,那个德国人就该起床找枪,把一切都弄得底朝天。

皮恩出门来到街上。手枪没让他心神不定,手枪藏在衣服里和其他东西一样,甚至让人忘记有枪。他不喜欢这种无动于衷,宁愿感到害怕,提醒他藏枪这件事。一支真手枪。一支真手枪。皮恩以此来激励自己。一个人有了真枪就什么都能干,像大人一样。就能以杀人来威胁,让男人和女人为他服务。

皮恩要握着手枪,走路时,手枪也得保持瞄准姿势。没人能夺下他的枪,大家都怕他。然而,现在手枪还是卷在皮带里藏在衣服

下面，不动它。他差不多希望以后找枪时，枪没了，丢在他身体的灼热里了。

在楼梯下一间隐蔽的小屋内，皮恩可以看枪了。人们通常在里面玩捉迷藏。路灯斜照进一道反射光。皮恩展开皮带打开枪套，像抓猫后脖子似的抽出手枪：枪确实很大，令人生畏，如果皮恩敢玩它的话，可以装成是一门炮。皮恩像玩炸弹一样摆弄它，保险，保险在哪里？

最后，他握着枪，小心手指别动着扳机，紧紧地握着枪把。只有这样，才能握好枪，瞄准想打的目标。皮恩首先瞄准屋檐靠近金属板的管子，而后瞄准他自己的一个手指，头向后仰，凶狠地小声说："要钱包还是要命！"后来又找到一只旧鞋，便又瞄准旧鞋。瞄准鞋后跟，瞄准里面，又把枪口对准鞋面的缝线。真好玩！一只鞋，对他这样一个修鞋伙计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一支手枪，一个非常神秘的物体，几乎是不现实的；要是有了这两样东西，就可以做从未想到的事情，可以用它们编出精彩的故事。

但是，到了一定时候，皮恩再也顶不住引诱，将枪瞄准了自己的太阳穴：这是个令人眩晕的举动！枪向前靠，触到皮肤，感到铁器的冰凉了。现在可以把手指放到扳机上。不，最好压低枪口顶住颧骨，直到感到疼痛，觉得空铁管里面藏有子弹。突然，枪离开太阳穴，可能是空气涡流使枪开了一枪。不，没开枪。现在可以把枪管放在口中，感到在舌下的味道。而后，还有更可怕的事情，将枪对着眼睛看里面，黑洞洞的枪管里好像是一口井。有一次，皮恩见到一位青年人用猎枪打瞎自己的一只眼，被送进医院，一大块血块盖满半边脸，另外半边脸全是黑色的火药粉粒。

现在，皮恩玩的是一支真枪，玩的差不多了。现在可以把枪给那些向他要的人了，巴不得给他们。他没有枪了，就好像没偷过枪。德国人又可以跟他发火，他也可以重新和他开玩笑。

第一个刺激可能是他跑进酒馆当众宣布："我弄到了，没逃出

我的手！"众人欢呼："真棒！"他觉得更好玩的是问大家："猜猜我带来什么了？"在告诉之前让他们先着急。当然，他们立刻会想到是手枪。那就马上进入正题，用十种不同的方式向他们讲述偷枪的经过，让他们也明白事情并不顺利。等他们急得不能再急了，再拿出枪放在桌子上，说："看我口袋里装的是什么。"再看看他们脸上是什么表情。

皮恩踮着脚尖走进酒馆，一声不吭，人们围着一张桌子窃窃私语。胳膊肘支在桌子上像在那上面扎了根一样。只有那个陌生人不在。他的椅子空着。皮恩躲在他们后面，没人发觉。他期望人们突然看到，惊跳起来，将询问的眼光投向他。然而没有人转身，皮恩搬动一把椅子，长颈鹿扭扭脖子，看看他，又转过去小声谈话了。

"好心的人们！"皮恩说。

大家看了他一眼。

"丑小子。"长颈鹿善意地应道。

没人再说话了。

"那么。"皮恩又说。

"那么，"司机基安说，"还要和我们讲什么？"

皮恩有点泄气。

"好哇，"法国人米歇尔说，"没斗志了？唱支歌吧，皮恩。"

"在这里，"皮恩想，"他们也装傻，却已经好奇得不得了了。"

"我唱。"他说。但是没唱，因为嗓子很干不畅，像是怕哭时的感觉。

"我唱，"又说，"唱什么？"

"唱什么？"法国人米歇尔问。

长颈鹿说："今天晚上真烦人！我要睡觉了。"

皮恩再也受不了这种游戏了。"那个人呢？"问道。

"谁？"

“原先坐在那里的那个人。”

“啊。”其他人说道，摇摇头，又小声交谈起来。

“我，”法国人米歇尔对大家说，“对委员会的这些人，不能妥协的太多。我不能为了他们的面子而承担风险。”

“好吧，”司机基安说，“我们怎么办？有人说：我们会看到的。现在最好和他们保持联系，但不许诺什么，等着时机。从一起上前线开始，我就和德国人有账要算。如果有仗要打，我愿意打。”

“好吧，”法国人米歇尔说，“注意，和德国人开不得玩笑，不知道结果如何，委员会希望我们组成‘加波’。那好，我们就为自己组成一个‘加波’。”

“同时，”长颈鹿说，“也让他们看看我们站在他们一边，武装起来。一旦我们武装起来了……”

皮恩已经武装起来了：上衣里面有手枪，一只手握在上面，像是有人要夺似的。

“你们有枪吗？”皮恩问道。

“没想过，”长颈鹿说，“你想着德国人的那支枪，我们已经说定了。”

皮恩竖起耳朵；现在该说：“你们猜猜。”该说了。

“如果你有了，可要看住别丢了。”

事情不像皮恩希望的那样。现在他们为什么不重视此事？难道希望他没拿到枪，希望他还回到德国人那里把枪放回去。

“为了一支手枪，”米歇尔说，“不值得冒险，再说是一支老型号枪：很笨重，老卡壳。”

“还有，”长颈鹿说，“应该让委员会看看我们在做事，这很重要。”他们又小声谈起来。

皮恩再也听不见什么了。现在他决定不把手枪给他们：他眼含着泪，咬牙切齿。大人们是一群虚伪的、背信弃义的人。没有孩子游戏中的那种严肃态度。然而，他们也有越来越严肃的游戏。

在这种游戏中别人弄不懂什么是真正的游戏。原先好像是和陌生人一起玩游戏反对德国人,现在他们又单独反对陌生人,不能相信他们说的话。

“皮恩,给我们唱一支歌!”他们说,好像先前什么事也没发生。好像他与他们之间不曾有过一个极为严肃的协议。一个被“加波”这一神秘字眼约定的协议。

“唱。”皮恩脸色苍白地说,嘴唇颤抖。他知道现在不能唱,本来想哭,结果他尖声一叫,大骂起来:“你们这些狗杂种,狗娘养的!”

大家看着他,不知出了什么事。皮恩跑出酒馆。

在外面,第一个冲动应该是找那个人,那个叫“委员会”的人,把枪交给他。现在他是惟一让皮恩尊敬的人。尽管原来他很严肃又不说话,不被人信任。但是现在他是惟一能理解皮恩,为他的举动而欣赏他的人,还可能把他带上一起与德国人作战,只有他们两人,都有武器,隐蔽在街角处。可是现在“委员会”在哪里?不能到处问,原先谁也没见过他。

手枪还留在皮恩那里,皮恩不给任何人,也不告诉别人说他有。只是想让大家明白他有一件可怕的东西。大家必须服从他。有真枪的人应该做一番惊人的游戏,做一些别的小孩都没做过的游戏。可是皮恩是个不会玩的孩子,既不会参加大人的游戏,也不会参加小孩的游戏。现在,皮恩将远离所有人,带着他的手枪一个人去玩,玩谁也不懂的游戏,玩谁也不会的游戏。

夜幕降临,皮恩躲开一片老房子,走过菜园和垃圾堆之间的道路。黑暗中,苗圃周围的金属网在月光照亮的灰地上留下一道影子。母鸡排着队在鸡舍里睡觉,青蛙都爬出水面,从源头到河口,在小河旁哇哇直叫。向青蛙开一枪会发生什么事:可能在石头上溅上绿色的黏液。

皮恩顺着小河旁的小路走,这里很陡,没有人种东西。还有些

路只有他认得，别的孩子也急于想知道：有一个地方，蜘蛛在那里筑巢。这地方只有皮恩知道，整个山谷，也可能是整个地区就这么一个地方。除了皮恩以外，别的孩子都不知道蜘蛛筑巢这件事。

可能有这么一天，皮恩找到一位朋友，一位明白事理和能够明白事理的真正的朋友。那时他就把蜘蛛巢的地方告诉他，只告诉他一个人。一条石头小路向下通向小河边，两旁是土墙和草墙。蜘蛛在草墙中筑巢，这是些小洞，周围糊有干草，令人惊叹不已的是这些巢都有一个小门，也是干草糊的，圆圆的，可以打开和关闭。

每当皮恩惹了大祸和笑过之后，心里总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悲伤，便一个人顺着小路寻找蜘蛛筑巢的地方。用根长木棍可以捅到巢的尽头，刺穿一个蜘蛛，一个黑色的小蜘蛛，身上带有灰色的斑点，像老太太夏装上的一样。

皮恩很高兴拆下巢上的小门，将蜘蛛串在木棍上，觉得很好玩，还高兴逮蟋蟀，细细观看它们愚蠢的绿脸，然后把它们切成小块，在一块石头上拼成带爪子的奇怪图案。

皮恩对动物很坏，认为它们是不祥之物，像大人一样不可理解。做一个小动物应该是丑陋的，也就是说是绿色的，拉屎一滴一滴的，总是害怕像他这样有一张长满红黑斑点的大脸、爪子可以撕碎蟋蟀的人到来。

漫长的夜晚，青蛙还在叫。皮恩一个人，周围是蜘蛛巢。他虽孤单一人，但身上带着手枪，像那个德国人一样把带枪的皮带系在屁股上。只是，那个德国人胖，皮带能够让皮恩斜挎在肩上，像电影中看到的武士们挂的子弹带。现在，他可以像抽剑那样做出个巨大的动作拔出手枪来，说："冲啊！勇士们！"就像孩子们玩海盗游戏一样。但他不知道那些流鼻涕的孩子在说和做那些事的时候有何感觉。皮恩在草地跳了几下，手枪瞄准橄榄树的影子，然后感到烦了，不知道用枪还能干什么。

这时，地下的蜘蛛正在吃蚯蚓，或者雌雄在交配，排出几丝黏

液:像大人一样让人恶心。皮恩将枪管伸进巢里,想杀死它们。如果开一枪,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房屋离这边很远,谁也不知道枪声从哪边来的。再说,德国兵和民兵宵禁时也经常向行人开枪。

皮恩的手指放在扳机上,瞄准一个蜘蛛巢。抵制抠扳机的欲望是很难的,但是手枪上了保险,皮恩不知怎么放开保险。突然,枪声响了,皮恩甚至没觉着自己抠扳机。手枪在手上向后震了一下,冒烟,沾满了土,蜘蛛洞塌了,土从上面落下来。周围的干草被烧焦。

开始皮恩害怕极了,接着,又欣喜若狂。一切都这么好玩。火药味很好闻。真正使他害怕的是青蛙突然不叫了,什么也听不见了,好像那一枪打死了地上的一切。然后,远处的一只青蛙又开始叫起来。随后是一只略近一点的,接着是其他更近的叫起来,最后大合唱又起来了。皮恩觉得叫声更大,比先前大多了。从房屋中传来一只狗的叫声,一个妇女也从窗子里向外喊。皮恩没再开枪,因为那种寂静和那些叫声使他恐惧。但是,第二天夜里他还来,那时就没什么让他恐惧了。到时候,他要打光枪里的子弹,打蝙蝠,打那时还在鸡舍周围窜的猫。

现在,应该找一个藏枪的地方:橄榄树洞里;不,更好的是埋在地下;最好是在蜘蛛巢的草墙上挖一个洞,然后用土、草盖上。皮恩用指甲在土松的地方挖,因为有很密的蜘蛛巢,土已被腐蚀变松。他从皮带上解下手枪套,然后将枪带套放进洞里去,再用土和草以及蜘蛛巢壁的碎块盖严,然后放些石头,作为识别记号。然后,用皮带抽打着灌木丛慢慢离去。回去的路要经过沟上面的一些小渠,旁边有一条窄石路可走。

皮恩拖着一头在水里的皮带慢慢走,吹着口哨,以压过越来越大的蛙鸣声。

然后,走过菜园、垃圾堆和房子:在一个地方他听到一些不是意大利人的声音在说话。宵禁时,他照样在夜里经常出来。因为

他是小孩，巡逻队对他也不说什么。但这一次皮恩感到害怕，因为德国兵可能正在寻找开枪的人。他们冲他走来，皮恩想跑。但是，那些人已经向他喊着什么并追上他。皮恩用皮带像鞭子一样做了一个僵硬的防卫姿势。德国兵盯住那根皮带并要它。突然他们揪住他的脖子把他带走。皮恩嘴里说个没完：求情，哀伤，漫骂。德国兵什么也听不懂，他们比城市警察还坏。

在小街里，也有一些带武器的德国和法西斯巡逻队，他们抓了许多人。其中有法国人米歇尔。皮恩被放到被捕人中间走上一条小路。周围很暗，台阶上头有一处因为太黑才有一盏路灯照着。

在小街上头，皮恩借着路灯灯光看见那个德国水兵气红了脸用手指着他。

三

德国兵比城市警察更坏。和那些警察起码还可以开开玩笑，可以说："如果你放了我，我可以免费让你和我姐姐上床。"

德国兵不懂大家说的话，法西斯分子又是些陌生人，根本不知道谁是皮恩的姐姐。这是两个特殊的人种：德国人，红润，肥胖，没有胡须；法西斯分子，黝黑，消瘦，脸色浅蓝，留着小胡子。

在德军司令部里，上午第一个被审讯的是皮恩。他对面是一个长着娃娃脸的德国军官和一个留着胡子的法西斯翻译官。在角落里坐着德国水兵和皮恩的姐姐。大家表情都是干巴巴的。在水兵看来，为了那把被偷的手枪，他应该编个故事，说明枪丢了不怪他，因此要说许多假话。

在军官的桌子上，摆着那根挂枪的皮带。问皮恩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有这东西？皮恩半醒半睡：昨天他们躺在走廊地板上过夜，法国人米歇尔挪过来，靠近他，每当他要睡，米歇尔就用胳膊捅他，捅得他很疼，小声对他说："如果你说了，我们就扒你的皮。"

皮恩说："但愿如此！"

"他们打你，也不能说，明白吗？要说我们教你的那些话。"

皮恩说："我要死了。"

"听明白了，如果我的同事见我没回家，他们会杀了你。"

皮恩："如果你得了重病呢？"

米歇尔战前在法国的饭店里工作，尽管人们时不时地称他为

通心粉[1] 或法西斯猪，但日子过得不错。一九四〇年他被送进集中营，从那以后，厄运接踵而来：失业，回国，搞非法活动。

哨兵有时发现皮恩和法国人米歇尔小声谈话，就把皮恩带走。因为他是主要嫌疑犯，不能和任何人交谈。皮恩睡不着觉，他已习惯挨打，反倒不害怕了。使他苦恼的是审讯时不知该取什么态度。一方面，想报复米歇尔和其他所有人，马上向德国军官招供说，把手枪交给酒馆那些人了，还有什么"加波"；但是告密是另一种不可挽回的行为，和偷枪一样。也就是说再不能在酒馆里白喝酒、唱歌、听人讲下流故事。再说，可能还牵扯到"委员会"，他总是那么伤心不高兴。这使皮恩很遗憾，因为"委员会"是他们中间惟一的好人。这时候，皮恩真希望"委员会"穿着雨衣进到审讯室，说："是我让他拿枪的。"这应该是个好举动，配得上他，他也不会有什么事。因为恰恰在纳粹要抓他的时候，像电影上的一样，会听到："我们的人来了！"于是"委员会"的人跑进来解救出所有人。

"我捡到的。"皮恩对问他皮带的德国军官说。军官举起皮带，用尽全力抽他的一边脸。皮恩差一点倒在地上，觉得脸像针刺一样疼，脸肿了，出血了。

姐姐叫了一声。皮恩想到姐姐也曾打过他，差不多也像现在这样重。那是因为他说谎惹她生气。法西斯分子带走姐姐，水兵指着皮恩用德语说了一通话，但是军官让他闭嘴。又问皮恩是否想说实话：谁派他去偷枪的？

"我拿枪是为了打一只猫，完了就还回去。"皮恩说。但脸上装不出天真的样子。因为脸肿了，想让人抚摩。

又抽了他另外一面脸，比刚才轻些。皮恩想起对付城市警察的方法。在皮带抽到脸之前，大叫一声，叫声不断。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场面：皮恩跳着闹着又哭又喊，德国人追他抓他抽他，他喊、

---

① 法国人有时用 macaroni(通心粉)来贬称意大利人。

哭、骂，用同样的话回答审讯。

"你把枪放在哪里了？"

现在皮恩也可以讲实话："放在蜘蛛巢里。"

"在哪里？"

说到底，皮恩还是想和这些男人做朋友。城市警察也打他，但后来他们就拿他姐姐开玩笑。如果这次和他们取得一致，就告诉他们蜘蛛巢在什么地方。他们感兴趣就和他一起去，指给他们所有蜘蛛巢。然后可能一起去酒馆买酒，再都去他姐姐的房间喝酒，抽烟，看她跳舞。但是，德国兵和法西斯分子是没胡子的或浅蓝色脸庞的人种，和他们讲不明白。他们继续打他。皮恩决心不告诉他们蜘蛛巢所在的地方。没告诉过朋友，怎么可能告诉他们。

他夸张地大哭，像个婴儿似的，又哭又骂，捶胸顿足，闹得整个德军司令部里都听得见。不能背叛米歇尔、长颈鹿、司机基安和其他所有人。他们是真正的朋友。这时，皮恩对他们充满敬意，因为他们是这些杂种的敌人。米歇尔可以放心，皮恩决不会背叛他。他当然能听到皮恩的哭闹，会说："坚强的孩子，挺住。不能说。"

皮恩的哭闹到处都听得见。别的办公室的军官也开始烦了，不断有人因请示工作进进出出德军司令部，让人听见他们连孩子也打，当然不好。

娃娃脸军官接到命令停止审讯，以后换个地方再审。现在让皮恩静下来不闹可不容易。他们想告诉他一切都结束了。但皮恩的尖叫盖过了他们的说话声。许多人过来让他安静，他跑、挣脱，哭得更凶。他们叫他姐姐进来安慰他，他几乎要跳到她身上咬她。过了一会，进来一队战士和德国兵让他静下来，有人抚摩他，有人替他擦眼泪。

最后，皮恩筋疲力尽才安静下来，气喘吁吁，没有声了。一个战士送他回监狱，明天再送他来审讯室。

皮恩走出办公室，后面跟着那武装战士。他粗硬的头发下面

脸显得很小，眨着眼，雀斑被泪水洗过了。

在门口，遇见了被释放的法国人米歇尔。

“你好，皮恩，”他说，“现在我回家。明天开始执勤。”

皮恩张着嘴，挤着小红眼睛看他。

“是的。我问过黑色旅的事。他们向我讲了好处和工资。还有，你知道吗？皮恩，搜捕时，你愿意去谁家搜查就去谁家。明天发给我制服和枪。好好干，皮恩。”

送皮恩回监狱的那个战士戴着一顶黑贝雷帽，上面有个红色束棒绣饰，个子很矮，还没有他的枪高。他不属于法西斯分子浅蓝色人种。

他们两人走了五分钟，谁也没说话。

“如果你愿意，他们也会让你进黑色旅。”战士对皮恩说。

“如果我愿意进你老奶奶母牛的那个……”皮恩毫无担心地答道。

战士假装生气：“你说，你信谁？你说，谁教你的？”停住了。

“行了，送我回监狱吧，快点！”皮恩拉着他说。

“想什么呢，你以为在监狱里能让你安静吗？他们老审讯你，打你。你喜欢挨打吗？”

“而你，你喜欢在……”皮恩说。

“说的是你喜欢。”战士说。

“你喜欢，你父亲喜欢，你爷爷喜欢……”

战士有点傻了，完全失望了。

“如果你不愿意挨打，就加入黑色旅。”

“然后呢？”皮恩说。

“然后，就去搜捕。”

“你也搜捕吗？”

“不，我是司令部的值勤兵。”

"算了吧,谁知道你杀死多少造反者,你不愿意说就是了。"

"我发誓,我从未参加过搜捕。"

"除了你参加的那几次。"

"除去他们抓我的那次。"

"搜捕中他们也抓你?"

"是的,那是一次严密的搜捕,组织得很好,全体警察出动,把我也抓了。我当时藏在鸡舍里。真是一次绝妙的搜捕。"

现在皮恩和米歇尔在一起觉得不舒服,不是因为觉得他干了坏事,是个叛徒。而是自己每次都弄错,不能预见大人们干的事,这使他非常恼火。他期望一个人有一种想法,而那家伙想法与众不同,经常改变主意,让人难以捉摸。

实际上,皮恩也愿意加入黑色旅,佩带头颅徽记和机枪弹夹到处转,让人害怕。愿意和老年人在一起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使他与那些大人分开的仇恨壁垒又将他与老年人连在一起。可能是因为想到此,他才决定加入黑色旅,这样至少可以取回那支手枪,持有它,公开地带在制服上,还可以用捉弄来报复那个德国军官和法西斯军士,使他们哭笑不得。

黑色旅有一首歌唱道:"我们属于墨索里尼,被人称为恶棍……"下面是淫秽歌词:黑色旅可以在街上唱下流歌曲,因为都是墨索里尼的恶棍。这太好了! 可是这个值勤兵是个笨蛋,令皮恩生气,所以每次问话他都以恶言相对。

监狱原是英国人的一个别墅,后被征用,因为德国人在港口的老炮台上安放了高射炮。这是一个稀奇古怪的别墅,位于一个南美杉树公园中,可能原先就有监狱的气氛。有许多塔楼、平台和大烟囱,原先有大铁门,后来又加上一些。

现在,房间都改成一间间牢房,样式很怪,地板是木头和亚麻油毡的,墙壁上有大理石壁炉,洗脸池和洗下身盆堵满了破布。塔楼上有荷枪实弹的哨兵。平台上犯人们排队打饭和分散着放风。

皮恩到时正是开饭的时候，他突然感到很饿。人们也给了他一个饭盆，让他排队。

犯人中间有许多是逃避兵役的，还有许多是倒卖粮食的，私自屠宰的，走私汽油和倒卖英镑的。真正意义上的罪犯不多，反正现在也没人抓小偷了，还有些人在服以前判的刑，因为超过了为获得赦免而要求参军的年龄。政治犯很容易区分，因为脸上青肿，审讯时被打的缘故。

一看就知道皮恩也是"政治犯"。他喝汤的时候，过来一位大块头青年，脸青肿得比他更厉害。光头，戴着一顶有帽舌的帽子。

"他们打你了，同志？"他说。

皮恩看着他，不知道该如何对待他，反问道："没打你？"

光头说："我，他们每天审讯我，用牛筋鞭子打我。"

他说话时很自豪，好像这对他是一种荣誉似的。

"如果你要我的汤，拿去吧。"他对皮恩说，"我不能吃，因为喉咙积血。"

他向地上吐了一口红痰。皮恩很感兴趣地看着他：对能吐血的人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敬佩，特别喜欢看肺结核患者是怎么弄的。

"怎么，你患肺结核了。"他对光头说。

"可能是他们使我变成肺结核患者。"光头庄重地说。皮恩敬佩光头，他们可能会成为真正的朋友。他把汤给了皮恩，皮恩很高兴，因为太饿了。

"如果这样下去，"光头说，"他们把我一生都毁了。"

皮恩说："你为什么不报名加入黑色旅。"

光头站起来，用肿胀的眼睛看着他："说，你不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你是谁？"皮恩说。

"你从来没听说过红狼吗？"

红狼！谁没听说过呢？法西斯分子遭到袭击，司令部大楼里

发生爆炸，每次奸细失踪，人们都会偷偷说出一个名字：红狼。皮恩还知道红狼十六岁，原先在“托德特”工厂当机械工。这是那些为了免除兵役在“托德特”工厂工作的青年人告诉他的。因为他总是戴着俄式帽子，总是谈论列宁。有人给他起个绰号“格伯乌”[①]。他酷爱甘油炸药和定时炸弹，他在“托德特”工厂工作好像就是为了学习制造地雷。有一天，铁路桥被炸，以后在“托德特”工厂再也见不着“格伯乌”了。他上山了，夜里下山进城，俄式帽子上有一颗白红绿三色星，随身带着一把大手枪，留着长发，人称红狼。

现在，红狼就在他面前，还戴着俄式帽，但三色星没了，大脑袋剃得光光的，眼圈被打得发青，吐血。

“是吗，真是你吗？”皮恩说。

“是我。”红狼说。

“什么时候抓到你的？”

“星期四，在波尔高桥：当时我带着枪，帽子上有星。”

“他们要把你怎么样？”

“可能枪毙我。”还是很庄重地说。

“什么时候？”

“可能是明天。”

“你？”

红狼又往地上吐血，问：“你是谁？”皮恩说了自己的名字。他曾渴望见到红狼，渴望看见他夜里突然出现在老城的小巷里，但同时他也感到害怕，因为姐姐和德国兵在一起。

“你为什么在这里？”红狼问，语气和审讯时法西斯分子的一样。

现在该轮到皮恩摆架子了：“我偷了德国人的一把手枪。”

红狼做了一个善意、严肃的鬼脸。问：“你参加组织了？”

---

① 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后改组为内务人民委员会。

皮恩说:“没有。”

“你没组织? 你不是‘加波’?”

皮恩很高兴又听到“加波”那个词。

“是,是,‘加波’!”

“和谁在一起?”

皮恩想了想,说:“和‘委员会’。”

“谁?”

“‘委员会’,你不认识他?”皮恩想显得优越,可是不成功,“一个很瘦的人,穿着浅色雨衣。”

“你在编故事。委员会由很多人组成,谁也不知道是谁。他们准备起义,你根本什么也不知道。”

“如果谁也不知道是谁,那你也不知道了。”

皮恩不愿意和这样年龄的青年人说话。因为他们总想高人一等,不信任他,把他当小孩子对待。

“我知道,”红狼说,“我是‘西姆’[①] 的一员。”

又一个神秘的字眼:西姆! 加波! 谁知道还有多少新字眼:皮恩想都知道。

“我也什么都知道,知道你还叫‘格伯乌’。”

“不对,”红狼说,“不要这样叫我。”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搞社会革命,只是争取民族解放。当人民解放了意大利,我们就迫使资产阶级承担责任。”

“什么?”皮恩说。

“就是这样。迫使资产阶级承担责任。这是旅政治委员对我说的。”

“你知道我姐姐吗?”一个不相干的问题。可是皮恩讲了不少

---

① 军事情报处。

他不懂的事情，想说些懂行的话题。

“不知道。”

“是‘长街的黑女人’[①]。”

“谁？”

“什么谁？是我姐姐。大家都认识她。长街的黑女人。”

难以想像，像红狼这样的青年会没听说过他姐姐。在老城，甚至六岁小男孩就开始议论她，向小女孩讲她和男人上床时干什么。

“说吧，不知道谁是我姐姐。这真有意思……”

皮恩真想叫其他犯人过来，说些轻浮话。

“现在，女人我看都不看，”红狼说，“起义成功后，有的是时间……”

“如果明天你被枪毙了呢？”皮恩说。

“这要看谁先动手，是他们枪毙我，还是我枪毙他们。”

“什么意思？”

红狼想了一下，弯腰对着皮恩的耳朵说：“我有个计划，如果成功，今晚就越狱，到那时，法西斯杂种们对我的折磨，我要让他们一个一个地付出代价。”

“越狱，往哪里跑？”

“到支队去，去比翁多那里，我们在准备一次行动，以后他们会发现的。”

“带我去吗？”

“不。”

“你真好，狼，带我去吧！”

“我叫红狼，”他纠正道，“当政治委员告诉我说‘格伯乌’情况不妙时，我就问他我该叫什么名字。他说：叫狼吧。我说我想要个带红字的名字，因为狼是法西斯动物，他说那就叫红狼吧。”

---

① 这是皮恩的姐姐丽娜的绰号，“长街”是他们住的那条小街的名称。

“红狼，”皮恩说，“听着，红狼，你为什么不带我去？”

“因为你还是个孩子，这就是原因。”

一开始，因为偷手枪的事，好像和红狼能成为严肃的朋友。可是到头来，还是把他当孩子看待。这使他不悦。和其他同龄的孩子在一起，皮恩至少靠谈论女人可以高人一头，可是和红狼在一起，这个话题就行不通了。不管怎样，和红狼一起参加组织，炸桥，进城袭击巡逻队，还是很美的。可能比参加黑色旅还美。只有黑色旅有头颅徽记，那比三色星有用多了。

平台上许多人正在吃饭，周围有高耸的烟囱，塔楼上的哨兵荷枪实弹。我却在那里和一个明天将被枪毙的人交谈。似乎这不可能是真的。周围全是南美杉树的黑影。真像一个迷人的场面。皮恩几乎忘掉了挨的打，也不能肯定这不是一个梦。

现在，监狱看守让他们排队回牢房。

“你的牢房在哪里？”红狼问皮恩。

“我也不知道要把我带到哪里。我还没去过呢。”皮恩说。

“我想知道你在哪里。”红狼说。

“为什么？”皮恩说。

“你以后会知道。”

皮恩很生气那些人老说：你以后会知道。

突然，在行进的犯人队伍中他好像看到一张熟悉的脸，非常熟悉的脸。

“红狼，告诉我，你认识前面那个人吗？干瘦干瘦的，走路那个样子？”

“是个普通犯人，算了吧！不能依靠普通犯人。”

“为什么？我认识他。”

“他们是没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红狼说。

四

“彼埃特罗马格罗！”

“皮恩！”

一个看守送他到牢房，一开门，皮恩惊叫一声。他在平台上看得没错，走路吃力的那个犯人正是彼埃特罗马格罗。

“你认识他？”看守问。

“不认识他才怪呢！他是我的老板。”皮恩说。

“这下好了，你们整个公司都搬到这里来了。”看守说完，关上门走了。彼埃特罗马格罗关进来才几个月，但皮恩见到他，好像已过去许多年。他皮包骨头，皮肤焦黄，脖子干瘦，胡子也好长时间没刮了，坐在牢房角落的一层草上，双臂像枯枝一样耷拉在两侧。他看见皮恩，抬起双臂。在皮恩和他的老板之间，惟一的关系就是吵闹打架。可现在皮恩看到他这个样子，既高兴又感动。

彼埃特罗马格罗讲话与以往不同：“皮恩，你也来了！”说话时声音沙哑，伤心，没有骂人话。看得出来他也高兴见到皮恩。他拉住皮恩的手腕，但不是像以前那样为了揍他；他用无神的黄眼睛看着他，说：“我病了，皮恩，病得很重。这些狗杂种不愿意送我去医务所。在这里真是让人什么也搞不懂：现在这里只有政治犯，总有一天，也会把我当成政治犯枪毙我。”

“他们打我了。”皮恩说道，并指给他看伤痕。

“那么说你也是政治犯。”彼埃特罗马格罗说。

“是的，政治犯。”皮恩说。

彼埃特罗马格罗想了想，说："是的，肯定是政治犯。我早就想到会在这里看到你。因为你早就讲过监狱。因为一个人进过一次监狱，就再也离不开了。放他出去多少次，他还进来多少次。当然了，如果你是政治犯就另当别论了。你看，假如我以前知道，从小我也干政治了。因为犯普通罪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偷得少的进监狱，偷得多的有楼房、别墅。犯政治罪和犯普通罪一样都要进监狱。干什么事都要进监狱。只希望：有那么一天，出现一个美好的世界，不再有监狱了。这是一位政治犯向我这么保证的：很多年前，他和我一起坐牢，留着黑胡子，后来死在牢里。我认识普通人，认识管粮的，收税的，认识各种各样的人，就是不认识像政治犯这样的好人。"

皮恩不太明白这段话的意思，但他可怜彼埃特罗马格罗，好心地看他脖子上一起一伏的颈动脉。

"你看，我的病使我不能小便，我需要治疗。可在这里坐在地上，在我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黄色的尿。我不能喝酒，可我真想醉上一个星期。皮恩，刑法是错误的，里面写的都是一个人在生活中不能做的事情：偷盗、杀人、窝藏赃物、挪用公款等，而没有写一个人处在一定条件中，如果不做这一切，可以做什么事情。皮恩，你在听吗？"

皮恩看他没刮胡子的黄脸像狗脸一样，感到他的喘息也吹到自己脸上。

"皮恩，我快死了。你应该向我发誓，照我说的发誓，我发誓：为不再有监狱，为重写刑法典而战斗一生。你说：我发誓。"

"我发誓。"皮恩说。

"记住了吗，皮恩？"

"记住了，彼埃特罗马格罗！"

"现在帮我逮虱子，我身上都爬满了。会捻死虱子吗？"

"会。"皮恩说。彼埃特罗马格罗看了看衬衣里面，然后给皮恩

一个衣边。

“注意看衣缝里。”他说。为彼埃特罗马格罗逮虱子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但他令人怜悯。他血管里充满黄尿，也许活不了多久了。

“店铺，店铺怎么样?”彼埃特罗马格罗问。不管是老板还是伙计都不大喜欢那工作，但现在他们开始谈论那落后的工作。皮革和细绳的价格，谁将为邻居修鞋。现在两人都在监狱里坐在牢房角落里的草堆上，逮着虱子，谈论水罐以及鞋和换鞋底，而不痛斥自己的工作。这在他们生活中是从来没有的。

“你说，彼埃特罗马格罗，”皮恩说，“我们为什么不在监狱里开一个修鞋铺，为囚犯修鞋?”

彼埃特罗马格罗从未想过此事。以前他愿意坐牢，因为可以什么活不干白吃饭。现在他愿意工作，因为假如能工作，就不觉得有病了。

“可以试着问问。你同意吗?”

是的，皮恩会同意的。这样的工作可能是件新鲜事，是他们发现的，像游戏一样好玩。待在监狱里也不觉得烦恼了。和彼埃特罗马格罗待在一起也不再挨打了，还可以给囚犯和看守唱歌。

一个看守打开门，红狼站在外面，指着皮恩，说：“是的，我说的那个人就是他。”

看守把皮恩叫出来，关上牢门，里面只剩下彼埃特罗马格罗，皮恩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过来，”红狼说，“帮我把那个垃圾桶搬下来。”

在走廊里不远处，有一个装满垃圾的铁桶。皮恩想：让红狼这样遭殴打的人干重活，帮他的人也是个孩子，这太残酷了！铁桶很高，高到红狼的胸部，也很重，很难搬动它。他们在那里搬的时候，红狼对着他的耳朵小声说：“好好干，机会来了，”然后稍微大点声：“我让人到各个牢房找你，我需要你的帮助。”

这真是件奇妙的事。皮恩想都不敢想。皮恩很快喜欢上这里的环境。监狱也有吸引人的地方。他好像愿意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万一能和红狼一起逃跑更好,可现在是刚来呀。

“我自己能干,”红狼对帮他把铁桶扛上肩的看守们说,“我只需要这个孩子跟在后面别让桶翻了。”

他们就这么开始了:红狼被压弯了腰。皮恩举着手臂托着桶底使桶稳当。

“你知道下楼的路吗?”看守们在后面对他喊,“小心!别在楼梯上摔倒!”

拐过第一个楼梯角,红狼让皮恩帮他把桶放在一个窗台上:累了吗?不累!红狼有话要对皮恩说:“注意,现在你到下面的平台去,和哨兵说话,要吸引他的注意力,别让他的眼睛离开你。你个子矮,他要和你说话得低着头,但不要太靠近他,行吗?”

“你干什么?”

“我给他扣上钢盔。你看吧,扣上墨索里尼钢盔,明白你该干的事吗?”

“明白,”皮恩说,实际他还是什么也不明白,“然后呢?”

“以后告诉你。等等,张开手!”

红狼拿出一块湿肥皂,抹了抹皮恩的手掌,然后抹双腿。从里向外,尤其是膝盖。

“干什么?”皮恩问。

“你会看到的,”红狼说,“我研究好了行动的细节。”

红狼属于靠惊险彩色画册接受教育的那一代人,只是他学得认真,生活没有欺骗他。皮恩又帮他把桶扛上肩,他们走到平台门口时,皮恩走在前面要和哨兵搭腔。

哨兵靠在栏杆上伤心地看着树。皮恩双手插在口袋里走上去。感到又回到自己家乡,又有了在小街上的机灵劲。

“喂!”他说。

"喂!"哨兵说。

这是一张陌生的脸:一个表情忧伤的南方人,脸上有被剃刀刮破的地方。

"无赖,看那边是谁!"皮恩喊道,"我早就说过:在无赖去的地方总能见到你。"

悲伤的南方人使劲睁开半闭的眼皮看着他:"谁?你是谁?"

"狗小子,你敢说你不认识我姐姐?"

哨兵否认:"我谁也不认识。你是囚犯?我不能和囚犯说话。"

红狼还没到!

"别说了,"皮恩说,"你敢说到这里值勤以来,从来没和一个有鬈发的褐发女郎……"

哨兵慌了:"是的,我去过。这事和……?"

"在一条小街上,转身向右拐,教堂后面一个广场上,扛着梯子?"

哨兵直瞪眼睛:"什么乱七八糟的。"

皮恩想:你这就要看到在她那里究竟是什么回事!这时红狼该到了,他一个人能扛桶吗?

"现在我告诉你,"皮恩说,"你知道市场广场在哪里吗?"

"唔……"哨兵说不出来,又看别的地方。不行,应该再找别的更能吸引人的话题。可是如果红狼不来,他就白费力气了。

"等等。"皮恩说。哨兵又转过身来看着他。

"我口袋里有张照片,给你看看。我只给你看一部分。头部,是的,如果让你全看了,今晚就睡不着觉了。"

哨兵冲他弯下腰,终于睁开两只穴居动物似的眼睛。这时,红狼出现在门口。垃圾桶压弯了他的身体,但他还是踮着脚尖走。皮恩从一只口袋里抽出合在一起的双手,在空中晃晃,好像手里藏着什么东西:"喂,你喜欢吗?嘿!"

红狼静静地大步走过来,皮恩慢慢地从一只手转向另一只手。

这时,红狼已到了哨兵身后。哨兵看着皮恩的双手:涂着肥皂,为什么? 根本没有照片? 突然,一堆垃圾倒在他头上,不只是垃圾,还有什么东西打他,周围全是垃圾。他呼吸困难,但摆脱不了。他被俘了,枪也被缴了。他倒在地上,觉得变成一个圆桶,在平台上滚动。

这时红狼和皮恩早已跨过栏杆跑了。

"那边,"红狼对皮恩说。"抓住那里,别松手。"向他指着一个房檐旁的排水管。皮恩很害怕。红狼几乎把他扔到空中。皮恩不得不抓住排水管,但是,涂肥皂的手和膝盖很滑。于是就像顺着楼梯扶手一样滑下来。他怕极了,既不能往下看,也不能松开管子。

红狼在空中一跳,要自杀? 不是,是要跳到不远的一棵南美杉树的树枝上紧抱住。他抓的树枝断了,从断树枝和针形树叶中间掉下来。皮恩觉得快落地了,他也不知道是为自己害怕,还是为可能摔死的红狼害怕。他落地了,差一点摔断腿,在南美杉树下他立刻看到红狼躺在地上,身下是一些树枝。

"狼,摔疼了吗?"皮恩问。

红狼抬起头,自己也搞不清楚哪些是审讯时的伤痕,哪些是摔落地时的伤痕。向四周看看,枪声四起。

"快跑!"红狼说。

红狼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跑。

"快跑!"他又说,"往这边跑!"

红狼认识所有的路,现在领着皮恩跑向一个被遗弃的公园,到处是野生的攀缘植物和带刺的草丛。塔楼上向他们射击。公园里有许多篱笆和针叶树。他们可以隐藏着向前跑。皮恩不知道自己是否被射中,反正没感到有伤。忽然,他重重地摔倒在地上。红狼领他到一个小门,过一个旧暖房,帮他翻过一面墙。

突然,公园中的阴影没了,眼前出现一道彩色强光,像是用移画印花法做的。他们做了一个可怕的动作:立刻扑倒在地,展现在

他们前面的是荒芜山丘，周围是广阔、安静的一片大海。

他们进到了一片康乃馨花地，在一些按几何图形立着的灰色柱子之间有戴大草帽的妇女们在浇花。他们向前爬行，不能让她们发现。在一个水泥水池后面有一条弯曲小路，附近有折起来的席子，这是冬天为避免康乃馨受冻用来盖花的。

“到这里来。”红狼说。他们藏在水池后面，拉过席子盖上，别人发现不了。

“必须在这里等黑夜。”红狼说。

皮恩回想起自己挂在屋檐上，想到哨兵的子弹，出了一身冷汗。使他感到更怕的是，以后还会遇到这些事。现在在红狼身边不能害怕。在水池后面和红狼坐在一起美极了，像是在玩捉迷藏游戏。只是在游戏和生命之间没有区别。这次不得不认真地玩，皮恩喜欢这样。

“你疼吗，红狼？”

“不太疼。”红狼说，用混涎的手指抹擦破的地方。“折断的树枝减缓了我的坠落。我都估计到了。你怎么样，涂上肥皂？”

“机灵鬼，红狼。你知道你是个奇才吗？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一个共产党人应该无所不知，”红狼答道，“对任何困难共产党人都能想出办法解决。”

“他是个奇才，”皮恩想，“遗憾的是做什么事都好装腔作势摆架子。”

“有一件事我很遗憾，”红狼说，“我没枪了，我不知道为一支‘斯坦’该付多少钱？”

又一个神秘的字眼，“斯坦”，“加波”，“西姆”，怎么能记住这么多字眼。这一发现使皮恩很高兴，现在他也可以摆架子了。

“而我不想这个问题，”他说，“我有手枪，没人动过。”

红狼看着他，尽量不使人看出他很在意此事：“你有手枪？”

"嗯,是的。"皮恩说。

"多大口径?什么牌子?"

"一支真枪。从德国水兵那里弄来的。我把他的枪弄到手,正因为这个,我才被关进监狱。"

"告诉我,枪是什么样的?"

皮恩尽量向他解释,红狼则讲述手枪现有的各种型号,最后认定皮恩的那支是 P38 型手枪。皮恩很兴奋:P38 型,P38 型,多美的名字!

"你放在哪里了?"

"在一个地方。"

现在皮恩该决定告不告诉红狼蜘蛛巢的事。红狼肯定是个杰出青年,能做出各种奇事。但是蜘蛛巢是个大秘密,只能告诉真正的朋友。尽管这一切,皮恩还是不太喜欢红狼,因为他太与众不同了,总说些严肃的事,对他姐姐不感兴趣。如果他对蜘蛛巢感兴趣,会变得更讨人喜欢,尽管对他姐姐不感兴趣。实际上,皮恩也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男人那么喜欢他姐姐。她牙很难看,腋下有黑毛,但大人跟他说话时最后总提到他姐姐。皮恩深信这是世上最重要的事,他也是个重要人物,因为他是长街的黑女人的弟弟。但是,他也深信蜘蛛巢比他姐姐和所有男女间的事更有意义,只是还没找到明白这些事的人。如果找到了,他也会原谅对姐姐奈拉没兴趣的人。

他对红狼说:"我知道一个蜘蛛筑巢的地方。"

红狼说:"我想知道你的 P38 在哪里。"

皮恩说:"好吧,就在那里。"

"给我讲讲。"

"你要知道蜘蛛巢是怎么做的吗?"

"我要你把枪给我!"

"为什么?那是我的。"

"你是个孩子,只对蜘蛛巢有兴趣,用枪干什么?"
"那是我的,无赖。我愿意的话,可以把它扔进沟里。"
"你是个资本家,"红狼说,"资本家们才这样思维。"
"假如你死了,"皮恩说,"比如……你淹死了。"
"你疯了吗?说话这么大声?别人听见了,我们就都完了。"
皮恩离开红狼,两人沉默了一会。跟他不再是朋友了。红狼把他从监狱救出来,这也没有用,他们不可能再和好了。可是,皮恩害怕一个人留下。手枪的事把他和红狼紧紧地连在一起,因此又不能断绝关系。
皮恩看见红狼找到一块炭在水池的水泥壁上写着什么。他也拿起一块炭画些下流画:有一天他在小街的墙上画满了下流画,圣朱塞佩教堂的神父向市政府提出抗议,命人把画都涂掉了。现在红狼专心致志地写着,根本没注意皮恩。
"你写什么呢?"皮恩问。
"处死纳粹-法西斯分子,"红狼回答,"我们不能浪费时间,在这里可以搞些宣传。拿上炭你也写。"
"我已经写了。"皮恩指着自己画的下流画。
红狼勃然大怒,上去擦掉。
"你疯了!我们应该做好的宣传。"
"你想做什么宣传?谁愿意到这个蜥蜴窝来念这些宣传?"
"住嘴!我想在水池上画些指示箭头,再在墙上画,一直画到路上。这样,谁顺着箭头方向走就能到这里来看。"
这是只有红狼才会玩的又一个游戏,他的游戏很复杂,使人着迷,但不令人发笑。
"应该写什么?列宁万岁?"
很多年前,小街墙上总有一条标语:列宁万岁!法西斯分子来把它擦了,第二天又出现了。后来有一天他们把木匠弗朗塞抓走,标语再也见不到了,据说弗朗塞死在一个岛上。

“你写:意大利万岁！联合国万岁!”红狼说。

皮恩不喜欢写字。在学校他是个千夫指,他从桌子下面看见女老师的腿是畸形的,还有他总把字母 W 弄错。最好找句更容易的话来写。皮恩想了一会,开始写:C.U.L...

白天开始长了,老不黑。红狼不时地看一只手,那只手就是他的表。每看一次,就显得更暗一点,什么时候只看到一个黑影,就说明天黑了,他们可以出去了。红狼和皮恩又和好了,皮恩将带他去有蜘蛛巢的小路,把手枪挖出来。红狼站起来:天已经黑得差不多了。皮恩问:“我们走吗?”

“等等,”红狼说,“我先去侦察一下,然后回来接你。一个人比两个人危险小。”

皮恩不愿意一个人留下,但是他也害怕这样出去,对外面的情况一点不了解。

“红狼,你说,”皮恩说,“不会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吧?”

“你放心,”红狼说,“我一定回来,然后我们一起去取 P38。”

现在皮恩只能等了。红狼不在,所有的影子都变成奇怪的形状,所有的声音都像是走近的脚步声。在小街高处用德语大嚷大叫的水兵到这里来找他,没穿衣服,只披着薄毛衣,说皮恩也偷走了他的裤子。娃娃脸军官也来了,牵着一条警犬,用挂手枪的皮带抽它。警犬的脸和小胡子翻译的脸一样。他们来到一个鸡舍旁。皮恩害怕是他们,他藏在鸡舍里面。他们没有进来,却发现送皮恩去监狱的那个值勤兵像鸡一样缩在那里,不知道为什么。

一张熟悉的脸伸进皮恩的藏身处,对他微笑,是法国人米歇尔！可是米歇尔戴上帽子,微笑变成了奸笑,戴的是黑色旅的帽子,上面有头颅徽记。红狼终于来了！有个人追上他,此人穿着浅色雨衣,用肘部触了触红狼,指着皮恩做了一个“不”的示意,面带着不悦的表情:是“委员会”。他为什么不愿意红狼追上他？他指着水池上的画。画很大,画的是皮恩的姐姐与德国人上床的内容。

水池后面堆满垃圾。皮恩原先没发现这些,现在想在垃圾中间挖一个藏身处,却触到一个人头:有个人被活埋在垃圾堆中,是那个脸刮得很干净、表情悲伤的哨兵。

皮恩惊跳起来:睡了多久?周围一片漆黑。红狼为什么还不回来?他是否遇上巡逻队被捕了?或者他回来过,叫他他不醒,以为他死了就又走了?也可能是有人在周围乡下到处寻找他们两人,他们不能离开一步?

皮恩从水池后面出来,青蛙的叫声此起彼伏。大海在深夜像一把闪闪发亮的剑。在野外有一种奇异的渺小感觉,这不是惧怕。现在,皮恩孤单一人,就他一个人。走过康乃馨和金盏花地,在山坡上走要尽量站直,他通过司令部控制区,然后下到沟里,那是他的地方。

他饿了,这个季节樱桃熟了。远离房子有一棵樱桃树,难道是由于魔法而在这里长出这棵树?皮恩爬上去猛摘起来。一只大鸟抓他的脸:鸟在那里睡觉。这时候,皮恩愿意和所有动物做朋友,但愿没打扰这只鸟。

当他不感到太饿了,便朝口袋里边装满了樱桃,然后跳下树来,又上路了,嘴里吐着樱桃核。他想法西斯分子可以顺着樱桃核追上他。但是世上除了红狼之外没人这么机灵会想到此。对,如果皮恩留下樱桃核,红狼会找到他,无论他在哪里!只要每二十步扔一粒樱桃核就行了!转过一道墙。皮恩吃一粒樱桃,在老榨油机房旁吃一粒,过了枇杷树又吃一粒。这样可以一直走到蜘蛛巢小路。但是还没走到水沟旁,樱桃已经吃完了,皮恩明白,红狼永远找不到他了。

皮恩走在差不多干涸的沟底里,里面有白色大石子和芦苇废纸,走在上面沙沙作响。井底下睡着的鳗鱼像胳膊一样长,弄干水用手就可以捉到。在老城的河口处睡着一些醉汉和得到满足的女人。皮恩的姐姐单独睡或是有人陪着睡,已经把他忘了,不想他是

否活着。在牢房的草堆上,只有老板彼埃特罗马格罗醒着,血管里的血正在变成黄尿,离死不远了。

皮恩到了自己的地方:他的水渠旁小路,他的蜘蛛巢捷径。他认出了那些石头,看看土是否被人动过,没动过,没人碰过。用指甲急切地挖起来,当触到手枪皮套时,感到非常亲切激动,就像小时候摸到枕头下面的玩具一样,赶紧取出手枪,用手指抠出枪里的土。突然,从枪管里出来一只小蜘蛛,它在里面做窝呢。

他的手枪很美,皮恩在世上只剩下这个东西。他握起手枪,想像自己是红狼,尽量想像红狼手里有了这支枪会干什么。但是,这也提醒他,他是一个人,得不到任何人的帮助,不管是酒馆里那些不可捉摸的人,还是他那做叛徒的姐姐,还是狱中的老板彼埃特罗马格罗,都帮助不了他,他甚至不知道如何处理这把手枪,也不会上子弹。如果人们发现他手里拿着枪,他必死无疑。他把枪装进皮套,又用草、土和石头盖上。现在他只能朝村子走去,不知道怎么办。

他又走上水渠旁的小路,黑暗中道路不平人容易失去平衡,脚踩进水沟里或者掉下去,皮恩集中精力保持平衡,强忍住不哭出来。他确实想哭,眼泪在眼眶里转,先是低声哭泣,而后是痛哭流涕,他边哭边走,看见一个人影,停住,那个人也停住了。

"谁在那里?"那人问道。

皮恩不知如何回答,眼泪涌了出来,他绝望地大哭起来。

那个人走近他,很高很胖,身着便装,带着冲锋枪,短斗篷斜挂在肩上。

"说,为什么哭?"那人问。

皮恩盯着他,此人高大,塌鼻子的脸就像个人形喷泉,脸上两撇小胡子,口中牙齿不多。

"这时候,你在这里干什么?"那人问,"迷路了?"

那人身上最怪的是帽子:一顶绣边的呢帽,上面有丝球饰物,

不知是什么颜色的。

“你迷路了。我不能送你回家，我不认识儿家，再说，我也不能领走迷路的孩子！”

他说这些话与其说是向皮恩解释，还不如说是向他自己解释。

“我没迷路。”皮恩说。

“那怎么了？怎么转到这里了？”戴呢帽的大块头说。

“你先告诉我你是干什么的？”

“好孩子，”那人说。“你真棒！你是个好孩子，为什么哭？我在夜里去杀人。你怕吗？”

“我不怕，你是个杀人凶手？”

“你看，连小孩也不再害怕杀人的人。我不是凶手，但照样杀人。”

“现在你去杀人吗？”

“不，我回来了。”

皮恩不感到害怕，因为他知道有的人杀人，但照样是好人。红狼总是谈论杀人，但他是好人。他家对面的画家杀死了妻子，也是好人。法国人米歇尔现在若杀了人，也是好人，依然还是法国人米歇尔。还有这位戴着呢帽的大块头，他忧郁地谈论着杀人，好像是受罚去干这件事一样。

“你认识红狼吗？”皮恩问。

“见鬼，当然认识他。红狼是比翁多的人，我是得利托的人。你怎么认识他？”

“我先前和红狼在一起，我把他丢了。我们从监狱跑出来。我们把垃圾桶扣在哨兵头上。他们曾用手枪皮带抽我，因为枪是我从和我姐姐好的那个水兵那里偷的。我姐姐是长街的黑女人。”

戴呢帽的那人用手指捋捋胡子，说：“是，是，是，……”尽量想一下子明白整个故事。“现在你想去哪里？”

“不知道，”皮恩说。“你去哪里？”

“我去营地。”

“带我去吗?”皮恩说。

“来吧。你吃饭了吗?”

“吃的樱桃。”皮恩说。

“好,拿着面包。”他从口袋里拿出面包给他。

现在他们在橄榄地里走。皮恩吃着面包,眼泪又顺着面颊流下来,他把它混面包一起吞下肚。那人拉着他的手。这是一只大手,又热又软,像是面包做的。

“我们看看是怎么过来的……最开始你告诉我……有一个女人……”

“我姐姐。长街的黑女人。”皮恩说。

“当然了,所有结尾不好的故事开头都有一个女人。错不了。你年轻,学学我跟你说的:战争完全是女人的过错……”

五

皮恩醒来时，从树枝间望见零散的天空，亮得有点刺眼。天亮了，这是晴朗自由的一天，鸟儿在唱歌。大个子已经站在他旁边，卷起脱下的短斗篷。

"走吧，天快亮了。"大个子说。他们几乎走了一夜。经过橄榄园，荒芜的土地，然后是黑暗的松树林，还看见雕鸠。皮恩不感到害怕，因为戴呢帽的胖子一直拉着他的手。

"你困极了，我的孩子，"大个子说，又拉了拉他，"不想让我抱着你吧？"

皮恩困得睁不开眼，很愿意在树下的蕨类植物中睡去，直到被它们淹没。差不多上午了，他们来到一个煤站的空场上，大个子说："我们可以在这里停一下。"

皮恩躺在煤烟熏黑的地方，像在梦中一般看见胖子给他盖上短斗篷，然后来回搬木头，劈开，点火。

天已大亮，大个子在熄灭的火灰上撒尿。皮恩站起来在他身边也往上撒尿。一边看着那人的脸：他还没在光亮下好好看过他。影子慢慢移开树林和惺忪的眼睛，皮恩继续在大个子身上发现某些新东西，他比外表看上去要更年轻，体型不是太胖，胡子微红，蓝眼睛。嘴大牙不齐，鼻子又扁，像面具一样。

"从这里走一会就到了。"穿过树林时他不时对皮恩说。他不会长篇大论，皮恩喜欢和他一起静静地走路。说实在的，他有点怕这个夜里一个人去杀人的人，但这人对他很好，还保护他。好人总

使皮恩感到尴尬:不知道怎么对待他们,想气他们一下看他们怎么反应。但和戴呢帽的胖子在一起却不同,不知道他杀了多少人,可以承认他是个毫无内疚的好人。

大个子只知道谈论没完没了的战争,谈他当了七年阿尔卑斯山地狙击兵后还不得不背着枪到处转,最后说这些年惟一活得最好的是女人,说他走南闯北,知道女人是最坏的人种。皮恩对这类话题没有兴趣,这些都是这个年代的老生常谈。但是关于女人,他从未听人这样说过。这人和红狼不同,红狼对女人不感兴趣:这个人好像很了解女人,可能有什么个人恩怨。

他们离开松树林,走进栗子树林。

"过一会,我们真的到了。"大个子说。

实际上,过了一会他们遇见一头骡子,带马具但没有驮鞍,吃着草随便地走着。

"我问问这是否是给妓女派骡子的方法,用不着拴它,"大个子说,"过来,到这里来!"

他抓住骡子的缰绳,牵过来。这是一头伤皮的老骡子,温柔听话。他们来到林中的一片空地,那里有一间农舍,里面烤着栗子,屋里没人,大个子停下,皮恩也停下。

"出什么事了?"大个子问,"怎么人都走了?"

皮恩明白这里可能有可怕的东西,但他不知道事情到底怎么样,也不会被吓住。

"喂,谁在那里?"大个子问,声音不高,一边从肩上拿下冲锋枪。

这时从农舍里走出一个较矮的人,肩上扛着口袋,看见他们来了,便把口袋扔到地上,拍了拍手:"你好,表兄!今天是音乐节。"

"曼奇诺!"皮恩的伙伴说,"活见鬼!其他人都哪里去了?"

此人搓着手迎过来。

"路上要开过来满满三卡车人。是今天早晨接到通知的,全营

都去欢迎了。再过一会音乐就开始了。”

此人穿着水兵上衣，秃头上戴着兔皮帽子。皮恩想他就是住在林中那家农舍中的一个矮人。

大个子用手指擦着胡子说：“好，我也应该去打击他们。”

“如果你来得及，”矮人说，“我留在这里做饭，我肯定中午他们就能消灭敌人回来了。

“既然你在这里，就看好骡子吧。”大个子说，“如果没碰见这头骡子，我们可能走到海边去了。”

矮人拴好骡子，盯住皮恩。

“这是谁？你有了一个儿子，表兄？”

“与其说是有儿子，不如说是伤透了我的心。”大个子说，“这孩子和红狼一起斗争，迷路了。”

情况不完全是这样。但是皮恩也很高兴他这样介绍自己，可能大个子故意这样说，使他的形象更好。

“皮恩，”大个子说，“这是曼齐诺，支队的炊事员，你要尊敬他，他年纪大。因为不这样他不多给你汤。”

“听着，革命的新兵，”曼齐诺说，“你能削土豆皮吗？”

皮恩本想用什么脏话来回答，以此来讨好他，结果没找到词，只能说：“我能。”

“好极了，我早就需要一个帮厨，”曼齐诺说，“等着，我去取刀。”消失在屋子里。

“你说，那是你表兄弟吗？”皮恩问大个子。

“不，表兄是我，所有人都这样叫我。”

“我也？”

“你也什么？”

“我也可以叫你表兄吗？”

“那当然。这是个普通的名字。”

皮恩对此很高兴，突然试着叫一声：“表兄！”

“干什么?”

“表兄,卡车来干什么?”

“来杀我们。但我们要迎上去杀他们。这就是生活。”

“你也去吗,表兄?”

“当然了,我应该去。”

“你走路不累吗?”

“我已经走了七年了,穿着鞋睡觉,即使我死了,脚上也穿着鞋。”

“好家伙,七年没脱鞋。表兄,你脚不臭吗?”

这时,曼齐诺回来了,不光是拿来削皮刀,肩上还扛着一只大鸟,它拍打着剪去尖的翅膀,被链子拴住一只爪,像拴鹦鹉一样。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皮恩问道,用手指摸着鸟喙下面。大鸟瞪着黄眼睛,差一点咬上一口。

“啊,啊!”曼齐诺讥笑道,“差一点咬着你的指头,同志!小心,巴贝夫是只好报复的猎鹰!”

“你在哪里抓到的,曼齐诺?”皮恩问,他越来越学会不信任大人,也不信任大人们的动物。

“巴贝夫是队里的老兵,小时候在窝里被我捉到的,是支队的吉祥物。”

“放飞这只猛禽更好,”表兄说,“吉祥物带来的晦气比神父还多。”

曼齐诺把一只手放在耳朵上,示意大家别说话:“嗒,嗒嗒……听到了吗?”

大家注意听,深谷中传来枪声。连射声,点射声,手榴弹爆炸声。

曼齐诺一只手拍打握拳的另一只手,尖刻地笑着:“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我在这里说过会全部消灭掉。”

“好。我们留在这里,什么也干不了,我去看看。”表兄说。

“等等，”曼齐诺说，“你不吃点栗子吗？是今天早晨剩下的。吉里雅！”

表兄猛然抬起头，问：“你叫谁？”

“我妻子，”曼齐诺答，“她从昨天晚上就在这里。黑色旅在城里追捕她们。”

在农舍门口出现一位女人，尽管有些衰微，但还算饱满年轻。

表兄皱皱眉，捋一下胡子。

“你好，表兄，”女人说，“我被疏散上来。”她揣着手走过来，穿着长裤和男式衬衣。

表兄看了一眼皮恩。皮恩明白：把女人带上来，结果不妙。他很自豪，他与表兄之间有秘密，有只能用眼神交流的关于女人的秘密。

“你来带来了好天气。”表兄挖苦道，移开他的眼光指着山谷方向，那里还传来枪声。

“你要什么天气，比这个还好？”曼齐诺问。“听，重机枪声多好听，听见激烈的枪声吗？吉里雅，给他一杯栗子，他要下山。”

吉里雅以奇怪的微笑看着表兄。皮恩发现她长着一双绿眼睛，活动着像猫背一样的脖子。

“没有时间了，”表兄说，“确实该走了。你们做饭，好好干，皮恩！”

他走远了，肩上斜挂着短斗篷，背着冲锋枪。

皮恩本想追上表兄和他一起去，但是遭遇许多不幸之后，他也实在累了。深谷里的枪声使他莫名其妙地害怕。

“你是谁，孩子？”吉里雅问，一只手摸他竖起的鬈发。皮恩摇摇身子，因为从未受到女人的抚摩。再说他也不高兴她叫他孩子。

“我是你儿子：昨夜你没发觉自己在分娩吗？”

“答得好！答得好！”曼齐诺叽里呱啦地说道，用一把刀磨着另一把刀，逗着焦躁不安的猎鹰。“对一个游击队员，永远不能问：你

是谁？可以回答：我是无产者的儿子，我的祖国是国际[1]，我姐姐是革命。”

皮恩斜眼盯着他，使着眼色：“什么？他也认识我姐姐？”

“别听他的，”吉里雅说，“他老谈革命，弄得队伍里的所有人都厌恶他。政治委员们也反对他：托洛茨基分子，说他什么，是托洛茨基分子！”

托洛茨基分子，又一个新词。

“什么意思？”皮恩问。

“我也不十分知道是什么意思。”吉里雅说，“但这个词肯定适合他：托洛茨基分子。”

“白痴！”曼齐诺叫着反驳说，“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如果你上山来就是为了气我，那你就马上回城去，黑色旅等着你！”

“可恶的自私鬼！”吉里雅说，“由于你的过错……”

“住口！”曼齐诺说，“让我听听：为什么重机枪不响了？”

一直射击的重机枪，突然不响了。

曼齐诺看着自己的妻子，担心地问：“出什么事了？子弹没了？”

“……机枪手可能牺牲了……”吉里雅焦急地说，两人都注意地听，然后相互看看，脸上又有了怨恨的表情。

“好吗？”曼齐诺说。

“我刚才说，”吉里雅又嚷道，“由于你的过错，我提心吊胆地过了几个月，你还不愿意让我上来躲躲。”

“母狗！”曼齐诺说，“母狗！我上山是因为……听！枪又响了！”

重机枪又开始射击了，停停射射。

“这还不错。”吉里雅说。

---

① 即共产国际。

“……是因为……”曼齐诺喊道，“你让我看到的一切使我再也不能和你在家里过了！”

“是吗？可是什么时候这场战争才会结束，船再出航，我才能一年只见到你两三次？……你说，这是什么声？”

曼齐诺不安地听着：“是迫击炮吧……”

“我们的，还是他们的？”

“让我听听！这是出发的枪声……是他们的。”

“是到达的枪声，在山谷那边，是我们的……”

“你总是跟我作对，我好像到了认识你那天所在的地方！是的，是我们的……很好，吉里雅，很好……”

“我早给你说过：托洛茨基分子，这就是你，托洛茨基分子！”

“机会主义分子！叛徒！可恶的孟什维克！”

皮恩开心极了，在这里他觉得不错，原先在小街里，丈夫和妻子成天吵架，他在窗底下能听几个小时，像听收音机一样，不漏过每句话。还经常与哭喊着出来的女人搭话，因为有时吵架的两口子不吵了，就从窗户伸出头来痛骂他这个坏小子。

在这里一切都很好玩：森林中间，伴随着枪炮声，听着一些有色彩的新词。

一切都静下来，深谷里的战斗大概结束了，这夫妇二人互相看着，再也不说话了。

“嘿，你们不愿意这么快结束，”皮恩说，“你们思路断了？”

两人看了看皮恩，又互相看了看，在想着要说点什么，和立即反驳什么。

“唱歌了！”皮恩惊喜地喊起来。实际上，深谷里传来了分不清是什么歌的回声。

“唱的是德语……”厨师嘀咕说。

“傻瓜！”女人叫道，“没听见是《红旗歌》吗？”

“《红旗歌》？”侏儒拍手转了一圈，猎鹰在他头上要飞。

“是的，是《红旗歌》。”

他跑出去，跑向峭壁，唱着：“红旗必将胜利……”一直唱到崖边，耳朵冲着峭壁。

“不错，是《红旗歌》！”

他欢叫着跑回来，猎鹰跟着链子振翅，像只风筝一样。他吻妻子，拍皮恩的脑袋，三人拉着手唱起来。

“你看，”曼齐诺对皮恩说，“你不会相信我们是真吵吧：是开玩笑。”

“确实如此，”吉里雅也说，“我丈夫有点傻，但他是世上最好的丈夫。”

她一边说着，一边摘下他的兔皮帽，在秃头上吻起来。皮恩不知道是不是大人们总是这样捉摸不定和撒谎。不管怎样，他很开心。

“下面是削土豆皮！”曼齐诺嘱咐，“两小时后他们要回来了，饭还没做好！”

他们把土豆倒出来，坐在一起削土豆皮。削完的扔进大圆锅里。土豆冰凉，冻手指头。然而和这类侏儒在一起削土豆也蛮有意思。不知此人是好是坏，他妻子更让人弄不明白。吉里雅不削土豆皮，倒梳起头发来，这使皮恩很生气。他不喜欢自己干活时有人在面前闲着。曼齐诺继续削着土豆皮，他大概习惯了，因为他们之间总是这样。

“今天做什么吃的？”皮恩问。

“羊肉土豆，”曼齐诺回答。“你喜欢羊肉土豆吗？”

皮恩只知道饿，回答说喜欢。

“你做饭好吃吗，曼齐诺？”皮恩又问。

“看你说的，”曼齐诺说，“这就是我的职业。我在船上当厨师已有二十年了，各个国家、各种式样的船上都待过。”

“也有海盗船？”皮恩问。

“也有海盗船。”

“也有中国船?”

“也有中国船。”

“你会中国话吗?”

“我会天下各国的语言。会做世界各地的饭菜:中国菜,墨西哥菜,土耳其菜。”

“今天你怎么做羊肉土豆?”

“爱斯基摩人做法。你喜欢爱斯基摩人吗?”

“什么,曼齐诺,爱斯基摩人做法。”

在曼齐诺破裤脚露出的踝骨处,皮恩看见上面画着一只蝴蝶。“这是什么?”他问。

“是文身。”曼齐诺回答。

“有什么用?”

“你想知道的太多了。”

水开了。第一批人回来了。

皮恩总是渴望见到游击队员,今天在农舍前空地中间他目瞪口呆,不能专心看某一个人,人人都不一样,都带着武器和机枪弹夹。

看起来他们也像兵,像是很多年前的一场战争中迷路的一个连,在树林中转来转去,找不到回去的路,穿着破军服、烂皮鞋,好长时间没剃头发和胡子了,拿的武器现在也只能用来杀野兽了。

他们很疲惫,汗流浃背,身上也沾满了土。皮恩本来想他们会唱着歌回来,而现在却是一声不吭,表情严肃,静静地倒在干草上。

曼齐诺异常兴奋,活蹦乱跳,用一只手掌拍打另一只握拳的手,大笑着说:“这一次,我们狠狠地揍了他们一顿!我们是怎么打的?给我说说!”

大家摇着头,躺在草地上不说话。他们为什么不高兴?好像是打败仗回来的。

“那么说，仗打得不好？我们有人牺牲了？”曼齐诺挨个问，他不相信这是真的。

德利托也来了，他是支队司令。消瘦，年轻，黑眉毛，鼻孔动作很怪。他转了一下，训斥大家，抱怨饭为什么还没好。

“到底出什么事了？”厨师问，“我们没打胜？不跟我讲清楚我就不做饭了。”

“胜了，胜了，我们打胜了。”德利托说，“打毁两辆汽车，打死二十多名德国兵，缴获很多战利品。”

他说这些时很不耐烦，好像不太情愿似的。

“那么说，我们有很多人牺牲了？有我们支队的人吗？”

“伤了两人，是别的支队的，我们支队安全无恙，明白了！”

曼齐诺望着他，可能开始明白了。

“你不知道，我们被调到了山谷的另一面，”德利托喊道，“我们一枪也没能开！旅部应该决定：要不信任我们中队，就把我们解散。要么相信我们和别的游击队员一样，那就派我们参加行动。否则，下一次让我们做后卫部队，我们就不去。我辞职，我病了。”

他吐了口痰，走进屋里。

表兄也来了，他叫皮恩。

“皮恩，你想看全营部队通过吗？下去，到崖边去，在那边能看见道路。”

皮恩跑过去，在灌木丛中露出头来，在他下面是条大路，一排队伍在向上走。但这些人不同于以往见到的：身上涂着颜色，闪闪发光，都留着长胡子，全副武装。他们的军服很怪，墨西哥式宽边帽，钢盔，皮外套，上半身光着，红围巾，各种军队的军服，武器也不一样，都是没见过的。俘虏也过来了，脸色苍白，垂头丧气。皮恩以为这都不是真的，是太阳光在道路尘土上照的。

突然，他跳起来。他见到一张熟悉的脸，没错，是红狼。他喊他，很快追上去：红狼扛着一支德国枪，走路一瘸一拐，脚踝肿了。

还戴着俄国式的帽子,但上面有一颗星,是红的,中间是白圈和绿圈。

"好孩子,"红狼对皮恩说,"你回家了,真棒!"

"红狼,"皮恩不明白,"你怎么在这里?我等了你很久。"

"你看,我从那个地方出来后,想看看下面德国人停汽车的地方,我进到附近的一个花园里,在围栏处看见一队全副武装的德国兵。我想:他们在准备进攻我们,如果现在开始准备,可能黎明进攻。于是我去通知他们,事情很顺利,只是我摔倒,脚踝肿了,现在瘸了。"

"你真是个奇才,红狼,了不起。"皮恩说,"你还是个骗子,把我扔在那不管。而之前还对我以荣誉担保。"

红狼按了按俄国式帽子:"首要的荣誉是事业的荣誉。"

两人一起来到德利托的营地,红狼从上到下打量所有人,冷淡地向大家回礼。

"你到了一个好地方。"红狼说。

"为什么?"皮恩不无辛酸地问道。他已习惯这里的环境,不愿意红狼再把他带走。

红狼凑到他耳边:"不要告诉任何人,我知道了。旅部最无能的混蛋们被派到德利托支队里来了,他们可能留下你,因为你是个孩子。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想法让你换个地方。"

皮恩不高兴因为他是个孩子才留下他,还有他认识的那些人也不是混蛋。

"告诉我,红狼,表兄是混蛋吗?"

"表兄是一个要让他自己干的人。他勇敢、能干,总是一个人到处转。好像有人说他的一个情人,去年冬天让人杀了我们三个人。大家都知道与他没关系,但他还是平静不下来。"

"告诉我,曼齐诺真的是托洛茨基分子吗?"

皮恩想:可能现在他会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

“政治委员对我说,他是一个极端分子。你听他的吗?”

“不,不。”皮恩赶紧说。

“红狼同志,”曼齐诺肩扛猎鹰走过来大声说,“我们让你当老城苏维埃委员!”

红狼都不正眼看他:“极端主义,共产主义的幼稚病。”他对皮恩说。

六

周围是一片树林，树下面有满是栗子皮的草地和满是硬树叶的干涸池塘。晚上，栗子树间飘动着雾气，它和苔藓与地衣合作，使树背发霉。还没走到这里，就能通过树顶升起的烟和树林中的低声合唱猜到这块营地。这是一幢石房子，两层楼，原先底层地上铺土养牲口，上层铺着树枝供牧人睡觉。

现在上、下两层都住着人，以鲜蕨和干草做褥草。底层点火的烟没有窗户出去，都积存在房顶下面，使人眼睛流泪，嗓子咳嗽。每天晚上，为了不让敌人发现，大家围在屋内有火的炉灶旁，你压着我，我压着你。皮恩在反射光照亮的地方，像在小街酒馆里一样高声唱歌。这些人和酒馆里的那些人一样，支着肘部，目光生硬，只是面前没有酒杯。他们手里有武器，明天要出去向敌人射击。

这和其他任何人都不一样：有敌人，对皮恩来说，这是新的、陌生的含义。在小街里白天黑夜都有喊叫、争吵、男人和女人的恩恩怨怨，却没有敌人的苦涩想法和夜里不让人睡觉的愿望。皮恩还不明白"有敌人"是什么意思。对皮恩来说，所有人既有某种像蛔虫一样令人厌恶的东西，也有某种吸引人的好的热情东西。

这些人不知道想别的事，比如恋爱。讲什么话的时候，嘴唇哆嗦，眼睛发亮，手指抚摸枪的标尺。他们并不要求皮恩给他们唱情歌或令人发笑的小调：他们愿意听他们自己的充满鲜血和动荡的歌曲，或者只有他才会唱的监狱和犯罪歌曲，或者非常下流的、需要发出厌恶的叫喊才能唱出的歌曲。当然，他们比其他任何人都

更令皮恩感到佩服：他们知道装满死人的汽车的故事，知道那些在土坑里裸体死去的奸细的故事。

农舍下面，森林分散成几条带形草地，有人说那里埋着奸细，皮恩夜里经过那里时有点害怕，为了壮胆，他在野草中用手扳着脚后跟走路。

皮恩已成为组织的一员，和大家关系密切，对每个人都能找出话来开玩笑，或追赶着胳肢人或打架。

"好哇，司令，"他对德利托说，"有人对我说你已叫人做好了制服，下山时穿上，有军衔、马刺和剑。"

皮恩和指挥员们开玩笑时，总是尽量使他们高兴，因为他愿意做他们的朋友，也为了逃避值班站岗和做杂役。

德利托是个瘦青年，南方移民的儿子，笑时不自然，长睫毛，老垂着眼皮，职业是服务员。这是个好职业，因为总是生活在富人周围。一个季节工作，另一个季节休息。他更愿意整年把健壮的双臂放在头下躺在地上晒太阳。然而，现在却是违背自己的心愿，整天骑着摩托车到处忙，鼻孔老动，像支天线，他慢慢喜欢上摆弄武器。在旅司令部里大家都防备他，因为从委员会传来对他不利的消息，说他在行动中喜欢自作主张，太愿意指挥别人，而很少愿意做榜样。他乐意的时候，非常勇敢。现在指挥员很少，就把一个支队交他指挥，但对该支队不能太依靠，用它来孤立那些可能破坏别人的人。德利托为此对司令部不满，干些工作还懒懒散散。时不时地说自己病了，就躺在屋内的鲜蕨床上，双臂放在头下，垂着眼睛。

要他起来，需要一位了解他的支队政委。贾钦托政委被虱子弄得筋疲力尽，虱子多到他难以控制，就像他不知如何在指挥员和战士面前树立权威。他经常被叫到营部或旅部，让他评论局势和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但还是白费力气，因为他回来后，从早到晚依旧无所事事，假装不知道司令干什么事，也不知道战士们说什么

话。

德利托动动鼻孔，不自然地笑笑，接受皮恩的玩笑，并说皮恩是全支队最棒的，并说自己病了，想隐退，大家可以把指挥权交给皮恩，反正事情总也不顺利。于是大家围在皮恩周围，问他何时采取行动，会不会向德国兵瞄准射击。听到这话，皮恩勃然大怒，因为说实在的，他听到枪声就害怕，没有勇气向人射击。但是当着同志们的面，他愿意让人相信他和大家一样。于是向人讲述若让他参加战斗时，他要干什么，把双拳靠近眼下，做拿机枪射击的姿势。

他激动了：想到法西斯分子，想到德国兵抽打他的时候，想到审讯室中那些没胡子的浅蓝色脸。哒，哒哒哒，都把他们打倒了，他们在德国军官的办公桌底下咬地毯，满嘴流血。

他变得粗野鲁莽，有杀人的愿望，也想杀藏在鸡舍里的执勤兵，尽管他是个傻子。正因为傻才杀他；还想杀悲伤的监狱哨兵，正因为他悲伤刮破了脸才杀他。这种愿望和他以前的爱情愿望一样遥远。味道和烟酒一样令人厌恶，令人刺激。这是一种说不清楚的愿望。因为所有人都有，包含神秘的快感使人得到满足。

"如果我像你一样是个孩子，"细高个泽纳，又名木帽子，对他说，"我就不会下山进城，向一个军官开枪，然后再跑来。你是个孩子，没有人注意你，你可以钻到他鼻子底下。逃跑对你来说很容易。"

皮恩气得难受，知道他们说这些话是为了取笑他。再说他们不给他枪，又不让他离营地太远。

"派我去吧！看吧我会去的。"他说。

"好，你明天出发。"大家起哄说。

"有一天我下去，消灭一个军官，打什么赌？"皮恩说。

"行。"其他人说，"德利托，给他武器吗？"

"皮恩是帮厨，"德利托说，"他的武器是削土豆刀和长柄勺。"

"我根本不在乎你们的武器！小子们，我有一支德国水兵的手

枪,和你们任何人的都不一样。”

“见鬼啦!”其他人惊叫起来,“放在哪里?在家里?一支水兵手枪,是水枪吧?”

皮恩咬着自己的嘴唇:有一天我去取枪,做些惊人的事,惊你们一下。

“我有一支 P38 型手枪,藏在只有我知道的地方,我们打什么赌?”

“你把枪藏起来,算什么游击队员?告诉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去取。”

“不行,这地方只有我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

“为什么?”

“因为蜘蛛在那里筑巢。”

“说什么呢?蜘蛛什么时候筑过巢?是燕子吧?”

“如果不信,给我一支你们的枪。”

“我们的枪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是我们缴一获一的。”

“那支手枪也是我缴获的,小子们。在我姐姐房里,当时那小子……”

众人大笑,不明白其中的故事。皮恩真想离开,带上自己的手枪单独做一名游击队员。

“我能找到你的 P38 型手枪,打什么赌?”

问这话的是佩莱,一个虚弱的孩子,总是着凉得病,干燥的唇边刚长出胡子。这时正在用布细心地擦枪封闭器。

“赌你姑姑,反正你不知道蜘蛛巢在什么地方。”皮恩说。

佩莱停下来不擦了,说:“小屁孩子,沟里的地方我全都了如指掌。我放在岸边躺下的女孩有多少,你难以想像。”

佩莱有两大爱好毁了他:武器和女人。他对皮恩非常懂行地谈论城里的所有妓女和称赞他姐姐“黑女人”,说明也很了解她,从而得到皮恩的敬佩。皮恩欣赏他,也厌恶他:他这么虚弱总是着凉

得病,总向人讲他冷不防抓住姑娘的头发,将她们按倒在草地上的故事,或是讲黑色旅送给他复杂的新式武器的故事。佩莱年轻,但随着野营和行军也走遍了意大利,枪不离手,逛遍所有城市的妓院,尽管还不到规定的年龄。

"没人知道蜘蛛窝在哪里。"皮恩说。佩莱露出牙床笑着说:"我知道。现在我进城,到一个法西斯分子家去拿一支冲锋枪,也去找你的手枪。"

佩莱经常进城,回来时总带着不少武器,他总能知道枪藏在什么地方,知道谁把枪放在家里。为了增加自己的武器,每次他也冒着被捕的危险。皮恩不知道佩莱说的是不是真话。也许佩莱就是他要找的伟大朋友,知道女人、手枪、蜘蛛巢等所有事情,但他冰冷的小红眼睛也令自己害怕。

"如果你找到,会给我吗?"皮恩问。

佩莱冷笑道:"我找到,自己留着。"

向佩莱要枪太难了,支队里每天都发生不少事情,因为佩莱不是个好同志,总夸耀自己有权支配自己弄来的所有武器。来支队之前,为了得到一支冲锋枪,他加入黑色旅。宵禁时,他满城转悠,向猫开枪。后来就偷了武器溜走了。从那以后,就经常出入城里,搞到一些怪异的自动武器、手榴弹和手枪。他经常谈论黑色旅,添油加醋,还算有些吸引力。"对黑色旅一些人这么干……又那么说……"

"德利托,我去找,说定了!"佩莱说,伸出舌头舔舔上嘴唇。

一般不应该让一个闹自由主义的人来来去去。但佩莱出去总有收获,从来没空手回来过。

"我放你出去两天,"德利托说,"不许多了,这样说定了。别胡来让人抓着。"

佩莱继续润着嘴唇,说:"我带新'斯坦'枪。"

"不行,"德利托说,"你有一把旧'斯坦',新的我们用。"

又是老一套。

“新‘斯坦’是我的，”佩莱说，“我弄来的，我愿意什么时候带就什么时候带。”

佩莱吵架时，眼睛发红，和哭一样，鼻音更重了。德利托冷冰冰地毫不动摇。开口之前，只捅了一下鼻孔。

“这么说，你不去了。”他说。

佩莱开始诉苦，说自己的功绩，并说如果是这样，他就离开支队，带走他所有的武器。德利托打了他一巴掌，说：“照我说的办，行吗？”

同志们看着他并同意他的做法。他们不尊重佩莱，也不尊重德利托，但很高兴看到指挥员让人尊敬他。

佩莱愣在那里，摸摸苍白的脸上的五个红手印。

“你等着看吧！”说完，转身出去。

外面，大雾弥漫，大家耸耸肩。以前许多次佩莱也这么干过，回来时又总是带着新的缴获物。皮恩跑上去跟着他，说道：“你说，佩莱，我的手枪，听着，我的那支手枪……”不知道该问他什么。可佩莱已经消失了，大雾吞没了叫喊声。

皮恩又回到大家中间，大家头发里夹有细草，目光辛酸。

为了活跃气氛和让大家开心，皮恩又开始对不能自卫的人开玩笑，自己也被别人开玩笑。这时候，卡拉布里亚大区的四个青年被领进大家中间：公爵、侯爵、伯爵、男爵，他们是连襟，为了与由卡拉布里亚大区移民到此的四个同乡姐妹结婚来到此地。在公爵带领下，为了自己也干点强盗事。

公爵是他们的老大，有威信，戴一顶圆皮帽，扣得很低，方脸，有胡子。腰带上挂一把奥地利大手枪。谁要反对他，他便拿出枪瞄准你的肚子，嘴里用气愤和怪诞的双词尾语言嘟囔着吓人的话：“打死你，打死你！”

皮恩调皮地对他说：“嘿，老乡！”

公爵不知道这是开玩笑，马上跑到他后面用奥地利手枪顶着他，叫道："我烧你的脑袋，打断你的角。"

皮恩不害怕，因为知道其他人和他站在一起，保护他。和卡拉布里亚人在一起也很好玩。侯爵有张海绵脸，头发盖过前额；伯爵很瘦，表情忧郁，像个黑白人的混血儿；男爵年纪最轻，头戴一顶黑色的大农民帽，一只眼斜着，衣服扣眼上挂着圣母像章；公爵职业是地下屠宰户，支队里有动物要宰，可以让他干。他有一种模糊不清的血崇拜。四个兄弟经常出去，到康乃馨种植园，那里住着他们的妻子四姐妹，在那里，他们和黑色旅有神秘的决斗、埋伏和报复，就像过去为了自己的利益，因为家庭间的对立而进行战争一样。

有时候，晚上，细高个泽纳，又叫木帽子，叫皮恩不要说话，因为他找到一本好书，要大声念给他听。细高个泽纳又名木帽子整天不出门，躺在碎干草上，在油灯下读一本厚书，书名叫"超级侦探书"。战斗时他也带着书，德国兵来之前，把书放在机枪弹盘上继续读。

现在，他用他那单调的热那亚口音高声念着书，内容是一帮人在神秘的中国人街区失踪的故事。德利托喜欢听人念书，还让别人不要说话。他一生中没有耐心地读过一本书。有一次，在监狱里，他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听一位老囚犯大声读《基督山伯爵》，他很喜欢。

皮恩不明白念书有什么乐趣，他厌烦了。他说："木帽子，到那天夜里你老婆会说什么？"

"哪一夜？"细高个泽纳又名木帽子问，他还不习惯皮恩的打趣话。

"第一次和她上床的那一夜，你还继续没完没了地读书！"

"豪猪脸！"细高个泽纳对他说。

"牛嘴唇！"皮恩针锋相对。这个热那亚人长着一张苍白的宽脸，两片宽嘴唇，眼睛无神，有沿的皮帽子像木头做的。细高个泽

纳大发其火，站起来："为什么牛嘴唇，为什么叫我牛嘴唇？"

"牛嘴唇！"皮恩还这么叫。站在他两只大手能打到的范围之外。"牛嘴唇！"

皮恩不惊慌，因为知道这个热那亚人不会追他，过一会还是让他说，他自己又接着读书，用粗指头做着记号。他是队伍中最懒的人：他有一个装卸工的脊背，但在行军中总是找借口不背东西，各个支队都设法摆脱他，最后派他到德利托支队来。

"人们被迫工作一辈子，这太残酷了。"细高个泽纳又名木帽子说。

在美洲有些国家，人们不受累就成为富翁：等到轮船启航时，细高个泽纳就去那里。

"自由的主动性，一切的秘诀就在于自由的主动性。"他说。躺在屋内的干草上，舒展一下长胳膊，手指点着书，接着读下去，书中讲述那些国家的自由幸福生活。

夜里，其他人都垫着草睡着了，细高个泽纳又名木帽子折好读到的那页书的一角，阖上书，吹灭油灯，脸放在被子上睡着了。

七

游击队员做梦很少也很短，夜里饥饿时才做梦，梦见的也是食物少还要分给许多人吃。梦见把咬碎的面包放进抽屉里。无主人的狗应该也做这样的梦，梦见把啃碎的骨头藏在地下面。只有肚子吃饱了，火也点着了，白天走路不太多，晚上才能梦见裸体的女人，早上醒来时有鲭鱼和香槟酒，像起锚时一样欢乐。

这时睡在干草上的男人们开始谈论自己的女人，谈过去的，谈将来的，或制定战争结束以后的计划，或传看发黄的照片。

吉里雅在又矮又秃的丈夫那边，靠近墙睡着了。早晨，听见充满欲望的男人们的讨论，觉得大家的目光都投向她，就像干草中的一排蛇。她起来，去喷泉洗脸。男人们留在黑屋里还想着她解开衣服，往胸部擦肥皂。一直不说话的德利托也起床了，去洗脸。大家骂皮恩，因为他说破他们的想法并讥笑他们。

皮恩在他们中间像在酒馆的男人中间一样，但是这里更有色彩，更有野味，比如在干草上度过的那些夜晚，胡子上爬满昆虫。除了大家都有的这种对女人的可笑欲望外，他们身上有某种新东西吸引皮恩，又令皮恩害怕：他们回来时经常带来一些陌生人，这些人环视四周，好像闭不上张大的眼睛，又好像张不开嘴，以便向人问话来解开心中的疑惑。

来的人顺从地和他们一起到树林尽头的多雾干枯的草地上去，然后再也见不到他回来了。有时候，在某个人身上能见到他的帽子，或是他的上衣，或是他的皮鞋。这是种神秘的迷人的事情。

皮恩每次都想跟随一小队人到草地去，但是别人用脏话把他赶走。皮恩在房前跳着，用一把扫帚逗猎鹰，同时想像在多雾潮湿的草地上举行的秘密仪式。

一天夜里，德利托和他开玩笑，告诉他在第三片草地上有个东西会让他惊奇。

“告诉我是什么，德利托，坏家伙！”皮恩很好奇，但黑暗中那些灰蒙蒙的林中空地也使他有点害怕。

“往前走，一直找到草地。”德利托说，嘴边露出奸笑。

皮恩一个人朝黑处走，恐惧就像潮湿的雾气一般，钻到骨头里。他顺着山脊走着，已经看不到农舍门里点火的光亮了。

他及时停下来，差一点踩在一只脚上。在身边看到一个白色的东西在草地上：草丛中有个背部已肿胀的人体。皮恩惊呆了，地上还伸出一只黑手搭在人体上，滑来滑去，像是一只溺水者的手。不是手，是一只癞蛤蟆！是夜里在草地上活动的一只癞蛤蟆爬到了死人的肚子上。皮恩吓得毛骨悚然，急忙跑出了草地。

一天，公爵回到营地，他和三个兄弟执行了一次神秘的任务。回来时脖子上围着一条黑色围巾，手里拿着小皮帽。

“同志们！”他说，“他们杀了我的兄弟侯爵。”

大家从屋里出来，看见伯爵和男爵也来了，脖子上都围着黑围巾，抬着用葡萄架和橄榄枝做成的棺材，里面装着他们的连襟侯爵，他是被黑色旅在康乃馨花地里杀害的。

连襟们把棺材放在屋前，脱帽，敬礼。这时，看见两个俘虏，他们是在前一天行动中被俘的法西斯分子。现在他们光着脚，头发很乱，在那里刮土豆皮，身上的军服上还带着扯破的饰物，没完没了地向走近他们的人解释说自己参军是被迫的。

公爵命令两个俘虏拿着铁锹和杆子，抬着棺材到草地上安葬他的连襟。他们上路了：两个法西斯分子扛着棺材慢慢地走着，后

面跟着三连襟，公爵在中间，其余两人在两旁，每人左手拿着帽子，放在胸口处：公爵的是小圆皮帽，伯爵的是毛料登山帽，男爵的是一顶黑色的大农民帽。右手拿着瞄准的手枪，稍后一点是其他人，大家默默地走着。

过了一会，公爵开始祈祷：拉丁语祷词从他口里说出来像是义愤填膺的骂人话。两个连襟跟着他祈祷，胸前拿着帽子，手枪一直瞄准着。送葬的队伍缓慢地向草地走去。公爵命令法西斯分子走稳点，把棺材抬好，拐弯时小心。然后命令他们停下来挖坑。

其他人在稍远点的地方也停下来，看着他们。棺材和挖坑的法西斯分子附近站着三连襟，脱帽，围着黑围巾，手枪瞄准着，口中念着拉丁语祷词，法西斯分子干得很快，挖完了一个深坑，看着三连襟。

“再挖！”公爵命令道。

“挖深点？”法西斯分子问。

“不，挖宽点！”公爵说。

法西斯分子又继续挖，往上扔土。又挖宽了二三倍。

“行了！”公爵说。

法西斯分子们小心翼翼地把侯爵的遗体放在坑中央，然后想上来填土。

“别上来，”公爵说，“待在下面盖土。”

法西斯分子们铲土掩埋遗体，他们站在遗体两边的小坑里，不时地往上看看公爵是否允许他们上来。公爵让他们继续盖土，死者上面形成一个很高的坟。

大雾来了，其他人离开三连襟走了，三连襟仍是不戴帽子，手枪一直瞄准着。一场浓雾，使人看不清东西，听不清声音。

卡拉布里亚人葬礼的事旅司令部知道了，引起非议。贾钦托政委又一次被召来报告事情经过。与此同时，战士们待在农舍里

欣喜若狂地听着皮恩的笑话。那天晚上因为三连襟在服丧，皮恩有所收敛，只是攻击细高个泽纳又名木帽子。

吉里雅跪在火旁边，给在烧火的丈夫一点一点地递劈细的柴火，也听着别人的谈话，笑着，绿眼睛转着。每当她的眼光与待在暗处的德利托的眼光相遇时，德利托也笑，笑得不自然还带着恶意，两人就这么相互看着，直到吉里雅垂下眼睛，恢复了严肃。

"皮恩，停一会，"吉里雅说，"给我们唱那支歌：谁敲我的门……"

皮恩让热那亚人消停一会，开始挑逗她。

"你丈夫不在家的时候，告诉我，吉里雅，"皮恩说，"你愿意谁敲你的门。"

厨师抬起被火烤得通红的秃头，别人开他玩笑的时候，他也要反击一下："我倒喜欢你去敲门，公爵拿着刀跟在你后面，说：我割断你的肠子！当着你的面关上门。"

但是把公爵扯进来的做法比较笨拙，也没意思。皮恩走近曼齐诺，冷笑着对他说："你看，曼齐诺，那次你真的没发现吗？"

曼齐诺现在也学乖了，知道不该问是哪一次。

"我没有。你呢？"他奸笑着答道。他知道皮恩不会放过他，其他人也等着听他说什么。

"那一次，你出海一年后，你老婆给你生了一个儿子，然后送进养育院，你回来了，什么也没发现吗？"

大家专心致志地听着，这时哈哈大笑，把厨师拉到中间，说："噢，曼齐诺，怎么样？这事你可从来没跟我们说过！"

曼齐诺也大笑起来，笑得像绿柠檬一样酸。"为什么？"他说，"你在杂种养育院时遇到过这个孩子，他对你说的？"

"够了，"吉里雅听不下去了，"皮恩，你能像好孩子一样待一会吗！给我们唱唱那支歌，那歌很好听。"

"我如果愿意，会唱的。"皮恩说，"根据命令，我不干。"

德利托慢慢地站起来，伸了伸懒腰，说道："唱吧，皮恩，唱她说的那支歌，或者警卫线那支歌。"

皮恩撩开眼前的额发，逗他说："但愿德国人别上来。支队司令今晚很动感情嘛。"

皮恩防备挨耳光。德利托在厨师的大脑袋上面看着吉里雅。皮恩摆好姿势，下巴向上，挺着胸开始唱起来：

谁敲我的门，谁敲我的大门
谁敲我的门，谁敲我的大门。

这是一首神秘的令人恐怖的歌曲，是他从小街上一位老太太那里听来的，可能是以前集市上卖唱者唱过的歌曲。

是摩尔人头领带着他的仆人
是摩尔人头领带着他的仆人。

"柴火。"曼齐诺说着，向吉里雅伸出一只手。吉里雅递给他一把扫帚，德利托在厨师的头上伸出手，接过来。皮恩唱道：

告诉我，戈代阿，你的儿子在哪里
告诉我，戈代阿，你的儿子在哪里。

曼齐诺还在伸手，德利托正点着扫帚。吉里雅在丈夫头顶递过来一把高粱秆，手碰到了德利托的手。皮恩注意地看他们捣鬼，继续唱着：

我儿子去打仗，再也不回来
我儿子去打仗，再也不回来。

德利托拉着吉里雅的手，用另一只手接过高粱秆扔进火里。现在放开吉里雅的手，两人互相看着。

他吃的面包能够噎死他
他吃的面包能够噎死他。

皮恩随着火苗做各种动作，每唱两句就增加激情，像是全身心投入进来了。

他喝的水能够淹死他
他喝的水能够淹死他。

这时，德利托跨过厨师，靠近吉里雅。皮恩声嘶力竭地继续唱。

他踩的地能够陷下去
他踩的地能够陷下去。

德利托蹲在吉里雅边上：她给他柴火，他扔进火里，其他人都注意听歌，到了最激动人心的地方。

你说什么呢？我的戈代阿，我就是你的儿子
你说什么呢？我的戈代阿，我就是你的儿子。

火苗太高了，需要从火中撤出一些柴火，不能再往里加了，否则会烧着上面一层的干草，可是他们两人还继续传着柴火。

我说了你的坏话,原谅我,好儿子
我说了你的坏话,原谅我,好儿子。

皮恩汗流浃背,最后一个尖音非常高,使得在房顶附近的猎鹰也在黑暗中振动翅膀,发出沙哑的叫声:猎鹰巴贝夫醒了。

我抽出剑,割下她的脑袋
我抽出剑,割下她的脑袋。

曼齐诺把手放在膝盖上。这时听到猎鹰醒了,便起来去喂它。

脑袋在厅里跳了一下,走了
脑袋在厅里跳了一下,走了。

厨师总带着一个口袋,里面装着动物内脏。他把猎鹰放在一个指头上,另一只手喂它吃带血的腰子。

大厅中间长出一朵美丽的花
大厅中间长出一朵美丽的花。

皮恩尽力唱完最后一句,走近他们两人,冲着耳朵大声喊:

这是被儿子杀死的一位母亲的花
这是被儿子杀死的一位母亲的花。

皮恩扑倒在地,精疲力竭。大家使劲为他鼓掌。猎鹰巴贝夫拍打着翅膀。这时,在上层睡觉的人喊起来:"火! 火!"

火苗变成了大火,扩展到盖树枝篱笆的干草上,劈劈啪啪地

响。

“快跑啊！”慌乱的人们争抢在别人睡觉的地方看到的武器、皮鞋和被子。

德利托一跳站起来，恢复了镇静，喊道：“快搬东西！先搬自动武器、弹药，然后搬旧式步枪！最后搬口袋和被子。还有食品，先搬食品！”

已经脱衣睡觉的人吓得惊惶失措，胡乱地抓些东西向门口冲去。皮恩在人群中打开一条通往外面的路，跑到外面找一个地方看这场火灾：一个动人的场面。

德利托拔出手枪，命令道：“没把东西搬出去之前任何人不许走！把东西搬出去后再回来搬！谁先跑，我就开枪。”

大火已经烧到墙壁，人们镇静下来，冲进烟火中抢运武器和必需品。德利托也进去了，在浓烟中咳嗽着发布命令，又跑出来叫别的人，阻止他们逃跑。他发现曼齐诺扛着他的猎鹰和全部行李在一片草丛中，德利托踢他一脚让他回屋拿军用大锅。

“谁不回去搬东西谁就倒楣！”德利托说。吉里雅平静地经过他身旁，朝火堆走去，面带她特有的怪异的微笑。他对她小声说：“你走吧！”

德利托的心很软，但是有指挥员的果断。他知道火灾的原因在于他的失职。也知道上级指挥部肯定会给他带来更大的不幸。但现在他还是支队司令，活动鼻子，指挥抢运火里的物资，阻止正在休息的人四处逃散，他们为了逃命，可能会丢掉所有东西。

“进到上边去！”他喊道，“还有一挺机枪和两背包子弹。”

“进不去！”大家说，“篱笆都着了。”

突然有人喊：“篱笆塌了！大家都出来！”

人们听见第一阵爆炸声：是稻草中的几颗手榴弹炸了。德利托命令：“所有人都出去！离房子远点！把东西搬开，特别是那些爆炸物！”

皮恩在一个小丘上观察蔓延的大火,夹杂着爆炸声像焰火一样。也听到枪声,从火堆里传出的连发声,子弹夹一个接一个地响。从远处听像战斗一样。天空中出现很高的火光,栗子树冠好像变成金黄色。一些树枝甚至变得很热,大火蔓延到树木,可能会烧到整个树林。德利托在清点缺少的东西:一挺"布里达",六个弹夹,两支旧式步枪,还有手榴弹、子弹和一百公斤大米。他的职业生涯结束了,再不能指挥了,可能被枪决。不管怎样,他继续活动鼻子,分配大家带东西,好像是一次正常的转移行动。

"我们去哪里?"

"以后再告诉你们。先从树林出去,前进!"

整个支队带着武器和行李,鱼贯地向草地走去。曼齐诺扛着军用大锅,上面站着猎鹰巴贝夫。皮恩拿着所有厨房用具。队伍中传着焦虑的声音:"德国人听到枪声,看到火光,很快会追来的。"

德利托脸很黄,不动声色,转过身来说:"安静! 谁也不许说话! 向前走!"

他们好像是打了败仗后正在撤退。

八

新的营房是一个干草仓库，人在里面很拥挤，房顶漏雨。早晨，大家抢着到悬崖边有杜鹃花的地方晒太阳，躺在霜打过的灌木丛中，脱下毛衣逮虱子。

皮恩很高兴曼齐诺派他到附近的地方去干事，到喷泉用水桶打水，到着过火的森林中用一把小斧子砍柴，到小河中去捞做凉拌菜用的水田芥。皮恩唱着歌，看着天空，早晨的世界真清爽，五颜六色的山地蝴蝶在草地上自由地飞来飞去。曼齐诺每次都不耐烦，因为皮恩总是让人等。等他满嘴草莓汁、看够了飞舞的蝴蝶回来时，火也快灭了，或米饭糊了，他就用各种语言把皮恩痛骂一通。这时，皮恩又重新是长街上的有雀斑的孩子，吵吵闹闹几个小时，把分散在杜鹃花丛中的人聚集在厨房周围。

早晨，皮恩走在山间小路上的时候，就忘记了旧街道，那里积存着骡子尿和他姐姐凌乱的床上的男人和女人气味，以及从打开的封闭器冒出的烟和扳扳机后的辛酸味道，还有审讯室内的鞭子声。在这里，皮恩有了色彩斑斓的新发现：从松土里长出的黄褐色蘑菇，在极大极细蜘蛛网里的红蜘蛛，在小路上突然出现又忽左忽右消失的长腿长耳朵小兔子。

一个突然短暂的引诱，就可以使皮恩又接受毛茸茸的暧昧的人类群体的感染：满脸雀斑，转动着眼睛偷看蟋蟀交媾，或者将松针插入小癞蛤蟆背上的疣中，或者在蚂蚁窝上撒尿，看着尿湿的土发出吱吱声层层脱落，冲掉成百上千红黑蚂蚁身上的泥土。

皮恩还感到受人类世界的吸引，这些人目光模糊，满脸怒气，使人难以理解。他回到曼齐诺那里，曼齐诺总是冷笑，从来不参加活动，总围着大锅转，肩上扛着那只变坏的猎鹰。

曼齐诺最值得欣赏的是文身，身体各部位上的文身：蝴蝶、帆船、心、锤子、镰刀、圣母。有一天，曼齐诺大便时，皮恩发现他屁股上也有文身：站立的男人和跪下的女人互相拥抱。

表兄却不一样：好像他总是抱怨，只有他知道战争是多么困难。他总是带着冲锋枪单独行动，来营房是为了几小时后又违心地离开营房，像是被迫似的。

德利托每次要派人到某个地方，就看着大家，问道："谁愿意去?"

这时，表兄摇摇大脑袋，好像是不公正命运的牺牲品，背上冲锋枪，带着他那张像喷泉面具一般的温柔的脸，叹息着离去。

德利托躺在杜鹃花中间，双臂放在头下，双膝夹着冲锋枪：旅指挥部肯定正在采取制裁他的措施。大家很困，胡子也没刮，德利托不高兴看到他们这个样子，因为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到对他的怨恨。但他们还是服从他，好像是双方都同意似的，避免大家步入歧途。但是德利托还是全神贯注地听着。不时地站起来下命令，不能让人改变把他当头领的想法，一刻也不行，因为那样等于把他们丢掉不管了。

皮恩不在意房子是否烧掉，反正大火的场面很好看，新营房周围有许多待发现的好地方。皮恩有点怕靠近德利托：他可能会把火灾的责任推到自己身上，因为是自己唱歌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但是，德利托叫他："皮恩，过来!"

皮恩走近躺在地上的德利托，不想说什么，知道大家恨德利托，也怕德利托，这个时候靠近他能长他的威风，颇有自己是他帮凶的感觉。

"你能擦手枪吗?"他问皮恩。

“可以，”皮恩答，“你拆开，我来擦。”

皮恩这孩子能说会闹，使所有人都有点怕他。但是德利托觉得那天他既没提到火灾，也没提到吉里雅和别的事情。因此认定他是惟一可以与自己为伴的人。

德利托把手绢铺在地上，把慢慢拆开的手枪零件放在上面，皮恩问能否让自己也拆拆，请他教自己。和德利托这样在一起小声交谈，谁也不谈烦心事，皮恩觉得很开心。皮恩可以比较一下德利托的手枪和自己那支埋起来的手枪，讲讲哪些零件不同，这支枪的哪些零件比那支枪的哪些零件好。德利托也不像往常那样说不相信他藏着一支枪。也可能大家并不是不相信，这样说只是为了开他的玩笑。说真的，德利托也是个很会说话的青年，讲解手枪功能时，很着迷，思想也不坏。研究了手枪的作用，也可以说手枪不再是杀人的工具，而是好玩的迷人玩具。

其他人，没刮脸，站得远远的，没注意皮恩在周围转，也不想唱歌。当灰心丧气像地上的湿气一样渗入到人的骨髓里的时候，事情就难办了。他们不再信任任何指挥员，他们看见带着火焰喷射器的德国人正在杜鹃花的山坡上将他们包围，好像他们的命运注定就是在山谷里躲来躲去，最后一个个死去，好像战争永远不会结束。有时候，他们也谈论战争，谈论战争何时开始的，谁愿意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以后比以前是更好还是更坏。

皮恩不清楚有战争和无战争的区别。自他生下来，好像就听人没完没了地谈论战争。轰炸和宵禁是以后才有的。

有时飞机也飞到山顶上空，不用像城里那样躲到山洞里，就能看到飞机肚子，然后能听到远处海边那里炸弹的轰隆声。战士们想到他们大概已成瓦砾的家，说战争永远不会结束。

“我知道谁愿意战争，我见到过他们！”宪兵跳起来说，“是学生们。”

宪兵比公爵更无知，比细高个泽纳更懒惰。他的农民父亲看

到没办法让他拿锄头，就对他说："参加宪兵吧！"他当了宪兵，穿上黑色制服，挂上子弹带，在城市和乡下执勤。然而对人们让他干的事，他全然不懂。"九月八日"行动后让他抓逃兵的父亲和母亲。后来有一天他知道，因为人们说他支持国王，要把他送往德国，他逃跑了。起初，因为他抓过人家的父母，游击队员们想杀死他，后来看他也是个可怜虫，便把他放在德利托支队，因为别的支队没人要他。

"四零年我在那不勒斯，我知道！"宪兵说，"是学生们。他们举着旗帜和标语牌，唱着马耳他和直布罗陀海峡，要求每天吃五顿饭。"

"住嘴！你当过宪兵，"大家说，"你当时站在他们一边，你去领了红卡。"

公爵用力吐了口痰，手摸着奥地利手枪："混蛋杂种蠢猪宪兵！"他狠狠地说。他的故乡有与宪兵长期斗争的历史，许多宪兵被打死在苦路上圣体龛的脚下。

宪兵焦急不安地抗议，在低额头的小眼睛前挥动着农民大手。

"我们宪兵！我们宪兵是反对他们的！是的，先生们，我们反对战争，学生们愿意战争。我们执勤是为了维持秩序！我们一个人对付二十个人。战争就是这样起来的！"

曼齐诺离得不远，抱怨着。他搅动大锅里的米。只要一停，米就粘住，人们的谈话也传到他的耳朵里。当大家谈论政治时，他也愿意参加进来，因为他们什么也不知道，需要他来解释。可是现在他离不开大锅，急得他跳着小步直搓手。"资本主义！"他不时地喊道。"剥削人的资产阶级！"好像给那些人提词，那些人却不愿意听他的。

"四零年在那不勒斯，是的，先生们，"宪兵还在解释，"学生和宪兵之间发生一场大战斗！如果我们宪兵和他们打，战争就不会发生了！可是学生们要烧各地的市政府！墨索里尼不得不发动战

争!”

“可怜的墨索里尼!”其他人讥笑道。

“让你和墨索里尼得癌症!”公爵喊。

厨房里传来曼齐诺的喊叫:“墨索里尼!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

“市政府,学生们要烧市政府,我们宪兵应该怎么办? 如果我们能制服他们的话,墨索里尼就不打仗了!”

曼齐诺必须看着大锅,又想和大家议论革命,也是不易。他大喊大叫直到引起细高个泽纳又名木帽子的注意,示意让他过来。细高个泽纳以为让他来尝米饭,于是就使劲站起来。曼齐诺说:“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告诉他们是资产阶级发动战争,为了瓜分市场!”

“狗屁!”细高个泽纳对他说并转过身去。曼齐诺的话总让他厌恶:他不明白曼齐诺说的话,对资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一无所知,人人都要劳动的世界对他没有吸引力,他更喜欢少劳动却能过得好的世界。

“自由的主动性,”细高个泽纳又名木帽子打着哈欠,在杜鹃花丛中面朝天躺着,通过裤子的破口搔痒。“我主张自由的主动性。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劳动自由地发家致富。”

宪兵继续往外掏他的历史观点:斗争中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宪兵,想维持秩序的可怜人;另一种是学生、大人物、骑士、律师、医生和受勋者那一类人,有高工资的那类人。他们的工资是一个可怜的宪兵连做梦都不敢想的,可他们还嫌不够,就把钱送出去用以发动战争 ,为了再增加。

“你什么也不懂,”曼齐诺实在忍不住了,让皮恩看着大锅,自己跳出来说。“帝国主义的原因是生产过剩!”

“去做你的厨师吧!”大家喊道,“当心这次米饭不要再糊了!”

但是曼齐诺还是站在大家中间,个子矮,套着他那件脏水兵外套,肩上有猎鹰屎。挥着拳头说个没完:金融家的帝国主义,大炮

商人,战争一结束就会在各国甚至在英国、在美国爆发革命,在飘扬着红旗的共产国际内取消边界。

大家都待在杜鹃花丛中,胡子很长,头发垂在脸上,穿的衣服也不配套,颜色和有油污的灰制服颜色相似。有的穿消防队员上衣,有的穿民兵上衣,还有的穿带破边饰的德国兵上衣。他们通过不同的渠道来到这里,许多人是法西斯部队的逃兵,或是被俘过来而获赦免的,许多人还很小,带有固执的冲动,不分好坏只想反对某个东西。

大家都讨厌曼齐诺,因为他总是用话语和议论而不是用射击来发泄愤怒。而议论是毫无用处的,因为他说的敌人大家都不知道,比如资本家、金融家。他有点像墨索里尼,墨索里尼希望大家仇恨英国人和阿比西尼亚人,而这些人大家从来没看见过,生活在大海那一边。大家把曼齐诺弄到中间,骑在他弯曲的小肩膀上,打他的秃头,猎鹰巴贝夫使坏,转动着黄眼睛。

德利托来干涉了,他离得稍远一点,顶着膝盖晃动冲锋枪,说:

"做饭去,曼齐诺!"

德利托也不喜欢争论,他只喜欢谈论武器和行动,谈论法西斯分子开始使用的小型新武器,若能搞到手那太好了。尤其喜欢下命令,让战士们隐蔽然后射击冲锋。

"米饭糊了,看,米饭糊了,你没闻到味吗?"大家冲着曼齐诺喊,推他快去。

曼齐诺把政委牵连进来,说:"贾钦托,政委,你什么也不说吗?你干什么呢?"

贾钦托这时正好从指挥部回来,还不知道该不该说有新闻,只是耸耸肩,说晚上之前旅部政委来视察。大家知道这事后又都躺在杜鹃花丛中:旅部政委来,就是要整治他,想这事没用。德利托也认为考虑这事没用。旅部政委会告诉他什么命运在等着他。于是,他也在杜鹃花丛中躺下,只是焦虑更多些,手中折着小树枝。

现在,曼齐诺向贾钦托埋怨,说在支队里没有任何人向大家讲为什么要当游击队员,什么是共产主义。贾钦托的头发根和小肚子下有许多虱子,有的还是白色的卵,他用两个大拇指指甲熟练地挤死虱子和白色的卵。嘴里还嘟囔着"嗯,嗯!"。

"孩子们,"他开始讲话,态度谦虚,好像不愿让任何人不高兴,包括曼齐诺,"每个人都知道为什么当游击队员,我以前是白铁工人,在乡下各村转,很远都能听到我的喊声,妇女们拿来破锅让我修理,我到各家去,和女佣们开玩笑。有时她们给我鸡蛋和酒。我在草地上焊容器,周围总围着不少孩子看我干活。现在,我不能在各村转了,因为他们会抓我,还有毁掉一切的轰炸。为此,我们当了游击队员,为了再回去当白铁工人,为了有便宜的鸡蛋和酒,再也不抓人,再也没有空袭警报。我们也愿意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不再有对着你关上大门的人家了,不必在夜里不得不进到鸡窝里。共产主义就是:如果你进到一家去,他们在喝汤,就给你汤喝,即使你是白铁工人。圣诞节他们在吃大面包,就给你大面包吃。这就是共产主义!再比如:这里我们大家都有虱子,使我们睡觉时也在活动,因为是虱子拖着我们走。我到旅指挥部去,看到他们有灭虱子粉。于是我说:你们真是好共产主义者,为什么不送一些给支队。他们说要给我们送来灭虱子粉,这就是共产主义。"

大家全神贯注地听着并表示同意,这些话大家都能明白,于是,正在抽烟的人把剩下的烟头给了伙伴,上岗的人许诺值班时不捣鬼,站满一小时岗,中间不叫人换岗。现在讨论将得到的灭虱子粉能杀死卵,还是只能杀死虱子,还是只能把虱子熏昏,一小时后咬得更厉害。

如果表兄不出来讲话,谁也不会再讨论战争。表兄说:"你们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依我的观点,是女人愿意战争。"

表兄用他那套关于女人的故事谈论此事时,比厨师更讨厌,可是至少他不想说服任何人,好像他为自己的事而抱怨。

“我在阿尔巴尼亚干过，在希腊干过，在法国干过，在非洲干过，”他说，“我在阿尔卑斯山地狙击兵里干了八十三个月。在所有国家我看到女人都在等出营房的士兵，我们越是带着臭味长满虱子，她们越高兴。有一次，我被说服了，我得到的好处是得了瘟疫，有三个月我撒尿必须到墙根尿。现在，如果一个人在遥远的地方，周围只能见到那样的女人，那惟一的安慰还是想想自己家，想想自己的老婆（如果有的话）或者未婚妻，说：至少有那个女人是安全的。但是，他后来回家了，是的，先生们，发现他老婆在他不在的时候，找到了替代他的人，和这个或那个男人睡觉。”

同志们知道这是表兄本人的故事，他老婆在他不在的时候，背叛了他，跟许多别的男人好，生了孩子还不知是跟谁生的。

“这还不够，”表兄继续说，“你们知道为什么法西斯分子继续抓我们的人？因为有许多女人当奸细，妻子告发丈夫，所有我们的女人在我现在说话的时候，都坐在法西斯分子的腿上为他们擦枪，让他们来杀我们。”

现在大家开始不耐烦了，向他喊道：“行了，你这个倒楣鬼，你老婆向德国人告发了你，让你回不去，逼得你落草为寇。但这也不能成为你侮辱别人妻子的理由。”

“你们看，”表兄说，“一个地方来一个女人就够了……我来解释……”

这时大家又不反驳他了，因为知道这里有影射，想听听结果如何。

“……在一个地方来了一个女人，马上有个白痴昏了头脑……”表兄说。表兄愿意和所有人做朋友，有话就说，哪怕对方是指挥员。

“……白痴是个普通人，也没什么，但是，如果白痴负有一定责任……”

大家看看德利托，他虽然离得稍远点，但肯定也在听。大家有

点怕表兄太过分了引起口角。

“……结果是为了一个女人，纵火烧房子……”

大家想他讲完了，现在该发生什么事了。他们说最好是这样，该到时候了。

这时听见轰隆声。天上有许多飞机。大家的注意力转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轰炸机编队，可能某个城市被夷为平地，浓烟四起，飞机在云中消失了。

皮恩觉得被炸得震动，飞机挂着几吨炸弹在他头上转，使他心惊胆战。这时刻，老城正在疏散，可怜的人们挤进泥泞的山洞。那边听到低沉的倒塌声。

皮恩看见德利托站在一个山头上，用望远镜观察山谷里面的情况，皮恩追上他，德利托奸笑了一下，调节望远镜镜头。

“让我也看看，行吗，德利托?”皮恩问。

“给你。”德利托给他望远镜。

镜头的颜色混乱，慢慢地出现了靠近海的山顶，升起了白烟，又听到下面的倒塌声。轰炸还在继续。

“炸吧，把炸弹都扔下来，”德利托用拳击打着手掌。“先炸我家！炸吧！先炸我家。”

九

临近晚上，费烈拉司令和吉姆政委来了。外面，浓雾飞动，屋里大家围在火炉和两位旅部来人旁边，这两位给大家递烟直到烟盒空了。两人说话很少，费烈拉很粗壮，棕色胡子，戴着阿尔卑斯帽，眼睛明亮、冷漠，总是半睁着眼偷看。吉姆瘦高个，长脸红润，轻轻地咬着胡子。

费烈拉是一位工人，出生在山里，表情冷漠，思路敏捷，现在听大家讲话，发出同意的微笑，但也坚持自己的主张：全旅部队如何布阵，如何分配重武器，何时使用迫击炮。对他来说，游击战争必须像机器一样准确、完美。这是在工厂里培养出来的革命抱负。把它运用在了如指掌的山区，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

吉姆是一位大学生，对前因后果要求明确肯定，合乎逻辑，脑子里充满疑问。对人类有极大的兴趣，因此，他学医，因为知道一切事物的解释都存在于细胞的运动中，而不在哲学的范畴中。将来要做脑科医生，一位精神病科医生对人是不热情的，因为看人的时候总是盯着不动，好像要看出人家的思想的根源。突然，提出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漫无边际，问人家的童年，或别的事情。然后，在人后面，是各阶级前进的大机器，它由每天的行为举止来推动。其他举止会烧掉而留下痕迹：这就是历史。一切都应该合乎逻辑，人们应了解一切，在历史中和在头脑中一样。在这个和那个之间有一个跳跃，一个盲区，这里集体理性以可怕的偏离和未想到的联系把它变成个人理性。吉姆政委每天背着那支乏味的斯坦枪在各

个支队里转，与政委们、指挥员们交谈，研究每个人，分析这个或那个人的立场，把每个问题分成几个因素，A，B，C……要求一切都要清楚，在他身上和在别人身上一样，一切都要清楚。

现在，战士们围在费烈拉和吉姆周围，打听有关战争的新闻。离前线远的，离前线近的，还有他们自己战斗的新闻。费烈拉说对盟军不应该有任何期望，认为游击队单独干也能战胜敌人。然后，通报当天的大新闻：一支德国纵队正向山谷前进，扫荡整个山区：德国人知道他们营地的地点，要把这些地区变成焦土。拂晓全旅都要埋伏在各个山头，其他旅也来支援。德国人必将遭到枪林弹雨的伏击，撤退回营。

这时，战士们行动起来，摩拳擦掌，慷慨激昂，在他们看来，战斗已经开始。表情严肃坚强，叮叮当当拿起自己的武器。

“德国人是看到火光才来的。我们早就知道了。”一个战士说。德利托在稍远一点站着，光线照着他垂下的眼睛。

“大火，当然也是因为大火，但还有别的原因。”吉姆说，慢慢吸了一口烟。其他人一言不发，德利托只是抬抬眼睛。

“我们有一个人叛变了。”吉姆说。这时气氛变得异常紧张，像风吹进骨头一样，一种寒冷潮湿的背叛气氛，营房里每次听到这种消息都是这种气氛。

“是谁？”

“佩莱。他到黑色旅那里去了。他一个人去的，没抓到他。他让人处死了我们在狱中的四位同志。他帮助审讯我们被抓的每个人，告发每个人。”

这种消息使人有一种盲目的失望，妨碍人们去思考。几天前，佩莱还和他们在一起，还说：你们听着，我们要打击！那次有点怪，在他们后面没听到他着凉感冒的呼吸，但他仇恨第二天战斗中要用的机枪。现在，佩莱在下面敌人的禁区内，戴着有头颅徽记的黑帽子，佩带漂亮的新式武器，再也不用怕扫荡了，总是愤怒地闪动

着凉感冒的小红眼睛，舔着口干舌燥的嘴唇。这是对他们，对他昨天的同志们的愤怒。这种愤怒没有仇恨或积怨，就像同志们玩以死打赌一样。

突然，皮恩想到自己的手枪。佩莱熟悉沟周围的所有小路，好把姑娘带到那里。可能他也找到了那支手枪，现在挂在他的黑色旅制服上，抹上油铮亮，像他带的武器那样。或者是另外一码事，他编造说熟悉蜘蛛筑巢的地方，是为了去城里，背叛自己同志，受赠获得新式的德国武器，那些武器射击时几乎无声。

"现在应该杀了他。"同志们说。好像同意他命该如此，也可能眼下更愿意他第二天又回到他们中间来，带着新式武器继续在那个悲伤的游戏中和他们交替着或做战友或做敌人进行战斗。

"红狼已经下山到城里组织爱国行动小组与他斗争。"费烈拉说。

"我也要去。"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费烈拉说首先要考虑的是准备好第二天的战斗，这是一次决定性战斗，大家散去分配各小队的任务，准备武器。

费烈拉和吉姆把德利托叫到一边。

"我们收到了关于火灾的报告。"他们说。

"是这样的！"德利托说。他不想为自己辩护，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有人对火灾负责吗？"吉姆问。

"都是我的过错！"德利托说。

他们两人看着他，表情严肃。德利托想最好离开部队隐居在自己知道的一个地方等待战争结束。

"你有什么要解释吗？"他们耐心地等着。

"没有，事情就是这样。"

他们可能说："滚吧！"或者："毙了你！"相反，费烈拉说："好了。关于这件事以后有时间再谈，现在要作战。你行吗，德利托？"

德利托黄眼睛看着地："我病了。"

吉姆说："尽快治好，明天。明天的战斗对你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想想吧！"

他们一直看着他，德利托觉得越来越希望让他离开。

"我病了，病得很重。"德利托重复。

"行了，"费烈拉说，"明天你们要坚守朝圣者山的山头，监视从桥墩到第二个山谷地区，听明白了？然后，再转移，等待命令。小队与小队之间要分开，需要的时候，机枪和射手及其他战士能够转移。所有人都必须参加战斗，任何人不得例外，包括司务长，厨师。"

德利托听着布置，不时地点头表示同意。

"任何人不得例外，"他重复道，"包括厨师？"他让自己听明白。

"明天拂晓，大家都在山头上，明白了吗？"吉姆咬着胡子看着他。"要听清楚，德利托。"

话音中像是带有爱心，但由于战斗的严重性，语调很有说服力。

"我病了，"德利托说，"病得很重。"

吉姆政委和费烈拉司令员走在黑暗的山路上到另外一个支队去。

"你相信这是一个错误吗，吉姆？"费烈拉问。

吉姆摇头，说："这不是错误。"

"是个错误！"司令员说，"你的想法是错误的，让不太可靠的人组成一个支队，让更不可靠的人当指挥员。你看结果会怎样。如果我们把他们分开，混在可靠的人中间，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那样更容易指挥。"

吉姆继续咬着胡子，说："对于我，这是我最满意的支队。"

费烈拉差一点急起来。他抬起冷漠的眼睛，挠着头："吉姆，你

什么时候才能明白这是一个突击旅，不是实验室？我知道你有科学上的满足要检查一下这些人的反应。要他们都守纪律，一部分人是无产者，一部分人是农民，还有你说的半无产者……我觉得你应做的政治工作是把他们混在一起，让没有阶级觉悟的人有阶级觉悟，达到有利的团结……不考虑军事上的效果……”

吉姆很难表达清楚，直摇头：“历史，历史！大家都在战斗，他们身上有同一种渴望，不，不同的渴望，每人有每人的渴望。但是现在都一起战斗，大家一样，也很团结。另外，有德利托，有佩莱……你不明白他们的价值……他们，也有同一渴望……一个心血来潮足可以拯救他们或失掉他们……这是政治工作……给他们一种观念……”

吉姆和大家讨论时，分析形势时，显得极其清楚、辩证。但现在两个人交谈，要阐明自己的观点，还真费劲！费烈拉把事情看得很简单。“好吧，就给他们这种观念，让他们清楚一点，照我说的。”

吉姆吹吹胡子，说：“你看，这不是一支部队，不能对他们说：这是义务。这里，你不能谈义务，不能谈理想：祖国、自由、共产主义。他们也不愿意听人讲理想。理想很好大家都该有，另一部分人也有理想。你看见当那个极端主义的厨师说教时发生什么事？大家喊着反对他，打他。他们不需要理想、神话、喊万岁，他们就是这样行动、战斗、不喊万岁。”

“那为什么？”费烈拉知道为什么战斗，他什么都清楚。

“你看，”吉姆说，“现在，各个支队开始静静地进入阵地，他们也知道明天可能有死人和伤员。告诉我，是什么推动他们过这种生活？是什么推动他们去战斗？你看，我们有农民，这里山区的居民。这对他们是很容易的。德国人烧房子、抢奶牛。他们的战争是最原始的人类战争，保卫祖国，农民们有祖国。这样，他们就站在我们一边，年老的和年轻的，带着他们的破枪和老起毛的猎服。整个地区都拿起武器。我们保卫他们的祖国，他们和我们站在一

起。对于他们，祖国就变成一个严肃的理想，超越了他们，又变成斗争本身。他们甚至牺牲房子、奶牛，还是继续战斗。而对另一些农民来说，祖国仍然是一个自私的东西：房子、奶牛、收获。为了保留这一切，他们就变成了奸细，法西斯分子，整个地区变成了敌人……另外，工人，工人有争取工资、罢工、劳动和手挽手斗争的历史。工人是一个阶级，知道在生活中有更好的东西，应该为这个美好的东西而斗争。他们也有个祖国，一个尚需征服的祖国，他们战斗就是为了征服它。城市有工厂，以后将是他们的。他们已经看到厂房上有红色标语，烟囱上飘着红旗。他们身上没有多愁善感。明白现实和改变现实的方法。另外，还有某些知识分子或学生，人数很少，散布在各地，他们有思想，但思想模糊不清，经常是错误的。他们有一个由词汇，充其量是由几本书构成的祖国。但是通过战斗他们发现词汇不再有任何意义。他们在人类斗争中发现新事物，并且这样战斗着，却不提问题，直到找到新词汇，又找到已变化的古老词汇，其意义是不受怀疑的。另外，还有谁呢？外国俘虏，从集中营逃出来并来到我们这里。他们是为真正的祖国而战争，想回到遥远的祖国去，正因为遥远才是祖国。这完全是一种象征的斗争，一个人为了杀德国人，应该想到不是这个而是另外一个德国人。玩一种使头脑畸形的调换位置游戏，其中每件事或每个人都变成一种中国皮影，一种神话，你懂这些吗？”

费烈拉卷着自己的棕色胡子，他对这些一窍不通。

“不是这样。”他说。

“不是这样，”吉姆继续说，“这我也知道，不是这样。因为，众所周知，还有别的什么东西，一种渴望。德利托支队：小偷，宪兵，军人，黑市交易者，流浪汉。这些人在一起成为社会的弊端，在扭曲中挣扎。他们没有任何东西要保卫，没有任何东西要改变。他们或是身体有缺陷，或是固定不变，或是狂热着迷，他们像被绑在磨石机的轮子上，不可能产生革命理想，或者产生缺陷，即愤怒和

屈辱的产物，表现在诸如极端主义厨师的冗长空话中。那么，他们为什么战斗？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祖国，不论是真实的还是臆造出来的。但是，你知道他们身上有勇气，也有怒气。他们的生活受到损害，他们的街道又黑又暗，他们的家破烂不堪，他们从小就学会污言秽语，总对人使坏。只要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原因，只要走错一步或心血来潮，就会使他们走到另外一方去，像佩莱，到了黑色旅，用同样的疯狂，怀着同样的仇恨开枪射击，对他们来说，射击这些人或射击那些人都没有什么两样。"

费烈拉哼哼唧唧："因此，我们的人的思想……和黑色旅的思想……是同样一回事？……"

"同样一回事，你懂我想说的话，是同样一回事……"吉姆停住，用一个手指像是拿着标志指着，说："是完全相反的同样一回事，因为在这里是正确的，在那里就是错误的，在这里解决了某个事情，在那里就强化压迫。压在德利托支队战士们身上的负担，压在我们所有人，你，我，身上的负担，我们身上具有的古老疯狂都发泄在射击，发泄在被打死的敌人上，这和使法西斯分子射击的疯狂是一样的，这疯狂使他们用纯化和解救的同样希望去杀人。于是，就有了历史。在历史上，我们是解救的一方，他们是另一方。我们这方，什么也不会失去，不管是行为还是射击，尽管和他们的相同，懂我的意思吗？和他们一样的失去了。这一切如果不是用来解放我们，解放我们的子女，那就将用来建设一个宁静的，不再有愤怒的人类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面人们可以不做坏事。另外一部分是失去的行为，无用的疯狂，尽管曾胜利过，但还是失去了无用了，因为不能成为历史，对解放无用处，只能用来重复和延续那种疯狂和仇恨，直到二十年，一百年，一千年以后，我们和他们再继续战斗，眼里冒着同样的无名仇恨，可能自己还不知道。我们是为了解脱，他们是为了当奴隶。这就是斗争的意义，就是超越各式各样的官方意义的真正的全部的意义。基本的无名的人类解脱的推动力来

自于各种屈辱：工人来自于剥削，农民来自于无知，小资产阶级来自于抑制，被蔑视的人来自于腐败。我认为这是我们的政治工作。还要利用人类贫困，利用它来反对人类贫困，获取我们的解脱，就像法西斯分子利用贫困来延续贫困和利用人来反对人。”

在黑暗中，能看到费烈拉的蓝眼睛和棕胡子，他直摇头，他不懂什么渴望：他做事准确像机械工，实用像山区居民，斗争对他来说是一部准确的机器，他了解这部机器的性能和作用。

“看来是不可能了，”他说，“你满脑子无稽之谈，看来你不可能当一个称职的和用清晰语言向群众讲话的政治委员了。”

费烈拉不懂，吉姆也不遗憾，对费烈拉这样的人讲话应该用词确切，应该说：A，B，C。对于他们，事情要么是要么否，不存在是否不清的地方，但是吉姆不计较这些，因为觉得自己比费烈拉强，他的目标是：能够像费烈拉那样思考，除了费烈拉的事实以外，没有别的事实，其余的一切都没有用。

“好吧。我向你告别。”两人来到一个岔道口。现在费烈拉要去“腿”那里，吉姆去“闪电”那里。这天夜里，战斗之前他们要视察所有支队。他们分手了。

其余的一切都没有用。吉姆一个人走在小路上，肩上背着那支斯坦枪像根破拐杖。其余的一切都没有用，树干在黑暗中像人一样。人总是把自己在儿童时代的恐惧一辈子都埋在心中。“可能，”吉姆想，“如果我不是旅部政委，我也会害怕。到了不再害怕的境地，那是人的最终目标。”

吉姆和其他政委分析各支队情况时，逻辑性很强。但是，一个人在小路上一边走一边思考时，事情又成为神秘的不可思议的，人的生活充满了奇迹。我们的头脑中也充满奇迹和魔力，吉姆想。他不时地觉得好像走在一个符号的世界里，就像小吉姆在吉卜林的那本令年轻人百读不厌的书中的印度一样。

“吉姆……吉姆……谁是吉姆？……”

他为什么夜里走在山路上，为什么准备一次战斗，为什么在他这个富人小孩忧郁的童年之后，在他这个腼腆青年枯燥的青年期之后，还要制服活人和死人？有时候，他觉得自己被愤怒的失衡所折磨，行动起来歇斯底里。不，他的思想是合乎逻辑的，可以透彻地分析每件事情。但他不是个平静的人。他的父辈们，那些创造财富的资产阶级父辈是平静的人。知道自己要求的无产阶级是平静的人，现在在家守夜放哨的农民们是平静的人，决心已定、勇猛机智地作战的苏联人是平静的人，这不是因为好玩而是因为需要。布尔什维克！苏联可能已是个平静的国家，那里可能已经没有人类贫困。他，吉姆，永远不得平静吗？可能有那么一天所有人都是平静的人。我们不再懂许多事情，因为我们一切都懂了。

但是，这里，人们的眼睛模模糊糊，脸脏，没刮胡子，吉姆喜欢这些人。为解脱他们而工作。德利托支队的那个孩子叫什么？皮恩？他笑的时候，有雀斑的脸上还带着怒气……都说他是一个妓女的弟弟。他为什么战斗？他不知道他战斗是为了不再是一个妓女的弟弟。那四个“南方佬”连襟战斗是为了不再当穷移民，“南方佬”，被人看成是外人。那个宪兵战斗是为了感到自己不再是宪兵，是纠缠人的臭警察。还有表兄，健壮高大，又温和又冷酷。表兄……大家说他要报复背叛他的女人。我们每人都有别人不知道的创伤。我们战斗就是为了摆脱这个创伤。还有费烈拉，可能还有费烈拉：他气愤不能使全世界像他想的那样前进。红狼，不：对红狼来说，他要求的一切都是可能的，但应该让他要求正确的东西，这是政治工作，是政治委员要做的工作。要学会要求的东西是正确的，这也是政治工作，也是政治委员要做的工作。

吉姆想，有一天，我也不明白这些事情了。在我身上一切都是平静的，我将用另外一种方法，可能更正确的方法弄明白这些人。因为：可能？好吧，到时候我不再说可能，我身上不再有可能了。我将让人枪毙德利托。现在我和他们、和他们的缺陷连的太紧了，

也和德利托连的太紧了：我知道德利托应该非常痛苦，因为他不惜一切蛮横固执，世上没有比干坏事更痛苦了。我小时候有一天关在房间里两天不吃饭，我非常痛苦，但还是不开门，最后他们用梯子从窗户进来领我。我非常希望被人同情。德利托亦是这样。但他知道我们将枪毙他，他愿意被枪毙，人们有时有这个愿望。佩莱，这时候佩莱会干什么？

吉姆走进一片落叶松林，想着山下城里的佩莱，戴着有头颅徽记的帽子，在宵禁时到处巡逻。佩莱可能是一个人，带着错误的无名的仇恨，干着受良心责备的背叛行为，为了自我辩解他变得更坏。宵禁时他会愤怒地向猫开枪。市民们被枪声惊醒从床上跳下来。

吉姆想到德国人和法西斯纵队，他们也许正朝山谷前进，拂晓时，山顶上会给他们带来伤亡，这是一支失去能力的纵队。现在一个士兵一边被卡车的震动惊醒，一边想：我爱你，凯特。六七个小时以后，他将死去，是我们杀死他的。也可能他没想：我爱你，凯特。但结果一样，他想的和做的都失去了，被历史抹掉了。

而我走进一片落叶松林，每一步都是历史，我想：我爱你，阿德利亚娜，这是历史，有伟大的结果，我明天将作为一个今夜想过"我爱你，阿德利亚娜"的人参加战斗。我也可能做不了大事，但是历史是由无名小事构成的，明天我可能死，甚至是在那个德国人之前死，但是我死前做的事情和我的死都是历史的一部分。现在我建立的所有思想将影响我明天的历史，影响人类明天的历史。

当然，我现在不能像小时候那样幻想，而是要思考进攻的细节、部队和武器的配备，我太喜欢继续想那些人了，研究他们，在他们身上有所发现。比如，"以后"他们干什么？在战后的意大利他们能认出由他们做的某些事情吗？他们懂得这种制度吗？用这种制度是为了继续我们的斗争，一种不同于解救人类的长期斗争吗？红狼能懂。我问：谁知道怎么做才能将它运用到实践中？他有创

造才能又有冒险精神，不可能再使用人的攻击和逃跑的方法了。我们大家都应该和红狼一样。然而也有人带着自己的无名渴望重新变成个人主义者，因此是没有收获的。堕落犯罪，成为失去渴望的一架大机器。忘记历史有一天曾在他们旁边走过，曾通过他们咬紧的牙齿呼吸过。前法西斯分子将会说："游击队员们！我以前跟你们说过！我立刻就懂了！"实际上他们什么也不懂，不管是之前还是之后。

吉姆有一天会平静下来，现在在他身上一切都清楚了：德利托，皮恩，卡拉布里亚四连襟。他知道对这些人和对那些人如何工作，既不怕也没怜悯。有时候夜间走路时，他头脑中有很多思想迷雾，就像空中的浓雾，但他是一个会分析的人，会向支队政委们说"A,B,C"，是个"布尔什维克"，一个能掌管大局的人。我爱你，阿德利亚娜。

山谷浓雾密布，吉姆走上一段石子路山坡，像湖岸一样。落叶松从雾中显出来像拴船桩。吉姆……吉姆……谁是吉姆？旅政治委员觉得自己是儿时读过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吉姆，英国人和印度人的混血儿，和老"红色喇嘛"周游印度，为了找到净化河。

两小时前他还和德利托那个混蛋及妓女的弟弟谈话，现在来到"闪电"支队，全旅最好的支队，其中有俄国人小队，都是从边境修筑工事时逃来的俘虏。

"谁在那里！"

是哨兵：一个俄国人。

吉姆说了自己的名字。

"有新闻吗，政治委员？"

是阿列克谢，俄罗斯农民的儿子，学工程的。

"明天有战斗，阿列克谢。"

"战斗？消灭一百个法西斯分子？"

"我不知道消灭多少，阿列克谢，我也不太清楚有多少人活

着。”

“盐和香烟,政治委员。”

“盐和香烟”是给阿列克谢印象最深的意大利语句子,他经常重复,就像一句口头禅,一句问候语。

“盐和香烟,阿列克谢。”

明天有一次大仗,吉姆是平静的,他将说:A,B,C。他继续想:我爱你,阿德利亚娜。这,不是别的,就是历史。

十

凌晨，天没亮，还很黑，德利托的队员们在房子周围静静地活动准备出发，把被子围在肩上，因为拂晓之前，在满是石头的山顶上很冷。队员们想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所带被子的命运：逃跑时丢掉，他们死的时候，被子可能沾满血，可能被法西斯分子捡到，拿到城里当作战利品。一条被子有多大意义？

在他们上面，像是在云彩上面，听到敌人纵队在活动。车轮在尘土飞扬的路上转动，车灯关闭，士兵们移动着疲惫的脚步，问班长：路还远吗？德利托的队员们小声说话，好像德国纵队就在房子的墙后经过。

现在队员们用饭盒吃煮熟的栗子，不知道下一顿什么时候吃。这次，厨子也要参加行动：厨子用长柄勺子分栗子，小声骂着，眼睛困肿了。吉里雅也起来了，在备战的队员中间转来转去，帮不上忙。曼齐诺不时地停下来看着她。

"说吧，吉里雅，"他说，"你一个人留在这营房里有失谨慎，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你愿意我去哪里？"她问。

"穿上衬裙，到一个镇里去，他们对女人不会干什么。德利托，让她走，她一个人不能留在这里。"

德利托没吃栗子，竖起领子几乎一言不发，领导队员们做准备工作，不抬头，也不立刻回答问题。

"不，"他说，"她最好留在这里。"

吉里雅看了一眼丈夫，好像是说："你看见了吧？"最后和眼睛都不抬的表兄吵起来。表兄说："滚开！"她照原路回屋睡觉去了。

皮恩也在队员们中间跑前跑后，好像猎犬看主人做准备。

"战斗，"他想，尽量兴奋起来，"现在有战斗。"

"那么，"他对贾钦托说，"我拿哪支？"

政委刚注意到他，问："什么？"

"我拿哪支，枪？"皮恩说。

"你？"贾钦托说，"你不去。"

"不，我去。"

"走开。现在不是带小孩的时候，德利托不愿意，走开！"

这时，皮恩怒气冲天，想不带枪跟在他们后面，难为他们，直到他们开枪射击。

"德利托，德利托，你真的不愿意我去吗？"

德利托没有回答，抽烟屁股，好像在咬烟。

"是你，"皮恩说，"坏家伙，你说过这不是真的。"

"现在要打我后脑勺了。"他想。但是德利托不说话。

"我能参加行动吗，德利托？"皮恩说。

德利托抽烟不答。

"德利托说我可以去。你听见了吗，贾钦托？"皮恩说。

现在德利托想说："行了！你留在这里！"

但是他没说，为什么？

皮恩大声说："那么，我去了。"

他朝剩下枪的地方走去，步子很慢，吹着口哨，为了把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他选了一支最轻的滑膛枪。

"我就拿这支了，"皮恩大声说，"这支枪是谁的？"

没人回答他。皮恩照原路回来，拿着滑膛枪前后晃着。他坐在地上，就坐在德利托面前，开始检查封闭器，标尺，扳机。

他低声唱起来："我有枪了！我有枪了！"

有人对他说:“住口。你傻了?”

队员们开始按小队按小组排队,运弹手分成班次。

“我们就这样定了,”德利托说,“支队的位置在朝圣者山的桥墩和第二个峡谷之间。表兄指挥。你们会接到营部的命令。”

大家以困乏和模糊不清的目光看着他,头发盖过了眼睛。

“你呢?”大家问他。

德利托垂下的眼里有点眼眵。

“我病了,”他说,“不能去。”

就这样,一切按他的愿望办了。队员们再没说什么。德利托想:“我是个穷途末路的人。”现在一切按他的愿望办了。太可怕了:队员们不说什么,也不抗议。这说明大家已经谴责他了,很高兴他拒绝最后一次考验,可能大家早就期望他这样,可是大家不明白是什么促使他这样做,德利托自己也不太明白为什么。现在一切按他的愿望办了。剩下的,他只能随波逐流了。

然而,皮恩什么都明白:他全神贯注,咬着舌头,满脸通红。在那边,吉里雅躺在草堆里,男式衬衣下面有一对热烈的乳房。她很热,夜里在草堆里翻来覆去。有一次大家都在睡,她起来,脱掉裤子,裸着身子钻进被窝,皮恩看见这一幕。当山谷里战斗正酣时,屋子里将发生令人惊讶的事情,比战斗还刺激一百倍。正因为如此,德利托才让皮恩去参加行动。皮恩把滑膛枪扔在脚边,全神贯注地盯着他的每个动作。队员们又开始排队,没有人告诉皮恩来站到队伍里。

猎鹰开始在房梁上振动翅膀,好像在进行一次失望的攻击。

“巴贝夫!我应该喂巴贝夫!”曼齐诺说,跑去拿装内脏的口袋喂猎鹰。这时,大家都转过身来看他和猎鹰,好像要把他们所有的怨恨都倾泻在某个确切的东西上。

“让你和你的猎鹰去死吧!不吉利的凶鸟!每次它唱,灾难就来!杀死它!”

曼齐诺站在他们对面，猎鹰抓在他肩上，他喂猎鹰碎肉，愤怒地看着同志们："猎鹰是我的，用不着你们多嘴，如果我愿意，就带着它参加行动，行吗？"

"杀死它，"细高个泽纳又名木帽子叫起来。"现在不是考虑猎鹰的时候！你杀还是我们杀！"

他说着就要去抓猎鹰。大鸟在他手背啄了一口，流出血来。猎鹰竖起羽毛，展开翅膀，转动黄眼睛不停地叫。

"你看！你看！我觉得满有趣！"厨师说。所有人都围着他，怒发冲冠，举起了拳头。

"让它别叫！让它别叫！会带来灾难的！会把德国人叫来的！"

细高个泽纳又名木帽子吮手上的血，说："杀死它！"

肩上扛着机枪的公爵从皮带上摘下手枪。

"我来开枪！我来开枪！"他哼哼唧唧地说。

猎鹰没有安静的迹象，反而更焦急不安。

"行了，行了，"曼齐诺下了决心，"看我怎么处置它。行了，按照你们的愿望办。"

他用两只手抓起猎鹰的脖子，用膝盖夹住把它的头往地上按。大家一声不吭。

"好了！现在你们高兴了！你们都高兴了，好了！"

猎鹰一动不动了，翅膀张开垂下来，羽毛立着。曼齐诺把猎鹰扔向一片荆棘丛生的荒地。巴贝夫翅膀挂在荆棘上，头朝下，抖了几下，死了。

"排队，排队，出发！"表兄说，"机枪手在前，运弹手在后，接着是步枪手。出发！"

皮恩待在一边，不在队里。德利托转过身进到屋里。战士们静静地远去了，踏上上山的路。最后一个是曼齐诺穿着水兵外套，肩上沾着鸟屎。

屋内很暗，散发着干草的气味。在房间的相对的两个角落里，女人睡在这边，男人睡在那边，都钻进被子里。他们都不动，皮恩保证直到天亮前他们都不会闭眼。他也躺下了，睁着眼睛。他要看要听：他也不闭眼。他们也不搔痒，低声呼吸。皮恩知道，他们醒着。慢慢地他睡着了。

皮恩醒来时，外面天已经亮了。他一个人在碎草堆里。慢慢地想起了一切。今天是战斗的日子！为什么听不到枪声？今天是德利托司令员和厨师妻子亲热的日子！他站起来出去。外面是和平常一样蔚蓝色的天空，蓝得让人害怕，有鸟鸣，听鸟鸣也让他害怕。

厨房在即将倒塌的一所老房子的老墙废墟中间，吉里雅在里面，在一个装栗子的饭盒下生着火。她脸色苍白，眼睛无神。

"皮恩，要栗子吗？"她问，摆出母亲的样子，很虚假，好像是想尽量讨好他。

皮恩很反感女人们那装母亲的样子：他知道这是虚情假意，她们实际并不喜欢他，像他姐姐那样，只不过有点怕他。他恨死这个女人。

"那事"已经发生了？德利托在哪里？他决定问问她。

"好，都干完了？"他问。

"什么事？"吉里雅反问。

皮恩不回答，做着鬼脸偷看她。

"我现在刚起来。"吉里雅像个天使似的。

"她明白，"皮恩想，"这个母牛，她明白。"

尽管他觉得没发生什么事，但这个女人表情紧张，好像屏住气。

德利托来了。他刚才洗脸去了，脖子上围着一条褪色的毛巾。他有一张成熟男人的脸，带皱纹和阴影。

"还听不到枪声。"他说。

“真倒楣，德利托，”皮恩说，“他们都睡着了？”

德利托不笑，吮吮牙。

“全旅都在山顶上睡着了，你这样想？”皮恩说，“德国人悄悄地上来了。Raus！ Raus！[1] 转过身去，他们在那里。”

皮恩指着一个地方，德利托转过身。他讨厌转身，耸耸肩。在火旁坐下来。

“我病了。”他说。

“要点栗子吗？”吉里雅问。

德利托往火灰里吐了一口痰。

“栗子使我胃热。”他说。

“你只喝汤。”

“我胃热。”

他仔细考虑，说：“给我！”

他捧着脏饭盒喝汤，然后放下饭盒。

“好吧，我吃。”皮恩说。用勺子喝热栗子汤。

德利托抬眼看看吉里雅。他上眼皮睫毛又长又硬，下眼皮没睫毛。

“德利托。”吉里雅说。

“噢。”

“你为什么没走？”

皮恩把脸藏在饭盒里，在饭盒边从下往上看。

“我去哪里？”

“什么问题，当然是参加战斗。”

“你愿意我去哪里，你愿意我去哪里，我在这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什么事不对劲，德利托？”

---

① 德语：出去！出去！

"什么事不对劲,我知道什么事不对劲吗?在旅里他们想骗我,已有一段时间了。跟我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每次都是:德利托,你说,德利托,这事我们以后再谈。现在注意,德利托,好好想想,当心,纸是包不住火的……见鬼去吧!我再也受不了了!有什么事要对我说,干脆就说。我愿意做我喜欢的事。"

吉里雅坐得比他高,长时间地看着他,鼻子直喘气。

"我愿意做我喜欢的事。"德利托瞪着黄眼睛对她说,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膝盖上。

听到皮恩用饭盒喝汤的声音。

"德利托,他们也许是跟你开个恶意的玩笑。"吉里雅说。

德利托靠近她。现在,他蜷曲在她脚边。

"我不在乎死,"他说。但他嘴唇发抖,像个病孩子。"我不在乎死。但是,首先我愿意……首先……"

他脑袋歪着,从下往上看着坐得比他高的吉里雅。

皮恩把空饭盒扔在地上,勺子还在里面。叮叮!勺子发出响声。

德利托把头转向他。咬着嘴唇看着他。

"哎?"皮恩问。

德利托心烦意乱。

"他们没开枪。"他说。

"他们没开枪。"皮恩说。

德利托站起来,转了转,显得焦虑不安。

"皮恩,去打点水来!"

"马上去。"皮恩弯下身系鞋带。

"吉里雅,你脸很白。"德利托站在她后面,膝盖顶着她的后背。

"我大概病了。"吉里雅叹息道。皮恩唱起那单调的没完没了的重复词,越唱越高:"苍白!……苍白!……苍白!……苍白!……"

德利托把手放在她脸颊上，把她的头转向自己："你和我一样病了吗？告诉我，和我一样病了吗？"

"苍白！……苍白！……"皮恩继续唱着。

德利托转向他，脸色难看："打水去，好吗？"

"等等，"皮恩说，"我系另一只鞋。"

他继续磨蹭。

"我不知道你病得怎样了？"吉里雅说，"你病得怎样了？"

德利托小声说："病得不行了，再也受不了了。"

他站在她后面，抱住她的肩，靠在腋下。

"苍白……苍白……"

"喂，皮恩。"

"好了，我去，现在我去。把大瓶子给我。"

然后，他停住，竖起耳朵听听。德利托也停下来，往上看着。

"他们没开枪。"德利托说。

"没有？确实没开枪……"皮恩说。

他们两人一声不吭。

"皮恩！"

"我去！"

皮恩出去，晃着大瓶子，吹着原先的小曲。那天，他大概很开心。皮恩没有同情心。德利托吓唬不了他了，不再是指挥员，拒绝参加行动，无权指挥了。现在，厨房听不到口哨声了。皮恩不声不响，停住，蹑手蹑脚地返回来。他们大概已经躺在地上，一个压在另一个身上，像狗一样互相咬着喉咙。皮恩已经在厨房里藏起来。那两人还在那里，德利托把手伸进吉里雅头发下面，摸到后颈，她像猫一样动一下，像是摆脱他。突然，他们转过身来，听到有人。

"谁？"男的问。

"我回来取另一个大瓶子，"皮恩说，"这个满了。"

德利托用一只手摸摸太阳穴："拿着。"

女的去坐在土豆袋子旁边："好了，我们削点土豆吧，至少做点什么。"

她把口袋放在地上，准备要削的土豆和两把刀。

"拿一把刀，德利托，这里有土豆。"她说。

皮恩发现她既傻又虚伪。

德利托继续摸自己的额头："他们还没开枪，出什么事了？"

皮恩走了，真的是打水去了。应该给他们时间，否则，什么事也不能发生。喷泉附近有一片满是桑葚的荒地。皮恩开始吃桑葚，他喜欢吃，但现在没兴趣吃。嘴里塞满了，却觉不出味道。吃得差不多，可以回去了。现在可能还早，最好先让他们满足。他蹲在灌木丛中。一定要努力，使他开心的是想像德利托和吉里雅在厨房的废墟间相互追逐，或是想像一些男人黄昏时被带到沟里跪下，裸着干黄的身体，牙齿发抖，所有这些事情既不道德又令人难以理解，带有一种像自己排泄物一样的古怪魅力。

皮恩用叶子擦擦嘴，准备好了，走！

厨房里，土豆都倒在地上。吉里雅在屋的一角，在口袋和军用大锅那边，手里拿着刀。她的男式衬衣扣子解开，里面有又白又热的乳房！德利托在栏杆那边用刀威胁她。真的，他们在互相追逐，现在互相伤人了。

然而，他笑了；两人都笑了，他们正在开玩笑。笑得不自然，是个令人难受的玩笑，两人还是笑着。

皮恩放下大瓶子，大声说："水！"

他们放下刀，过来喝水。德利托拿起瓶子递给吉里雅。吉里雅接过来喝水，德利托看她的嘴唇，又说："他们还没放枪。"

转向皮恩。"还没放枪，"他又重复说，"出什么事了？"

皮恩很高兴他这样平静地问他。

"你说，会出什么事？德利托！"他问。

德利托嘴唇不碰瓶子，对着喉咙痛饮起来。然后，擦干嘴："给

你，吉里雅，还喝吗？渴就喝，喝完再让他去打。”

“如果你们愿意，”皮恩酸溜溜地说，“我给你们打一桶来。”

两人互相看着，笑着。皮恩明白他们不是因为他的话才笑起来，这是他们之间神秘的没有道理的笑。

“如果你们愿意，”皮恩说，“我给你们打水可以洗澡。”

他们继续互相看着，笑着。

“洗澡，”男人重复道，不明白是笑还是气，“洗澡，吉里雅，洗澡。”

他拉过她的肩。突然，他脸变了，放开她：“下面，看下面。”

在离他们几步远的一片荒地上，是那只僵硬的猎鹰，翅膀被缠住了。

“扔掉，扔掉！”他说，“我再不想见到它了！”

他抓起鹰的一只翅膀扔出去，把它扔到杜鹃花丛里。巴贝夫翅膀不动被扔过去，可能它从来没有这样滑翔过。吉利雅拉住他一只胳臂。说：“不，可怜的巴贝夫！”

“扔掉！”德利托气得脸发白，“我再不想见到它了！把它埋了去！皮恩，把它埋了。拿把铁锹把它埋了。”

皮恩看着杜鹃花丛中的死猎鹰：如果死鸟站起来，会怎么着，会啄他的眼睛吗？

“我不去。”皮恩说。

德利托动动鼻子，手放在手枪上，说：“拿铁锹，去，皮恩。”

皮恩提起猎鹰的一只爪子，爪尖像钩子一样又弯又硬。他扛着铁锹，提着耷拉头的死鹰走了。穿过杜鹃花地和一片森林，来到草地上。顺着台阶从这些草地可以上到山上。所有死人都葬在这些草地下面，眼睛里充满土，不管是死去的敌人还是死去的同志。现在猎鹰也葬在此。

皮恩在草地上奇怪地转了几圈。他不愿意为死鸟挖坑的时候，铁锹触到死人脸，也不愿意踩着死人，他怕他们。然而，要是能

从土里挖出一个死人，一个裸体死人，牙露着，眼睛空着，那也不错。

皮恩周围只能看到山。看不到底的大山谷，陡峭的山坡，黑压压的树林，一排山接着一排山望不到头。皮恩一个人站在土上，土下是死人。树林那边山坡那边的另外一些人在地上，男人蹭女人，一个人扑在另一个人身上互相残杀。死猎鹰在他脚边。起风了，一大片云彩在他头上飞过。皮恩为死鹰挖了一个坑。鹰跟人不一样，一个小坑就行了。皮恩拿起死鹰，见它眼闭着，翻着白眼皮，跟人死的时候一样，皮恩使劲翻开，看见下面圆圆的黄眼睛。他真想把猎鹰扔向空荡的山谷中，看着它展开翅膀，重新飞翔，在他头上盘旋几圈，再飞向远方。而他像在有仙女的寓言故事中一样跟在它后面，越过山冈，走过平原，一直到一个人人都善良可爱的迷人的国度里去。现在他把死鹰放进坑里，用铁锹慢慢地掩埋它。

这时，一声巨雷响彻深谷：枪声，炮声，在山谷中显得更响：战斗开始了！皮恩吓得向后退。可怕的巨大响声在空中回荡。声音很近，离他很近，不知在哪里。过一会子弹要在他头上飞过，过一会，从山脊里会突然冒出德国人拿着机枪向他射击。

"德利托！"

皮恩扔下插在坑土中的铁锹，跑了。他跑着，巨大的响声包围着他。

"德利托！吉里雅！"

他跑进树林。冲锋枪声、机枪声、手榴弹声、迫击炮声。战斗是在他梦中突然出现的，不知道在哪里。可能离他几步远，可能在那边小路的拐弯处能听到机枪的呜咽，看到分散在荒地上的死人。

"救命啊！德利托！吉里雅！"

他来到杜鹃花丛的边缘，空中的枪声使他更加惧怕。

"德利托！吉里雅！"

厨房里，空无一人，他们跑了！扔下他一个人。

“德利托，他们开枪了！他们开枪了！”

皮恩哭着跑到花丛的边缘。灌木丛中有一条被子，里面裹着一个活动的身体。一个身体，不，是两个身体。里面伸出四条腿，交叉着，跳动着。

“战斗！德利托！他们开枪了！战斗！”

十一

全旅部队经过几个小时的行军,到达半月关。冷风刺骨,战士们筋疲力尽,难以入睡。指挥员命令在一个岩石台阶下停下休息片刻。在阴云密布的黑夜,关口在大雾环绕的两个岩石高地中间像一个凹形草地。关口那边是自由的山谷和平原,一些敌人还未占领的新地区。战士们自出发以来,还没有休息过。就是他们的斗志也难以忍受这长时间疲劳所带来的折磨。战斗热情推动他们前进。这是一场浴血的战斗,最后以游击队的撤退而结束。但这不是一场失败的战斗。德国人从一个峡谷过来,发现山顶上有许多人大喊大叫,悬崖边升起喷出的火舌:他们中的许多人滚进大道的坑洼处,几辆卡车开始冒烟起火,像锅炉一样,过了一会成为一堆废铁。后来援军到了,但作用不大:只打死了几个不服从命令而留在大路上或混战中离开队伍的游击队员。因为指挥员们及时得到汽车纵队到来的情况,及时散开队伍,沿着山路返回,以避免被敌人包围。当然,德国人丢了面子之后也不肯就此罢休,于是费烈拉决定让全旅放弃这个现在有可能会成为陷阱的地区,让自己的部队进入更容易防卫的其他山谷。撤退是安静的,井井有条的,将黑暗的夜空留在后面,顺着崎岖山路向半月关前进,一支骡子队驮着辎重、食品和伤员。

德利托的战士们在岩石台阶下面冻得牙齿直打架,把毯子像阿拉伯长袍那样围在头上和肩上。支队死了一个人:贾钦托政委,白铁工人。他躺在一个草地上,被德国火焰喷射器射中。他漫游

各地的五彩缤纷的梦想抛弃了他，让他和身上的虫子在一起，因为任何杀虫剂都驱赶不了它们。还有一位伤员，卡拉布里亚四连襟之一的伯爵手上受了伤。

德利托和他的战士们在一起，面色蜡黄，肩上围着一条毯子像一个真病号。他活动着鼻子，静静地一个一个地打量每一个人。不时地像是要下命令，结果还是一言不发。战士们也没向他说话。如果他下命令，或是一个同志对他说话，肯定会引起大家的不满，说出激烈的言词。还不到时候：大家都明白这点，好像他和其他人达成了默契。他不再下命令，也不再训斥人；别人做事也不再需要他。这样支队行军很有纪律，没人散开，也没人因轮流背东西而吵架。不能说没有指挥员。实际上，德利托还是支队司令，他一个眼神就能使大家守规矩。德利托是个杰出的指挥员，有杰出指挥员的品质。

皮恩戴着登山帽注视德利托、吉里雅，而后看曼齐诺。他们的表情和平时一样，只是因寒冷和劳累显得憔悴。每人的脸上都没有记载昨天早晨历史的有关章节。别的支队过来了，在更远的地方停下来或者继续行军。

"司机基安，基安！"

一支小队还在"立定"，皮恩在里面认出了酒馆里的老朋友，他穿着游击队队服，全副武装。基安不知道谁叫他，他也十分惊奇：

"啊，是皮恩！"

他们以不习惯互相祝贺的人的谨慎喜悦庆祝见面。司机基安变得不同了：参加游击队一个星期，眼睛已不再是穴居动物的眼睛，因为抽烟和饮酒总是眼泪不断，就像所有酒馆里的常客那样。脸周围似乎想留胡子。他在重剑营。

"我到旅部报到时，吉姆想把我交给你们支队……"基安说。皮恩想："他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可能是那天晚上在酒馆里叫'委员会'的那个陌生人给所有人都打了小报告。"

“哇，要在一起多好呀，基安。”皮恩说，“后来为什么没送你来？”

“唉！他们说没用了：你们支队不久要解散！”

“就是这样，”皮恩想，“一个人刚来，就知道我们这些人的情况。”皮恩对城里情况一无所知，便问：“司机！小街上有什么新鲜事？酒馆里呢？”

基安酸溜溜地看着他：“你什么也不知道？”

“不知道，”皮恩说，“有什么事？‘狙击兵’生儿子了？”

基安吐了一口痰：“我再不愿意听人谈那些人了，”他说，“生在他们中间我感到羞耻，那些年我真受不了他们、酒馆、小街上的尿臊……尽管我待在那里……现在我要离开那里，感谢那个无赖告发了我……”

“法国人米歇尔？”皮恩问。

“米歇尔是一个，但不是他，这个无赖。在黑色旅和爱国行动小组之间搞两面手法，至今尚未决定跟哪一派……”

“其他人呢？……”

“在一次拉网式搜捕中，都被捕了。当时我们刚刚决定组织爱国行动小组……长颈鹿被枪毙了……其他人被送到德国……小街几乎空了……一颗炸弹落在炉子栏杆附近……大家或是疏散或是住在山洞里……这里是另外一种生活：我好像又回到了克罗地亚，只是现在，如果上帝愿意，我愿到那边去……”

“克罗地亚，司机，坏小子，你生在克罗地亚，情人呢？……我姐姐呢？……告诉我，她也疏散了吗？”

基安捋捋刚长出来的胡子，说：“你姐姐，她让别人都疏散了，那条母牛。”

“你说清楚，”皮恩开着玩笑说，“你知道你冒犯我了。”

“蠢货！你姐姐在党卫队那里穿着丝绸服装，和军官们乘汽车兜风。德国人到小街时，是她挽着一位德国上尉带领他们挨家挨

户搜！”

“一个上尉，基安！狗东西，多好的职业！”

“你们正谈论做奸细的女人吗？”说这话的人是表兄，伸过来他那张塌鼻子、留胡子的宽脸。

“是我姐姐，那个母猴，”皮恩说，“从小时候起她就当奸细，可以想像得到！”

“可以想像得到。”表兄说，看着远处，呢帽子下面表情沮丧。

“对法国人米歇尔，也可以想像得到。”基安说，“米歇尔不坏，但是个无赖。”

“佩莱，你认识黑色旅那个新人佩莱吗？”

“佩莱，”司机基安说，“是人群里最坏的。”

“以前是最坏的。”他们后面有人说。他们转过身来：是红狼带着从德国人那里缴获的武器和机枪子弹带来了。大家欢迎他，每次见到红狼，大家都很高兴。

“那么说，佩莱怎么了？怎么回事？”

红狼说：“这是爱国行动小组的一次行动。”他开始讲述。

那时，佩莱有时回家睡而不在兵营。他一个人住在一家民房的阁楼里，把弄来的枪都藏在那里，因为在兵营里要分给其他人。一天，佩莱回家，和平时一样带着武器。有一个人跟着他，身着便装，穿着雨衣，手揣在口袋里。佩莱觉得有人要向他开枪。他想，“最好假装什么也没发现。”继续走。在另一条人行道上，见到另外一个陌生人，也穿着雨衣手揣在口袋里。佩莱转身，那两个人也转身。他想，“现在应该赶紧回家，一进大门就跳进屋去，从门框后面射击，使人不能靠近。”但是，在人行道上，除了大门以外，又有一个穿雨衣的人向他走来，佩莱想，“最好让他过去。”他停下，三个穿雨衣的人也停下。只能尽快地进门了。在大门里面又有两个穿雨衣的人靠在楼梯栏杆上，一动不动，手也揣在口袋里。佩莱进来了，心想，“我中圈套要被捕了，他们会对我说：‘举起手来！’”然而，他

们好像不看他。佩莱从他们前面走过，上楼梯。想，“他们再跟着我，我就趴在台阶上向楼梯井开枪。”在第二个楼梯拐弯处往下看，他们还跟着他。佩莱还处在他们手枪的枪口上，手枪都在雨衣口袋里看不见。又一个拐弯处，佩莱又横着往下看，在他下面每个楼梯拐弯处都有一个人，佩莱贴着墙继续上楼，不管他在什么地方，都有爱国行动小组的人，他下面一、二、三、四楼的拐弯处都有人贴着墙上来，手枪对着他。六层，七层，楼梯井半明半暗，好像到处都有人慢慢上来。佩莱想：“如果到阁楼前他们不开枪，我就得救了；我躲进屋内，里面有许多枪和手榴弹，可以坚持到黑色旅来。”到了顶层阁楼，佩莱跑上最后一个拐角处，开门进去，赶紧用肩把门顶上。“我得救了！”但是阁楼的窗口那边房顶上，又有一个穿雨衣的人用枪对着他。佩莱举起双手，身后的门也开了，所有穿雨衣的人都用枪对着他，其中一个人，不知是谁，开了枪。

在半月关停下的同志们都围在红狼周围，屏住呼吸听他的叙述，有时红狼也夸张一番，但总的说来，他讲得不错。

一个人问道：“你是他们一起的吗？你是哪一个？”

红狼微微一笑，从在监狱里被剃光的头上提了提有沿帽。说：“房顶上那个。”

然后，红狼开始列举佩莱收藏在那阁楼上的所有武器：机枪，斯坦式，马基内式，马斯式，手榴弹，各种口径的各式手枪，红狼说甚至还有一门追击炮。

“你们看，”红狼说着，展示一支手枪和一些特制手榴弹，“我只拿了这些，爱国行动小组的装备比我们差，他们需要。”

皮恩突然想起自己的手枪：如果佩莱知道那个地方，去取出来的话，那支枪也应在其中。现在应该属于他皮恩的，别人不能拿去！

“红狼，听着，红狼，”皮恩拉了拉红狼的外套说，“在佩莱的手枪中，有一把 P38 型吗？”

"P38型?"另一个人说,"没有,没有P38型。收藏中什么型号都有,惟独P38型没有。"

红狼又开始描述这个枪迷收集的零件,种类繁多,有的还很少见。

"你能肯定没有P38型吗?"皮恩问,"不可能被爱国行动小组的什么人拿走吗?"

"不可能。"红狼说,"你认为我会没有注意到P38型?我们是在一起清点的。"

"这么说,那支手枪还埋在蜘蛛巢旁边,"皮恩想,"那是我的枪,佩莱说知道那个地方,这不是真的。没人知道那个地方,那只是皮恩的地方,一个神奇的地方。"对此,他深信不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蜘蛛巢还在,埋在那里的手枪还在。

天快亮了,全旅本来还要进行长时间行军。但是,指挥员们判断:太阳升起以后,这么多人的队伍走在暴露的大路上,会立即被人发现。因此决定:等到夜晚降临,再秘密地继续行军。

这里以前是一些边境哨所,多年来,将军们在这里假装备战,结果打起仗来还是毫无准备。山上分布着许多长排低矮的军事营房。费烈拉命令部队在营房里安顿,睡觉。整整一天都要隐蔽在里面,直到天黑或者起大雾继续行军。

这些营房分配给各个支队。德利托支队分到一个小的水泥房子,四周有墙与外面隔开,以前可能是马厩。战士们躺在少量的烂草上,闭上了疲惫不堪和充满战争场面的眼睛。

早晨,人挤在屋子里面觉得心烦。每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到墙后面小便。没有别的事就在里面休息。吃饭时不能唱歌抽烟。因为在山谷里,树林中有奸细用望远镜四处观察并到处打听。大家只能轮流到一个军用厨房里吃饭,它的烟道通过地下到远处冒出去。

皮恩不知道该干什么,坐在靠门有太阳的地方,脱下漏底的鞋

和没后跟的袜子，在太阳光下看脚，揉着伤口，抠出脚趾缝中的脏东西。然后逮虱子，每天都要“扫荡”一次，否则最后就像贾钦托一样，可怜的贾钦托！可是，如果以后像贾钦托一样，有一天死了，那现在逮虱子又有什么用？可能贾钦托之所以不逮虱子，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了。皮恩很伤心，记得第一次从衬衣里逮虱子是和彼埃特罗马格罗在一起，是在监狱里。皮恩真想和彼埃特罗马格罗在一起重新在小街上开个修鞋店。然而，现在小街已经没有人了，人都跑了，或者被抓或者死了。而他姐姐，那个母猴，还和上尉们鬼混。不久，皮恩将被大家抛弃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不知道去哪里。支队里的同志们是一些他弄不清楚又敬而远之的人，像酒馆里的那些人，但他们眼里充满杀人的疯狂和在杜鹃花丛中做爱的野性，又比酒馆里的那些人更迷人一百倍，更不可理解一百倍。惟一和他合得来的是表兄，伟大、温柔又冷酷的表兄，但现在他不在。早晨皮恩醒来时，没有看见他。他经常一个人带着冲锋枪和呢帽子出去，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这个支队也将解散，这是吉姆对司机基安说的，同志们还不知道。皮恩转向他们，他们都挤在水泥房子里铺着烂草的地上。

“坏小子们，若不是我来给你们带来消息，你们都不知道你们出生了。”

“怎么了？你吐痰。”大家问他。

“支队要解散了，”皮恩说，“一到新地区就解散。”

“什么，谁告诉你的？”

“吉姆。我发誓。”

德利托听懂了，但没有做任何表示，他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别啰嗦了，皮恩，把我们弄到哪里去？”

大家开始谈论起哪些人被分配到哪个支队，愿意去哪些地方。

“你们不知道给我们每人一个支队吧？”皮恩说，“让我们每人都当司令。让木帽子当沙发游击队司令，肯定的，一支坐着战斗的

游击队部队。没有骑兵战士吗？现在游击队员都坐轮椅。”

“等到我读完，”细高个泽纳又名木帽子说，用手指指着《超级侦探书》中读到的一页，“然后再回答你。现在我快知道谁是杀手了。”

“杀死牛的?”皮恩说。

细高个泽纳看不懂书也听不懂话：“什么牛?”

皮恩“咦”地笑起来，因为泽纳中了圈套了，“你买牛嘴唇的那头牛。牛嘴唇！牛嘴唇!”

木帽子支在一只大手上要站起来：手指还夹在书中读到的地方，另一只手在空中挥动要抓皮恩。后来发现太累了，就又开始看书。

听到皮恩的俏皮话，大家笑了，并喜欢看这个场面：皮恩一开起玩笑来就没完没了，直到一个一个地把每个人都来一次。

皮恩开心兴奋，连眼泪都笑出来了。现在，皮恩很得意，周围是大人：对自己好的人和对自己不好的人混在一起，可以一起开玩笑和发脾气的人。他觉得自己很冷酷：毫无怜悯地伤害他们。

吉里雅也笑了，但皮恩知道她是假笑，因为她心里有鬼。皮恩不时地望她一眼，她不低眼睛，只是嘴唇轻轻一笑。“你等着，”皮恩想，“你笑不了多久了。”

“宪兵!”皮恩说。他每提到一个名字，大家都小声冷笑，预感到皮恩要讲出一个新故事。

“让宪兵指挥一个特别支队。”皮恩说。

“纠察队。”宪兵说，抢在他前面先把话说了。

“不对，美男子，抓父母支队!”

每次提起他抓拒服兵役者的父母当人质，宪兵都暴跳如雷。

“不对！我从来没抓过人家父母!”

皮恩说得尖刻狠毒，其他人帮着起哄：“别生气，美男子，别生气！抓父母支队，你抓父母很能干……”

宪兵焦躁不安,后来想,让他说吧,说累了就说另一个人了。

"现在该……"皮恩环视四周,然后停住,呲牙眯眼地笑着。大家已明白要说谁了,憋住不笑出来。公爵面对皮恩的奸笑,像被施催眠术似的一动不动,紧绷着脸。

"我折断你的角,捅穿你的屁股。"他咬着牙说。

"让公爵组织一个宰兔支队。坏小子,你的话太多了,公爵。除了掐死鸡剥兔子皮外,没看见你做过什么。"

公爵把手放在奥地利手枪上,好像要用皮帽子打人。"我捅破你的肚子!"他喊道。

这时,曼齐诺失算了,说:"我们让皮恩指挥什么?"

皮恩看看他,好像第一次发现他在那里。说:"哦,曼齐诺,回来了……离家好长时间了……你不在的时候,家里出了许多好事……"

他慢慢转过身来:德利托在一个角落里,表情严肃;吉里雅靠近门,面带虚伪的假笑。

"你猜猜,你指挥什么支队,曼齐诺……"

曼齐诺傻笑,还想抢先:"……军用大锅支队……"他说,接着又笑,好像说了世界上最诙谐的话。

皮恩严肃地摇摇头。曼齐诺眨眨眼:"……猎鹰支队……"他说,又使劲笑,嗓子里发出古怪的声音。

皮恩很严肃,示意不对。

"……海军支队……"他又说,口不动了,流泪了。

皮恩抓住他滑稽虚伪的表情,油腔滑调慢慢地说:"你看,你的支队和其他支队一样,只能走草地,走宽路,走种矮植物的平原……"

曼齐诺又笑起来,先是没声,后来声音越来越大:还不明白皮恩要引到哪里去,但照样笑。大家都在等皮恩的下文。有人已经明白,笑起来。

“可以到处去，除了树林……除了有树枝的地方……有树枝的地方……”

“树林……啊，啊，啊……树枝，”曼齐诺冷笑，“为什么？……”

“会被缠住……你的中队……戴绿帽子人支队！”

大家大笑起来，声音极高。厨师很不自在地站起来，双唇紧闭。笑声减弱。厨师看着周围，又笑起来，眼睛肿了，嘴也歪了，勉强地笑，狂笑，拍自己的膝盖，用手指指着皮恩，好像是说：说出了他想说的话。

“皮恩……你们看着他……”他说，虚伪地冷笑，“皮恩……给他，我们给他卫生间支队，给他……”

德利托也站起来，向前走了几步。

“到此为止！”他面无表情地说，“你们不明白不能出声吗？”

这是战斗之后，他第一次下命令。用不能出声作借口下的命令，而没说：到此为止，因为这个故事我不喜欢。

大家见他也不自然：他不再是支队司令了。

吉里雅说话了：“皮恩，为什么不给我们唱个歌？还唱那首……唱吧……”

“卫生间支队……”曼齐诺说，“头上顶着夜壶……啊，啊……皮恩头上顶个夜壶……你们想像得到……”

“你要我唱哪首歌，吉里雅？”皮恩问，“上次那首歌？”

“安静！”德利托说，“你们不知道命令吗？不知道我们在危险地区吗？”

“给我们唱那首歌，”吉里雅又说，“就是那首，你唱得非常好……怎么唱的？噢依力，噢依拉……”

“头上顶着夜壶，”曼齐诺笑得继续拍着膝盖，眼眶含着气愤的泪水，“自动武器用的灌肠器……给你做一阵灌肠……皮恩……”

“噢依林，噢依浪，吉里雅，你能肯定吗……”皮恩说，“你根本不知道……以噢依力，噢依拉开头的歌根本没有。”

“做一阵灌肠……你们看看他……皮恩……”曼齐诺说。

“噢依力，噢依拉……”皮恩开始临时编词，“丈夫去打仗，噢依力，噢依拉，妻子留在家！”

“噢依力，噢依拉，皮恩是个拉皮条的！”曼齐诺要压过皮恩的声音。

德利托第一次看到没有人服从他，他抓住皮恩的一条胳臂使劲扭：“住嘴！ 住嘴！ 明白吗？”

皮恩感到疼，他反抗，继续唱：

“噢依力，噢依拉，妻子和司令，噢依力，噢依拉，将要干什么？”

厨师使劲对着唱，不愿听他的词：“噢依林，噢依浪，妓女的弟弟。”

德利托扭皮恩的两条胳膊，手指间觉得他的细骨头几乎要断了：“住嘴，杂种，住嘴！”

皮恩泪汪汪的，咬着嘴唇，还唱：“噢依力，噢依拉，他们走向灌木丛，噢依力，噢依拉，像两只狗一样！”

德利托放开他一条胳膊，用一只手堵他的嘴。这是个愚蠢又危险的动作：皮恩咬住他一个手指，用力咬。德利托尖叫一声。皮恩松开手指，看看周围。大人们都看着他。这群不可理解、与人为敌的人！ 德利托吮着流血的手指，曼齐诺笑得浑身发抖，吉里雅脸色苍白，其他人，所有其他人都瞪眼看着这一幕，气也不敢出。

“你们这些混蛋！”皮恩大叫，痛哭起来，“戴绿帽的！ 母狗！”

现在，只能走了。走！ 皮恩跑了。

对于他，只有孤独！

德利托在他后面喊：“不能出营房！ 回来！ 皮恩，回来！”要去追他。

但在门口，他碰上两个带枪的人。

“德利托，我们正找你。”

德利托认识他们，是旅部的两个传令兵。

“费烈拉和吉姆叫你去汇报,跟我们走吧。”

德利托面无表情地回来。“走吧。”他说,背上冲锋枪。

“他们说,下掉你的枪。”他们解释说。

德利托眼皮不动,从肩上解下枪带,说:“走吧。”

“还有手枪。”他们又说。

德利托解下手枪皮带,让它落到地上,说:“走吧。”

他夹在两个人中间,转过身来,说:“两点钟,轮到我们去做饭,你们要开始准备好所有的东西。三点半,两个人去站岗,顶上昨夜我们没上的岗。”

又转过身去,夹在两个带枪人中间走远了。

十二

皮恩一个人坐在山顶上。长满灌木的岩石落在他脚边。山谷开阔，谷底是流淌的河水。山坡上升起的长条云遮住了远处的村镇和树木。现在一件不可挽回的事件已经发生。正像他偷德国水兵手枪的时候，他离开酒馆的那些人的时候，他逃离监狱的时候，现在他再也不能回到支队战士那里去了，再也不能与他们共同战斗了。

他作为大人世界里的一个孩子很伤心，永远是孩子，被大人当作好玩的东西和讨厌的东西来对待，不能使用他们神秘和有刺激的东西，武器和女人，永远不能参加他们的游戏。但是，皮恩有一天会长大，可以对大家很坏，报复那些对他不好的人。皮恩现在就愿意成为大人，或者不是大人，但照样令人佩服或令人惧怕。做某些杰出的举动，成为孩子，同时又是大人的头领。

现在，皮恩走了，远离这些多风的陌生的地方，回到自己的王国，沟渠，回到蜘蛛筑巢的那个神奇地方，那里有他埋藏的手枪，它有神秘的名字：P38 型。皮恩将为了自己去参加游击队，带上自己的手枪，没有人扭着他的胳膊，几乎要扭断，没有人派他去埋葬死猎鹰，自己却和女人在杜鹃花丛中乱滚。皮恩要单独干，做些惊人的事情，要杀掉一个军官，一个上尉：他的狗奸细姐姐的上尉。到那时大家都尊敬他，都愿意和他共同战斗：可能会教他使用机枪。吉里雅再不会对他说：“给我们唱首歌，皮恩。”以便能和情人鬼混。她再不会有情人了。有一天吉里雅会让他，皮恩，摸她的乳房，男式衬衣下面粉红色的热乎乎的乳房。

皮恩走在半月关下山的小路上，步子很大，在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他发现自己对那些计划的热情是假的，预想的。发现他的幻想肯定永远不能实现，他继续是个迷途的、到处漂泊的可怜孩子。

皮恩走了整整一天，遇到一些可玩许多开心游戏的地方：跳白石头，爬歪脖树，看见松树顶上的松鼠，靠在欧洲黑莓上的蛇，以及投石子的好靶子。但皮恩不愿意玩，不停地走，走得上气不接下气，心里感到忧郁。

他停下来，进到一户人家要点吃的，屋里有一对老夫妇，孤苦伶仃，以放羊为生。两个老人欢迎皮恩，给他栗子和牛奶，给他讲他们的儿子都被抓到很远的地方。又靠近火炉念玫瑰经，还想让皮恩也念。

但是，皮恩不习惯和善人相处，觉得不自在，也不习惯念玫瑰经。于是，当两位老人闭着眼睛祈祷时，他轻轻离开椅子走了。

夜里他睡在草垛里，第二天早晨继续走。经过德国人骚扰的更危险的地区。皮恩知道自己是个孩子，有时也很方便，即使说自己是游击队员，也没人相信。

有时候，封锁区挡住他的去路。戴钢盔的德国人从远处就盯住他。皮恩厚着脸皮往前走。说：

“羊，你们看见我的羊吗？”他说。

“Was?[①]”德国人听不懂。

“羊，一只羊，咩……咩……”

德国人笑了，听懂了。皮恩头发很长，衣服也不合身，很容易被当成一个小羊倌。

“我丢了一只羊，”他哭着说，“我肯定，羊来这里了。去哪里了？”皮恩混过去，继续走路，嘴里叫着：“咩……咩……”这一关也

---

① 德语：什么？

过了。

昨天大海在天边像一层混浊的乌云，今天在山冈和房屋那边变得碧蓝，啸声震天。

皮恩回到自己的小河旁。夜幕降临，青蛙稀少，黑色的蝌蚪使井水振动。往上就通到蜘蛛筑巢的小路。从这里过了到芦苇地，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有皮恩知道。这里，皮恩可以奇思怪想：变成国王，变成神。他提心吊胆地往上走，看到蜘蛛巢了：但是，土被移动过，到处都能看出有人用手动过。拔草，移动石头，破坏蜘蛛巢，刮掉抹上去的碎草。佩莱！佩莱知道这地方：佩莱曾经在这里，气得嘴唇发抖，淌着口水，用指甲刨开土，把小木棍钉入洞里，把蜘蛛一个一个地都弄死，寻找 P38 型手枪！他找到了吗？皮恩再也认不出准确的位置：他原先放的石头没有了，草被一把一把地拔掉。应该是这里，他挖的壁龛还在，但是里面堵满了土和凝灰岩碎石。

皮恩抱着头哭了。没有人能还给他手枪了：佩莱死了，枪没在他的住房里。他把枪放在哪里？给谁了？对皮恩来说，这是他在世上剩下的最后一件东西。现在怎么办？支队是回不去了，他对大家，对曼齐诺、对吉里雅、对公爵、对细高个泽纳又名木帽子干的坏事太多。酒馆经过搜捕，所有人都被流放或杀死，只剩下法国人米歇尔加入了黑色旅。皮恩也不想有佩莱的下场，爬上很长的楼梯等人开枪。皮恩一个人留在世上。

长街的黑女人听到有人敲门时，正在试一件新的蓝色便装。她听着：在小街的旧房子里，她怕这时候给陌生人开门。继续敲门。

“谁？”

“开门，丽娜，我是你弟弟，皮恩。”

黑女人开门，弟弟进来。他穿着式样很怪的衣服，头发长过肩

膀，很脏，衣衫褴褛，样子很狼狈，脸上分不清是土还是泪。

"皮恩，你从哪里来？这段时间你在哪里？"

皮恩往里走，几乎不看她，说话声音沙哑：

"别来烦我。我在我应该在的地方，做饭了吗？"

黑女人温柔地说："等着我给你做。坐下，可怜的皮恩，你累了，你很走运碰上我在家，平时我几乎不住在这里，现在我住宾馆。"

皮恩嚼着面包和一块德国造的榛子巧克力。

"看得出，他们待你很好。"

"皮恩，我真为你担心！这段时间你干什么了？流浪，造反？"

"你呢？"皮恩反问。

黑女人往面包片上抹德国麦芽果酱，递给皮恩。

"现在，皮恩，你想干什么？"

"不知道，让我吃饭。"

"听着，皮恩。你要参加党派可要当心。听着，我工作的地方需要像你这样的棒小伙子，让你生活得不错。又没什么活干，只是从早到晚转转看大家做什么。"

"丽娜，你说，你有枪吗？"

"我？"

"对，你。"

"好吧，我有一支手枪，现在我带着它以防万一。是黑色旅的一个人送给我的。"

皮恩抬起眼睛，咽下最后一口东西："能让我看看吗，丽娜？"

黑女人站起来："你拿枪干什么？你偷了弗里克那支还不够？这支和弗里克那支很像。给你，看吧！可怜的弗里克，被派到大西洋上去了。"

皮恩看这支迷人的手枪：P38 型。他的 P38 型！

"谁给你的？"

“跟你说过了,黑色旅的一个人,头发是棕色的。他着凉感冒了,我不夸张,他身上有七支完全不同的手枪。我问他:怎么弄的这么多?送给我一支。他不愿让人求他,他有手枪癖。最后他送给我这支,因为损坏最严重,但照样能用。我问他:你给我的是什么,大炮?他说:这样,就留在你这里。谁知道他想说什么?”

皮恩不听她讲话: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枪。他抬眼看着姐姐,把枪贴在胸部,像抱玩具娃娃一样。“丽娜,听着,”他声音沙哑地说,“这把枪是我的!”

黑女人很不高兴地看着他:“谁给你的?你成什么了,造反者?”

皮恩把椅子摔在地上。

“母猴,”他用力喊道,“母狗!奸细!”

把枪揣进口袋,摔门而去。

外面,黑夜茫茫。小巷里空无一人,和他来时候一样。商店窗户关着。在墙边人们堆起桌子和沙土袋以防轰炸。

皮恩走上沿河的小路,好像又回到偷枪的那天夜里。现在皮恩有了手枪,一切和以前一样。只是现在就他一个人了。和那天夜里一样,皮恩心中只有一个问题:我要干什么?

皮恩一边走一边哭,开始是无声地哭,后来哭出声来。现在没有人来安慰他。没人吗?在拐角处闪出一个很大的人影。

“表兄!”

“皮恩!”

这真是个神奇的地方,每次都有奇迹出现。那支手枪也很神奇,像魔棒一样。表兄是个大魔术师,带着冲锋枪和呢帽。他一只手摸着皮恩的头,问道:“到这里干什么,皮恩?”

“来取我的手枪。你看,一支德国水兵的手枪。”

表兄凑近看手枪。

"很漂亮,一支P38型,保管好。"

"你在这里干什么,表兄?"

表兄叹口气,还是那可怜的样子,似乎总是在受罚。

"我去看个人。"他说。

"这是我的地方,"皮恩说,"神奇的地方,蜘蛛在这里筑巢。"

"蜘蛛筑巢,皮恩?"

"全世界只在这里蜘蛛筑巢。"皮恩解释道,"我是惟一知道的。后来来了那个法西斯分子佩莱,把巢都毁了。要我指给你看吗?"

"让我看看,皮恩。蜘蛛巢,你听,你听。"

皮恩拉着他的手走,那只又软又热、像面包一样的大手。

"到了,你看,这是巢的所有的门。那个法西斯杂种都给破坏了,这里还剩一个完整的,看见了吗?"

表兄靠近蹲着往里面看,说:"你看,你看,小门能开能关,里面是洞,很深吗?"

"深极了,四壁都是用嚼碎的草做的,蜘蛛在里面。"皮恩解释说。

"点根火柴。"表兄说。

两人蜷曲着靠得很近,看洞口的火柴光在里面有什么反应。

"快,把火柴扔进去!"皮恩说,"看蜘蛛出不出来。"

"为什么,可怜的小动物?"表兄说,"你没看见它们已经遭到很多损失了吗?"

"你说,表兄,你相信它们能重新筑巢吗?"

"如果让它们安静,我想会的。"表兄说。

"以后我们还回来看看。好吗?"

"好吧,皮恩。每个月回来看一次。"

找到表兄太好了,他对蜘蛛巢这么有兴趣。

"你说,皮恩。"

"要什么,表兄?"

“知道吗，皮恩，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我知道你懂这些事。你看，我已经好几个月没和女人在一起了……你懂这些事情，皮恩。听着，大家说你姐姐……”

皮恩又冷笑了。他，是大人的朋友，懂得这些事。遇到这种情况时，能为朋友们提供这种服务，他感到自豪：“坏家伙，表兄，跟我姐姐好好玩。我指给你路：你知道长街吗？好，在夹楼上，过了水暖工的那个门。你放心地去，路上没人。和她在一起，要小心，不要告诉她你是谁，也不要告诉她是我叫你来的。只告诉她你在‘托德特’工厂工作，路过这里。对，表兄，你可以说女人的坏话。去吧，我姐姐是个令许多人喜欢的棕发女人。”

表兄微露一丝笑意，脸上还是那么苦恼。

“谢谢，皮恩。你够朋友，我去去就回来。”

“坏家伙，表兄，带冲锋枪去吗？”

表兄用手指捋了一下胡子。

“你看，不带枪活动我不放心。”

看到表兄在这种事情上拘束不安，皮恩觉得好笑。“带上我的手枪，把冲锋枪留给我，我给你当警卫。”

表兄放下冲锋枪，揣上手枪，摘下呢帽也放进口袋，用沾了唾液的手指试着抹直头发。

“弄漂亮点，表兄。你要能打动她，你想在家找到她，你就快点。”

“再见，皮恩。”表兄说完就走了。

现在，在黑夜里，皮恩孤单一人，靠近蜘蛛巢，旁边是放在地上的冲锋枪。但他不再感到失望，他找到了表兄。表兄是他渴望找的伟大朋友，对蜘蛛巢很有兴趣。但是，表兄也和其他大人一样，对女人有神秘的欲望，现在他去找黑女人，在零乱的床上拥抱她。想到此，他认为表兄要是没有那种想法更好。他们可以在一起再看看蜘蛛巢，然后表兄说说他那套反对女人的话，皮恩对此明明白

白,而且同意。然而表兄还是和其他大人一样,毫无办法。皮恩对此一清二楚。

在山下,老城里,又有枪声。谁干的?可能是值勤的巡逻队。夜里,枪声更使人觉得恐惧。肯定是太冒失了:表兄为了一个女人,单独到法西斯占领区。现在皮恩怕他落到巡逻队手里,怕他在姐姐家遇到德国人被捕。这样对他也好,皮恩也觉得解气:跟他姐姐这只毛茸茸的青蛙有什么乐趣可言?

但是,如果表兄被捕,皮恩就是一个人了。只剩下使他害怕的冲锋枪,他还不会用呢。皮恩希望表兄没有被捕,竭尽全力希望如此,倒不是因为表兄是伟大的朋友,他已经不再是伟大的朋友,他是个和其他人一样的人。而是因为他是世界留给他的最后一个人。

可是,在开始担心之前,再等等。突然一个影子走过来,是他。

"怎么这么快,表兄,全干了吗?"

表兄忧郁地摇摇头:"知道吗,我觉得恶心,什么都没干,就离开了。"

"坏家伙,表兄,你觉得恶心!"

皮恩兴高采烈,表兄确实是位伟大的朋友。

表兄又背上冲锋枪,把手枪还给皮恩。他们行走在乡间。皮恩把手放在表兄那只像面包一样又柔软又暖和的大手里。

黑暗中有星星点点的亮光,那是盘旋飞舞在篱笆上的萤火虫。

"所有女人都是这样,表兄……"皮恩说。

"唉……"表兄同意,"但不是所有时候都这样。我母亲……"

"你想起了你妈?"皮恩问。

"是的,我十五岁时她去世了。"表兄说。

"她好吗?"

"是的,她很好。"表兄说。

"我母亲也很好。"皮恩说。

“这里有许多萤火虫。”表兄说。

“靠近看萤火虫，”皮恩说，“它们也令人恶心，淡红色的。”

“是的，但这样看很美。”表兄说。

他们继续走着，大人和孩子，在黑夜中，在萤火虫飞舞中，手拉着手。

烟　云

我迁入到这个城市安顿下来时，对一切都毫不关心。安顿这个词也许不太确切，因为我并不想在这里安顿下来，我愿意让我周围的一切都是临时的，不安定的，只有这样我才能在内心里感到安定。那么什么是我内心的安定呢？其实，我也说不上来。因此，经过辗转介绍，当这里有人聘请我来当《净化》杂志的编辑时，我就接受了这个工作。

对一个刚刚走下火车到达陌生城市的人来说，火车站就是这座城市，转来转去尽是一些狭窄的街道，两旁是车站的库房，运输代理人的库房和咖啡馆，载重卡车擦肩而过，喷着令人恶心的浓烟。他双手交替着提行李，不一会便手酸臂痛，汗流浃背，衬衣紧紧贴在身上。这里的一切都会使他感到烦躁。

我正是在火车站附近找到了符合我条件的带家具的住房：在一栋楼房的大门门框两边，用线绳系着两排利用旧鞋盒做的出租房屋的广告，字写得虽然都不好，却都贴着正式的印花票。我提着行李，不时地换换手，看到那些出租房屋启事便走了进去。这楼里每个楼门、每一层楼至少有两家出租房屋。我在三门二楼门口停下，按了一下门铃。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房间，光线很暗，有扇门窗通向院子，需从院子里经阳台进出，使它与这套房子的其他房间隔开。女主人玛格丽蒂小姐耳聋，害怕小偷，平时总把铁栅栏锁上。房间里没有卫生间，厕所搭在阳台上；室内只有一个洗脸池子，有自来水，却没有热水龙头。这不是很适合我吗？租金很适合我，是我可以承受的，多了我付不起，少的我又没有找到。再说，这住房也是临时的，我

自己对这一点应该非常明确。

“好吧，我要了。”我回答玛格丽蒂小姐说。可她以为我在问那房间冷不冷，用手指了指那里的火炉。

房间我已看过了，现在只想放下行李出去走走。到达这里后我很想洗个澡，可又懒得打开箱子找肥皂，仅把手伸到洗手池水龙头下面冲了一下。

“噢，为什么您没告诉我呢？我这就去给您拿毛巾。”玛格丽蒂小姐说罢，迅速跑回自己的房间，拿来熨得平平整整的毛巾挂在椅子背上。我觉得脸太脏了，又用水清爽了一下脸，再用毛巾搓了搓。这个动作使女主人终于明白了，我要下了这个房间。

“啊，您要了，您要了。好，您是不是要打开箱子换换衣服，您请便吧；这里是衣架，请把您的大衣给我挂这边。”

我没让她来脱我的外套，因为我想出去。只是要设法告诉她，我需要一个书架：我有一箱书要运来，那是我在这动荡生活之中好不容易才收集起来的一些书籍。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对那聋子解释清楚，最后她把我领到她房间里一个小货架前，那上面放着她的针线筐、纱线筒、需要修补的旧衣服和各种刺绣样子。她答应我很快收拾出来，搬到我房间里去，我这才出了门。

《净化》杂志是由某机构主办的，我应该到那里去报到才能知道我的任务是什么。如果我再年轻几岁，对生活抱有更大希望，那么这项新的工作，这个新的城市，也许能使我感到兴奋或满意。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看到的全是阴暗面，看到的是大家都在贫困中挣扎，我也在其中挣扎。不是说我已听天由命了，不，我是乐在其中，因为这样就证实了我的这个看法：生活就是如此。就说现在去找那单位吧，我宁愿多走几步，选择那些又小又窄毫无名气的街道绕道走，也不愿走那些两旁都是商店、酒吧，橱窗里摆得琳琅满目的大道走；我觉得走在那宽敞的街道上心里不痛快，那里看不到身边行人疲惫不堪的样子，看不到小饭馆里那拥挤不堪的场面，看

不到那些破旧的小店铺，听不到窄小街道上特有的那种噪音：有轨电车叮当叮当的行走声，小货车吱吱的刹车声，小作坊里电焊时发出的刺刺声。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外部世界那些破旧与贫困的样子，可以使我的内心世界得到平衡。

可事与愿违，要到达那个单位，必须穿过一段截然不同的富人区。这里庭院绿树成荫，建筑风格古色古香，街道宽敞，汽车分道行驶，既不堵塞也不喧闹，车流量比那些小道上还少。这里的人行道挨着的不再是两边楼房的砖墙，而是各家各户的铁栅栏，透过铁栅栏可以看到，那些装饰别致的建筑物四周环绕着低矮的植物篱笆、花圃和石子通道。面对这种不寻常的景色，我感到茫然，再也看不到我可以辨认的征兆了（不是我迷信征兆。一个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看到的一切都可能成为一种征兆）。

当我走进那个机构的大楼时，感到出乎意料，有点不知所措，因为那些大厅都是贵族式的，墙壁上镶着玻璃镜，挂着壁毯，墙边摆着托架，大理石壁炉，柔软的地毯（不过家具都是二十世纪的标准办公家具，灯饰是现代化的霓虹灯管制作的）。总之，我现在为租下了那个又简陋又阴暗的房间感到不安；当我被领进该协会主席科尔达工程师的办公室，受到他热情洋溢的接待，他仿佛把我看成与他的声望和社会地位同等的人时（当然是指我对该协会杂志《净化》研讨的问题具有同等的兴趣和专长），我更加觉得拘束不安，无地自容。说心里话，我认为《净化》研讨的问题，只不过是人为地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供人们茶余饭后谈谈而已，我接受这个工作也不过像接受其他任何工作一样，现在可好，不得不成为这个事业的一部分了（科尔达工程师已为之奋斗了一生）。

他年纪约五十岁，但相貌年轻，留着黑胡子。就是说，他就是那种虽然年过半百，长相却很年轻，仍然留着黑胡子的一代人，我和他们那代人从未打过交道。他的举动，他的言谈，他的外表（标准的灰色西服，洁白的衬衫），他的手势（他讲话时挥动着一只手，

手指间夹着香烟），他的一切都反映出他办事精干，思维敏捷，态度乐观，没有成见。他把《净化》至今出的几期都拿给我看，是他（社长）和印刷部的负责人阿万德罗博士（科尔达工程师给我们做了介绍，阿万德罗博士是那种说话跟念稿子一样的人）共同收集的。《净化》总共没出几期，篇幅也不大，看得出是由非专业人员编辑的。我根据自己对报刊编辑工作的了解，善意地（当然不是进行批评）对他们说明了，我希望对该杂志进行哪些技术方面的改进。我讲话的口气也那么实用、那么自信，而且我高兴地看到我和他们的意见不约而同。为什么我要用"高兴地"这个词呢？因为我越是装得精干，越是装得乐观，思想深处越是想着那可怜的房间、黯然失色的街道、锈蚀的栏杆和汗淋淋的衣服，越是觉得能够坦然对待这一切。我仿佛在科尔达工程师和阿万德罗博士面前变魔术，把他们那种工作效率变成一堆面包渣，让他们毫无察觉。科尔达却兴奋地点着头。

"好，我们说定了，您明天就着手进行改进，"科尔达对我说，"现在……"

他想让我看看他们最近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

"喏，"他把我领到一个陈列着各种油印文件副本的书架旁，对我说道，"您看看，看看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您有了吗？好，您数数，都有了吗？"

他一边说，一边把那些油印的纸张拿到手里。恰恰在这时我看见一股灰尘从那些纸张上冉冉浮起，看清他在那上面留下的手印。科尔达弹弹拿在手里的纸张，用嘴轻轻一吹，动作非常轻微，仿佛不愿让人发现那上面落了灰尘。他每取一份文件，都特别注意不让手指碰到第一页。但是，只要他的手指哪怕是手指甲轻轻挨上那第一页，那上面薄薄一层灰色尘土上就会出现一条细细的白色痕迹。尽管他很小心，手指仍然被弄脏了，他似乎也察觉到了，把手指弯曲到手心里绕着圈擦干净，结果把整个手掌也弄脏

了。他下意识地把手放到灰色法兰绒裤腿上并保持一段时间，然后才抬起来。我们两人都这样小心谨慎地传递和接过那些文件，好像那些纸张和荨麻叶子一样，摸着就会使人皮肤感到刺痛。尽管如此，大家都面带笑容，高兴地微笑着点头说道："啊，这次大会很有趣！大会的议题很好！"不过，我觉得科尔达工程师在我炯炯的目光面前变得越来越急躁，越来越沉不住气，而我自己也越来越感到沮丧，因为这一切，正如我想像的那样，不过是装模作样而已。

我辗转反侧不能入睡。这房间看起来很安静，但夜间却被一种后来我才弄清楚的噪音困扰着：不时传来一阵阵高音喇叭声，仿佛要人们注意什么但又听不清楚。那时如果我已入睡，便会被那声音吵醒，懵懂之中还以为自己睡在火车上呢。因为那声音的音色和节奏，与火车站上昏昏欲睡的乘客听到高音喇叭发出的声音完全一样。我侧耳细听，才听清那声音说的是："两份饺子，带汁的……一份烤牛排……一份排骨肉……"

我这个房间的下面，是乌尔班诺·拉塔齐酒馆的厨房，午夜后那里也经常炒菜。服务员用对讲器从柜台上向厨师传达顾客们点的菜，顾客们的谈话时而也有歌声夹杂着，也从那个信息渠道穿了过来。那里的菜味道不错，价格略贵一点，经常去吃饭的人并不俗气，很少听见有人深夜发酒疯，打翻桌椅或杯瓶什么的。顾客们的欢乐声传到我的床前，仿佛穿过了一层云雾，失去了原有的欢乐和色彩，变得模糊不清了。惟有那喇叭筒里传来的低沉的鼻音依稀可辨："一盘炸土豆条配菜……饺子得了吗？"

乌尔班诺·拉塔齐酒馆夜里两点半左右关门。服务员们个个掀起工作服的衣领御寒，从厨房门那里走进院子，聊着天离去。三点左右，一阵阵铁桶撞击的声音从院子里传来，那是厨房里的杂工往外拖沉重的空啤酒桶，侧着拖或让酒桶在地上滚，然后还要清洗；他们一定是计时工，干活不慌不忙，漫不经心，一边打着口哨，一边踢打着那些酒桶，一直折腾到五点。六点时拉啤酒的汽车来了，送来满桶，运走空桶。这时候乌尔班诺·拉塔齐酒馆里传来了清洁工干活的声音，她们已经开始清扫、擦地板，准备迎接新的一天。

各项劳作交替的间歇里，从玛格丽蒂小姐黑暗的房间里传来阵阵对话声，并夹杂着笑声，那好像是同一个妇女的声音伪装的，时问时答。玛格丽蒂小姐耳聋，区分不了自己是在默思呢，还是在大声讲话；不论是白天还是深夜，只要她沉溺于某种思想，回忆起愉快的或悲伤的往事，便情不自禁地开始自言自语，模仿各种人讲话。幸亏她那种独白都很简练，让别人听不懂。不过，这倒使我觉得接触到她的隐私，心里忐忑不安。

早晨我去她厨房要点热水刮胡子时（敲门她听不见，我只能等她面向门口时进去，让她能看见我），常发现她对着镜子微笑或做鬼脸，或者坐在椅子上，目视前方，自己给自己讲故事。她一发现我，便装模作样对我说："啊，我正在跟猫说话呢！"或者："对不起，我没看见您，我正做祈祷呢（她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但她并未发觉她的话被人偷听了。

的确，她经常和猫讲话，有时能讲上几个小时。有时我听她站在窗户旁不停地呼唤"咪咪，咪咪，我的小猫"，等候它玩够了从阳台上或房顶上归来。她的猫又瘦又小，像只无人喂养的野猫，毛色虽是黑的，但每次外出归来，都成了一只灰猫，仿佛这一带的灰尘和烟尘都落到它身上了。它一看见我就逃，急忙躲到什么家具下面，仿佛我打过它似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曾注意过它。我不在家时，它肯定到过我的房间，因为女主人放到我衣柜大理石台面上的白衬衫的衣领和前襟上总有它脚爪的痕迹。开始时我大声咒骂，很快就不骂了，因为女主人听不见，改为把那受难的衬衣拿给女主人过目。女主人看了很伤心，到处找猫要惩罚它，并向我解释说：她上我房间里送衬衣时，那小猫一定偷偷跟了进去；她出来时无意把小猫关在房间里了，小猫从房门里出不来，气愤之余跳上衣柜弄脏衣服。

我只有三件衬衣，也许是因为我刚到这里，要收拾办公室，衬衣穿半天就脏了，就得交给玛格丽蒂小姐洗。洗好的衬衣给弄脏

了，又没有别的换，只好穿那衣领上有小猫足迹的衬衫上班。

有时在我的枕头上也能发现它的足迹。这大概是因为女主人傍晚上我房间来给我掖起被角，它也跟了进来，被关在室内了。

那猫身上很脏，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你只要用手摸一下阳台栏杆，你手上就会沾上黑色的痕迹。每次我回到家里用钥匙开阳台栏杆和门窗上的四把锁，然后伸手去开百叶窗、阳台门时，手都要被弄脏，进门时只得举着开门的那只手，以免弄脏别的东西。进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洗手池边去洗手。

洗完手擦干净，我这才会觉得舒服点，似乎刚才没有用过那只手似的，然后才开始摆弄室内为数不多的别的东西。不过我应该声明，玛格丽蒂小姐房间打扫得很干净，天天都要把房间擦一遍。如果我把手伸到她擦不到的地方(她身材矮小，胳膊短)，那么手上就会沾上一层尘土，只好立即去洗手池里洗干净。

最关键的问题是我的那些书。我把它们摆在那个货架上。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书，我才觉得这里是我的家。编辑工作并未占去我的全部时间，空闲时我喜欢待在家里看看书。众所周知，书籍最招灰尘；当我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时，打开书之前总要用抹布把它好好擦擦，擦擦封面，擦擦书口，然后再拍打拍打，因为书上总有很多灰尘。最后再去洗洗手，躺到床上开始阅读。尽管如此，翻书时我还是觉得手指上有薄薄一层灰尘，感到扫兴，有时甚至破坏了我读书的兴趣。这时我便立即起身，走到洗手池旁再洗洗手。我不仅不会觉得手洗干净了，反而会觉得我的衬衣上、衣服上到处都沾上了灰尘。

当然，出去的时候我也得像进来时那样操作：先是锁百叶窗和门，然后是铁栏杆上的锁，手上沾的灰尘比进屋时还多。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带着那双脏手到办公室去洗。一到办公室，我就奔向卫生间洗手：那里卫生间里的手巾黑得不像样子，用它擦手只能越擦越脏。

我在那家协会上班的最初几天是用来收拾我的办公桌。分配给我的那张台子上堆满了杂物:纸张、信件、文件夹、旧报纸等。简言之,凡是没有固定收存地点的杂物,都堆在那张台子上。我的任务首先是把桌上那些东西清理掉,可是在清理过程中我发现,那里面有些资料是我们杂志需要的,有些则可能引起我们一定的兴趣。于是我决定仔细看看那些东西。不过,现在桌面上已不那么杂乱无章了,我尽量把那些资料摆放得整整齐齐。不言而喻,桌上原来的那些资料上都有一层尘土,因此新放上去的资料也被沾上了尘土。我珍惜自己好不容易才整理出来的东西,便告诉打扫卫生的女工不要随意移动它们。这样一来,有些东西尤其是文具、纸张、信封等,得不到清扫,天天落一层尘土,几天下来就脏得像是旧的,谁也不愿再用手触摸它们了。

抽屉里也是如此!里面尽是陈旧的、沾满尘土的纸张,是这张台子几十年经历的证明:它所在的这个房间既做过公共事业的办公室,也做过私营企业的办公室。我坐在那张台子上不论干什么,过不了几分钟就觉得应该去洗洗手。

我的同事阿万德罗博士的双手,随时都很清洁,而且护理得很好:十个手指的指甲修理得清清爽爽,平平整整,或尖或圆形状一模一样。我曾这样问过他:

"您不觉得在这里待一会,手就脏了吗?"

"有可能,"阿万德罗博士同情地回答说,"您也许摸到过不干不净的东西或纸张吧。我冒昧地奉劝您一句,在写字台上最好不要堆放任何东西。"

阿万德罗博士的写字台，除了他当时正在办的案卷和手中的圆珠笔，的确是什么杂物也不放，干净明亮。

“这是个习惯问题，”他补充说道，“主席先生特别看重这个习惯。”

科尔达工程师对我也曾这么说过：一个领导人不在自己的写字台上堆放东西，那是因为他遇到问题不等问题积压下来便立即着手解决。可是科尔达几乎从来不到办公室来，偶尔来一次也只待一刻钟：让人呈上报表和统计数字看，或向秘书口授信函，签署信件，或向属下下达指示，交代任务，但他从不考虑各种任务的难易程度。

阿万德罗博士则不同，他不论上午、下午都待在办公室里，看上去工作很忙，但他一会儿叫速记员，一会儿叫打字员，任何文件在他写字台上停留的时间最多不超过十分钟。他桌上那个干净样子令我十分气愤。我开始注意他，这才发现：如果有什么文件在他桌上多停留一会，他就立刻把它们放到别的什么地方去。有一次给我碰上了，他手持一些无用的信件向我的办公桌走去（我去洗手，刚刚离开那里），顺手塞到我桌子上的一个文件夹下面，然后迅速从衣兜里掏出手帕擦擦手指，再回自己的座位上去。他那桌面上仍旧是只有一张印有该协会名称的信纸和一支并排放着的圆珠笔。

我完全可以出其不意突然走进办公室，让他下不了台。但是我想，看见了，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不就行了。

因为我是从阳台上进入我房间的，玛格丽蒂小姐住的那些房间对我来说还是一片陌生的地方。她独自一人，有两个朝向院内的房间出租，我这个房间和相邻的另一个房间。那个房间的房客，听说是干警察的，我还从来没见过，只是深夜或清晨听见他归来或离去时的沉重脚步声。其他房间玛格丽蒂小姐自己住着，大概住得很宽敞。

有时候我得叫她听电话，因为她听不见电话铃响，常常由我接电话。她耳朵对着听筒时，也能听清对方讲话。所以，和本教区的女友们打电话聊天，是她的一项娱乐。

“玛格丽蒂小姐，电话！电话找您！”一天我这样大声叫她，用力敲打各房间的门，就是找不到她。我这才知道，她住的面积很大，有起居室、客厅、盥洗室，家里有名贵的古老家具，有漂亮的灯罩、字画、雕塑、挂历等摆设；各个房间都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地板上打了蜡，沙发上铺着抽纱靠垫。真可谓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最后我终于在最里边的一个房间里找到了她。她正在那里专心致志地擦地板和家具，身穿一件褪了色的睡衣，头上包着一块头巾。我指了指电话那边，用力比划着跟她讲话。那聋子迅速奔向电话机，抓起听筒，开始进行一场马拉松式的谈话，此时讲话的声调与对猫讲话时的声调完全不同。

我回到自己房间里，看到洗手池上和灯罩上落的足有一公分厚的尘土，一股怒火油然而生：那可恶的女人，把全天的时间都用来打扫自己的房间，收拾得窗明几净，可对待我这个房间，竟不愿用抹布抹一下。我决心找她给她点颜色看。等我在厨房里找到她

时，看见那厨房比我的房间还要脏，一张旧饭桌漆面脱落，油污斑斑，柜橱里的玻璃杯没有一点光彩，墙壁上的瓷砖已翘起或熏黑，看到这种情形，我已无话可说了。因为我知道，这套房子里只有厨房才是那女人真正生活的地方，其他房间，尽管她十分珍惜，不断打扫、上蜡，只不过代表了她对美好的憧憬：为了使那些房间能保持完美的形象，她甘愿不在那里居住，而且除了进去打扫外，从不像主人一般走进那些房间；打扫之余的其他时间，她都待在这个肮脏的厨房里。

《净化》杂志是一份半月刊，副标题是“净化空气中的烟雾、化学散发物和燃烧排放物”，是 EPAUCI 即“工业城市大气净化协会”的机关刊物。EPAUCI 与其他国家的兄弟协会联系密切，定期收到它们的简报和刊物，经常举行国际会议，讨论日益严重的烟尘问题和其他问题。

我从前从未研究过这类问题，但我知道编辑专业报刊杂志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困难。多看同类外国报刊杂志，把某些文章翻译过来，再订一份文摘报和一份简报，差不多就算齐了；然后再找两三个懂行的技术人员合作，让他们定期发表些小文章；至于协会本身，只要它想开展工作，它总会有些公报呀，日程呀，这一类的东西要发表，要用黑体发表这些东西；还会有人要求把他们的专利介绍当作文章给予发表。开代表大会时，你至少可以出一辑专刊；如再剩一些发言和报告，以后哪期稿件不够时，你再陆续慢慢地发。

按说社论应该由协会主席来写，可是科尔达工程师好像很忙（他担任许多工厂的执行董事，只能抽些零碎时间从事协会的工作），便让我起草，按照他向我讲述清楚并一再强调的观念起草。我写好后，等他下次再来时拿给他看。他经常要去外地出差，因为他那些工厂分布在全国各地。有一次他对我说，他所担任的职务中，EPAUCI 协会主席虽说是个荣誉性职务，却令他最为满意。“因为，”他解释说，“这是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我写社论却不是为了理想，也不想有那种理想；我不过是想替他写篇文章，让他高兴高兴，为了保住自己这个工作。这个工作比

起我可能找到的其他工作，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我了解科尔达的论点（“假如大家都以我们为榜样，大气层的空气今天就可以得到净化……”），熟悉他喜好的表达方式（“不言而喻，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是讲究实际的人……”），可以按照他的要求一字不差地写出来。不这样写该怎么写呢？难道要把我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不，我敢担保，按照科尔达工程师的意思写出来的文章一定非常漂亮，对工业界和管理部门充满乐观主义的态度。按照科尔达的意愿写这篇社论并不难，只要变换一个我的心态，让我自己反对自己，就能具备写这篇社论必不可少的那种热情。

“我们现在处于解决飞尘问题的前夕，”我提笔写道，“这将加速空气污染问题的最终解决，”我仿佛看到科尔达工程师的脸上已经露出笑容。“私人企业对解决这一问题的技术作出的贡献，必将得到一向关心这一问题的政府部门的充分理解……”科尔达工程师读到这里一定会拿出笔标出这句话来。

我把这段话念给阿万德罗博士听。他把那双精心护理的手放在写字台中央那张白纸上，面无表情却非常客气地望着我。

“怎么？不行？”我问道。

“行，行！”他急忙回答说。

“您听文章这样结束：‘我们不能同意那些说发展工业会带来灾难的预言，我们要再次申明，自由发展工业与保持人类机体所必需的健康环境并无矛盾，现在如此，过去也是如此，’”我不时望望阿万德罗，他始终低头望着写字台中央那张白纸。“‘在我们工厂努力生产、烟筒排放烟尘，和我国无与伦比的蓝色天空绿色植被之间……’喏，您认为怎么样？”

阿万德罗紧闭双唇惊讶地望着我，沉默片刻说道：

“喏，您的文章表述得很好，我们协会的目的，对，协会的目的，实质就是，尽一切努力争取……”

“嗯……”我若有所思地嘟哝了一下。说实在的，我也没想从

这个言谈委婉的同事那里得到直截了当的赞同。

两天后科尔达工程师来了，我把那篇文章交给他。他当着我的面认真阅读了那篇文章，读到结尾时把那几页纸又按顺序放好，仿佛还要重读一遍似的，不料他却开口说道：

“好。”他思索片刻接着说，“好。”他又停顿一下说道：“您很年轻。”我不同意他这个说法，但不打算反驳他。“不，这不是对您的批评，请允许我讲下去。您年轻，看得远，有信心。但是，请您原谅，目前形势很严峻，对，比您文章中描述的要严峻得多。让我们以公民的身分来谈谈这个问题吧：大城市空气污染非常严重，我们有各种分析得出的数据，说明形势非常严峻。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来设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大城市的污染问题，那么我们那些小城市最终也将被烟尘吞没。”

他说着站起身来，在室内踱来踱去。

“我们不愿掩饰困难，我们为环境而担忧，我们不像那些不关心环境的人，更不像那些从中作梗的人。”

他走到我跟前停下来，压低声音说道：

“您还年轻，也许您会以为别人都同意我们的观点。其实不然，同意我们观点的人很少。对，我们是腹背受敌，受到来自前后两个方面的攻击，但是我们决不屈服。我们要解决污染问题，要大声疾呼，果断行动。我希望在您的文章中看到这些东西，您明白吗？”

他这番话我听得非常清楚，我知道应如何模仿与我自己的意见截然相反的意见，将这篇文章修改得完美无缺，三天之后再将修改后的文章交给科尔达工程师。于是我从头至尾进行了改写，用三分之二的篇幅勾画出一幅阴暗的画面，说明欧洲烟尘污染问题多么严重，然后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描述我们这座城市的光辉形象，与其形成鲜明对照：我们这里天空晴朗，空气新鲜，这与我们的生产企业合理配置不无关系……，等等，等等。

为了更好地集中思想，我留在家里躺在床上写这篇文章。一束阳光从天井里斜射过来，穿过玻璃窗照进我房间，光束通过之处可见室内空气中亿万个触摸不到的灰尘微粒在飞扬。床罩上大概已经落上了这些尘粒，恐怕要不了多少时间也会落上厚厚一层，床罩也会变得黑糊糊的，像百叶窗的横板或阳台的铁栏杆。

我把这一稿交给阿万德罗博士读后，他似乎很喜欢，对我说道：

"您一定是按照科尔达主席的意见，将我们这里的形势与其他城市的形势进行了对比，您写得很好。"

"不，科尔达工程师没有对我这样讲过，是我自己想到的。"我略带生气地回答说，他不该把我看得没有一点主见啊。

科尔达工程师对这一稿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他把打字稿往桌上一摊，摇摇头说道：

"我没有说清楚，没有说清楚。"

他首先向我介绍了这个城市工业生产的情况，如每天烧多少煤，多少柴油，有多少汽车在行驶等，然后谈到这里的气象问题，最后将我们在这两方面的情况与欧洲北方的各个大城市做了个比较。

"您知道，我们是个大工业城市，烟雾弥漫，污染问题在我们这里同样存在，其严重程度不比其他地方低。所以我们不能同意那些反对派的意见，说我们这里的问题没有他们那里严重。这一点您在文章中可以而且应该写得非常明确！我们是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同时我们又是为扭转这种局面付出最多的一个城市！您明白吗，要强调'同时'？"

我明白了。同时我也明白了，我与科尔达工程师之间永远也不会达到相互理解。那些熏黑了的房子，那些昏暗的玻璃窗户，那些脏得不能依扶的窗台，那里面居民的为别人看不到的面孔，还有天空中这层笼罩着一切、使人们看不清一切、使一切失去其原有的

形状和价值的烟雾,随着秋天来临总不能再解释成气候潮湿所致吧,所有这一切对我来说体现了民众的贫困,对他那样的人来说却象征着财富、地位和权力,象征着危险、毁灭和悲剧,仿佛他们置身其中犹如顶天立地的英雄。

我第三次修改那篇文章。第三稿他终于通过了,不过他认为文章结尾有点可笑("我们面临的是人类社会最可怕的问题。我们能够解决它吗?")。

"是不是有点太悲观了?"他问道,"是不是会让人丧失信心?"

最简单的办法是去掉问号,改成"我们能够解决它",也不用加惊叹号,显得既有信心又态度温和。

"这是不是太温和了点?像不像官样文章?"

最好将这句话重复一遍,一句带问号,一句不带问号,写成:"我们能够解决它吗?我们能够解决它。"

这是不是要把问题的解决无限期地推迟下去呢?于是,我们把两个动词改为现在时:"我们现在要解决它吗?我们现在就要解决它。"

写文章就是如此:先是改个标点符号,接着不得不改个字,然后又要改变一下句子结构,最后整篇文章面目全非。我们一起商讨了半个小时。最后我建议说,问句与回答中的动词不必采用同一个时态,写成:"我们能够解决它吗?我们正在解决它。"科尔达工程师听了十分满意,从那以后他对我的能力再未怀疑过。

有天夜里我被电话铃吵醒。那是外地打来的长途电话。我打开灯，才夜里三点，没等穿好衣服我就扑向走廊，抓起听筒，懵懵懂懂听到对方讲话，我便辨别出那是克劳迪娅的声音。

她那嗓音在听筒里回响，像是从另一个星球上传来的。我睡眼惺忪，仿佛看到一团耀眼的火星，其实那是她的声音在回荡，是她通常讲话时夹杂在自己声音中的那不可抑制的激情，通过电话传到玛格丽蒂小姐家的过道里，传到我的耳朵里。我从不怀疑过克劳迪娅早晚会找到我，可以说这些天来我一直在等待这一时刻。

她没有问我这些日子都干了些什么，怎么跑到这里来了，甚至没有告诉我她怎么找到了我的新地址。她有许多事情要告诉我，但她的事情都那么琐碎不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我不仅不知道而且想像不到。

"我需要你，快点，不，立即乘第一趟火车赶到我这里来……"

"我……我在这里有工作……在……"

"噢，你也许能见到爵士吧……告诉他……"

"我见不到他，我只不过是个……"

"亲爱的，你会立即上我这里来的，对吗？"

我怎么回答她呢？告诉她我住的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尘土？百叶窗上有一层灰尘，我的衬衣领子上有猫的足迹？告诉她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能找到的惟一工作，而她那个世界对我来说只不过是幻觉？她是不会听我这么说的，她已习惯居高临下看待一切，我的生活，我生活中的一切，她自然不会收入眼帘。她和我的一切关系难道不正是她这种傲慢态度的产物吗？这使她无法看清，我不

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乡间编辑，既无前途又无野心。正因为如此，她继续把我当作她的同类看待，仿佛我也属于上流社会，是个富翁，是个艺术家，是她习惯与之交往的人。其实，有年夏天我在那种场合被人介绍给她，纯属偶然，就好像在海边浴场上经常发生的那样。她不愿弄清事实真相，因为那就等于承认她自己错了。她继续赋予我我根本就不具备的品质、权威和爱好。我究竟是什么人，对她来说这其实是个细枝末节的问题，而她在这种小问题上从来不承认自己有错误。

现在她讲话的声音渐渐温和下来，变得很温柔。这是我期待的时刻(虽然我自己并不承认)，因为只有在这相互倾吐爱慕之情的时刻各人身上的差别才会消逝，我们才能像以往那样不计较对方究竟是什么人。我们刚刚交换了两句爱慕的话，我身后那扇玻璃门外面的电灯就打开了，传来一阵低沉的咳嗽声。那是我那当警察的邻居，他就住在电话机旁边的房间里。我立即压低讲话声，因为我知道别人能听见，爱慕的话语也不能讲了，结果我的话既听不清也失去了情感色彩。那盏灯终于熄灭了，电话线那头传来了一阵阵抗议：

"你在说什么呀？大点声！这就是你要对我说的话吗？"

"不，还有……"

"什么？谁在你那边？"

"没别人。你知道现在夜深了，会把别人吵醒的……"

这不是她想得到的解答，她生气了。她想知道我的反应，听到我的激情，听见能使距离化为乌有的某种东西。可是我的回答谨慎小心，尽是抱歉和安慰的话。

"别这样，克劳迪娅，别这样，我向你保证，我求求你，克劳迪娅，我……"

邻居警察房间里灯又亮了，我把嘴唇紧紧贴到话筒上唧哝而语。

院子里清洁工们正在搬运啤酒桶。玛格丽蒂小姐的房间里传来阵阵低语,时而夹杂着笑声,仿佛有人来访。邻居警察用南方话大声骂了一句。我光着脚站在走廊的瓷砖上,克劳迪娅在电话线那头发出的热情言词向我伸出了手,我含糊其词仿佛在迎着她奔跑。每当我们要在我们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时,我们的努力和爱慕的表示均在各种冲击之下被瓦解、被粉碎。

自那以后电话铃曾多次在夜间或白天响过，克劳迪娅的声音像只斑斓猛虎在那狭窄的走廊里碰撞，它不知自己已落入陷阱，纵身一跳逃了出去，却什么也没察觉。见她搀入这肮脏的、令人失望的环境之中，我的心情错综复杂，是困惑，是爱恋，是高兴，还是残忍？我说不清楚。乌尔班诺·拉塔齐酒馆对讲机的喇叭里传来声音说“一盘水饺”，玛格丽蒂小姐的洗碗池里堆积着肮脏的盘子，在这种环境之中我仿佛看见她的形象也沾染上了尘土。不，不会的，她的声音一尘不染，沿着电线逃走了，她对这里的情况仍一无所知。我呢，每次打完电话都感到孤独和空虚。

有时候克劳迪娅很开心，无忧无虑，笑声不绝，讲起话来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最后我也给她逗得开心地笑了。不过这时候，院里的噪音和屋里的尘土更加令我担忧，仿佛它们会妨碍我的另一种生活。有时候克劳迪娅急于想知道，我住的这地方什么样，我怎么编辑《净化》杂志。我已无法摆脱她了，时时盼望着她打电话来，最好是夜间打来把我惊醒。恰恰这时候出人意料地传来她的声音，她那么高兴，那么温柔，仿佛已经忘却了上次打电话时的不快；我呢，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不记得自己身处何方。

“你说什么？从陶尔米纳[①] 给我打电话？”

“对，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在这里，这里真漂亮，你赶快乘飞机来吧！”

---

① 西西里岛东海岸著名的旅游城市和疗养胜地。

克劳迪娅每次打电话来，都是在一个新地方，也许她因为心情烦躁至极或高兴至极，总是要求我立即赶到她那里去，与她分担忧愁或分享幸福。我每次都要对她解释为什么我不能立即赶去，可她从来不让我把话说完，接过话茬继续讲下去，通常是严厉指责我一番，有时也出人意料地夸奖我一下，赞扬我无意之中讲出的某一句话让她感到宽慰，令她崇拜。

当话务员或夜班值班员提醒我们说"所付通话时间已到"时，克劳迪娅总要补上一句说："那么，你几点到？"仿佛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似的，我只好支吾其词，把一切都推到下次我给她打电话或她给我打电话时再说。我相信克劳迪娅会立即改变她的计划，请我立即前往的邀请还会在不同场合提出来，但我若每次推迟行期，她都能找到合适的解释。其实我内心里仍有一丝后悔，我并不是绝对不能离开，我可以找个借口预支下月工资，请三四天假呀；我反复思考，感到内疚。

玛格丽蒂小姐什么也没听见。她即使路过走廊看见我在打电话，也只是点点头跟我打个招呼，一点没看出我的心情有多么激动。那个邻居却不然，即使他待在房间里，也什么都能听见，我不得不对我的任何感情流露进行防范，避开他那锐利的嗅觉。幸好他几乎不待在家里，我打电话时可以放任自流，无拘无束，只要克劳迪娅高兴，我们就可以进行灼热的对话，那时我们每一句话都充满激情和隐私，能在内心里引发快感。有时那邻居警察躲在门后偷听，虽然她完全放开了，我却受到约束，只能用简单的言词回答她那热情奔放或脉脉含情的表白；有一次我确实看见他满脸黑胡子，探头窥视我。他身材矮小，换个地方决不会引起我注意。但是，在这里，在这穷苦的人们居住的房子里，又是深夜，我打长途电话谈情说爱，他则刚刚下班回来，我们都身穿睡衣，在这种情况下相见，彼此决不会怀有好感。

克劳迪娅讲话时常常提到一些名人，因为她经常接触名人。

我呢,首先,我不认识那些名人;其次,我也不愿那些名人吸引我的注意力。所以,我不得不答话时,总是避免提到他们的名字,兜着圈子说话,克劳迪娅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做,跟我发火。关于政治问题,我一向躲得远远的,因为我这个人不愿抛头露面。现在来到这个半官方的机构任职,我自己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既不过问这一派的事,也不过问那一派的事。克劳迪娅也不知怎么了,有天晚上问起我对一些议员的看法。那时那个警察正在门后偷听,我却需要立即给克劳迪娅一个答覆,于是说道:

"第一个嘛,你说的那第一个……"

"谁? 你在说谁?"

"那个,对,比较胖的,不,不,个子比较矮的……"

总之,我爱克劳迪娅。但是,我很不幸。她怎么才能理解我的不幸呢? 有人命中注定要过平庸的生活,默默无闻,因为他们经历了痛苦或不幸;有人却故意这样做,那是因为他们得到的幸福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

我在一些供应套餐的餐馆吃饭。这座城市的套餐馆都是来自托斯卡纳的人经营的，他们相互都有亲戚关系，而且那里的女服务员都来自一个名叫阿尔托帕世奥的地方。那些年轻姑娘生活在这里，心里却惦记着阿尔托帕世奥，与本地人从不交往，傍晚出去散步，从不远行，还要找在这里餐馆或机械厂工作的来自阿尔托帕世奥的小伙子做伴。她们专找这些小伙子结婚，婚后有的回阿尔托帕世奥去，有的继续留在这里，在他们的亲戚或同乡开的餐馆里做工，省吃俭用，盼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开个餐馆。

在这些餐馆里用餐的顾客，也可想而知，除了每天过往的客人外，固定的顾客就是那些单身职工、学生或军人，多数是男的，也有少数女的。这些顾客来这里用几次餐，就相互熟悉了，吃饭时不论是否坐在同一张桌上，都相互热情交谈。有时人们开始时并不相识，谈着谈着干脆把各自的桌子并到一起，边吃边谈起来。

顾客们也经常和那些阿尔托帕世奥的女服务员开玩笑，当然都是善意的玩笑，问她们有对象没有，或说上几句俏皮话。实在没什么好谈的时候，就打开电视机，评论起这个或那个演员来，说这个讨人喜欢，那个不讨人喜欢。

我从不参与他们的谈话，除了点菜，什么话也不说。就是点菜也老是这两句：奶油面条，煮肉配青菜。因为我正节制饮食呢。对那些年轻姑娘，虽然我早已知道她们叫什么名字，但从不称呼她们的名字，坚持称呼她们“小姐”，以免和她们过于亲近。这个餐馆我不常来，可以说是个偶然的顾客。今后我也许会天天来，也许能坚持许多时间，但我希望自己像个过路客，今天在这里，明天也许就

到那里，否则我心里就会感到不安。

我并不是厌恶这里的人。不，这里不论是工作人员还是顾客都是好人，都很讨人喜欢，那种亲切的气氛更令我陶醉。如果没有那种气氛，我也许会觉得缺少点什么。但是，我宁愿旁观，不愿参与。我避免和其他顾客交谈，避免和他们打招呼，因为结识一个人很简单，但结识以后却需要保持相识关系。比如，有人随便问了句："今天晚上演什么？"然后就和别人一起去看电视或看电影；从那以后他经常要和一些毫不相干的人结伴而行，向他们讲述自己的事情，或听他们讲述他们的事情。

我尽量找空着的桌子坐，摊开上午或下午的报纸（我上班的路上买份报纸，浏览一下证券市场的情况，然后等吃饭的时候再好好看），从头到尾认真阅读。如果找不到空闲桌子，不得不和别人坐一张桌子时，那张报纸对我就更加重要了：我埋头看报，谁也不会来打搅我。不过我尽力找个空桌子一个人坐，研究尽量推迟吃饭时间的办法，等大批的人吃完饭走后再去。

晚到的缺点是桌子上有面包渣。常常是前面的顾客刚刚起身，我就坐过去，桌面上尽是面包渣。这时我尽量不把目光投向桌面，等服务员来把脏杯子和盘子收走，擦干台布，撤去脏罩布，在上面再铺上一块干净的罩布。有时这道工序进行得很仓促，台布和罩布之间仍然留有面包渣，我心里非常不高兴。

去吃午饭最好的时刻是，等服务员认为不会再有顾客来了，开始认真清扫餐桌，为晚饭做准备；然后老板、服务员、厨师和清洁工，一起收拾一张台子坐下来准备吃饭。这时候我再走进餐馆说："噢，我是不是来得太晚了，还有东西吃吗？"

"怎么能没有呢？请坐，您随意坐哪里！丽莎，快伺候这位先生。"

我挑选一张干净而漂亮的桌子坐下，立即有个厨师下厨房去给我备菜。我打开报纸阅读，然后慢慢用餐，听他们边吃饭边说

笑，讲述阿尔托帕世奥地方的故事。吃完每道菜我都要等一刻钟，因为那些小姑娘都坐在那里吃饭、说笑。等得不耐烦时我便催问："小姐，水果……"他们回答说："好了，安娜你快去！喂，丽莎！"我对这种办法非常满意。

我吃过饭，读完报纸，把报纸一卷握在手里，走出饭馆回家；爬上楼梯，进入房间，把报纸往床上一丢就去洗手。玛格丽蒂小姐窥视我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再出去，等我一出门她便来拿报纸看。她不好意思找我要报纸看，所以悄悄来拿，在我回来之前再悄悄放回我的床上。她好像有点害羞，怕人笑话她浅薄，因为她就看一种消息：讣告。

有一次我进门时正好碰着她手里拿着报纸，她面红耳赤地解释说：

"对不起，有时我来拿报纸看看死人的消息，您知道，那些死人中有些是我的老相识……"

我已习惯晚点吃饭。有时看电影晚了,走出电影院脑子昏沉沉的,站在霓虹灯下更觉得周围一片昏暗,天空一层烟雾吞噬了这座城市的景色。我看看手表,心想那些小餐馆可能已经关门了,已是过了我平时吃饭的钟点,再说我也来不及赶到那里去了。于是,我决定到乌尔班诺·拉塔齐酒馆,就是我房间下面的那家酒馆,去随便吃点东西。

从街上走进酒馆,不仅光线由暗到亮反差很大,而且世界仿佛也变了个模样:酒馆外面行人稀少,没有光彩,一切都模糊不清;酒馆里面则柜台表面光亮照人,切片机上的生火腿红白相间,服务员的绿色服装鲜艳夺目,金色的啤酒闪闪发光。这里顾客满盈,一切东西有形有色,清晰可辨。我走在街上遇到的行人,既看不清他们的体形也看不清他们的面孔,他们仿佛都是幽灵,我也是一个幽灵;来到这里我才看清那么多陌生的面孔,有男人的面孔,也有女人的面孔,如花似玉,各不相同。开始时我还幻想自己能保持一个幽灵的形象,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也和他们一样形色具备,我的形象映照在镜子里,可以清楚看见早晨刮过的胡须又长了出来,我就是想躲也躲不开呀。这里的烟民吞云吐雾,浓浓的烟雾顶着天花板在室内弥漫,但它仿佛自成一体,仿佛是道配菜,既不影响也不改变其他事物的本质。

柜台附近人群拥挤,我用力挤过去,时而回头望望大厅。大厅里每张桌子上都笑语不断。一旦有人站起来,我便坐到他那张椅子上,并设法引起服务员的注意,让他给我摆上托盘,杯垫,一扎啤酒和菜单。可在这个乌尔班诺·拉塔齐酒馆里,我每天夜晚为之不

能入睡，已熟悉了它的作息时间、工作节奏和嘈杂声音的酒馆里，我费尽心机却不能让服务员听到我的声音。

“喂，请来一盘奶油土豆圆子。”我说道。

服务员终于听见了我的声音，并对着对讲器一字一字地说道：

“一份奶油土豆圆子！”

这使我想到扬声器把这句话传到厨房里会变成什么样子，也使我仿佛既趴在酒馆的柜台上同时又躺在自己房间的床上。我努力区分周围又吃又喝欢快谈笑的声音和刀叉杯盘相互碰撞的声音，企图找出我每天夜晚听到的那种噪音。

在世界的这个角落里，线条明朗和色彩鲜艳的背面究竟是什么呢，我渐渐意识到了，而且我就是它们的背面的一员。也许灯光明亮、一目了然的这一面就是背面，事物真正重要的一面恰恰是处于阴暗之中的那一面。乌尔班诺·拉塔齐酒馆之所以存在，不就是因为在黑暗中可以听见它那变形了的声音“一份奶油圆子”？听到啤酒桶相互撞击的声音吗？不就是因为阴暗的街道被霓虹灯的灯光打破，昏暗的玻璃窗户后面躲着看不清面孔的人吗？

一天早晨克劳迪娅的电话吵醒了我。这不是长途电话：她已经来到这座城市，就在火车站上。她刚下火车，发现丢了一个箱子，就打电话给我。

我赶到火车站时，她正满脸笑容地领着一队搬运工往车站外边走，几分钟前给我打电话时的焦急心情已经一扫而光。她长得漂亮，穿着考究，我每次见到她时，都觉得她光彩照人，不同往常。她对我说，她对这个城市突然产生了兴趣，还夸奖我搬到这里来住。虽然这天天气阴暗，她却说这里光线好，街道上的色调也好。

她在一家大旅馆里订了房间。我走进那家旅馆的大厅，询问服务台，打电话通知她，乘电梯上楼，处处感到拘束，感到不自在。由于某种工作上的关系，克劳迪娅到这里来住几天，也许她就是为了来看我，我很感激她，但这同时也使我窘迫不堪。因为这使我清楚地看到，我与她的生活方式之间存在多大差异。

然而那天上午我还对付得不错，还抽空去了趟办公室，提前支取了部分薪金，以应付这突如其来的花费。问题是领她上哪里去吃饭，因为我不熟悉这里的高档餐厅和风味餐厅。作为第一项活动，我想最好还是带她到山上去转转。

我叫了辆出租汽车。现在我才发现，这里的居民，工资达到一定水平的，都有自己的汽车（甚至我的同事阿万德罗博士也有自己的车），我却没有车，不过我也不会开车。我自己对生活是一无所求，但是现在面对着克劳迪娅，我却因为没车而感到窘迫。克劳迪娅呢，她却能坦然处之，她说，我手上要是有辆车，那简直是个灾难。她一点不顾及我的情面，一向贬低我的生活能力，仿佛她对我

的看法很有根据。究竟她有什么根据，我也搞不清。

言归正传吧！我们叫了辆出租汽车；那汽车破破烂烂，司机还是个老头。我尽力开着玩笑，想使这些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事情变成笑料，一笑了之，因为我生活中这类事情太多了；克劳迪娅却不能容忍那破车，仿佛这种事情不应该让她碰上。在这种情况下，我真不知道是应该藐视我的命运呢，还是听天由命。

我们沿着城东绿色的山坡向山上爬。天空渐渐晴朗了，秋季的金色阳光洒满大地，田野的颜色也趋向金黄色。我在汽车里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拥抱了一下克劳迪娅，因为她的到来唤醒了我对她的爱，也因为车窗外面道路两旁闪闪而过的绿色与金黄色的景象打开我的心扉（为了拥抱她，我摘下了眼镜）。

带她去吃饭以前，我让司机拉我们去山顶能看见全景的地方。我们下了车。克劳迪娅头戴一顶黑色大帽子，自转一周，让风吹开她的裙子，我则左右跟随着她，指给她看远处阿尔卑斯山白雪覆盖的山峰（我随便说出各山峰的名字，因为我也分不清哪个山峰是哪个名字）和近处波浪起伏的山脊、丘陵、村庄、道路和河流，指给她看山下这座城市，灰暗的和明亮的建筑物鳞次栉比显得非常渺小。我心里充满了世界广阔的感觉，不知是因为克劳迪娅戴的那顶帽子和她那随风飘荡的裙子，还是因为眼前这片景色。秋天了，这里天空还算秋高气爽，不过仍有一些面积不等、形状各异的凝聚物：山脚下凝集着一块块浓雾，河流上笼罩着一股股潮气，天空中飘荡着一缕缕散云。我们依附着栏杆。我搂着她的腰，面对这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观，顿时觉得自己的地理和气象词汇十分贫乏。她呢，感慨万分，随时在用深情的言词表达自己的各种感受，但她说出来的话并非描述眼前的景色。恰恰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那个东西，一把抓住克劳迪娅的手腕并用力攥着说道：

“你看！往下面看！”

“看什么呀？”

“那是什么？你看那是什么？”

怎么对她解释呢？那东西和云雾差别不大。空气中的潮气遇到冷空气带便开始凝结，凝结的方式不同会产生不同的颜色，呈灰色、蓝色、白色或黑色。那东西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像咖啡的颜色，又像沥青的颜色；更确切地说，那东西一会边上呈这种颜色，一会中间呈这种颜色，就像有块脏东西不仅把它弄脏，而且同时在改变它的浓度（在这一点上它和其他云层也不一样）。它比重很大，离地面不高，在斑驳陆离的城市上空慢慢飘荡，一会吞噬了城市的这一片，一会吐出了城市的那一片，在它所经过的地方总会留下一片污浊的痕迹。

“是烟尘！”克劳迪娅大声惊呼道，“你看见了吗？那就是一片烟云！”

她忧心忡忡，不再听我说话，正为刚才看见的那群飞鸟担忧。我继续望着那片烟云。这是我第一次置身于烟云之外看这片烟云。它曾每时每刻笼罩着我，我生活在它之中，它也生活在我的心中。我知道，在周围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之中，就是烟云令我担忧。

晚上我把克劳迪娅领到乌尔班诺·拉塔齐酒馆吃晚饭，因为除了这种套餐馆外，我不认识任何别的餐馆。另外我也担心别的地方价格太贵。带着克劳迪娅这样的小姐进乌尔班诺·拉塔齐这种酒馆，简直是另一种感受：身穿绿色工作服的服务员，个个受宠若惊，给我们挑了一张最好的桌子，还把特色菜用小车推到我们跟前来让我们挑选。我尽量表现出骑士的风度，但同时也觉得他们已认出我是住在楼上的房客，是到这里来站在柜台边吃快餐的顾客。这种心理使我言谈举止平淡无味且滑稽可笑，很快克劳迪娅便对我的表现表示不满。我们争吵起来，但争吵的声音被酒馆里的噪音掩盖了。尽管大家听不到我们争吵，服务员却老是盯着我们，随时准备满足克劳迪娅的要求，其他顾客也盯着我们，好奇地望着这位长相漂亮、穿着入时、讲话颇有权威却被一个唯唯诺诺的男人陪伴着的小姐。我发现他们都在听我们争吵，同时也发现，克劳迪娅这个平时就看不起周围人的女性，现在更不愿掩盖自己的不快。我觉得大家都在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克劳迪娅一生气站起身撇下我就走，还我一个不为人注意的普通人的形象，就像墙壁上一块司空见惯的潮湿的斑点。

与他们的愿望相反，我们争吵之后通常是友好的和解。晚餐已接近尾声，克劳迪娅知道我就住在附近，对我说道：

“我上你房间去看看。”

我带她上乌尔班诺·拉塔齐酒馆来吃饭，是因为我就认识这一家套餐馆，不是因为这酒馆离我住的地方近。我还真担心她要上我家，哪怕是站在大门口看一眼呢。我想她粗心大意，也许不会产

生这种想法。

这下糟了，她要上屋里看看。我尽量夸大那房间的缺陷，想以开玩笑的方式打消她的念头。她却一边上楼梯，一边往屋里走，一边夸奖那房子怎么好怎么好，古老，建筑风格独特，古建筑实用，等等。我们走进房间，她却说道：

"你说什么呀？这房间太漂亮了！你还要它怎么样？"

为了帮她脱下外衣，我立即走到洗手池边洗洗手，我觉得我的手和平时一样又弄脏了。她呢，恰恰相反，用那双轻巧的手到处抚摸室内的家具。

没过多大工夫，房间里到处都是她的衣物：纱巾、帽子、狐皮外衣、丝绒裙子、薄纱衬裙、缎面鞋、长筒丝袜等。我尽量把这些东西都收到衣柜或抽屉里，因为我怕它们放在外面才一会就会沾满尘土。

克劳迪娅已脱光衣服，露出白皙的肌肤，躺到那一拍就可能尘土飞扬的床上。她顺手从旁边的书架上抓了一本书。"小心尘土！"我说，她却打开书，翻阅一阵后，把书丢在一边。我望着她那娇嫩的胸膛，粉红的乳头，担心书上的尘土会落到她身上，于是伸手去擦掉可能落到她乳房上的尘土，可我这一动作又好像是在抚爱她。

她的皮肤白皙、光滑、富有弹性。台灯的灯光照到她身上，灯光中微小的尘粒像毛毛细雨一样纷纷扬扬，眼看就要落到她的身上。我赶紧扑到她身上，搂着她，其实我是想遮挡住她，保护她，让尘土都落在我身上，别落在她的身上。

克劳迪娅走了，对我有些失望，也有点厌倦，因为她坚持对未来抱有美好的看法。她走后，我更加勤奋地投入编辑工作，一方面因为克劳迪娅的来访占用了我一些时间，耽误了下一期杂志的准备工作，另一方面我想尽力忘掉她，再就是因为我对《净化》杂志所讨论的问题，不再像刚来时那样，认为它与我无关了。

这一期还没有社论，科尔达工程师也没有告诉我有关精神，只简单地说了句："您看着写了，拜托。"我着手写这篇老生常谈的社论，写着写着便开始描述我亲眼所见的笼罩在城市上空的那块烟云，描述烟云下面人们如何生活，描写古建筑的前脸和众多凹凸不平的装饰上积存的黑垢，描写现代建筑平滑、单调、方形的前脸失去原来的色彩，描述白领阶层无法保持衣领干净半天。我这样写道：对，现在还有人生活在烟尘之外，古往今来一直有人生活在烟尘之外，有人甚至可以穿过烟云或在烟云中停留以后走出烟云，丝毫不受烟尘味道或煤炭粉尘的影响，保持原来的生活节奏，保持他们那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干净样子，但重要的不是生活在烟尘之外，而是生活在烟尘之中，因为只有生活在烟尘之中，呼吸像今天早晨这种雾蒙蒙的空气（冬季的浓雾已使一切街道变得灰蒙蒙的），才能认识问题的实质，才有可能去解决问题。我很快发现，我这是在和克劳迪娅争论哪，于是把文章撕掉，也没有拿给阿万德罗看。

我对阿万德罗博士还不太了解。有一回星期一早晨，我走进办公室，知道我见他什么模样吗？晒得又红又黑！对，他那苍白的面孔晒得红里透黑，前额和颧骨上还有几处被阳光灼伤的痕迹。

"你怎么了？"我问道（近来我们已开始用"你"称呼对方）。

“我滑雪去了。初雪，太棒了，细得跟面粉一样。星期天你也来滑雪吗?”

那天以后他就把我当作他对滑雪爱好的知音。我说知音，那是因为他跟我谈滑雪时使用的词汇，远远超过了对滑雪运动的一般爱好：他准确地描写各种动作的几何线条，准确描写各种滑雪器械的功能，准确描写那白皑皑的雪景。他这个规规矩矩、无可指责的职员，竟在自己的描述之中流露出对自己工作的异议，有时超然地微笑，有时奸险地挖苦：“嘿，那才叫《净化》呢！烟尘？拜拜，留给你们自己吧！”然后立即更正说：“不，我这是开玩笑……”总而言之，我明白了，他虽然为人忠实，但对这个协会和科尔达工程师的理想并不太相信。

有个星期六的下午我遇见阿万德罗博士，他一副滑雪的装束，头戴一顶大沿帽，急急忙忙朝一辆大轿车走去，那车边已挤满了要去滑雪的男男女女。他得意地向我告别说：

“你就留在城里?”

“对。出去有什么用呢？明天晚上你不还得回到这里来。”

他那大沿帽下双眉紧锁，回答我说：

“要城市干什么呢？不就是为了星期六和星期天出去吗?”

他加快脚步向大轿车走去，因为他对如何在行李架上摆放雪橇有新的建议要和大家商议。

成千上万的人和阿万德罗一样，整整一星期在这昏暗的城市里工作，为的就是周末能出去。对他们来说，城市已经无可救药，城里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制造能够数小时摆脱城市然后再回到城里来的手段。滑雪季节之后，阿万德罗去郊游，去钓鱼，去海边，去山区，去照相。他的经历就是他的各种交通工具的历史(由于和他经常交往，我已了解他以往的生活)，先是一辆带小马达的自行车，然后是一辆小摩托车，然后是一辆大摩托车，现在是一辆微型汽车，今后的理想是越来越舒适、越来越快速的各种轿车。

这一期《净化》即将付印，科尔达工程师还没有读过清样。那天我在EPAUCI协会等他，他一天没露面，傍晚的时候才打电话来，让我带着清样到WAFD工厂去找他，说他无法离开那里。他还要派他的司机开车来接我。

科尔达工程师是WAFD工厂的常务董事。我坐上他那豪华的轿车，躲在后座上，双手捧着清样搁在膝盖上。汽车穿过陌生的街区开到市郊，又沿着一段围墙开进宽敞的铁栅栏，大门口的守卫还举着手敬礼，最后在厂部办公楼门口的台阶处把我放下。

科尔达工程师坐在办公桌后面，桌上摊着几大张纸，厂里的一些领导站在办公桌四周。他们正在讨论厂里的账目或生产计划。

"对不起，请您稍等一下，"他对我说道，"我这就见您。"

我向他身后看去。他身后有个大玻璃窗户，从那里可以俯瞰整个工厂。在这傍晚的浓雾之中，能看见的东西很少，那最前面的像是一条提升运输线，把一斗斗（我想是）铁砂运上去。铁斗排列成队，跳跃式地微微荡漾着上升。这种运输方法好像会把铁砂抖出来，我似乎已经看见细细的矿尘在空中飞舞，有的已散落在科尔达工程师的玻璃窗上。

这时候科尔达工程师让开灯。室内突然明亮的灯光照在玻璃窗上，玻璃上的铁砂微尘在室外黑暗的背景中闪闪发光，宛如银河系中的群星。窗外近处的东西已看不清了，远处一根根巨大的烟囱的影子倒是显得更为清楚。在那一盏盏红灯的上方，一条黑色的带子在空中飘然上升，侵吞着夕阳的光辉。

科尔达和我研究《净化》杂志的清样，作为EPAUCI协会的主

席,他立即对各种问题表现得非常兴奋,非常关切,当着 WAFD 工厂领导人的面就杂志的每一篇文章对我发表评论。我虽然是协会的一名工作人员,但在协会办公室里我曾多次直截了当地提出反对意见,在思想上还认为自己是烟尘的支持者,是秘密打入对方参谋部里的烟尘的代理人呢。现在我才明白我那种态度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科尔达工程师才是烟尘的主人,是烟尘的制造者,是他不停地向空中释放烟尘。EPAUCI 协会是他的宠儿,他制造出这个协会的目的,是为了让制造烟尘的人抱有可以过着没有烟尘生活的希望,同时也为了显示他个人的力量。

科尔达对这期杂志很满意,他要用车送我回家。那天傍晚下大雾,沿路街灯很少,灯光很弱,可见度很差,汽车开得很慢。主席先生的情绪很高,向我描述未来城市的线条,花园式街区,花园式厂区,驱逐烟筒排放烟雾的火箭装置,等等。他指着黑洞洞的车窗外面,仿佛他想像中的东西已经在那里存在。我听他讲述,心里不知是对他感到害怕还是崇拜。我发现他既是一个出色的工业家,又是一个幻想家。在他身上这两种品质同时并存,无法区分。

突然我仿佛认出了自己的住处。

“停车,就在这里停车吧,我到了。”我对司机说道。

我跟他们告别,表示感谢,下了车。汽车走远后,我才发现自己认错了地方。这个街区我一点也不认识,四周什么也看不清。

我在饭馆里用饭，仍然是孤独一人，埋头看报纸。有一次我发现那里还有个顾客，吃饭时跟我完全一样。没有空位子时，我们有时也坐到一张桌上，但都举着报纸遮挡着自己。我们看的报纸互不相同。我看的是这里人人都读的那份最重要的报纸，因为我不愿标新立异，看与众不同的报纸以招人注目，更不愿（像我的同桌那样）突出自己的政治观点。我从不关心政治，与各政党保持着一定距离。可在那餐厅里，有时我放下报纸时，那同桌却问道："可以吗？"示意要拿我的报纸看，并把他的报纸递过来说："您若愿意看看这份……"

就这样我有时也浏览一下他的报纸。他的报纸可以说是我的报纸的反面，不仅观点相反，而且它所探讨的问题对我看的这份报纸来说根本就不存在，如雇员被解雇，机工被齿轮绞了手，家庭补贴一览表等。更明显的是，他那份报纸讲究编辑技巧，以各种生活经历吸引读者，例如少妇离婚等。虽然那些文章语言乏味，千篇一律，但标题诱人，富于教育意义。该报纸的印刷也不行，字号很小，只有一种黑体。但是，我却在想："嗯，我喜欢这份报纸。"

我把自己这个印象讲给我的同桌听，当然要尽量避免涉及某些消息或观点（他问我怎么看待有关亚洲的那条消息），尽量把对某些缺点的看法说得委婉一些，因为我觉得他是个不愿听别人批评的人，而我呢又不愿和他进行辩论。其实他是个胸有成竹的人，我对那报纸的赞扬显得肤浅和不切实。

"告诉您吧，"他说道，"这份报纸办得还不够好，还不像我想像的那样。"

他年纪很轻，棕色皮肤，身材虽不高，长得却很魁梧，拳曲的头发梳得光光的，稚嫩的脸庞白里透红，线条匀称，眉毛很重，脸上那自信的表情给人一种傲慢的印象。他的穿戴却有点过分考究。

“它还很一般，缺乏准确性，”他接着说道，“没有体现我们自己的特色，和其他报纸相差无几。我认为报纸应该由它自己的读者来办，应该对工业生产进行准确而科学的报道。”

“您是哪家工厂的技术员吗？”我问他。

“是技术工人。”

我们相互做了介绍。他叫奥马尔·巴萨鲁齐，听说我在EPAUCI协会工作时，对我的工作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问了我一些数字准备下次写报告用。我和蔼地告诉了他一些参考书（当然是大家都能看到的，毫不涉及我工作中的秘密），他掏出笔记本像做图书卡片那样做了记录。

“我负责统计工作，”他说，“在统计方面，我们这个组织很落后……”

我们穿上外衣准备离开。巴萨鲁齐穿件运动式外衣，式样很好看，头戴一顶防雨布帽。

“非常落后。”他接着说，“但是，我认为统计工作十分重要。”

“您有时间业余从事统计工作吗？”我问道。

“要知道，”他回答说（他总带着站在讲台上居高临下讲课的口气），“这里有个方法问题。我白天八小时在工厂上班，晚上每天都有会，有时星期日还要开会。这就要善于组织安排。我把工厂里的年轻人组织起来，分成几个调查小组……”

“跟您一起干的人多吗？”

“不多，可以说越来越少，我们一个一个地被他们辞退。”然后指着报纸说，“您哪天一定会在这上面看到我的相片和这样的标题：又一个同伴遭到报复被辞退。”

夜里街上气温很低，我掀起衣领护着头；奥马尔·巴萨鲁齐也

掀起了衣领。他边走边讲，嘴里吐出的热气很快就在他嘴唇周围结了一层薄霜。每当他讲到激动的地方，总要从口袋里掏出手并收住脚步，仿佛不说清楚那一点，他就无法前进。

我已经不再听他讲什么，一心在想，奥马尔·巴萨鲁齐这种人并不躲避我们身边这层灰蒙蒙的烟雾，他是要把烟雾变成某种道义上的价值，变成一种生活准则。

“烟尘……”我脱口而出地说道。

“您说烟尘？我知道科尔达想做个现代工业家……想净化大气层……好，让他去跟他的工人们讲吧！大气层如要净化的话，决不是由他来净化……这是社会制度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改变这个社会制度，我们也一定能够解决烟尘问题。解决烟尘问题的将是我们，而不是他们。”

他邀请我同他一起参加本市各工厂的工会代表大会。我坐在烟雾弥漫的会议大厅后面，奥马尔·巴萨鲁齐坐在主席台上。主席台上的成员都比他年长。会议厅里没有暖气，参加会议的人都穿着大衣，戴着帽子。

发言的人一个个要走到主席台旁站着发言。他们的发言千篇一律，既没有激情，也不讲究辞藻，连怎么开头，怎么展开，都似乎遵照某种约定的方式进行。听众席上有时因一句有争议的话也会出现轻微的骚动，但即使有争议也很隐蔽，首先要肯定发言人前面已经讲过的话。我觉得，许多发言是反对奥马尔·巴萨鲁齐的。他坐在主席台靠边一点，微闭着眼睛，一手撑着面颊，一手掏出烟斗，再掏出烟丝袋填满，一边抽烟一边倾听大家的发言。

会议大厅已是烟雾腾腾。有人建议把上面的小窗户打开一会，一阵凉风袭来，换新了空气，但也带进来了外面的浓雾，没多大工夫大厅的这头已看不见那头了。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望着前面人的背影，有人已掀起衣领；隐隐约约看见坐在主席台上的那排人都裹着大衣，旁边站着的发言人衣服穿得厚得像狗熊。不仅他

们被这层浓雾笼罩着，他们的发言、他们的意愿也被这浓雾笼罩着。

二月份克劳迪娅又来看我。我们一起上河滨公园里的一家高档餐馆吃饭,坐在窗户旁透过玻璃窗欣赏由河岸、绿荫和清新空气构成的自然风光。

我们谈话很不投机,在美的问题上各持己见。

“你们男人丧失了对美的感知。”克劳迪娅说。

“不,美要靠人不断去想像。”我说。

“美就是美,美是永恒的。”

“不,美产生于对立。”

“哈,古希腊人的观点!”

“是古希腊人的观点,那又怎么样呢?”

“美是一种文化!”

“往下说……”

“你说啊……”

我们可以这样无休止地一直争论下去:“这个公园,这条河流……”

(但我心里在想:“这个公园,这条河流,这些都是次要的,它们只能给予我们以宽慰。古典的美不可能和现代的美相互矛盾。”)

“这条白鳝……”

这家餐馆的大厅中央有个玻璃箱即水族箱,里面有些鳗鱼在游弋。

“你看,你看哪!”

几个顾客走到水族箱旁,看来是这家餐馆的贵客,是一家爱好美食的殷实家庭:母亲、父亲、长女和小儿子。身穿黑色礼服、白色

衬衣，体格高大而肥胖的餐馆经理陪着他们，手里拿着一只笊子，像孩子们捕捉蝴蝶用的网。全家人全神贯注地望着水族箱，过了一会那夫人抬起手指着一条鳗鱼。胖经理迅速放下笊子捞起那条鳗鱼。鳗鱼张大嘴喘息着拼命挣扎，胖经理举着笊子像举着长矛似的向厨房走去。那家人望着经理离去，然后回到自己桌边坐下，等候烹饪好的鳗鱼回来。

"残忍……"

"这是一种文化啊……"

"残忍，太残忍了……"

我们没叫出租车，步行走出餐厅散步。河边的草地和树干，被河面上升起的一层浓浓水汽覆盖着，这是来自大自然的潮气。克劳迪娅裹着裘皮大衣，掀起衣领，手上戴着裘皮筒子，头上戴着皮帽。我们手挽手在河边漫步，仿佛这卷画中的一对恋人。

"真美……"

"你的美……"

"那有什么用呢？我们……"

"美是永恒的呀。"我说。

"哈，你现在在说我刚才说过的话吧？"

"不，我说的是反话……"

"跟你没法辩论。"她生气地说。

她用力摆脱我，仿佛要自己独自在河边散步。一股浓雾擦着地面袭来，那穿着裘皮衣服的身影仿佛离开了地面在空中飘荡。

晚上我把克劳迪娅送回旅馆。旅馆大厅里挤满了身穿晚礼服的男士和袒胸露背的女士。这家旅馆为给慈善事业募捐，狂欢节正举办通宵舞会。

“太好了！你留下来陪我！我上去换身参加晚会的衣服。”

我这个人不爱通宵达旦跳舞，不愿接受她的邀请。

“我们没有请帖呀……再说我也没穿黑色衣服……”

“我不用请帖……你是我的男舞伴……”

她急忙上楼换衣服。我留在大厅里不知何处藏身。那里挤满了年轻姑娘，她们显然都是第一次穿晚礼服，进入舞厅之前激动得往身上洒香水或相互窃窃私语。我躲在屋角里，装做是被派来送货的售货员。

电梯门打开了，克劳迪娅走了出来。她换了一条卷边长裙，袒露的胸前戴了一条珍珠项链，眼前还戴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小面具。我不能再装售货员了，立即迎着她走过去。

我们一起步入舞厅，大家的目光都被她吸引住了。我找了一个长鼻子的假面具古第昂戴在脸上，开始和她跳舞。克劳迪娅翩翩起舞，跳到哪里，哪里的人便让开，站在一边看她跳舞。我不会跳舞，总想躲在人群中间跳，避免让人看见。克劳迪娅则说我一点也不开心，说我不会娱乐。

舞曲结束后，我们朝自己的座位走去，经过一群男士旁边时，啊，我和科尔达工程师碰了个迎面。他身穿燕尾服，头戴一顶橘黄色舞会帽子。我不得不停下来和他打招呼。

“博士，我真没想到，这竟是您！”他对我说，眼睛却盯着克劳迪

娅。我明白，他是说他没有料到，这位漂亮小姐的舞伴竟是我这个身穿平日上班衣服的人。

我只好给他们做了介绍；科尔达吻了克劳迪娅的手，并向她一一介绍了和他一起的年长绅士。克劳迪娅仍是那副傲慢且漫不经心的样子，根本不注意听那些人的名字（我却自言自语地在说："天哪，是他。"因为那些人都是当地工业界的名人）。然后科尔达又介绍我说：

"这位是我们杂志的编辑，就是那本由我担任主编的《净化》杂志呀，我们……"

我明白，他们都被克劳迪娅的美丽惊呆了，言不由己。因此，在他们这些人面前我显得反比他们胆大多了。我也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是说科尔达已经迫不及待地要邀请克劳迪娅跳舞。于是我回答他说：

"对，我们一会见……"

我点头向他们致意，带着克劳迪娅走下舞池。然而，她却说道：

"你说，你会跳这个舞吗？你听这是什么舞曲呀？"

我什么也听不见，只觉得我出现在克劳迪娅身边，这在某种意义上扫了他们的兴，也许他们自己还没有反应过来呢。我心里非常高兴，一边哼着"嘣，嚓，嚓"，一边假装跳那种我并不熟悉的舞步；我轻轻拉着克劳迪娅的手，让她可以不受我的约束，自由自在地跳舞。

这是狂欢节，我为什么不痛痛快快地玩一玩呢？小号响亮地哇哇吹着，似乎要吹破那明亮的号筒；一把把夹竹桃轻轻击打着男女舞伴的肩膀，花瓣落人他们的衣襟，落到地板上，被他们踢得七零八落；舞厅里从天花板到地板牵着许多条装饰灯闪闪发光，宛如一束发光玻璃纤维，也像一栋墙壁已经坍塌的建筑，剩下的电线仍在空中飘荡。

“你们可以容忍这丑恶的世界，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将来要摧毁它。”我对奥马尔·巴萨鲁齐说道。我这么说是要激他，否则我们的谈话就没有味道。

“且慢，”奥马尔说，一边放下正要送入口中的咖啡，“我们并没说这个世界越糟糕越好啊。我们要革新这个社会，既反对改良主义也反对极端主义。我们是要……”

他在按自己的思路讲，我在按他的思路听。自从在河滨公园与克劳迪娅分手以后，我正努力寻找世界的新形象，既能解释目前这种悲惨景象又能挽救自然美的一种新的形象，新的面目。

他拉开黑色皮公文包的拉链，取出一本画报说：“看见了吗？”画报里有许多照片：一个亚洲人戴着皮帽，穿着皮靴，愉快地走向河边捕鱼；另一张是那个亚洲民族学习的照片，一位教师手指着写在床单上的我们不认识的文字；第三张是过节，他们头上戴着龙头一样的头盔分立两旁，中间有一台拖拉机，拖拉机上面竖着一张肖像；第四张上有两个戴着皮帽的人，正在操作机床。

“您看见了吗？”他说，“这就是世界的另一种面目。”

我望了一眼巴萨鲁齐说道：

“你们没戴皮帽，不去捕鱼，也不爱好龙啊。”

“那有什么呢？”

“除了这个，”我指了一下机床，“这个你们已经有了，别的东西你们不可能有，也不可能像他们。”

“噢，会像他们那里一样的，关键是改变意识。我们和他们都要改变意识，变成新人进入新的世界，从现在起就要改变……”

巴萨鲁齐一边说，一边继续翻阅那本画报。有一页上有许多高炉和工人，他们额头前都悬着镜子，表情自豪。

“嘿，那时也会有问题，不能认为一天之内就把……”他接着说，“生产中的问题都解决了，有些问题会很严重，会持续一段时间……不过会有很大改进的……现在这样却不可能有所改进……”

接着他又谈到那些让他天天操心的问题。

我明白了，对他来说未来究竟如何，会不会有那么一天，这并没有他今天的信念重要，主要看今天的行为，要持之以恒。

“当然了，问题随时都有……那时也不可能是天堂……我们也不是圣人哪……”

圣人如果知道那不是天堂，难道就不会改变自己的行为吗？

“上星期我已经被解雇了。”奥马尔·巴萨鲁齐说。

“您现在干什么？”

“现在我在工会做事，也许到秋天有个工会干部会退休。”

他朝 WAFD 工厂走去，那天上午厂里的工人要罢工。

“您跟我一起去吗？”

“嘿，我还真不能让人在那里看见我，您明白这是为什么。”

“我也不能让人看见。那会不利于那些工人的。我们在工厂附近找个咖啡馆，躲在咖啡馆里。”

我和他一起去了，从玻璃窗里看见当班的工人困乏地或推着自行车走出大门，或拥向有轨电车站。有人显然已经得到通知，立即到咖啡馆来找奥马尔。他们几个人躲到一边商议。

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们的问题，只想把从工厂门口蜂拥离去的人群（他们心里除了自己的家庭和工休日以外，别的什么也不考虑）同奥马尔这伙人（即坚强的骨干）加以比较，研究他们的面孔有没有区别。我没有找到任何区别，他们都有一副饱经风霜的苍老面容或早熟的面容；他们的差别在内心里。

然后我又研究这伙人的表情和语言，看能否区别出这样两种人：以“有没有那么一天……”来决定自己行动的人和不管有没有那么一天都不懈努力的人，例如奥马尔。我发现也无法把这两种人区分开，也许因为他们都属于第二种人，也许因为他们之中缺乏恒心，夸夸其谈，貌似第一种人的为数太少了。

然后我就不知道该研究他们什么了，只好观察天空。时值初春，市郊的上空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我仔细观察，发现天边上有一条灰暗的边缘，如同一张褪了色的旧照片的白边，也像透过分色镜看到的那种标记。唉，美丽的春季也未能将天空洗刷干净啊！

奥马尔·巴萨鲁齐戴着一副太阳眼镜，镜框粗大。他不停地对那些人讲着，讲得那么仔细，那么深入，那么自信，说话的声音略带鼻音。

我在《净化》杂志上转载了一条从外刊上摘录下来的有关核辐射的消息。消息很短，科尔达读清样时没有注意到，杂志出版之后他才看见，派人把我叫到他那边去。

“天哪，要是什么都得我盯着，我就是长一百只眼睛也不够用啊！”他气愤地说，“您怎么会想起来发表那条消息呢？那不是我们协会的任务啊！我们的事还少吗？再说，这么棘手的问题，也该跟我打个招呼啊！好了，现在人家该说我们蛊惑人心了！”

我说了几句自我辩解的话：

“对不起，既然那也是环境污染问题，我就……”

我已经告辞出来了，科尔达又把我叫进去说道：

“博士，您是否相信放射性的危险呢？相信它有那么严重……”

我记得某科学讨论会上的一些数字，报告给他听。科尔达很不高兴地点头听着。

“啊，亲爱的博士，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多么可怕啊！”他突然说道，又变成了我所了解的那个科尔达。“亲爱的，我们不能回头，只能冒险干下去，我们下的赌注很大啊，很大！”

他低下头，默默站了几分钟，然后接着说道：

“我们这里，我不想估计过高，我们尽了努力，做出了贡献，控制着这里的局面。”

“这是毫无疑问的，工程师先生，对此我可以说深信不疑。”我说，然后大家尴尬而虚伪地相互看了一眼。烟云现在似乎变小了许多，相对原子尘埃来说，它不过是一小块乌云，一朵卷云罢了。

我又说了一些空洞的赞美话，告别科尔达出来。这次我还是没有搞清楚，他究竟是反对还是赞成烟尘。

自那以后我尽力避免在标题中涉及原子爆炸或辐射问题，但在每期科技消息栏里我总要加进一些这方面的消息；在一些统计数字中，如有关城市空气中煤炭和石油含量的统计数字中，在一些谈论它们的危害性的文章中，我也加进一些原子方面的数据或论据。科尔达没再提出异议，别人也没有提过，对此我并不感到高兴，反而让我更加相信没人读《净化》杂志。

我有个核辐射问题的卷宗，看报时注意收集有关消息和文章，一看到这方面的东西就把它剪下来放进卷宗里。有一家剪报社，我们是它“大气污染”栏目的订户，它越来越多地给我们寄送一些有关原子弹试验方面的剪报，有关烟尘方面的剪报却寄得越来越少。

所以我每天都能看到许多关于稀奇古怪疾病的报道，诸如渔民在海洋中遇原子辐射而死亡，豚鼠经过铀元素照射生下的小豚鼠有两个脑袋，等等。现在已是六月下旬，夏天还迟迟未到：阴雨连绵，天空总有一层浓雾，中午时城市上空光线灰暗，行人仿佛都是一些没有躯体的阴影。

季节的交替一反常规，欧洲上空不停地出现气旋，夏初已经有过几次雷雨，然后又是数周阴雨，时冷时热，变化无常。报纸上说，天气不正常与原子弹试验无关，个别科学家则认为有关（不过很难确定，是否应该相信他们）。不言而喻，老百姓是喜欢听信那些无稽之谈的。

玛格丽蒂小姐也愚蠢地对我谈论核威胁，并告诫我说早晨上班要带雨伞。听她说这些话，我很生气。但早晨我打开窗户，看见院子里阴沉沉的天气，栏杆也模糊不清，宛如一条条画痕和一块块污垢，我不由自主地缩回头，仿佛要躲开那时天空中降下一股看不见的尘埃。

这种心理上的压力仿佛变成了一种禁忌，人们街谈巷议谈到天气时尽力避免它，不得已时也只说天晴了，下雨了，尽量不提它，就像回避某种内疚似的。阿万德罗博士平日的生活是为了准备星期日的郊游，对天气他采取了表面上看来无所谓的态度。我认为他这种态度很虚伪，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我准备了一期《净化》杂志，没有一篇文章不谈辐射问题。这次我也没有遇到任何麻烦。要说没人读那期杂志，那也不可信。读是有人读的，不过人们现在已经对这个问题习以为常了，即使你说人类面临灭绝之灾，谁也不会再说什么了。

现在一些非专业杂志也刊登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但人们好像只注意封面上的彩色美女照片。有一本周刊最近一期封面上就刊登了克劳迪娅的照片，她身穿泳衣，脚踏划板，在水上做划水动作。我把它剪下来，用四个图钉钉在我租赁的房间墙壁上。

每天早晨和下午我都要穿过我办公室所在的这个宁静的街区，时时会联想到去年秋天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的情景。那时候我把什么东西都看成是某种征兆，周围的一切都像我当时的心情一样暗淡。现在我的目光仍然注意寻找征兆，除了征兆我什么也看不见。那么，我寻找的是什么征兆呢？是那种能够没完没了相互证实的征兆。

有时我能在那个街区遇见一辆骡子拉的大车：时而见它在非机动车道上行走，上面堆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时而见它停在人家门口，驾辕的骡子低着头，大包小包东西上面还坐着一个小女孩。

后来我发现那里这种车不止一辆，有好几辆。我也说不清是什么时候发觉的。一个人每天看见许多东西，并不注意它们。即使他看见的那些东西对他有很大影响，他却不去注意它们。一旦他把那些东西联系起来，他便觉得那一切对他来说都有某种意义。我看见那些车，开始没注意，后来我发现它们对我起到一种镇静作用。因为在汽车遍地跑的城市里突然见到一辆来自农村的大车，这就足以使你想到，这个世界并非到处都一样啊。

因此我开始注意它，注意它上面的包裹堆积如山，注意它上面坐着一个梳小辫的女孩在看小人画，注意从大门里走出一个胖胖的男人拿着两袋东西放到车上，然后松开刹车吆喝骡子道："驾……"。大车走起来，那女孩仍然坐在上面看画报。不一会它停在另一家门口，那男人卸下几包东西拿着进去。

再靠前面一点，在对面的人行道上，另有一辆大车，车辕上坐着一位老人，一个年轻妇女头顶包裹进进出出。

后来我发现，看见大车那天我就心情舒畅，信心倍增，而且都是在星期一。我又听说，星期一那天洗衣店的人赶车进城，送洗干净的衣物，收要洗的脏衣物。

我知道这件事后，便有意识地注意它。哪天早晨只要我看见一辆大车就会说："啊，星期一了！"接着就能看见另一辆大车迎面过来，后面还跟着一只小狗汪汪叫；那里还有一辆渐渐远去，我只能从后面看见车上堆着的衣物包，都用黄白相间的条纹布包裹着。

一天我乘坐有轨电车回家，途经拥挤而喧哗的街道，在一个十字路口不得不停下来，因为前面有辆洗衣房的大车横在轨道上。我往旁边小巷里看，看见一头驴驮着大包小包，一个男人头戴草帽正往下卸东西。

那天下班回家，我没走平时走的路，在城里兜了一个大圈，看见许多大车。我觉得对这个城市来说，它们能给人们带来欢乐，人们高高兴兴地把被烟尘污染的衣物交给它们去洗，把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换在身上，哪怕干净衣服用不了多久又会变脏。

又到了星期一，我决定跟着大车，看它们交活、收活以后回什么地方去。我漫无目的地走着，时而跟着这辆车，时而跟着那辆车。后来我才发现，最后它们都朝着一个方向走，都走上了那么几条路。当大车在交叉路口并成一队时，赶车的人相互致意，有说有笑。我继续跟着它们，直到我走不动为止；它们沿着一条很长很长的道路前进，最后消失在尽头。不过，在离开那里以前，我已经打听到这里郊区有个洗衣村，叫巴尔卡·贝尔图拉。

有一天下午我决定到那个村庄去看看。跨过一条河，那里已是半城市半农村的样子了，马路两旁虽然还有一排房子，房子后面已是农田，但还看不到任何洗衣店。沿着河边有许多小饭馆，门前都搭有凉棚。我继续往前走，注意搜索通向每个院落的小道，观察它们的院子。我就这样搜寻着渐渐走出村庄。田野里沟渠纵横，两边都种上了杨树。我站在道边树荫下面，穿过一片杨树，看见远

处草坪上有白色的东西在飘荡：那就是正在晾晒的衣物。

我走上一条小道，发现那里有许多宽敞的草地，上面拉着一排排一人高的铅丝，城里送来的所有衣物洗涤后，湿渌渌、皱巴巴的就挂到那些铅丝上晾晒。有些草地的铅丝上晾着白色的衣物，有些草地上没有晾晒衣物，铅丝光秃秃的像葡萄园里的葡萄架。

我在晾晒着洁白衣物的铅丝之间漫步，突然听见背后传来一阵笑声。我转身一看，发现前面水闸旁有家洗衣房，几个女工身穿各色衣服，挽着衣袖，红红的脸膛，正在那里有说有笑地干活呢。年轻的姑娘乳房丰满，来回搬运衣物，走起路来胸前的衬衣上下起伏；年长的妇女体态健壮，头上戴着头巾，挥动那结实的臂膀打肥皂拧衣物。间或也有男人，头戴草帽，从大车上往下卸衣物，堆成一堆一堆的，或给女工送肥皂，帮着捶衣物。

这一切我都看清了，用不着再询问什么，便起身往回走。马路旁边长着青草，我尽量沿着路边走，一方面可使我的皮鞋少沾点尘土，另一方面也可离路上开的汽车排放的尾气远一点。我边走边用目光在这一片片草地和树木中搜索洗衣店，发现一些低矮房屋门前写有“蒸汽洗衣店”，“巴尔卡·贝尔图拉洗衣合作社”，看见一些妇女提着篮子像去收获葡萄一样去草坪上收晒干的衣物。阳光哺育着这片绿油油的田野，照射着那一片片白色的衣物，水渠里流水潺潺，虽然这一切都极其平常，但对我这个只想看到某种景色的人来说，已经足够了。

阿根廷蚂蚁

我们搬来住时，对这里的蚂蚁一无所知，满以为往后会过得挺惬意。天宇碧净，草木翠绿，景色宜人，对心事重重的我和我的妻子来说，也许宜人得有点过分。我们怎么能想到这个地方蚂蚁成灾呢？其实，仔细想想，奥古斯托叔叔有一次似乎对我们提起过："你们在那里，一定会发现蚂蚁的……那里的蚂蚁，嘿，跟这里的可不一样……"不过，他或许是在谈到别的事情时顺口说的，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也有可能是我们正在闲聊时突然爬来了蚂蚁，我脱口说了声"蚂蚁"，引出了他的话。我们看到的大概是只离群的蚂蚁，又肥又大（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老家的蚂蚁确实又肥又大）。不管怎么说，奥古斯托叔叔讲的那几句话没有影响他对这个地方的赞誉。他对我们说，由于某些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的原因，在这里谋生比较容易；还有可能发家致富，虽然并非十拿九稳。这不单是他——奥古斯托叔叔——的看法，在此地安家的许多人也是这么认为的。

来到这里的第一天傍晚，我们就已隐约猜出，为什么叔叔会在这里生活得这么愉快。我们看见，人们用毕晚餐，便披着明亮的霞光，沿着通往乡村的街道，心旷神怡地漫步。我们还发现，另外一些人悠闲自得地坐在桥头纵目遐想。我们找到了叔叔常去光顾的那家酒馆后，心里就更明白了。酒馆后面与菜园毗邻。几个和他一样身材矮小、年事已高的男人在店里海阔天空，信口开河，自称是他的挚友。我相信这些人跟他相仿，也没有固定职业，靠打零工度日。其中的一个自称是钟表匠：准是吹牛。我们听见他们用一个绰号称呼奥古斯托叔叔，大家来回说着这个绰号，还加上一些评

语。柜台后面站着一位芳龄早过、体态丰满、身穿绣花白衬衫的女人。我们见她冷笑了一下。我和妻子觉得,这一切是奥古斯托叔叔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有一个外号,听凭别人跟自己打趣;晚上到桥头稍坐片刻后,到酒馆里去看那位身穿白绣花衬衫的老板娘走出厨房、走进菜园;第二天到任何一片点心店里去卸几个钟头货。他离不开这一切。我们终于明白了,他在我们老家逗留的那些日子里,为什么一直惦念着这个城镇。

如果我是个没有任何牵挂的小伙子,或者我们一家三口的生活业已安排停当,那么这一切也会使我心满意足的。然而,我们当时情况欠佳:孩子久病初愈,我的工作尚无着落,上面那些使奥古斯托叔叔满意的事情我根本无暇顾及。相反,面对这一切,我们更觉伤悲:在这个似乎人人称心如意的城镇里,我们显得格外不幸。几个不大不小的问题使我们伤透脑筋,不顺心的事情接踵而至;不过我们对这里的蚁害仍旧一无所知。毛罗太太指着她租给我们的住房,一遍又一遍地嘱咐,简直令人难以忍受。我至今还记得,为了煤气表的事,她向我们唠叨了半天。我们只好洗耳恭听。"是的,毛罗太太……我们一定当心,毛罗太太……不会弄坏的,毛罗太太……"我们只顾听她絮叨,以至没有特别在意——但我至今记忆犹新——她的眼睛忽然紧紧盯着墙上,好似在看布告。稍后,她伸出手,用指尖在墙上掐了一下,随即使劲甩手,仿佛指头上沾着污水、沙子或灰尘。我们深信是蚂蚁爬上了她的手指,虽然她自己没说。屋里有几只蚂蚁,就像每所房子都有墙壁和屋顶一样,是很自然的;可我和妻子总觉得她想瞒着我们,唠叨也好,嘱咐也好,都是为了突出别的方面,掩盖这件事实。

毛罗太太走后,我把床垫搬进屋里。妻子一个人搬不动床头柜,把我喊过去帮忙。她走进厨房,跪在地上,开始擦地板。我对她说:"这么晚了,你要干什么?明天再说吧。现在我们大致收拾一下卧室,准备睡觉。"孩子困得直哭,先得把摇篮拾掇好,让他睡

下。我们把长摇篮带来了:在我们老家,孩子一般睡在这种摇篮里。屋里有个放摇篮的好地方:一个周围不潮、离地不高、孩子摔下来也不碍事的小土台。我们把塞满摇篮的内衣统统拿出来,把摇篮放在小土台上。孩子一放进去就睡着了。我和妻子开始打量这间屋子:四堵墙壁,一个天花板,中间有道隔墙,屋子被分成两半。“对,对,刷成白色,一定刷成白色。”我瞟了一眼天花板,回答妻子道。我拐起胳膊肘,推搡着她来到门外。她想去看看设在左面那个棚子里的厕所,但我却打算和她一起到庭院里去散散步。新居的四周是庭院:两片荒芜的土地,原先大概是花坛或苗圃;中间横着一条阡陌,上面搭着铁架,以前大约攀缘着野葛、南瓜秧或葡萄藤,现在是光秃秃的。毛罗太太原先答应把这个庭院交给我们使用,种点蔬菜瓜果之类。她不想另收租金,因为这两块地已经荒弃多年了。但她今天对此事只字不提,我们也避而不谈,因为面前有许多更加紧迫的问题亟待解决。就这样,第一天晚上我们就到庭院里蹓了一趟,为的是熟悉环境,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为了摸清情况。我生平第一次觉得,终于有可能过上安顿日子了。今后,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到庭院里来散散步,我们的心情将越来越愉快。这些是在我脑子里盘旋的念头,我没跟妻子讲。我渴望知道,她是否也有同样的想法。我认为,我让她到庭院里来走走,已经获得预期效果:她此刻讲起话来温柔动听,稳重得当;我去挽着她的胳臂,也没有被她推开,尽管这种亲昵举动在目前并不合适,因为我们的生活尚未安排停当。

我们手挽手,一直走到庭院尽头,看见了篱墙那边的雷吉瑙多先生。他手里拿着喷雾器,正在房前房后忙个不停。我和他相识是几个月以前的事,当时我到这里来和毛罗太太洽谈租房事宜。我和妻子贴近篱墙向他问好,我把妻子向他做了介绍。“晚上好,雷吉瑙多先生,”我说,“您还记得我吗?”“噢,当然记得,”他说,“晚上好!这么说来,您成了我们的邻居了?”这位先生个子矮小,穿着

睡衣，戴着草帽，架着一副大眼镜。

“哦，我们是邻居，嗯，邻居之间嘛……”我妻子嫣然一笑，说了几句客套话。我很久没听她用这种细声柔气的语调讲话了；但我并不觉得不愉快，相反，因为自己用不着听她发牢骚而颇感高兴。

“克劳迪娅！”我们的邻居喊道，“过来，这是劳莱利别墅中的新住户！”我感到很蹊跷，因为以前从未听人用这个名字称呼我们的新居（后来才知道，这座房子的最早的主人是劳莱利）。雷吉瑙多太太应声从屋里出来，她又高又胖，一面往外走，一面撩起围裙擦手。他们两人对我们很热情，很客气。

“雷吉瑙多先生，您提着喷雾器干什么？”我们问道。

“嘿，蚂蚁……这些蚂蚁……”他边说边笑，仿佛不把蚂蚁当回事。

“唔，蚂蚁？”我妻子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她的语调又像往常那样客气，然而冷漠了。在陌生人面前，她总是装出一副专心听他们讲话的样子，并且时时用这种若即若离的口吻插上一两句话。不过她从来没用这种声调对我讲话，即使我们初次见面时，她也没用这种口气。

我们彬彬有礼地和邻居告别。周围虽然有热情友好的邻居，但我们没时间和他们侃侃交谈，我们无暇充分享受这种乐趣。

回到屋里后，我们打算马上睡觉。“你听见了吗？”妻子问。我聚精会神地听了一阵，是雷吉瑙多的喷雾器在嘶嘶地响。妻子走到洗碗池边，想接杯水。“给我也接一杯。”我边说边脱衬衫。“哎哟！”她嚷道，“快来！”她在自来水龙头上发现了蚂蚁。一队蚂蚁正顺着墙壁往下爬。

我们打开灯。两间屋子共用一盏灯。一列密匝匝的蚂蚁队伍在墙上爬动。它们来自门框方向，但蚁巢在何处，却无从得知。蚂蚁现在已经爬到我们手上了。我们张开手掌，凑到眼前，仔细观察它们的模样；同时不停地转动手腕，以免它们顺着胳膊往上爬。这

种蚂蚁体型很小，几乎无法捉住。它们一刻不停地爬动着，好像跟我们一样浑身奇痒，不动不行。我突然想起了它们的名称：阿根廷蚂蚁；是的，它们被人叫做阿根廷蚂蚁。以前我曾听说过这个城镇里有阿根廷蚂蚁，这是肯定的；但只有现在才明白，这个名称和一种什么感觉联系在一起：一种难以忍受的、用任何办法也不能消除的痒感。使劲挥动胳臂也好，拼命搓手也好，全都无济于事，因为总会有几只蚂蚁顺着上胳膊或袖管，悄悄爬到我们身上来的。这种蚂蚁被掐死后，像一粒粒黑色的小细沙似的往下掉，但它们那股刺鼻的蚁酸味却久久地留在我们的指头上。

“这是阿根廷蚂蚁，你知道吗……”我告诉妻子，“是从美洲来的……”我不由自主地操起老师教学生的腔调，但没说几句便已后悔莫及，因为她最不能容忍我用这种口气对她讲话。她大概很清楚，我只有心里没把握时才用这种语调说话，因此每逢这种时候，她总要抢白我几句。

可是这回她仿佛没听见，全神贯注于用手掌拍打墙上的那队蚂蚁，试图拍死或驱散它们。结果是，一些蚂蚁爬到她手上，其他蚂蚁四散奔跑，满墙皆是。她匆忙拧开水龙头，一面冲手一面往墙上泼水。墙面虽已泼湿，蚂蚁却继续在上面爬动。她手上的蚂蚁也没冲掉。

“你看，屋里有这么多蚂蚁！你看，”她反复说道。“屋里一直有蚂蚁，只不过我们现在刚发现罢了！”仿佛蚂蚁早被发现的话，事情就会大不相同似的。

我劝道：“唉，算了，算了，不就是几只蚂蚁嘛！现在我们睡吧，明天再想法子！”我又加了一句：“算了，算了，不就是几只阿根廷蚂蚁嘛！”我这回用了当地人称呼它们的准确名字，旨在说明这是一件由来已久的事实，不必大惊小怪。

我妻子刚才在庭院里溜达时脸上出现的轻松表情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她像通常那样，脸拉得老长，对一切都抱着戒心。在

新居中过的第一夜不像我盼望的那么美好，刚刚开始的新生活并未给我们带来愉快和欣慰；相反，我们陷入了新的、永远无法摆脱的烦恼。“不就是几只蚂蚁嘛！”我还在想着。我记得当时的确是这么想的，其实对我来说，或许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疲乏战胜了愤激，我们酣然入睡。半夜，孩子从梦中哭醒。我和妻子在床上没有动弹，以为他哭几声就会重新睡着的。然而并非如此，我们的指望落了空。我和妻子彼此问对方：“他怎么啦？怎么啦？”奇怪，他病愈后，夜里从来没哭过。

“蚂蚁爬到他身上了！”妻子嚷了一句，匆匆起了床，走到摇篮跟前。我也下床去帮忙。我们把摇篮里的东西统统拿了出来，把他身上的衣服全部脱光，然后把他抱到那盏两个房间共用的小电灯下面，勉强睁开睡意尚浓的眼睛，在他那小小的躯体上寻找蚂蚁。一丝凉风透过门缝，吹进屋里。妻子指出：“他会着凉的。”我们在他身上找蚂蚁，发现他全身皮肤通红，还有一道道搔痕，不免心疼起来。一列蚂蚁正在小土台上爬动。我们认真翻看了摇篮里的每一块垫布，直到所有蚂蚁都被捉尽为止。我们面面相觑：“现在让他睡哪里好？”床上躺两人已嫌太挤，他如果睡到床上来，我们一翻身会把他压死的。我仔细检查了一下小衣柜，那里还没有蚂蚁。我把衣柜推离墙跟，打开一个抽屉，整理了一番，给孩子当摇篮。他刚躺到里面就呼呼入睡了。我们也该重新上床休息了，困倦会使我们马上进入梦乡的。但妻子还要去看看我们带来的食品。

“快来！到这边来！我的上帝！全是蚂蚁！一片黑！你来帮帮忙！”有什么用呢？我拥着她的肩膀说：“睡觉去吧，明天再想法子，现在看不清楚。明天好好整理一下，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保险的地方。上床吧！”

“可是吃的东西怎么办？全糟蹋掉了！”

“让它们去吧！你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明天我们一定把蚂蚁

窝捣毁，一定……”

我们终于上了床，但一直不能安心睡觉，老在想着这些到处乱爬的小动物。吃的东西也好，用的东西也好，里面一定全是蚂蚁；没准它们现在正沿着地板和小衣柜的腿，爬到了孩子身上……

雄鸡打鸣后，我们才合眼。没过多久，一阵奇痒使我们从梦中醒来。我们辗转反侧，不住搔痒，因为觉得床上有蚂蚁；也许是从地板上爬上来的，也许是刚才翻看摇篮里的垫布时爬到我们身上来的。因此，拂晓前的几个钟头我们也没得到休息。我们早早起了床，盘算着怎么办。这些令人头疼的、小得几乎肉眼不能察觉的敌人侵占了我们的新居，我们必须立即投入战斗。真叫人烦恼。

妻子觉得应该先去看看孩子是否被蚂蚁咬坏了(谢天谢地，看来他没挨咬)。她给他穿上衣服，喂他吃了点东西。她一面做着这些事，一面不停地挪动着双脚：新居中到处是蚂蚁，不这样不行。洗碗池里、盘子的边缘、孩子的围嘴和水果上都叮着蚂蚁。我知道，她看见这些情景后，竭力控制自己，不然的话，准会惊叫起来。但她打开奶锅时，再也忍不住了：“一层黑！”牛奶上浮着一层蚂蚁，有的已溺毙，有的在游动。“不过，全浮在表面上，”我指出，“可以用勺子撇掉。”蚂蚁倒是撇净了，但我们觉得牛奶变了味，因此一口没喝。

我凝视着在墙上爬动的一列列蚂蚁，想搞清楚它们来自何处。妻子忍住满腹怨愤，开始梳头穿衣。“先把蚂蚁全弄干净，然后再摆家具！”她说。

“别着急，瞧着吧，总会有办法的。我到雷吉瑙多先生那里去一趟，他有药粉，我问他要一点，撒在蚂蚁洞口。我已经发现洞口了，屋里的蚂蚁很快就会绝迹。不过我得过一会去，因为现在去可能会打扰雷吉瑙多夫妇的。”

妻子平静了点，但我仍旧忐忑不安：我扬言已经发现洞口，其实只是为了安慰她。我越是仔细观察，发现的蚂蚁就越多；它们从

各个方向而来，往各个方向而去。我们的新居看起来像骰子一样光洁严实，但墙壁仿佛是疏松的，上面似乎有无数道大大小小的裂隙。

我信步走到门口，望着洒满阳光的树木，心情才觉得轻松了点。脚下是萋萋芳草，虽然沾满泥土，不甚干净，但也令人赏心悦目。我顿时产生了干活的愿望：拭净沾污草叶的泥土，耕耘庭院中的荒地，撒上种子，栽植秧苗……“你老躺在摇篮里，身上会长霉的，”我对儿子说，“出来吧。”我把他从摇篮里抱出，走进“花园”。我不但自己把庭院称作“花园”，而且希望妻子也习惯这个叫法，便对她说：“我把孩子抱到花园里去玩一会儿。”接着补充道：“抱到我们的花园里。”我认为“我们的花园”这种说法更亲切，能使我们产生一种主人翁的感觉。

孩子晒着太阳，高兴得手舞足蹈。我对他说：“这是长角豆，这是柿子树。”我把他高高擎起，一直碰到树枝。“现在爸爸教你怎么爬树。”

他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怎么啦？你害怕？”我看见了蚂蚁，橡皮状的树干上爬满了蚂蚁。我马上把他放了下来。“哟，小蚂蚁真多……”我心神不定地对他说。我注视着顺着树干往下爬的一队队蚂蚁，发现这些肉眼几乎难以分辨的小动物爬到地上后，便在草丛中散开，朝四面八方而去。于是我想道：屋里的蚂蚁怎么能驱除干净呢？昨天我还觉得这个庭院很小，现在我用新的眼光看着它，又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些无以计数的蚂蚁，两者一对比，我便觉得这个庭院其实是硕大无比的。地面上覆盖着密密麻麻的一层蚂蚁，肯定是从地下的数千个蚁巢中钻出来的；肥沃的黏土和低矮的植物给它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粮。脚下倒是一块净土，乍一看，连蚂蚁的影子也没有，我不由得舒了口气；可是仔细一看，却发现一只小蚂蚁正朝着我的方向徐徐前进，接着又发现，它只是一支蚂蚁大军中的一员。这队蚂蚁扛着大过本身几倍的面包屑和其他食品，和

别的蚁军频频相遇。有的地方蚁群聚集,似乎粘成了一团,有如伤口外面的结痂。我认为那里准有一块树脂或一个死昆虫。

我抱着孩子,回到妻子身边;我是跑着进屋的,因为觉得腿肚子上有蚂蚁在爬动。妻子说:“唉,孩子被你弄哭了。怎么啦?”

“没什么,没什么,”我连忙解释,“他看见树上有几只蚂蚁,夜里的印象还没消除,大概身上又痒起来了。”

“唉,真烦人。”妻子叹了口气。她盯着在墙上爬动的一队蚂蚁,想用手指头把它们一个个掐死。我似乎又看见了门外那个硕大无比的庭院,我们仿佛站在庭院中部,陷入了几百万蚁军的重重包围。我不由自主地对她嚷道:“你想干什么?你疯了?这么干不会有用的!”

她气得直发抖:“可是奥古斯托叔叔……奥古斯托叔叔预先不打一点招呼!我们两个傻瓜,听了他的话!听信他这个骗子的话!”其实奥古斯托叔叔能对我们说些什么呢?他当时即使告诉我们这里蚂蚁很多,我们也决不会把“蚂蚁”这个词的传统含义跟眼下这种狼狈处境联系在一起的。有一次他好像说过这里蚂蚁成灾,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然而就算确有此事吧,我们也只会联想到,这是一些具体的、可数的、有身躯、有重量的敌人。的确是这样,现在我回想起故乡的蚂蚁,马上便觉得它们是值得尊敬的小动物,像猫和兔子一样,可以任人抚弄,任人摆布。然而,我们在这里面临的敌人却像虚无缥缈的云雾和无孔不入的细沙,根本无法对付。

我们的邻居雷吉瑙多先生在厨房里,手拿漏斗,把一个瓶子里的液体倒进另一个瓶子。我远远喊了他一声,气喘吁吁地跑到他家厨房的落地长窗前。“噢,我们的邻居!”雷吉瑙多高声说道,“请进,先生,请进!真对不起,我正在配药水。克劳迪娅,端把椅子来,给我们的邻居坐!”

我开门见山地说:“我到您家来……请原谅……是想麻烦您一

件事……是这么回事，我看见您有那种药粉，我们整夜……蚂蚁……”

“哈！哈！哈！蚂蚁！”雷吉瑙多太太走进厨房，大笑道。她丈夫似乎迟疑了片刻——这是我的感觉——，然后用更大的嗓门，发出几声像他太太的回声似的大笑：“哈！哈！哈！你们那里也有蚂蚁！哈！哈！哈！”

我撇了撇嘴，也装出个笑容。我知道自己的处境很可笑，但别无他法：家里有蚂蚁是实际情况，正因为如此我才到这里来向他求助的。

“亲爱的邻居，谁家没有蚂蚁呢！”雷吉瑙多先生举起双臂大声指出。

“谁家没有呢，邻居先生，谁家没有呢！”他妻子两手在胸前交叉，紧接着说。她和丈夫一样，脸上一直笑容可掬。

“可是，我觉得你们有一种灭蚁药，对不对？”我问道。我的声音发颤，他们大概会认为这是忍不住想笑的缘故，其实这是出于绝望，彻底的绝望。

“一种药！哈！哈！哈！”雷吉瑙多夫妇笑得前仰后合。“我们只有一种药？不，我们有二十种药，一百种药！一种比一种好！哈！哈！哈！”

他们领我进了另一间屋子，屋里有几十个贴着五颜六色商标的纸盒和铁盒，放在家具上。

“您要扑氯氟思芳吗？要迷尔硼奈克吗？还是要锑奥勃氯弗利特？阿尔索潘有粉剂和乳剂两种，要哪种？”他们相继拿起唧筒喷雾器、毛刷和喷粉器，淡黄色的药粉和药水立刻像烟雾一样弥漫在空中，一股药房和农药店里特有的味道随即扑鼻而来。他们的笑声一直不断。

“真正有效的灭蚁药有吗？”我问。

他们的笑声戛然停止。“没有。这些药都没有起到作用。”他

们回答说。

雷吉瑙多先生拍拍我的肩膀，他的太太打开了百叶窗，屋里顿时充满了阳光。嗣后，他们带我到这所房子的内部走了一圈。

他穿着背心和红条子睡裤，光秃秃的脑袋上戴了顶草帽，裤腰带在略微凸起的肚子上方系了个结。他太太身穿一件褪色连衣裙，胸褡的肩带不时露出，一头乱蓬蓬的淡黄鬈发下面露出一张通红的大脸庞。他们心境豁达，性格开朗，拉开了嗓门说个不停。这所房子的每个角落都有一个故事，他们争先恐后地给我讲述，这位刚说了一半，那位便插了进来。他们又是比划，又是感叹，仿佛每件事都可演成一出闹剧。例如，他们说，某个地点曾经喷过千分之二的阿尔法纳克塞溶液，有两天时间蚂蚁绝了迹，可是第三天又出现了，于是只得把溶液浓度提高到千分之十。蚂蚁终于从那里消失了，但它们绕了个圈子，在屋梁上开辟了一条新路线。他们在另一处撒了不少克烈索旦粉，使这个地方和别处完全隔绝；可是大风一吹，药粉被刮得到处皆是，每天撒三公斤也不顶用。他们在楼梯上试验了一下佩特洛切德的药效，蚂蚁一沾上仿佛就送了命，其实只是陷入了昏睡状态。他们在一个屋角撒了杀蚁粉，蚂蚁照样若无其事地爬来爬去，翌日清晨倒在那里发现了一只被毒死的老鼠。他在一个地方洒了点肯定能赶走蚂蚁的契莫福思弗药水，但太太却在同一处撒上了伊塔尔马克药粉；结果药粉起了解毒作用，把药水的驱蚁效能中和得一干二净。

我们的这两位邻居把房子和花园当作人蚁对垒的战场，兴致勃勃地划出好几条不许蚁军越过的分界线。他们寻索蚂蚁的新进军路线，试用各种新研制出的药水和药粉，遏制蚁军的前进。每种药都能使他们回忆起一个插曲或一件趣事。因此，只要提起一个药名，例如阿尔杀砒特、灭尔克西吐，等等，他们就相互挤挤眼睛，说句双关话，乐呵呵地笑一阵。他们曾经做过许多灭蚁尝试，但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因此现在已放弃了这种企图。他们只是满足

于设法截断蚂蚁的某几条通路，迫使它们绕道，吓唬吓唬它们，防止它们大举入侵。他们每天用不同的药物划出新的迷宫一般的分界线，看样子是在做捉迷藏游戏，而蚂蚁便是必不可缺的游戏对手。

“真拿这些小动物没办法，毫无办法，”他们说，“除非你向上尉学习……”

“唉，我们花了许多钱，”他们接着说，“买了各种灭蚁剂……上尉的方法比较经济……可想而知……”

“当然，我们不能夸口说已经战胜了阿根廷蚂蚁，”他们指出，“但上尉也一样。您以为他的方法有效吗？我怀疑……”

“对不起，这位上尉是谁？”我问。

“勃劳尼上尉，您不认识他？唔，您昨天刚搬来！他是我们的近邻，就住在右边那栋白色的小别墅中……是个发明家……”他们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发明了一种消灭阿根廷蚂蚁的装置，……不，发明了许多灭蚁装置，并不断进行改良……您去找他一趟吧。”

体态丰满的雷吉瑙多夫妇领我走进他们那个只有几平方米大的花园。他们志得意满地翘首仰望蔚蓝色的天空，脸上露出狡黠的神情。小花园里到处是乌黑的药水留下的斑渍和道道，到处撒着黄绿色的药粉，到处堆着洒水壶、喷药器、盛满乌黑的药水的瓶瓶罐罐。这里还有几个未经修葺的小花坛，里面疏疏落落地长着几株玫瑰和其他花草，叶上和茎上都蒙着一层药粉。

我和他们做了这番交谈后，心情不觉轻松了很多。当然，我不能像他们那样，对蚁害只是一笑了之；但我认为也不能把区区几只蚂蚁看得过于严重，以至失去信心。

“嗯，蚂蚁，”我现在是这么想的，“蚂蚁没什么可怕的！有几个蚂蚁不会造成多大危害！”

我应该马上回到妻子跟前，取笑她一番：“你见了蚂蚁吓得魂不附体，天晓得你是怎么想的……”

我一边盘算着这样奚落她两句，一边捧着雷吉瑙多夫妇给我试用的、装在大大小小的纸盒和铁盒中的药粉，走进我家的庭院。药粉是按照我的意图挑选的，不包含对婴儿有害的成分，因为我的孩子不管见了什么都爱往嘴里塞。我看见妻子抱着他，眼泪汪汪地站在门口。她的腮帮已经凹陷了。我知道，她又发现了无数包围着我们的蚂蚁，又徒劳无益地搏斗了一番，又一次以投降告终。我想对她露个笑脸、奚落她几句的愿望一点也没有了。

"你总算回来了，"她冷淡地说，并没有对我大发雷霆，但这种语调使我更痛苦。"我在这里实在待不下去了……你看……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呃，我们现在可以试试这种药，"我劝慰她，"也可以试试这种，还有这种……"我把拿来的盒子一个个摆在门前的平台上，开始向她解释这些药物的用法。我只是三言两语地说了几句，因为我担心她会因此而产生过高的希望。我既不想使她产生幻想，也不想打破她的幻想。我的脑海中涌出了另一个念头：立刻去找那位勃劳尼上尉。

"你照我说的用药吧。我想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

"又要走？去哪里？"

"到另一个邻居家里去，他有一种灭蚁装置，我去看看。"

我三步并作两步，朝我家庭院的右侧跑去。庭院边上竖着一个金属制的藤架，上面缠生着藤萝。太阳此时隐藏在一块云朵后面。我刚走近藤架，那座白色的小别墅就投入了我的眼帘。别墅位于一个漂亮的小花园中，几个圆形花坛之间逶迤着一条条铺着灰色砾石的小径。这些花坛和公园里的一样，围着一圈漆成绿色的铸铁矮护栏，中间栽着一棵黑色的小树，不是橘树，便是柠檬树。

万籁俱寂，地上铺满了凉爽的树荫，一丝风也没有。我产生了疑惑，正要离开时，蓦地瞥见一个脑袋从修剪得平平整整的篱墙后面冒出，上面戴着一顶皱巴巴的白帆布海滨遮阳帽，波浪形的帽沿

压得低低的。帽沿下面是一副钢架眼镜和一个塌鼻子,再下面是一张微笑着的嘴和一排锃亮的钢制假牙。这是一个干瘪精瘦的男人,穿着毛衣和灯笼裤,脚踝很发达,跟常骑自行车的人相似。他穿着一双凉鞋,走到一棵橘树前,用怀疑的目光默默觑着树干,嘴角一直挂着那个僵硬的笑容。我走到篱墙前,踮起脚尖向他打招呼:“您好,上尉。”

那人猛地抬起头,脸上的笑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道冰冷的目光。

“对不起,您是勃劳尼上尉吗?”我问。

那人点点头。

“您知道吗,我是您的新邻居,租住劳莱利别墅……想打扰您一会,因为我听说您有一个灭蚁装置……”

上尉举起一只手,勾了勾食指,让我到他跟前去。我纵身一跳,越过篱墙,来到他身边。上尉的这只手一直举着,另一只手向前平伸,指着他正在观察的那棵橘树。我看见树上缠着一小根铁丝,与树干成直角。铁丝的末端缚着一样东西,像是鱼肠;中间折成锐角状,角尖朝下,成V形;下方吊着一个小罐,像是肉汁罐头盒。树干和铁丝上蚂蚁来来往往,络绎不绝。

“蚂蚁闻见鱼腥味后,”上尉说明道,“顺着铁丝往前爬。您看,它们来来去去,秩序井然,从未发生冲突。不过,这个V形角很危险。来自相反方向的两只蚂蚁在这里遇上后,就得停下来互相让路。下方的小罐里盛着煤油,强烈的油味把它们熏得晕晕乎乎的;因此,它们刚伸出腿往前爬,便会撞在一起,‘滴’、‘滴’两声,掉进煤油中送命。”他刚说了两声“滴、滴”,两只蚂蚁便应声掉进罐里。“滴,滴,滴,滴,滴,滴。”上尉一遍又一遍地说道,他的唇边一直浮现着那个僵硬的微笑。他每说一声“滴”,便有一只蚂蚁往下掉。煤油有两指深,上面浮着厚厚一层黑蚂蚁。

“每分钟平均消灭四十只,”勃劳尼上尉说,“每小时两千四百

只。当然，煤油应该勤换，否则油里全是死蚂蚁，以后掉下去的就能活命了。”

这个罕见的小装置不断地消灭着蚂蚁。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许多蚂蚁衔着鱼肠，从这个危险点上安然通过；但总有一些蚂蚁到此停下，动动触角，掉进煤油罐。勃劳尼上尉戴着眼镜，凝视着蚂蚁的每一个微小动作；每掉下一只蚂蚁，他就情不自禁地颤栗一下，嘴角也会微微抖动起来。他常常忍不住伸出手去，调整一下铁丝的角度，晃晃罐里的煤油，把死蚂蚁捞出来扔在地上，或是碰碰铁丝，让更多的蚂蚁往下掉。不过，他大概认为最后这个举动是犯规行为，因此立即缩回手，并用一种准备为自己辩解的目光瞟着我。

“那种装置更完善。”他边说边领我走到另一棵树前。树干上也缠着一根中间折成V形的铁丝，但末端缚着的是一根猪鬃。蚂蚁以为能沿着猪鬃找到出路，但煤油的气味和猪鬃的晃动使它们头重脚轻，纷纷往下掉。上尉还给我看了许多别的用猪鬃或马鬃制成的灭蚁装置。譬如，树上绑根粗铁丝，末端系根细马鬃，蚂蚁在这个突然变化面前惊慌失措，失去平衡，掉进煤油罐。他甚至还设计了一个“陷阱”：一边是树干，一边是诱饵，当中是一根中间剪断的马鬃；蚂蚁爬到断处，自身的重量把鬃毛压弯，它就掉了下去。这个静寂、美丽的花园中，每棵树、每根铁管和每条栏杆上都仔仔细细地拴上铁丝，下方再挂一小罐煤油。令人心悦神爽的玫瑰花和藤萝架只是这些灭蚁装置的遮掩物而已。

“阿格劳拉！”上尉走到别墅的一个小门口，朝屋里喊了一声，然后对我说：“现在我让您看看最近几天的灭蚁成果。”

一个又高又瘦、面色苍白的女人从小门中走了出来，她的眼神机警而略带恐惧，裹在头上的那条头巾在前额上打了个结。“把那几个口袋拿出来，给我们的邻居看看。”勃劳尼说。从他的口气中可以听出，她不是用人，而是上尉太太。我朝她点点头，支吾了一

句,算是问候。她没有回答我,而是立即回到屋内,拽出一个沉甸甸的口袋,来到我面前。她胳膊上的静脉根根绷起,这表明她费了很大劲;她要比外表看上去有力气得多。透过半开半闭的门扉,可以看到屋里有一堆这样的口袋。上尉太太一声不吭,又回到屋内。

上尉解开口袋,里面像是装着泥土或化肥。他伸进一条胳臂,抓出一把咖啡粉似的东西,然后摊开手掌,让它慢慢漏到另一只手中。全是死蚂蚁,像细沙子一样的黑红色的死蚂蚁。这些蚂蚁缩成一团,头足难分,发出一股股刺鼻的酸味。装满了死蚂蚁的口袋在屋里垒得像金字塔一样,大约有几百公斤重。

"真惊人……"我指出,"照这样下去,准能使蚂蚁绝种……"

"不行,"上尉四平八稳地说,"这些是工蚁,光消灭它们不管用。蚁巢遍地皆是,每个蚁巢里都有一只蚁王,它能繁殖出几百万只小蚂蚁。"

"那该怎么办?"

我走到他太太拽出的那个口袋跟前。他坐在下方的台阶上,仰着头向我解释。那顶皱巴巴的白帆布帽遮住了他的整个额头和那副钢架眼镜的上半部分。

"应该让蚁王挨饿。工蚁负责给蚁王觅食,它们的数目大大减少后,蚁王便会饿肚皮。到那时,我向您保证,哪怕外面再热,蚁王也会拖着肥胖的身躯,自己出来找吃的……到了那一天,它们被灭绝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

他草草束好口袋,站了起来。我也直起了腰身。

"但有人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把它们赶走,"他朝雷吉瑙多的别墅瞥了一眼,嗤笑了一下,露出一嘴钢制的假牙。"还有人想把它们喂得肥肥的……那也是一种办法,知道吗?"

我不理解最后这句话的意思。

"谁?"我问道。"为什么要喂肥它们?"

"那个蚂蚁人没到您家去过吗?"

他指的是谁?"我不知道,"我回答说,"大概没来吧……"

"会到您家去的,等着吧。每逢星期四他就挨家逐户转一圈。所以,如果今天上午没上您家,下午肯定会去的。他要给蚂蚁喂补药。哈!哈!"

为了迎合他,我也抿嘴笑了一下。但我只想向他求救,没有精力再去琢磨别人的灭蚁妙法了。因此我说:"我认为您的方法最好,别的方法不可能比您的好……您觉得我们家可以试试您的灭蚁装置吗?"

"您得告诉我,您喜欢哪一种装置。"话音未落,勃劳尼便又把我带进花园,给我看了他发明的另外几件我还没见过的装置。弄死蚂蚁理应是易如反掌的,他却殚精竭虑,费尽心机,设计出这么多装置,简直令人难以想像。我总算渐渐悟出了所以然:灭蚁并不简单,方法要恰当,还得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想到这里,我泄了气,因为我觉得勃劳尼上尉在这方面表现出的惊人毅力是任何人也无法具有的。

"对我们来说,也许简单点的装置更为合适。"我说。

勃劳尼从鼻孔里哼了一声,不知是表示赞许,还是认为我的要求实在太低。

"我考虑一下,"他告诉我,"先给您设计一张草图。"

我道了谢,向他告辞,重新跃过篱墙,回到自家的庭院。我居然没听见双脚落地时踩着砾石发出的声音,真像是在梦中。我的家!虽然蚂蚁成灾,但我却第一次觉得它真是我的家了!我走进家门,不由自主地说道:终于回家了。

孩子误食了灭蚁粉,妻子正在发愁。

"别担心,对人体无害!"我赶紧安慰她。

虽然无害,但毕竟不是可以往肚里吞的食品。孩子疼得大叫大嚷。应该给他服催吐剂。他在我妻子刚打扫干净的厨房里吐了一地,成群的蚂蚁立刻接踵而至。我们把地擦净,哄住孩子不哭,

把他放进摇篮,四周撒了厚厚一层灭蚁粉,外面还支了顶蚊帐,边角扎得结结实实。这样,他醒来后就不会爬出摇篮,乱吃东西了。

妻子买了一篮食品回家,蚂蚁立即前来侵袭,令人猝不及防。我们把每样食品,包括油渍沙丁鱼和干酪,都冲洗了一遍,把叮在上面的蚂蚁一只只捉掉。接下来,我帮妻子做烧菜的准备工作:劈柴,把经济灶架在壁炉上,生火。她在洗菜。我们不能待在一个地方不动,隔不了一分钟就会蹦起来:"哎哟,咬了我一口!"我们不停地搔痒,捉蚂蚁,或者拧开自来水龙头冲掉胳膊或腿上的蚂蚁。饭做好了,但我们不知道应该在哪里吃:在屋里吧,会招来更多的蚂蚁;端到门外吧,蚂蚁会爬到我们身上来。我们只好站着用餐,一面吃,一面来回走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觉得到处是蚂蚁:大概是菜里混着蚂蚁的缘故,加上我们的双手还不断地发出蚁酸味。

饭后,我叼着香烟,走进庭院。丁零当啷的餐具碰撞声从雷吉瑙多家的方向传来。我走到篱墙前,发现他们在室外用餐,地上支了个大遮阳伞,伞下摆着一张桌子。他们穿着笔挺的衣服,带着怡然自得的表情,脖子上系着方格餐巾,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着奶油布丁,呷着白葡萄酒。我祝他们胃口好,他们请我过去尝尝。我发现他们那张餐桌周围摆满了袋装的或桶装的驱蚁剂,每件物品上都蒙着一层黄白色的粉末或涂着几道沥青状的东西。一阵阵难闻的药味刺激着我的鼻膜。于是我说,十分感谢,但我没有胃口。这是事实。雷吉瑙多的收音机播着音乐,音量拧得很小;他们一面尖着嗓子哼曲子,一面做出互相祝酒的样子。

我是登在篱墙边的梯子上跟他们讲话的。站在同一把梯子上也能看见勃劳尼家的花园的一角。上尉大概已经用餐完毕,正端着一杯咖啡,边走边喝着从屋里出来。咖啡杯放在一个托盘上。他的眼睛东张西望,大概在检查那些装置是否功能正常,是否在持续不断地消灭蚂蚁。我发现有两棵树中间挂着一个白色的吊床。我知道床上肯定躺着那个形销骨立、令人反感的阿格劳拉女士,但

我只能看见她的手腕以下部位。她手拿蒲扇，来回扇个不停。吊床的绳索上拴着几个奇怪的圆环，大概是某种防蚁器械；也许吊床本身便是一个诱杀蚂蚁的圈套，上尉太太便是诱饵。

我不想把我拜访过勃劳尼的事告诉雷吉瑙多夫妇，因为我料到他们会以鄙夷不屑和冷嘲热讽的口吻发表一番评论的。邻里关系历来如此。所以，我特意转过头，朝位于高处的毛罗太太的花园遥望了一眼：她的别墅筑在山巅，屋顶安着一个随风转动的鸡形木制风标。

“不知道山上的毛罗太太家里是不是也有蚂蚁……”我说。

可以看得出来，雷吉瑙多夫妇在吃饭时能够克制自己的幸灾乐祸心情，因为他们听了我的话后只是微微一笑，轻描淡写地说了这么几句：“嘿，嘿，嘿……她家当然也有蚂蚁……嘿，嘿，嘿……她家也有……肯定有……当然有……”

我妻子叫我回家。她想在桌子上铺个床垫，躺下睡一会。我们的床直接和地面接触，无法防止蚂蚁爬上来。桌子嘛，只要四条腿周围撒上药粉，蚂蚁一时半时就上不来。她躺下休息，我又出了门，借口说是托人找工作，实际上只是想到外面走走，换换脑子。

我觉得路上的所有地方都和昨天的所见迥然不同了：每个菜园里都是蚂蚁成群，每家墙壁上都爬着一队队蚂蚁，它们边爬边朝一切甜的或含有脂肪的食物伸出触角。我的目光专注，我发现一个男人在门外拍打他的各种杂物，因为里面爬进了蚂蚁；一位老太太手拿唧筒，在喷驱蚁药水。我还看见，一列蚂蚁满不在乎地在一个盛着毒饵的小碟的盘沿爬过；当然，这只有眯起眼睛才能看清。

然而，这却是符合奥古斯托叔叔的理想的城镇。蚂蚁纵然不少，但能把他怎么样？他时而为这个老板卸货，时而为另一个老板卸货；白天在酒馆里吃饭；晚上哪里热闹，哪里有手风琴声，就上哪里；夜里哪里空气新鲜，哪里地面柔软，就在哪里睡觉。

我一边踽踽而行，一边想像着自己就是奥古斯托叔叔。我应

该像他那样，每天下午沿着这些道路踯躅。当然，要成为奥古斯托叔叔那样，首先应该具有他的生理特征：身材矮小，体型粗短；胳膊如同猿臂，老是莫名其妙地张着，或是在半空挥动；腿很短，当他回头打量女人时，常常迈错脚步；嗓音尖细，脾气一上来，便用外地口音操着当地方言破口大骂。在他身上，肉体和灵魂是统一的。我有很多操心事，苦于不能解决，真希望能和奥古斯托叔叔一起，到处走走，活动活动。当然，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假设自己已经变成了他；任何时候都可以这么对自己说："喂，到干草堆上去睡觉吧！喂，到酒馆里去美餐一顿炒猪血，畅饮几杯葡萄酒吧！"看见猫后，我应该像叔叔那样，先摸摸它，然后大喝一声"嗬！"，把它吓跑。碰到女用人时，我应该对她说一句："嗳，嗳，小姐，需要我帮忙吗？"可是，像奥古斯托叔叔那样为人处世很不容易。我越发现他在这里过得很自在，心里就越明白，他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受不了折磨着我的这些操心事：需要安家，找工作，孩子有病，妻子脸上没笑容，床上和厨房里全是蚂蚁。

我走进头天我和妻子到过的那家酒馆，向那位身穿白绣花衬衫的老板娘问道：昨天和我讲过话的那些人来了没有。店里很凉快，空气新鲜，也许不是滋生蚂蚁的场所。我听从她的建议，坐下等那帮人。我用毫不在乎的口气问她："你们这里没有蚂蚁吧？"

她用抹布在柜台上揩了一把："这里人们来了就走，谁也没发现有蚂蚁。"

"可是，您是一直住在这里的。"

她耸了耸肩："我这么个大块头，难道会怕蚂蚁吗？"

她似乎把店里有蚂蚁当作一件丑事，这种遮遮掩掩的样子越来越使我愤慨。我追问一句："您不放毒蚁药吗？"

"对蚂蚁来说，最好的毒药，"坐在另一张桌旁的一个人（我认出他来了，他是奥古斯托叔叔的朋友之一，昨天和我讲过话）说，"是这个。"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其他人陆续到达。他们没能向我提供任何找工作的线索，只是让我和他们一道喝酒。他们又谈起了奥古斯托叔叔。一个人问道："老滑头不知道眼下在那边搞什么名堂?"当地人用"滑头"这个词称呼游手好闲、机灵刁钻的家伙。大家一致认为这个称号安在我叔叔头上最合适，他正因为是个"滑头"才被人看得起。但我听后心里却颇觉不快，因为我知道叔叔虽然生活浪荡，但总的说来为人厚道，奉公守法。不过，言过其实、夸大其辞也许是当地人的共同处世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我隐约猜出，这大约和蚂蚁成灾有关：他们有意把周围世界描绘得动荡不安、充满危险，以便忘却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繁杂的烦人事，包括蚂蚁带来的麻烦。回家的路上，我思忖道，我无法和他们持同样的想法，障碍来自我妻子，她对想像的东西深恶痛绝。我还想道，她现在深深地影响着我的生活，我已经不能用空洞无物的词藻和虚无缥缈的想法来麻醉自己了，因为我一开始思考问题，她的面容、目光和身影便会立刻跃入我的脑海。归根结底，她对我不错，我需要她。

妻子愁容满面地走出门，朝我而来，告诉我说："嗳，来了一位测量员。"

酒馆里那些人的夸夸其谈还在我的耳际鸣响。我心不在焉地说了句："唔，测量员，这时来了位测量员……"

她说："对，测量员到我们家来了，正在量屋子……"

我感到十分蹊跷，连忙进了屋。

"嗨，你说的是什么哟?！他是上尉。"

是勃劳尼上尉。为了给我们设计一个合适的灭蚁装置，他带了一根黄色的折尺，正在丈量我们的屋子。我把妻子向他做了介绍，对他的热心表示感谢。

"我想研究一下这里的环境可能性，"他说，"一切都要像数学那样准确。"

上尉甚至量了摇篮的大小，惊醒了睡在里面的孩子。他见一

根黄色的尺子在眼前来回晃动，吓得大哭。我妻子赶紧去哄他。孩子的哭声使上尉很烦躁，我尽量用别的话分散勃劳尼的注意力。幸好这时他太太喊了他一声，他走出门。阿格劳拉女士从篱墙那侧探出身来，挥动着她那双没有血色的瘦胳膊，朝他喊道："回来！快，快回来！来人了！真的，是蚂蚁人！"

勃劳尼朝我瞟了一眼，抿着嘴唇，向我递过一个会意的微笑。他必须马上回家，并为此表示道歉。"他也会到您这里来的，"他说，并且指了指那位神秘的"蚂蚁人"眼下所在的地方。"您马上就会明白的……"上尉走了。

我不想在搞清这位蚂蚁人的身分和意图之前就和他打交道。我走到篱墙边，登上梯子，下面就是雷吉瑙多家的庭院。他刚好回家，穿着一件白衣服，戴着一顶草帽，拿着许多小口袋和罐头盒。

我问他："喂，蚂蚁人到您家来过了吗？"

"不知道，"雷吉瑙多说，"我刚从外面回来。不过，我想他来过了，因为我发现到处都是糖浆。克劳迪娅！"

他的妻子露了面："来过了，来过了。他也会到劳莱利别墅中来的。可是，嘿，您别指望有什么用！"

我当然不会存有任何奢望的。我问道："这个人是谁派来的？"

"谁会派他来呢？"雷吉瑙多说。"他是与阿根廷蚂蚁作斗争局的职员，负责在每家的花园里放糖浆。您看见那些小碟子了吗？"

他妻子做了补充："是拌了毒药的糖浆……"说罢抿嘴一笑，仿佛什么全知道似的。

"能毒死蚂蚁吗？"我明白，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有时眼看着就能得到答案了，但又会遽然节外生枝，变得比原先更为复杂和棘手。

这个问题看来是不该提的。雷吉瑙多连连摇头："毒不死……毒药的剂量很小……工蚁很爱吮食糖浆……但应该让它们活着爬回蚁巢，吐出这种加了微量毒药的糖浆喂蚁王……据说用这种方

法迟早会使蚂蚁绝种的。”

我没有追问他，蚂蚁是否真的迟早会灭绝。因为我听得出来，雷吉瑙多介绍这个方法时用的是一种客观陈述的语调；他虽然不同意这种做法，但当局的官方措施是必须尊重的。他的妻子则相反，她和许多女人一样，脾气急躁，毫不掩饰她对糖浆灭蚁法的反感情绪：一边听丈夫讲话，一边不住讪笑，还时时讽刺挖苦几句。丈夫大概觉得她的行为有失检点，或者过于放肆，但他不正面驳斥呵责，只是竭力向我解释，以便消除妻子造成的悲观主义印象。他们单独待在一起时，他或许也是用这种失望的语气讲话的，没准更糟。不过，他现在想给妻子做一个不偏不倚的榜样，说道："哎，克劳迪娅，你未免太夸张了……当然，并不十分有效，但还是有用的……再说，糖浆免费供给……需要过几年才能下结论……"

"几年？他们像这种样子搞了差不多二十年，蚂蚁却一年多似一年，成倍增加。"

雷吉瑙多没有反驳，而是把话题转到了与阿根廷蚂蚁作斗争局所做的好事上。他谈起了粪料盒：蚂蚁人们的人把这些盒子放在每家的花园里，等蚁王在里面产完卵后，就把盒子取走烧毁。我觉得雷吉瑙多先生讲的这些话也适于讲给我那生性多疑、悲观失望的妻子听，所以回家后就把他的话复述了一遍，而对克劳迪娅女士的冷嘲热讽则只字未提。我妻子是那种对什么也看不惯、但又无可奈何的女人；举个例子来说吧，她认为火车时刻表、列车编组、乘务员检票都是荒唐可笑、糟糕透顶、毫无意义的，但她出门时又不得不乘火车，接受这一切。听了我讲的糖浆灭蚁法后，她做出了判断：这种方法荒谬绝伦，完全是多此一举。我无言以对。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略微收拾了一下屋子，准备迎接那位蚂蚁人来访；听说他叫包迪诺先生。我们不打算对他发牢骚，也不想徒劳无益地向他提出各种要求。应该让他专心致志地工作。

他没有叩门便走进了我们的庭院。我们正在议论着他哩，他

却已经出现在眼前了,真叫人难堪。他是个五短身材,五十来岁,身上那件黑衣服已经褪了色,磨损得很厉害。脸像醉汉似的,头发还没变白,梳着儿童发型;眼睛半睁半闭,眼圈和鼻子周围泛红,唇边露出一个似有若无的笑容。他讲起话来外地口音很重,嗓子很尖,像是布道的教士;说得激动时,嘴角和鼻子周围的皱纹会轻轻抖动起来。

我把包迪诺先生描绘得如此细致入微,是为了说明他为什么会给我们留下他像蚂蚁的奇怪印象。噢,不,一点不奇怪。因为我们原先就认为蚂蚁人应该是这种样子,能在一千个人当中轻而易举地被辨认出来。他的双手粗大,手背毛茸茸的,一只手拿着一个形状像咖啡壶的器皿,另一只手端着几个陶土小碟。他告诉我们说,他要放糖浆了。他的口气表明,他是一个惯于磨洋工、对一切都无所谓的职员。他拖曳着嗓门,有气无力地说出"糖浆"这个词,这足以使我们明白,他是多么不把我们看在眼里,对他自己的工作成效又是多么缺乏信心。我发现,在这个人面前,我妻子倒给我做出了保持冷静的榜样。她耐心地告诉他,哪些地方经常有蚂蚁爬过。他谨小慎微地来回做着那几件事:把咖啡壶中的糖浆倒进小碟,把小碟放在该放的地方,当心别碰翻它们。我没看多久便失去了耐心。我观察着他的举动,重新想起他给我留下的初始印象:他像蚂蚁。原因何在? 我说不上来,可他确实很像蚂蚁。大概是由于他皮肤黝黑吧,但也可能是因为他个子矮小的缘故,或者是他的嘴角老在颤动,和蚂蚁的不断抖动足和触角相似。不过,蚂蚁的另一个特点他却不具备:它们不停地奔忙和操劳,而包迪诺先生却笨手笨脚,慢慢吞吞。现在他正举着一把蘸满糖浆的小刷子,在墙上可笑地涂抹着。

我注视着他的动作,越来越感到厌恶。忽而,我发现妻子不见了。我用目光四处搜索了一遍,最后在庭院的一个角落里看见了她。雷吉瑙多和勃劳尼两家的篱墙在那里相连。克劳迪娅女士和

阿格劳拉女士分别站在自家的篱墙边，指手画脚地讲个不停，我妻子所在的位置正好在她们中间，她在洗耳恭听。我朝她们走去，反正包迪诺先生正在房后涂糖浆，那里没什么重要东西，怎么涂都可以，我不必看着。我听见勃劳尼太太在大声发牢骚，她挥着胳膊说：

“那家伙是来给蚂蚁喂补药的，哪是什么毒药！”

雷吉瑙多太太为她帮腔，但口气没有这么激烈：“如果有一天蚂蚁灭绝了，他们那些职员不就失业了吗？所以，您能指望他们正在干什么呢，太太?!”

“喂肥了蚂蚁，这就是他们的工作成绩！”阿格劳拉女士愤然下了结论。

两位女邻居的话都是对着我妻子说的。她凝神听着，表面上很平静，但我从她那不停抽动的鼻孔和紧紧咬着的嘴唇中可以看出，她这时内心满腔怒火，由于知道自己被愚弄而十分愤懑。说实话，我也接近于相信，这两位女士不是在信口雌黄、搬弄是非。

“还有那些带有蚁卵的粪料盒，”雷吉瑙多太太接着说，“您以为他们取走后真会烧掉吗？根本不是！”

忽然响起了她丈夫的声音：“克劳迪娅！克劳迪娅！”妻子说话过了火，显然使他局促不安。雷吉瑙多太太说了声“对不起”，匆匆离开我们；她的道歉声中包含着对随波逐流、胆小怕事的丈夫的鄙视。从相反方向仿佛传来了一阵冷笑声，我回头一看，发现勃劳尼上尉正在砾石小径上调整他的那些灭蚁装置的角度。包迪诺先生刚倒上糖浆放在那里的一个陶土小碟在他脚旁成了碎片，碟底朝天；大概被他踢了一脚，但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出于不慎。

我和妻子回到屋里。我想像不出她会怎样发泄她对包迪诺先生的怒火；但我知道，我不会劝她止怒的，反倒有可能给她火上加油。可是，我们扫视了屋里屋外，却没发现这位蚂蚁人的踪迹。嗯，我们进门时，似乎听见庭院的栅门吱哑一声关上了。他大概刚

走，不辞而别了。他在屋里涂下的这一道道黏糊糊的暗红色糖浆发出一种难闻的甜腻味，和蚂蚁的气味虽然不同，但我觉得两者有关系，虽然我说不出其所以然。

儿子在睡觉，我们认为这是抽空到毛罗太太家去串门的好机会。我们应该去一趟，向她要储藏室的钥匙；另外，这也是礼节的需要。但我们迫不及待地去拜访她的真正动机却是让她听听我们的抱怨：她事先不做任何说明，就把这么一个蚁害严重的住所租给了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们想看看房东太太是怎么对付蚂蚁的。

毛罗太太的别墅带有一个延伸在山坡上的大花园。参天的棕榈树枝叶纷披，扇状树叶已经发黄。一条小路曲曲弯弯，通向雄踞在山巅的别墅：这是一座有许多阳台和阁楼，屋顶安了一个鸡形风标的建筑物。锈迹斑斑的风标发出吱吱咯咯的声音，艰难地转动着；它的反应比棕榈树叶要迟钝得多：微风一吹，树叶就瑟瑟作响，仿佛在低声呻吟。

我和妻子沿着小路往上走，不时倚着路旁的护栏，眺望下方的一切：那座对我们来说还很陌生的新居，庭院中那片杂草丛生的荒地，雷吉瑙多家那个跟仓库的内院相似的小花园，还有勃劳尼家那个方方正正、和墓地相仿的小花园。只有在这时，我们才可以暂时忘记那些地方蚂蚁成群；只有在这时，我们才可以假设那些地方没有日夜不停地困扰着我们的蚁害；只有在这时，离得远远的，我们才觉得那些地方像天堂一样美丽。我们越往上走，心里就越懊恼：我们竟会住在那种地方。在那种庸俗、烦人的地方生活，整天只得为解决一个又一个庸俗、烦人的问题而大伤脑筋。

毛罗太太年纪不轻了，人很瘦，个子挺高。她在一间阳光照不到的屋子里接待我们，端端正正地坐在一把高靠背椅上，旁边摆着一张小桌，桌上放着针线和文具。她浑身着黑，只有上衣的男式领子是白色的。她的脸庞瘦削，扑了薄薄一层粉，头发梳得整整齐

齐。她马上就把钥匙给了我们，这是她头天就答应的。她没问我们是否住得挺舒服；我们认为，这表明她心里明白，我们是向她诉苦来了。

"太太，下面那些蚂蚁……"我妻子说道，她这时的口气温顺谦恭，一反往常。我真希望她别用这种声调讲话。她是一个性格倔强、嘴不饶人的女人，但有时也谨小慎微；每逢这种时候，我就感到不高兴。

我赶紧给她撑腰，用一种深受委屈的口吻指出："太太，您租给我们的那所房子……坦率地说，如果我们知道有这么多蚂蚁……"我没往下讲，心想这已经够清楚了。

太太连眼也没抬。"那所房子长期没人住，"她说，"有几只阿根廷蚂蚁不足为奇，这种蚂蚁到处都有……房子经常打扫，蚂蚁就会绝迹的，可是您，"她的眼睛盯着我，"拖了四个月才给我答覆。如果那时您马上搬来住，现在就不会有蚂蚁了。"

"这么说，"我妻子插了一句，她的话中含有嘲讽语气，"您这里准没蚂蚁吧？"

毛罗太太撇了撇嘴。"没有。"她斩钉截铁地说。稍后，她见我们不大相信，便做了一番解释："我们这里打扫得一尘不染，光洁如镜。蚂蚁刚从花园中爬进屋里，就会被发现。我们立刻便采取对策。"

"什么对策？"我和妻子异口同声问道。我们感到好奇，充满了希望。

"很简单，"太太耸耸肩，"把它们撵走，用笤帚把它们扫走。"刚说到这里，她那故作镇静的表情忽然起了变化，她仿佛体会到一种难以忍受的痛楚。我们发现她坐得不是那么端正了：腰部扭向一边，全身的重心也明显地朝那边偏移。如果她刚才没有用如此肯定的语气讲出上面那几句话，那我一定会发誓说，准是有一只阿根廷蚂蚁钻进了她的内衣，在她身上叮了一口。一只，或者好几只蚂

蚁在她身上乱爬，使她感到奇痒难忍。她竭力不在椅子上扭动身躯，但她显然无法像刚才那样雍容大方地坐着了。她神色紧张，表情越来越苦恼。

"我们房前的庭院里全是蚂蚁，黑压压的一片，"我匆匆说，"屋子打扫得再干净，也免不了会有几千只蚂蚁爬进来……"

"有道理，"太太说，她那只癯瘦的手紧紧抓着椅子扶手，"有道理。庭院荒着，荒地里会繁殖出几百万只蚂蚁来的。我本想四个月前就在那块地里种上庄稼，可您让我等了这么久。现在您自作自受了。不仅您吃了苦头，大家也跟着倒楣。蚂蚁朝四面八方爬去……"

"也爬到您这里来了吗？"我妻子问道。她差点笑出声来。

"没有！"毛罗太太立刻否认。她的脸色苍白，右手一直紧紧抓着扶手，肩膀转动了一下，胳膊肘轻轻擦着腰部。我终于明白了，除了矢口否认事实的自尊心和这所宽敞、阴凉、考究的别墅外，毛罗太太并没有什么抵御蚂蚁的对策。当然，她在蚁害面前表现得比我们要坚强得多。不过，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一切，包括正襟危坐在椅子上的她在内，都被蚂蚁叮着、咬着，这是显而易见的。这里的蚂蚁也许比下面的更无情，它们像某种非洲蛀虫，能把所有东西啮食一空，最后只剩一个空壳。太太的别墅中似乎只有那条褪色的地毯和那几块积满灰尘的窗帘还没有受到蚂蚁的侵袭，其他东西仿佛转眼间就会变成粉末。

"我们上您这里来，是要向您请教如何摆脱蚂蚁……"我妻子说，她的神情泰然自若。

"屋子经常打扫，地里种上庄稼：没有别的办法。干活，只有干活才能摆脱蚁害。"她骤然站了起来，再也不能端坐在椅子上了。她的全身下意识地颤抖了一下。我们决定立即告辞。她镇静了下来，苍白的脸上浮现出一个轻松的微笑。

我们沿着小路往下走，回到我们的庭院。我妻子说："但愿他

还没醒。"我也在惦念着孩子。然而,我们还没跨进家门,就听见了他的哭声。我们连忙跑进屋,把他抱出摇篮,千方百计地哄他重新入睡。可是他仍然尖着嗓子,嚎啕大哭。一只蚂蚁爬进了他的耳朵。他没命地哭着,怎么哄也不管用。我们费了半天劲,才弄清事情的原委。其实我妻子一开始就猜到了。"准是蚂蚁!"但我却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哭个不停,因为周围并没有蚂蚁。我们脱光他的衣服:身上没发现有被咬或搔痒的痕迹。但我在摇篮里看见了几只蚂蚁。我虽然把摇篮放在离墙很远的地方,但没想到包迪诺先生在地板上涂了糖浆,蚂蚁被这位蚂蚁人的糖浆所吸引,沿着地板爬进了摇篮。

孩子的哭叫和妻子的嚷声把几位女邻居吸引到我们家里。雷吉瑙多太太对我们关怀备至,勃劳尼太太为我们忙这忙那,还来了几个以前从未见过的女人。大家争先恐后出主意:往耳朵里灌温热的橄榄油;让他张开嘴,使劲擤鼻子;还有一些别的法子,我记不得了。她们高声说话,喊喊喳喳,虽然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是一种安慰,但说实话,忙帮得不多,麻烦倒添了不少。她们在孩子身边忙碌,起到的主要效果是激起了大家对那个蚂蚁人的义愤。我妻子对他——包迪诺——破口大骂,把所有过错都安在他头上。邻居们全都认为,他最好还是回家抱孩子去,他在这里的工作只是为了使蚂蚁繁殖得更快,这样他才不会失业;他工作得很出色,助蚁为虐,与人作对。她们讲的话过了头,但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我也很激动,加上手里还抱着个哭哭啼啼的小孩,所以也和她们一道骂了起来。如果包迪诺那时就在跟前的话,我真不知道会对他干出什么事情来。

一只小蚂蚁随着温热的橄榄油从孩子耳朵里流了出来。他止了哭,傻乎乎地拿过一个赛璐珞玩具,晃了几下,塞到嘴里吮吸着,再也不理我们了。我这时和他一样,希望一个人待着;我要放松一下神经。邻居们还在咒骂包迪诺,她们告诉我妻子说,他现在大概

就在附近的一个庭院里，那里有他的仓库。我妻子说："哼，我去找他，到那里去找他算账。"

马上形成了一支由我妻子领头的小队伍，我当然走在她身边，尽管我不认为这种举动会有什么用处。唆使她这么做的女邻居们跟在她后面，有时抢先几步，给她带路。克劳迪娅女士主动提出留下给我们看孩子，她在栅门边送别了我们。后来我发现阿格劳拉女士也没来，虽然她刚才唾沫四溅，仿佛是包迪诺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跟我们两人一块出发的只是那几个以前没见过面的女人。我们沿着一条宽阔得像院子一样的道路前进，两旁相继闪过小木房、鸡圈和堆满垃圾的菜园。几个刚才嚷嚷得最凶的女人走到自己家门口后，停下了脚步；她们热情地告诉我们应该往哪边走，然后就回家喂老母鸡去了，或者喊过在街上玩耍的浑身是土的子女，把他们拉进家门。只有两三个女邻居跟我们一起走到包迪诺所在的那个庭院门口。不过，等我妻子敲开门后，我们发现进去的只有我和她两人。女邻居们有的趴在窗口注视着我们，有的在鸡圈里看热闹，有的一面在门外扫地，一面继续鼓动我们。当然，她们的声音很轻，除了我们以外，旁人听不见。

那个蚂蚁人站在仓库中。这是一个小棚子，四分之三已倒塌，仅存的那堵木板墙上贴着一张发黄的纸片，上面赫然写着"与阿根廷蚂蚁作斗争局"几个大字。地上堆着一叠叠放糖浆的小碟、各式各样的木盒和空罐头。这里像是一个垃圾堆，破纸、鱼骨和其他废物应有尽有，人们马上就能想到，这是当地所有蚂蚁的大本营。包迪诺先生面带愠怒和询问的神色朝我们走来，他似笑非笑地咧了一下嘴，我们发现他的牙齿已经所剩无几。

"您！"我妻子犹豫片刻后对他开了火，"您应该感到羞耻！您到了我们家，弄得到处一塌糊涂，用糖浆引来了蚂蚁。一只蚂蚁还爬进了我孩子的耳朵。"

她冲着他的脸挥拳头。包迪诺先生像受惊的动物一般躲开

了，但嘴角的笑容并未消失。他耸耸肩，眨眨眼，朝周围环视着。他的视线最后落在我身上，因为附近没有别的人。他的目光似乎意味着："她发疯了。"但他说出口的话却只是无力地为自己辩解："不……不……怎么能呢……"

"大家都说，您不是给蚂蚁下毒，而是给它们喂补药！"我妻子嚷道。包迪诺先生溜出棚子，来到那条像院子一样宽阔的道路上。我妻子一直跟在他后面骂个不停。他开始对附近小木屋里的女人们耸肩膀和挤眉弄眼。我觉得她们此时在悄悄扮演着两面派的角色：一方面接受他的目光的含义，同意他的看法——我妻子是在胡说八道，与疯子无异；另一方面，当我妻子的视线投向她们的时候，她们又频频颔首，或者挥动笤帚，鼓励她继续向那蚂蚁人开火。我避免介入。我应该如何是好呢？当然不能像妻子那样出言不逊，更不能对节节败退的包迪诺大打出手，我妻子的这通脾气已经够他受的了。但我也不应该劝妻子息怒，因为我不想袒护包迪诺。我妻子越来越愤怒，刚嚷了句"您在坑害我的孩子！"，便一把揪住他的衣领使劲摇晃。我怕他们打起来，正想奔过去把他们拉开时，忽然发现包迪诺先生并不还手，只是用越来越像蚂蚁的动作转动了几下身子，挣脱了她，滑稽地跑开了。他在不远处停下，理好衣服，耸耸肩，嘟哝道："什么哟……谁会那样……"然后便走开了。临走前，他朝小木屋里的居民们摆了几下手，意思似乎是"她发疯了"。我妻子朝他扑去时，小木屋里的居民们发出一阵含混不清的喧哗声；那人挣脱后，喧哗声随之沉寂；而等那人离开了这里，人们看着他的背影，又开始纷纷议论起来。这回她们讲得很清楚，每句话的意思都很明白：不是抗议或威胁，而是抱怨，表示同情，以及提出要求。她们的声音很响，仿佛是在发表一篇自豪的宣言："我们会被蚂蚁活活咬死的……床上有蚂蚁，菜盘里有蚂蚁……白天有蚂蚁，夜里有蚂蚁……我们本来就吃不饱，可是还得喂蚂蚁……"

我拽过妻子的手臂，但她还不时扭过身去喊道："没这么便宜！

我们知道谁是骗子！我们知道应该找谁算账！”她还讲了另外一些怒气冲冲的话。这时已经没有人附和她了：我们从那些小木屋门前经过时，家家户户立即关上门窗；邻居们宁愿和蚂蚁和平共处，她们不想招惹是非。

回家的路上冷冷清清，这其实也在我的预料之中。尽管如此，看到女邻居们的那种表现，我实在感到痛心。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愿看见那些只会口头上到处抱怨深受蚂蚁之害的女人。我一辈子也不会像她们那样耍两面派手法。我倒想仿效毛罗太太，独自关在家里，高傲地忍受痛苦。不过，她是个阔老，而我们一贫如洗。我找不到出路，想不出法子，不知道怎样在这个城镇里继续待下去。但我认为，我的熟人中间，以及不久前我还觉得比我有能耐的那些人中间，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出了办法，或者即将想出办法。

我们到了家。孩子还在吮吸着他的玩具。妻子坐到椅子上，我打量着爬满蚂蚁的土地和篱墙。雷吉瑙多先生的花园里有人在喷驱蚁粉，一股粉尘在篱墙那侧冲天而起。右边是上尉家那个浓荫铺地、静谧安宁的花园，各种精巧的装置正在不断地消灭蚂蚁。这就是我的新居所在的城镇。我抱起孩子，挽着妻子说：“我们去遛遛，一直走到海边去。”

太阳已偏西。我们沿着林阴大道和傍山小路朝前走。老城的一角还沐浴着阳光，那边的房子由灰色的海泡石砌成，窗棂上抹着灰泥，屋顶长满青草。这个城镇呈扇形展开，房屋依山而筑。山坳间空气清新，大地这时染上了紫铜色。孩子回过头去，不胜诧异地浏览着这一切。我们也部分受到了他的感染，觉得颇为新奇。生活中的某些时刻是很甜蜜的，我们似乎接近了这种时刻，心头的伤口也仿佛渐渐愈合了。

我们碰见了几个老太太。她们头上垫着个草垫圈，上面顶着一个大篮子。她们低着头向前走，腰板挺得笔直，身子从不乱晃。一群裁缝姑娘跑出修道院的花园，奔到池边，伏在石栏上看着水中

的一个蟾蜍;她们说:“唉,真可怜!”栅门后边的一株紫藤下,几个身穿素白衣裳的小女孩在逗弄一个玩汽球的瞎子。一个光着上半身、蓄着大胡子、留着披肩发的小伙子手持木叉,在一株长满又长又白的树刺的老树下够刺梨。一户殷实人家中的几个小孩神情悒郁,每人戴副大眼镜,在窗前吹肥皂泡。铃声骤然响起,收容所里的老人该回房了:他们拄着拐棍,戴着草帽,一边喃喃低语,一边依次踏上台阶,走进寝室。两个工人在检修电话线,在下面扶梯子的那位对在电线杆上干活的伙伴说:“下来吧,该收工了,我们明天把它干完吧。”

我们来到港口,面前便是浩瀚的海洋。海边有一排棕榈树和几条石凳。我和妻子坐下,孩子乖乖地待在一边。妻子说:“这里没有蚂蚁。”我接过她的话柄:“而且空气新鲜。在这里待着真舒服。”

海水忽进忽退,拍击着栈桥边的礁石。渔船在轻轻晃动,肤色黧黑的渔民们把一张张红色的鱼网和一个个鱼篓放进船舱,准备晚上出海捕鱼。海面平静,只是颜色在不断变化,时而蓝,时而黑,越到远处,色调越深。我想着远方的海水,想着海底的无数细小沙粒,以及被潜流带到海底、被波涛冲刷得干干净净的洁白的贝壳。

短篇小说八篇

牲 畜 林

在那扫荡的日子里，树林里像集市一般热闹非凡。山间小路以外的灌木丛和树林中，赶着母牛和小牛的人家，牵着山羊的老太婆和抱着大鹅的小姑娘比比皆是。更有甚者，有人连逃难的时候还带着家兔。

不管在哪里，栗树越是稠密，膘肥体壮的公牛和大腹便便的母牛就越多，它们走在陡峭的山坡上简直不知道往哪里迈脚。山羊的处境则好多了。但最高兴的还莫过于骡子，总算有这么一次可以不负重地走路，而且还能边走边啃树皮。猪专拱地，结果长鼻子上扎满了栗子壳。母鸡栖息在树上，可把松鼠吓坏了。由于多年圈养而不会挖洞做穴的兔子，只好钻进树洞里，但有时会遇到咬它们的睡鼠。

那天早晨，农民朱阿·德伊·菲奇正在树林深处砍柴，对村子里发生的事情全然不知。他头天晚上就离开了村子，睡在林子里一间秋天用来风干栗子的房子里，打算第二天一早采蘑菇。

他正挥动斧头砍一棵枯树时，隐约听到林子里响起了系在牲口脖子下的铃铛声，感到非常惊奇。他停下手中的活儿，倾听着这声音由远而近。"噢——"他朝声音喊去。

朱阿·德伊·菲奇是个矮胖子，圆圆的脸膛黑里透红。他头戴一顶绿色圆锥形毡帽，上面插着根野鸡毛，身着一件带黄色大圆点的衬衣，外罩一件毛背心，圆鼓鼓的肚子上，一条带圆点的红围巾系住了打满蓝色补丁的裤子。

“噢呜——”有人回答他。从长满苔藓的岩石后面,走出一个头戴草帽、长着小胡子的农民。是他的老乡,牵着头白胡子大山羊。

“朱阿,你在这里干什么。”老乡对他说,“德国鬼子进村了,正挨个搜查牲口棚呢!”

“天哪,糟糕了！他们肯定会找到我那头奶牛‘花大姐’,把它带走。”朱阿大声说。

“你快去,可能还来得及把它藏起来。”老乡提醒他说,“我们看到德国人的队伍进了山口,就马上撤了。可能他们还没走到你家。”

朱阿丢下木柴、斧头和蘑菇篮子,撒腿就跑。

他在林子里跑着,一队队鸭子拍着翅膀,从他脚下跑开。一群群肩并肩的山羊却不给他让路。孩子和老太婆朝他喊道:“他们已经到马多内塔啦！正在桥上挨门挨户搜查呢。我看见他们快到村口了。”朱阿用那两条短腿飞快地跑着,下坡时就像一只滚动的球,上坡时气喘吁吁。他跑啊,跑啊,翻过一道山脊,村子便展现在眼前。处在群山之中的山村,早晨空气清新柔和。石砖和石板搭成的简陋房屋显得那么凄凉。村子里空气紧张,不时传来德国人的叫喊声和用拳头砸门的声音。

“天哪！德国鬼子已经进村了!”

朱阿·德伊·菲奇全身颤抖起来。这一方面是由于喝酒过多,早就有手颤的毛病,另一方面,一想到他在世上惟一的财产“花大姐”要被带走,便不寒而栗。

凭借一排排葡萄架的掩护,他穿过田野,悄悄地靠近村子。他的家在村子的最后一排,在房屋和菜地交叉的地方,一片绿色南瓜地之中。可能德国人还没到那里。

朱阿一面环顾四周,一面开始溜进村去。他从一个屋角转向另一个屋角,看到街上空无一人,只有干草和马厩的气味依旧。野

蛮的叫喊声和带钉子的皮靴声是从村中心传来的。他的家就在前面，门依然关着，无论是牛圈的门，还是破旧阶梯连着的房间的门都关着。门口的破锅里种满了罗勒。"哞……"一个声音从牛棚里传出，是母牛"花大姐"，此刻它听到了自己的主人正在走近。朱阿高兴了。

就在这时，突然从一个拱门下传来了脚步声，朱阿赶紧躲进门洞，用力向后收缩圆鼓鼓的肚子。这是一个长得农民模样的德国兵，短短的制服遮不住那长胳膊、长脖子，他的腿也很长，拿着一杆像他一样高的破枪。他离开了同伴，想独自捞点什么。这村子使他回忆起了熟悉的东西和气味。他边走边用鼻子嗅着。扁平的军帽下，一张猪样的黄脸东张西望。"哞……""花大姐"又叫了起来，它不明白为什么主人还没来到。听到这声音，德国兵的精神为之一振，迅速向牛棚走去。朱阿紧张得气都喘不过来了。

他看到德国人在凶狠地踢着门，肯定很快会破门而入。于是就绕到房子后面，走进干草棚，在草堆下翻找起来。那里藏着一杆老式双筒猎枪和子弹袋。他把两颗打野猪的子弹推上膛，子弹袋系在腰上，平端着枪，悄悄地走到牛棚门口。

德国兵正牵着牛往外走。那是一头漂亮的、带黑点的红色小母牛，因此绰号叫"花大姐"。它性情温顺，但又很固执。现在它不愿跟着这个陌生人走，站在那里不动。德国人不得不在后面推着让它走。

躲在墙后面的朱阿开始瞄准了。要知道，他是村子里最蹩脚的猎手，从来瞄不准，不要说野兔子，就连一只松鼠也没打到过。当他朝树上的鸟儿开枪时，它们甚至动也不动。没人愿和他一起去打猎，因为他会把铁砂粒打到同伴的屁股上。他本来就双手发抖，瞄不准，现在又如此激动，结果便可想而知了。他使劲瞄准，但颤抖的双手使枪口不停地在空中转动。他想对准德国人的胸膛，可是准星正对着的却是牛屁股。"天哪！如果我想打死德国兵，遇

难的却是'花大姐',怎么办?"朱阿这样想,不敢贸然开枪。

德国人牵着这头因听到主人来到而不肯前进的牛,吃力地走着,突然发现伙伴们都已离开村子上路了。他准备拉着这头固执的牛追赶伙伴。朱阿一直尾随在后面,保持着一定距离,不时躲在篱笆或矮墙后面瞄准。但无论如何总拿不稳枪,更何况德国人和母牛靠得那么近,他哪里敢抠动扳机。难道就这样让他牵走吗?

德国兵为了追赶逐渐远去的伙伴,想抄近路,走入了树林。现在凭借树干的遮挡,朱阿更容易跟随他。这时候德国兵大概会距离牛远一点,可能有机会开枪了。

进入树林,母牛似乎不那么固执了。相反,由于德国人对这林间小路一点也不熟悉,是母牛领着他前进,并选择走哪条岔路。没过多久,德国人就发现,他并没有走上通往大道的近路,而是进入了密林深处。一句话,他和母牛一起迷了路。

朱阿一直跟着德国兵,像他一样,鼻子被荆棘划破,双脚陷入小溪,鹪鹩被惊得四处乱飞。想要在密林中瞄准就更难了,特别是要通过多重障碍和那总在眼前晃动的牛屁股。

德国人心惊胆颤地打量着这浓密的树林,琢磨着如何才能走出去。忽听杨梅果树丛中一阵响动,跑出一头漂亮的粉红色小猪。在他的家乡,从未见过猪在树林子里跑来跑去。他松开牵牛的绳子,就去追赶那头猪。"花大姐"一旦得到了自由,就一头钻进树林跑了,这里有它许多朋友。

对朱阿来说,这正是开枪的好机会。德国人手忙脚乱地在抓猪,想要紧紧地抱住它,但猪还是挣脱了。

就在朱阿站在那里准备抠动扳机时,附近出现了两个小孩,一男一女,头戴毛线帽,足登长统靴。他们脸上挂着泪珠说:"朱阿,请你瞄准点。要是把我们的猪打死了,我们就什么也没有了。"朱阿手中的猎枪又跳起了塔兰泰拉舞。他的心肠太软了,激动得太厉害了。这倒不是因为他要杀死那个德国鬼子,而是为那两个可

怜孩子的猪担心。

德国鬼子怀里抱着那头吱吱乱叫、拼命挣扎的猪东撞西撞。突然，伴着猪的叫声，“咩——”的一声，从山洞里跑出一只小羊。德国人放下猪，又去抓羊。他抓住那声嘶力竭叫唤着的羊的一条腿，像牧人那样把羊扛在肩上，向前走去。朱阿蹑手蹑脚地跟在后面，心想，“这一下你可跑不了了，机会来了。”正要抠动扳机，突然有一只手托起了他的枪。原来是个白胡子的老牧羊人。他合掌向朱阿祈求说：“朱阿，不要杀死我的小羊，你只打死他，千万别打死我的羊。你瞄准点。”朱阿简直给搞糊涂了，连扳机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了。

德国兵在林子里转悠，对自己看到的东西感到惊奇：小鸡栖息在树上，豚鼠从树洞向外伸头探脑。简直像诺亚方舟一样。看，松树枝上站着一只开屏的火鸡。他连忙伸手去抓，但火鸡轻轻一跳，跳到更高一层的枝上，尾羽依然展开着。德国兵放开了山羊，开始爬树。他每向上爬一层，那只下巴垂肉鲜红的火鸡，就跳到更上一层的树枝上，挺着胸脯，一直保持着开屏的姿势。

朱阿头顶茂盛的树枝，双肩和枪筒也用树枝伪装起来，他悄悄来到树下。这时，一位年轻的、戴红头巾的胖姑娘来到他身边。“朱阿，”她说，“你听我说，如果你打死德国人，我就嫁给你。要是打死了我的火鸡，我就割断你的脖子。”听了这话，年纪已经不轻、但还没结婚的、腼腆的朱阿羞得满面通红，手中的猎枪像烤肉的铁叉一样在眼前转动起来。

德国兵继续向上爬，树枝越来越细，脚下的树枝突然折断，他掉了下来，差点砸在朱阿身上。这次朱阿不糊涂了，拔腿就跑，伪装的树枝掉了一地。德国兵摔在松软的树枝上，没有受伤。

跌倒在地上之后，他看到小路上有只兔子，但又不像野兔。它圆鼓鼓的，比野兔肥实，听到响声不但不跑，反而趴在地上不动，原来是只家兔。德国人一把抓住了它的耳朵。提着吱吱乱叫、左右

扭动的兔子，他又上路了。为了不使兔子跑掉，他不得不高举手臂，跳来跳去。林子里到处是牛叫、羊叫、鸡啼。每走一步都可以发现新的动物：一只鹦鹉站在冬青树上，三条红鱼在泉水中游动。

朱阿骑在一棵老橡树高高的树枝上，一直盯着提兔子的德国兵。虽然兔子不时地变换姿势，但总是离不开准星。朱阿觉得有人在拉他背心的下摆，一看，是个梳着辫子、满脸雀斑的小姑娘。她说："朱阿，别打死我的兔子，反正德国人已经把它拿走了。"

德国兵来到一个布满灰岩石、长满绿苔藓的地方，附近只有几棵干枯的松树，前面就是悬崖。一只母鸡正在洒满松枝的地上觅食。德国人急忙去追鸡，兔子乘机溜走了。

这是一只光秃秃没剩几根毛的母鸡，人们再也不可能见到比它更老、更瘦的鸡了。是全村最穷的老太婆吉鲁米娜的。它很快被德国兵抓住了。

朱阿埋伏在岩石的高处，用石头垒了个枪座。实际上，他修筑的是个掩体，只留下一个可以放枪筒的射击孔。现在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开枪了，就算把那没毛的母鸡打死，也没什么关系。

正在这时，吉鲁米娜老太太身披黑色破披肩走了过来，向他讲了这样一个道理："朱阿，德国人拿走了我的鸡，那是我在世界上惟一的财产，这已经够使我伤心的了。现在要是你把鸡再打死，那我就更伤心了。"

听了老太太这番话，朱阿的手比以前颤抖得更厉害了，他的责任太大了。尽管如此，他还是鼓足了勇气，抠动了扳机。

听到枪声，德国人看到手中的鸡没了尾巴。接着又一声，翅膀丢了一只。难道这只鸡有魔法，会在手中自我爆炸，自我消耗？又是一枪，母鸡的毛全部剥光，除了还在不停地叫以外，简直可以直接送去烧烤。心惊胆颤的德国兵抓住鸡的脖子，手臂平伸出去，同自己身体保持一定距离。朱阿的第四枪恰好打在他手下面一点的鸡脖子上，他手中只剩下了一个鸡头。他飞快地把鸡头扔掉，撒腿

就跑。但再也找不到路了，前面是个乱石崖。石崖边上长着棵角豆树，上面趴着一只大猫。

现在，他对在林子里能看到各种家养的动物，已毫不奇怪了。他伸手去抚摸那只猫，希望能听到它的呼噜声，聊以自慰。

要知道，很久以来，这个林子里就有一只凶恶的野猫，专门捕食飞禽，有时甚至到村子里偷鸡吃。原以为可以听到猫呼噜的德国兵，看到那只凶狠的动物，竖起全身的毛向他扑来，他感到快要被野猫的利爪撕成碎片。人和野猫在厮打中一起滚下了石崖。

就这样，朱阿这个劣等射手，受到了像全村最伟大的游击队员和猎手一样的欢迎。人们用公积金给可怜的吉鲁米娜买了一窝小鸡仔。

贝维拉河谷的粮荒

一九四四年，战线依旧是四〇年那样，只是这次战争旷日持久，没有任何移动的迹象。人们再也不愿像四〇年那样，用小车推着破烂和母鸡，牵着骡子、拉着羊逃难了。那年，当他们重返家园时，看到的是箱倒柜翻、人粪遍室。要知道，那些当兵的意大利人，搞起破坏来，是不管在朋友家，还是在敌人家的。就这样，人们没有撤离。法国人的炮弹日夜在房顶开花，德国人的炮弹则在头顶呼啸。

"总有一天会向前推进的。"人们这样说，从九月份一直重复到来年四月份，"盟军会向下游挺进的。"

贝维拉河谷到处是人，有农民，也有从文提米利亚疏散来的人。大家都没吃的了。没有食品贮备，面粉则必须到城里去买，而通往城里的路日夜受到炮弹的轰击。

人们没法回家，只能躲在山洞里。一天，村里的男人都聚集到一个大山洞，讨论该怎么办。

"现在必须轮流到文提米利亚去找面包。"村委会的人说。

"这主意真不错，这样我们就一个接一个地在路上被炸得粉碎。"有人说。

"或者一个个被德国人抓住，送到德国去。"另一个接着说。

"牲口怎么办？谁出牲口？即使有，谁也不愿拿去冒险。就是有人愿意去，最后连人带牲口和面包都回不来，这是明摆着的。"又有人这样说。

所有的牲口都已被征用，就算有个别幸免的，也早已被隐藏起来了。

“不管怎么说，没有面包，我们怎么生活？有谁愿意带一头骡子去文提米利亚？那里正通缉我，不然的话，我就去了。”村委会的人说。

他环视了一下四周，男人们坐在山洞的地上，眼睛里毫无表情，用手指在松软的凝灰岩上挖着什么。

这时，坐在后面、张着嘴、什么也没听懂的老汉比斯马站了起来，走出山洞。大家以为他要去小便，因为他年纪大了，经常要小便。

“留神点，比斯马，找个隐蔽的地方。”人们朝他喊。

但他连头都没回一下。

“对他来说，就好像没有轰炸这码事，”有个人说，“他耳聋，听不到炸弹声。”

比斯马八十多岁了，背驼得好像老是背着捆柴禾，似乎他一生中从树林背到马厩的柴禾仍压在他的背上。

人们叫他比斯马，是由于他胡子的缘故。据说，他年轻的时候，胡子很像俾斯麦的胡子。不过，现在他的胡子花白而肮脏，弯曲下来，就像他身体其他的部分一样，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然而，却什么都没掉下来。但他步履蹒跚，头不停地摇动，像所有的聋子一样，目光呆滞而多疑。

他重新出现在洞口。

“吁！”他吆喝着。

这时大家才看到，他身后牵着头骡子，并且鞴好了鞍架。比斯马的这头骡子，看起来比它的主人还老，脖子扁平，就像块木板，头低得快要碰到地上，走起路来小心谨慎，似乎怕那些突出的骨头刺破皮肤，从爬满苍蝇的伤口处钻出来一样。

“比斯马，你带骡子到哪里去？”人们问。

他张着嘴，晃动着脑袋，什么也没听见。

“口袋，给我口袋。”他说。

“喂，你和这头没用的骡子上哪里去？”

“多少公斤？到底要多少公斤？”他问。

大家给他拿来口袋，用手比划着要多少公斤。之后，他就出发了。炮弹不断地响着，人们站在洞口，朝大路张望，看着那一瘸一拐的身影不断远去。骡子和骑在上面的老人是那样危险，似乎随时都可能一起倒下去。炮弹在前面的路上不断炸开，硝烟弥漫，有时落在前面，破坏了骡子小心翼翼地走着的道路，有时又落在后面，但比斯马连头也不回。人们屏住呼吸，注视着他在炮弹的呼啸声中一步一步地前进。“这颗炮弹准得击中他。”有人说。这时，只听得一声炮响，扬起的尘埃完全笼罩了他。人们顿时安静了下来。随着烟尘慢慢地消失，剩下的大概只是光秃秃的道路，连他的尸体可能也看不到了。不料人和骡子却幽灵一般再现了，他们继续慢慢地走着，到了最后一个拐弯处，以后就再也看不见他们了。“他办不成这事。”人们这样议论着转过了身去。

比斯马骑着骡子继续走在铺着鹅卵石的崎岖山路上。那头老骡子迈着哆哆嗦嗦的蹄子，走在布满石块和塌方的高低不平的路上，驮架下的伤口好像要撕裂它的皮肤。炮弹的爆炸声不会使它害怕，因为它一生中吃了那么多苦头，再也不会有任何事情能使它激动。它低头走着，黑色的眼罩挡住了部分视野，但使它看到非常美丽的东西：被击碎外壳的蜗牛，在岩石上留下一道道五颜六色的黏液，蚁巢被捣毁，黑、白蚂蚁四处乱奔，蚁卵遍地，野草被连根拔起，如同大树那样稀奇古怪的根系朝天竖起。

骑在驮架上的人，力图在骡子消瘦的臀部上挺直身体，他那把老骨头，受尽了道路高低不平的折磨。他同他的骡子一起成长，他的思想简单，就像骡子一样听天由命，因为他这辈子吃的面包都是经过艰难的道路取得的，他自己吃的和别人吃的都是如此。现在

他要为整个贝维拉村去找面包。这个世界，他周围这个寂静世界，似乎现在也力图用他这个聋子都能听到的炮声和四处飞扬的尘土对他讲话。一路上，比斯马看到悬崖倒塌，烟尘四起，碎石乱飞，红色闪光在小山包上忽隐忽现。世界要改变它那副旧面孔，把植物、土地和所有东西统统颠倒过来。远处隆隆的炮声冲击着寂静，这老年人可怕的寂静。

骡蹄子前面的路上突然爆出巨大火光。顿时，他们的鼻孔和嗓子都塞满了泥土。碎石雨点般地向老人和瘸腿骡子袭来，同时，一根巨大的橄榄树的树杈从他们头顶飞过。但只要骡子不倒，他就不会倒下去。骡子坚持住了，四个蹄子就如同钉子一样，钉在撕裂的土地上，膝盖几乎要折断。然后，它又慢慢移动脚步，在烟尘弥漫中继续前进。

傍晚，贝维拉村里突然有人喊道："快来看，比斯马回来了，他成功了。"顷刻，男女老少一齐走出家门和山洞，只见在最后一个拐弯处，驮着口袋的骡子比原来更加一瘸一拐地走来，比斯马步行跟在后面，他拉住骡子的尾巴，不知是他被骡子拉着走，还是他在推着骡子向前进。

人们热烈欢迎带来了面包的比斯马。分配面包这件事是在大山洞里进行的。村民们排成队，一个接一个，村委会委员分给每人一个。比斯马坐在旁边，用那仅有的几颗牙齿边啃自己的一份，边看着大家。

第二天，比斯马照样又去文提米利亚了。只有这头骡子引不起德国人的注意。从此，他每天都到那里驮面包，而每次都能穿过枪林弹雨，死里逃生，安全而归。人们说，可能他与死神签了和约。

后来德国人撤离了贝维拉河谷右岸地区，临走时炸毁了两座桥和一段路，安放了地雷，并宣布四十八小时之内居民必须迁出村子和周围地区。人们撤出了村子，但并未离开这个地区。他们进山，钻入山洞。由于这个地区处在交战双方的中间地带，与世隔

绝，没有办法弄到食品，饥饿降临了。

当黑衫军知道贝维拉已经疏散，便唱着歌开进了村庄。有个士兵提着一桶油漆，手持毛刷，在墙上写道："他们不会得逞。我们坚决顶住。轴心国不退让。"

与此同时，其他黑衫党徒肩扛冲锋枪，沿着大街小巷巡逻，挨门挨户搜查。就在他们想用肩膀撞开房门时，骑着骡子的比斯马出现在斜坡上，正从两排房子中间走过来。

"喂，你往哪里去？"黑衫党徒们问道。

比斯马好像根本没看见他们，骡子依然一瘸一拐地走着。

"喂，说你哪！"

这个骑在皮包骨的骡子上，瘦骨嶙峋，面无表情的老人，活像从那破烂不堪、空无人烟的村庄中，某块石头缝里冒出来的幽灵。

"是个聋子。"他们说。

老人开始逐个地审视他们。黑衫军拐进一条小巷，来到小广场上，这里只能听到喷泉的流水声和远处的炮声。

"我看这家有东西。"一个黑衫兵指着一座房子说。他是个眼睛下长了块红斑的小伙子。空旷的广场四周的房子发出回声，重复着他说的每个字。小伙子做了个神经质的动作。那个手持毛刷的士兵在残壁上写道："战斗光荣。"一扇未关的窗户砰的一声关上了，发出比炮声还大的响声。

"看我的。"那个长红斑的小伙子对另外两个正在使劲推门的士兵说。他用冲锋枪对准门锁，一阵扫射，门打开了。恰恰这时，比斯马又出现了，而且是从他们刚看到的相反方向过来的。好像他是骑在那头瘦弱的骡子上，在村里来回散步似的。

"我们等他走过去。"其中一个说。他们若无其事地站在门前。那个拿毛刷的人又写道："不到罗马，毋宁死。"

骡子慢慢地穿过广场，好像再多走一步就会倒下去。骑在上面的老人似乎在打瞌睡。

“快走开。”带红斑的小伙子朝他喊，“村子戒严了。”

比斯马没有回头，好像一心一意地赶着骡子，穿过广场。

“我们要再碰上你，就开枪了。”那士兵坚持说。

“我们必胜。”拿毛刷的人接着写。

比斯马已经走远，只能看到他那衰老的背影，以及骡子那似乎静止的四条黑腿。

“我们到那边去。”他们说着，从门洞里钻出来。

“快点，别耽误时间，从这家开始。”

他们打开了房门，那个带红斑的士兵第一个进去。房子里空荡荡，只有回声。他们转遍了每个房间，最后走了出来。

“你们看，我真想放把火，烧了这村子。”带红斑的又说。

“我们勇往直前。”另一个再写道。

比斯马又在小街口出现了，朝他们走来。

“别开枪。”其他黑衫士兵对正在瞄准的带红斑的人说。

“领袖万岁。”拿毛刷的人又写了一句。

但是带红斑的人还是抠动了扳机。一阵枪响，老人和骡子同时中弹，可仍然站在那里，似乎四条黑腿上面的躯体是一个整体，就倒在四个蹄子上。黑衫士兵站在那里看呆了，长红斑的人丢下冲锋枪，全身发抖。后来老人和骡子同时向前倾，好像是再向前迈一步，然而却一个压在另一个身上，一齐倒下了。

夜里，村里来人把他们抬走了。人们安葬了比斯马，把骡子煮熟吃了。肉是硬一些，但他们饿啊。

月亮与霓虹灯

夜晚，GNAC耀眼的光亮持续了二十秒钟后熄灭了。二十秒钟的瞬息间，整个夜空露出笑脸：晴朗的天空飘荡着几朵急匆匆飘游的乌云；金色的新月像一把镰钩高高挂在空中，一朵淡淡的云彩遮住了它的笑容，显现出一个若隐若现的月晕；星星眨巴着亮晶晶的小眼睛，越细看它们就越显得更微小更稠密，熙熙攘攘，缀满天空，一直连接上银河的明亮光带。这匆忙看到的夜空一闪而过，倘若只顾凝视夜空的一点，那么就会失去观赏整个夜空的机会，因为二十秒钟一闪而过，GNAC重新亮起来。

GNAC是高悬在对面楼顶上高大的SPAAK-COGNAC[①]霓虹灯广告的一部分，每隔二十秒钟亮一次，一次亮二十秒钟。每当它亮的时候，夜空变得平平坦坦、漆黑一片，月亮蓦然惨淡无光，星星失去了光彩。GNAC熄灭十秒钟后，发情的公猫和母猫才迟钝地开始喵喵嚎叫起来，沿着屋檐和烟囱管胆怯地慢慢靠拢。突然，GNAC一亮，射出刺眼的磷光，猫立即惊恐地竖起全身的毛，隐藏在瓦垄中。

马科瓦尔多一家住在霓虹灯对面一幢楼的阁楼里。此时，一家人倚窗眺望，思绪各异。十八岁的姑娘伊索丽娜静静地仰望着月光，坠入了情思绵绵的遐想，以致觉得楼下收音机里传来嘁嘁喳喳低微发颤的声音，仿佛是情郎在窗下唱的小夜曲。蓦然，GNAC

① COGNAC即白兰地，SPAAK是公司名。

闪亮，好像收音机也随之变换了曲调，传来了活泼的爵士乐，伊索丽娜缩缩穿着紧身褡的身体，情不自禁地寻味着舞厅里快乐的舞步、五彩缤纷的灯光。然而，此时此刻，可怜的少女却孤独地待在阁楼里。

塔尼莱和米凯利诺，一个六岁，一个八岁。每当夜幕出现，他们总是眼睛瞪得滚圆，凝视着窗外，一种朦胧的对窒息的恐惧在他们的脑子里盘旋，仿佛他们置身于匪徒的包围中。然后，GNAC 发亮了，他们伸出拇指和食指，形成一个手枪的形状，互相开起枪来，嘴里喊着："举起手来！我是超人！"

每当黑夜降临的时候，母亲多米娣拉总是这样想："孩子们应该离开窗口，否则，这种气氛会对他们有害的。伊索丽娜这么晚了还探头探脑地看着外面，可不太好啊！"阁楼外面的灯光重新亮起来，照得室内室外一片通亮，多米娣拉忽然恍若自己走进了一家豪门巨室。

十五岁的费奥达利吉是个早熟的男孩子。每当 GNAC 熄灭的时候，他总是看见在旋涡形的 G 字里有一个小天窗。这时，小天窗随之亮了，玻璃窗里露出一张如同月光、霓虹灯光和夜晚大自然光色的少女的脸，一张几乎还是幼女的小脸。费奥达利吉向她微笑，但他没有看清楚她的反应，那张小嘴微微闭着，也许她曾向他微笑过。外面 GNAC 那可恶的 G 字又重新亮了起来，小天窗顿时模糊不清，少女的脸的轮廓消失了，变成了微弱发白的影子。现在，他无法知道那张小嘴是不是正在回答他甜蜜的微笑。

一家人各有各的情趣，各有各的思虑。这时候，马科瓦尔多很想教授孩子们一点天文知识，便慨然指点着天体星辰的位置。

"看，那是大熊星座，一、二、三、四，那是勺把，那是小熊星座。北极星指示北方。"

"那么，那一颗指示什么？"一个孩子指着 GNAC 的字母 C 天真地问。

"那是字母C,跟星辰没有关系,它是COGNAC这个词的最后一个字母。星星是指示方向的:东、西、南、北。现在是新月,因为月亮的弦峰朝西隆起。记住,上弦近望,下弦近晦。"

"爸爸,那么COGNAC要落了?因为C是下弦!"

"这跟升还是落没关系,那是SPAAK公司安上去的广告灯。"

"那么,月亮又是哪个公司安上去的?"

"月亮不是任何公司安上去的,是一颗卫星,永远存在。"

"月亮如果一直就在那里,那为什么要经常变呢?"

"月亮分四个月相,有时人们看到的只是它的一部分。"

"COGNAC不是也只能看到它的一部分吗?"

"那是因为皮埃贝纳尔蒂大楼太高。"

"比月亮还高吗?"

就这样,每当GNAC闪亮的时候,马科瓦尔多的星辰总是和地球上的商业广告纠缠在一起,解释不清。伊索丽娜却陶醉在这夜景中,把美妙的愿望融合在优美低吟的曼博舞曲中。那少女消失在迷茫暗淡的天窗里,霓虹灯的光亮掩盖了她对费奥达利吉终于鼓足勇气送去的飞吻的答覆。塔尼莱和米凯利诺两掌合拢,形成一个飞机上的机关枪,举在面前,朝着二十秒钟后就要熄灭的耀眼的霓虹灯打去,哒、哒、哒……

"哒、哒、哒……爸爸,你看见了吗?我只一梭子就把它给打灭了。"塔尼莱高兴地说。然而,窗外的霓虹灯又重新亮起来,他那幻想中的战斗的胜利破灭了,他的眼睛里充满了睡意。

"但愿把它打灭了!"父亲情不自禁地说,"这样的话,我指给你们看狮子星座、双子星座……"

"狮子星座!"米凯利诺顿时兴高采烈。"等一下!"他想到了一个主意。然后,他拿来弹弓,掏出经常装在口袋里的石子,安在弹弓上,用尽浑身力气向GNAC射去。

只听一阵石子像下冰雹似的落在对面楼顶的瓦上和屋檐的铁

皮上，一扇被击中的窗户的碎玻璃和弹回来的石子落下来，打在路灯的灯罩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路上一个声音高叫着："下石头子！喂，楼上是怎么搞的，混蛋！"石子飞过去的时候，亮闪闪的霓虹灯熄灭了，这正好是二十秒钟的最后一秒钟。阁楼里的一家人在默默地数着：一、二、三……十、十一，数到十九的时候，大家粗粗地吸了一口气，又接着数了二十，数了二十一、二十二。然而，GNAC没有亮，他们都担心是不是自己数得太快了。不，并不快，GNAC再也没亮起来，在广告牌的框架上左盘右旋的字母变得模糊不清，漆黑一团，宛如缠绕在棚架上的葡萄藤蔓。"啊！啊！"大家都惊讶地叫起来，布满星斗的天穹在他们头顶上完全显露出来了。

马科瓦尔多很想揍米凯利诺一巴掌，但胳膊刚抬起来，又停住了。他忽然感觉到，自己站在高高的阁楼里，仿佛飘飘然升到了奇妙的宇宙空间。夜的黑暗将阁楼罩在里面，像一个晦暗的屏障把高处和楼下另一个世界分隔开来。楼下，象形字体似的红色、黄色、绿色的霓虹灯仍在闪烁着光亮；交叉路口的信号灯交替地眨巴着疲倦的红色和绿色的眼睛，空空荡荡的有轨电车沿着明亮的轨道急匆匆地跑着；模糊不清的汽车推着两道圆锥形的光柱向前移动；现在，从楼下这个世界只能映到阁楼上散乱的犹如烟雾的磷光。抬头环视，再也不会感受到强烈灯光的刺激了。开阔的空间映入眼帘：天穹像一个无限大的球体囊括一切，无边无际。微小发亮的星星镶满天穹。只有金星闪烁着爆发性的集聚的光亮，从云罅中钻出来，镶嵌在天和地交接的地方。

一弯新月挂在空中，只探出半个脸来。地球遮掩了太阳的光辉，只有太阳的斜光照射在月亮的四周，然而月亮依然显露出一个不透明球体的自然容貌，依然反射出生动的光辉。这种情景，只有在初夏之夜才能看到。马科瓦尔多深情地凝视着月亮：阴影和光亮把月亮分成黑白分明的两个部分，明亮的月牙宛如一个狭长的

静谧的海岸。他心里油然泛起一丝留恋和向往的感情，多么希望在幽静的夜晚来到这奇迹般的阳光明媚的海岸啊。

马科瓦尔多一家人久久倚在阁楼的窗户上眺望。孩子们对自己的举止所带来的无法估量的后果感到惊讶。这时，伊索丽娜触景生情，心醉神迷。费奥达利吉凝视着明亮的小天窗和那月色少女的微笑。母亲催促着他们：

"孩子们，离开这里吧！夜已深了，你们还站在这里干什么？这样的话，你们会生病的。"

米凯利诺一边举弹弓，一边说：

"你们看着，我来把月亮也打灭！"然而，他已经被母亲抱住，送到了床上。

这天晚上和第二天晚上，阁楼对面楼顶上的霓虹灯只剩下SPAAK-CO几个字母在发亮，但在马科瓦尔多的阁楼里可以看见美妙的天空。费奥达利吉和月色少女互送着飞吻，也许默默的交流已经帮助他们成功地定好了约会。

第三天上午，两个穿着工作服的电工出现在对面楼上霓虹灯的框架中间，检查灯管和电线。马科瓦尔多将头伸到窗外，看着这情景，忧郁地说：

"今天晚上又是GNAC的夜晚。"那种神情很像一个善于预言天气的老人。

有人在敲阁楼的门。房门打开了，走进一个戴眼镜的先生。他对马科瓦尔多说：

"请原谅，能从你们的窗户看看吗？多谢，多谢！"戴眼镜的先生又自我介绍，"我是戈迪弗雷多博士，霓虹灯广告公司的专员。"

"真糟糕，霓虹灯被我们打破了。他们肯定要我们赔偿损失！"马科瓦尔多暗想，眼睛盯着几个孩子，好像要一下子把他们吞下去，却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天文学对孩子们的魅力。

"他只要从窗口一望就会明白，石子是从这里飞过去的。"他想

到这里，抢先站在窗前，哀求说：

“您看，是孩子们，他们随便拿石子打麻雀玩，不知道石子怎么会打到那里，把 SPAAK 公司的霓虹灯广告给打坏了。我已经狠狠地揍了他们一顿。唉，先生，如果我已经狠狠地揍了他们的话……您尽管放心，保证以后再不出现这种事。”

戈迪弗雷多博士聚精会神地听着，认真地说：

“说真的，我为 COGNAC TOMAWAK 公司工作，不是为 SPAAK 公司做事。我是来观察一下能不能在这座楼顶上安一个广告灯。不过，请您继续讲下去，您讲的，我很感兴趣，请您讲下去。”

就这样，半个钟头以后，马科瓦尔多与 SPAAK 公司的竞争对手 COGNAC TOMAWAK 公司达成一项协议：只要 SPAAK 公司的广告灯一亮，孩子们就用弹弓把 GNAC 打掉。

“SPAAK 已经是溢到缸外的一滴水，很快就会干涸。”戈迪弗雷多博士说。

他没有说错：的的确确，由于沉重的广告费用，SPAAK 公司已经债台高筑，濒于倒闭的边缘。而且，在 SPAAK 公司自己看来，该公司华丽的霓虹灯广告接连不断地损坏也是不祥之兆。广告灯有时是 COGAC，有时是 CONAC，有时又成了 CONC，这给 SPAAK 公司的债权人造成混乱的感觉，思想上敲起了警钟。后来，连广告公司也拒绝修复连续不断损坏的霓虹灯了，如果 SPAAK 公司不付清旧账的话。最后，SPAAK 公司破产了。

在马科瓦尔多阁楼的上空，一轮满月洒下金色的光辉。

月底的一天，几个电工又出现在阁楼对面的楼顶上。那天晚上，比原先高一倍宽一倍的火红字体 COGNAC TOMAWAK 闪烁着刺眼的光辉。从此以后，金色的月亮惨淡无光，亮晶晶的星星失去了踪影，无限辽阔的天穹和无比美好的夜景消失了，只有 COGNAC TOMAWAK，COGNAC TOMAWAK，COGNAC

TOMAWAK,每两秒钟一次,一次亮两秒钟。

马科瓦尔多一家人中受打击最大的是费奥达利吉,他再也看不见那月色少女含着甜蜜微笑的脸蛋:那扇天窗消失在巨大的没有一点空隙的 W 字母的背后。

马科瓦尔多逛超级市场

一到傍晚六点，整个城市就成了消费者的天下。

一整天来，劳动者的主要活动是生产：生产消费品。一到钟点，像电路上的保险丝一下子断了一样，生产活动停了下来，一个个洗洗手，走了，都投身到消费活动之中去了。每天一到时刻，灯火通明的玻璃窗里，五光十色的商品展现在消费者面前：一串串粉红色香肠挂在那里；摆成塔形的瓷盘顶到了天花板；一匹匹衣料抽出一角，拼凑组合，像孔雀开屏。消费大军涌进市场，他们拆卸这一切，侵蚀这一切，攫取这一切。望不到头的一字长蛇阵在所有的人行道上和门廊下蠕动，穿过玻璃大门，延伸到商店里，围在货架旁。人们的手臂你抬我放，我推你碰，使那长蛇阵的蠕动像是由活塞的曲杆在推动前进。

快来买吧！你看，他们拿起商品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拿起来又放下，那是多么好看；快来买吧！你看，面色苍白的女售货员在货架边口若悬河，夸耀商场的床上用品，那是多么动听；快来买吧！你看，那一团团五颜六色的线团像陀螺似的在转，一页页花纸像长了翅膀在飞，花纸把人们买到的商品包成小包，小包外又有中包，中包外还有大包，每包又用那五颜六色的绳子捆起来，结上蝶式花结，那又是多么漂亮。大包、中包、小包、小小包，一齐涌到付款台前停了下来。一根根手指又在一个个小包里搜寻，寻找零钱。下边，在那林立的陌生人的腿和裙裤中间，松开手的孩子们张皇失措地哭喊着。

就是在这样一个傍晚，马科瓦尔多带着一家人出来散步。他们没有钱，这散步只不过是看看别人花钱买东西；不过，钱这东西流通得越快，也就越有可能有那么一部分流进不抱希望的人手里："迟早总会有那么一点点落入我的钱包。"可是对马科瓦尔多来说，他不仅工资少，而且人口又多，分期付款的钱要交，欠的债要还，因此，钱一到手马上就又流走了。不管怎么说吧，看看别人花钱也不错，特别是在超级市场。

这个超级市场的货物是自拿自取的。门口停放着铁丝编的小货车，上面很像篮子，下面装有车轮，每个顾客都可以推上这么一个小车，把要买的货放进去，最后出来的时候到付款台算账付款。马科瓦尔多进去时只推了一个这样的小车，他的妻子、四个小孩子也都各自推了一个。这样，一家人一人推一辆小货车鱼贯而行，在那些摆得像山一样的食品架之间漫步。他们指指香肠，摸摸奶酪，念叨着它们的名字，像是在人群中辨认老朋友的面孔，或者熟人的面孔。

"爸爸，我们可以拿这个吗?"孩子们几乎每分钟都提出这样的问题。

"不行，不能动，禁止抚摸。"马科瓦尔多回答说，他时刻都记着，转这一圈之后，最后等着他的将是算总账的收款员。

"怎么那边那位太太拿了?"孩子们纠缠着不放，他们看到那些优雅的太太在选购。

这些太太到超级市场来，本来可能只不过是为了买两个胡萝卜和几棵芹菜，但是，面对着这罐头摆起的金字塔，也不由自主地选购了。于是，咚咚咚！一盒盒西红柿酱、糖渍桃子、油浸鳀鱼掉进了她们的小车；她们取这些东西时像是漫不经心，又像是听从什么命令。

总之，如果你的车是空的，而别人的车是满的，那么，你只能忍耐到一定程度，然后你会感到嫉妒，感到伤心，于是再也不能忍耐

下去。这时，马科瓦尔多在吩咐他的妻子和孩子们都不要乱动之后，快步来到货架之间的一条过道，货架挡住了家人的视线。于是，他从货架上拿下一盒蜜枣，放进了自己的小车。他只想过过瘾，推着这盒蜜枣转上十来分钟，也像别人一样显示显示自己购买的货物，然后再把它放回原处。除了这盒蜜枣之外，他又拿了一个红瓶装的辣酱、一袋咖啡和一个蓝色袋子装的挂面。马科瓦尔多知道，只要小心一点，他至少可以推着这些货转上一刻钟，饱尝善于选择商品的人的甜丝丝的滋味，同时又不必付一分钱。但是，孩子们要是看到了，那就糟了！他们会立即效尤，最后如何收场，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马科瓦尔多时而跟着忙忙碌碌的女售货员，时而又尾随珠光宝气的阔太太，在货架间拐来拐去，尽量设法不让家里人看见。像这位太太或那位夫人一样，他模仿着，伸手拿起一个香喷喷的金黄色的甜瓜，或者一块三角形的奶酪。喇叭在播送着轻快的音乐，顾客们随着音乐的节拍或进或停，跟着节拍准确地伸手，拿起货，放进小车，一切随着音乐进行，显得那么和谐、自然。

现在，马科瓦尔多小车里的货物已满满当当，他的双脚又把他带到了一个顾客很少的地方。这里的商品名称越来越让人摸不清头脑，而且又装在盒子里，虽然盒上画着图形，但这图形使你弄不清是莴苣用的肥料呢，还是莴苣籽，是莴苣呢，还是毒死莴苣上虫子的毒药，是引诱鸟类来啄食这些害虫的诱饵呢，还是拌凉菜或红烧野味用的调味品。管它是什么，马科瓦尔多反正要拿它两三盒。

他就这样在两排高高的货架中间转着。突然，货架夹成的过道结束了，前边是一片没有一个人的空场，霓虹灯照着反光的地板。马科瓦尔多站在那里，只有他一个人和他的货车，空场对面是付款台和出口。

这时，他发自内心的第一个想法是，推着他的像坦克一样的货车低头猛跑过去，在女店员还没有来得及按警铃之时就推着他的

这车货跑出超级市场。但是，就在这时，从邻近的另一个过道口出现了一辆比他的车装得还要满的货车，推车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妻子多米娣拉。从另一边又出现了第三辆货车，菲利佩托正用尽他浑身的力气推着前进。原来，这是众多货架间的通道会合的地方，从每个通道都走出马科瓦尔多的一个孩子，每个人都推着满载货物的小车，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想法。现在，他们会合了，他们发现，把他们的物品集中到一起，简直就是这个超级市场的所有货物的样品。

"爸爸，这回我们可富了吧？"米凯利诺问，"够我们吃一年了吧？"

"向后转！快！躲开付款台！"马科瓦尔多边喊边来了个向后转，推着他的货车藏到了货架间；他又赶紧后退了两步，像是躲开敌人的枪口，退入通道不见了。他身后发出一阵轰响，他转过身，看见全家人个个推着自己的货车，组成一列小小的火车，紧跟着他奔跑过来。

"一算总账得要我们上百万！"

这个超级市场很大，通道七拐八弯像个迷宫：他们可以一小时一小时地转下去。市场货色齐全，马科瓦尔多一家人可以在里面度过整整一个冬天不必出来。偏偏就在这时，市场的喇叭停止播送音乐，开始广播说：

"顾客请注意，再过一刻钟，市场将停止营业，请赶紧到付款台付款！"

现在是把车上的货物放还原处的时刻了：要么现在还，要么永不再还。在广播喇叭的催促之下，成群的顾客忙乱起来，好像剩下来的几分钟是全世界最后一家超级市场的最后几分钟了，那种忙乱好像是，不知是把这里的一切都拿个干净呢，还是不去动它们。总之，货架柜台前一片熙熙攘攘。马科瓦尔多、多米娣拉和他们的孩子利用了这阵混乱，把货物放回货架，或者趁机塞进别人的货

车。他们把货物放回去时弄了个乱七八糟:捕蝇纸放到了火腿架上,卷心菜放到了点心架上,真是牛头不对马嘴。他们没有注意,有位太太推的不是货车,而是个婴儿车,他们竟给人家的婴儿车里塞了一瓶酒。

不用说,把这些连尝都不曾尝一口的东西放下,实在令人痛心,催人泪下。然而,在他们把一桶酱放回货架时,一串香蕉掉在手上,他们拿了起来;或者,放下一把塑料扫帚,拿起一只红烧鸡。就这样,他们的货车越卸反而越满了。

一家人带着他们的战利品,沿着循环电梯,上上下下来回转,每一层都遇上女收款员把守出口,她们面前的计算机正对着他们,而且噼啪作响,像一挺挺机关枪面对着要出去的人。马科瓦尔多一家人转啊转啊,那情势越来越像是笼中的野兽,或者像囚犯在墙上贴着花格纸、被照得通明的房间里漫无目的地乱转。

突然,一个地方,墙上的花格纸被揭掉了,一个梯子靠在那里,旁边放着铲子、木匠和泥瓦匠用的工具。一家建筑公司正为扩大这个超级市场进行施工。看得出来,下班之后,工人们把一切工具就地一放,回家去了。马科瓦尔多推着他的货物从墙上的这个洞里钻了出去。外边一片漆黑,他试探着向前走。一家人推着车紧紧跟在他身后。

货车的胶轮在一段揭掉路面的沙土路上跳动着,然后又是一段瓷砖尚未铺平的地面。马科瓦尔多抬起两个轮子,只用一个轮子着地,尽力把握平衡;他们也模仿着他的样子跟在后边。突然,他们看到,他们的前后上下投来了探照灯光,周围是一片空虚。

原来他们走到了一个施工脚手架上,有七层楼高。在他们脚下,城市展现出一片灯火,有从窗户透出的灯光,有广告招牌的灯光,有电车线的亮光。在他们的头顶,天空布满星斗,另外还有电台天线塔顶的一盏红灯。脚手架在他们那些危险地堆满货物的推车重压下摇摆起来。米凯利诺惊呼了一声:

“我怕！”

黑暗中，一个黑影移动过来。一张大嘴一边从钢铁的脖颈上伸过来，一边大张开来，可嘴里却没有牙齿，待伸到近处一看，原来是一个大吊车。吊车对着他们降下来，到了他们所在的高度停下，铲斗的下颚正好对着脚手架。马科瓦尔多把车一倾，把货物倒进了铁铲斗，一步跨了过去。多米娣拉也照样行事；孩子们也模仿他们的父母，吊车的铲斗合上了，把从超级市场挑来的所有货物全吞了进去，吱嘎作响地沿着它的钢铁脖颈缩了回去；然后向远处移去。

下面，五颜六色的灯光组成的广告仍然亮着，转着。那广告的内容正是邀请人们到这个大型超级市场来购买货物。

糕点店的盗窃案

德里托来到预先约定的地点时，杰苏班比诺和沃拉-沃拉已经在这里等他好半天了。夜色深沉，万籁俱寂，静得在街上都能听见沿街居民家里的钟摆声。今夜他们要在两个地方行窃，所以行动要迅速，以免天亮的时候被人发现。

“我们走吧！”德里托说。

“上哪里？”另外两人问道。

“走吧！”德里托这个人对于他想要行窃的目标从来守口如瓶。

像干涸的河流一样空荡荡的大街上，他们三人在清冷的月光下快步向前走去。德里托走在最前面。他的黄眼睛不停地转动着，鼻孔微微翕动，仿佛在嗅着什么。

杰苏班比诺身材矮壮，人们称他为杰苏班比诺，大概因为他的脑袋和新生婴儿的脑袋差不多大[①]，头发剪得很短，漂亮的脸孔上蓄着乌黑的小胡子。他浑身的肌肉舒张自如，活动起来像猫一样轻捷、柔韧。要论攀登高处或蜷曲身子的本事，任何人都比不上他。因此每当德里托带他出去，肯定是要派他用场的。

“德里托，你说这回油水大吗？”杰苏班比诺问道。

“如果干的话……”德里托心不在焉地回答。

他们在街上拐弯抹角，只有德里托一人清楚要去什么地方。不一会，德里托带他们拐进了一座院子。他们立刻明白了，在商店

---

① 杰苏班比诺(Gesubambino)这个词的意思是“圣婴”。

的后屋要有事情做了。沃拉-沃拉赶忙走到他们的前面，因为他极不愿意被派去望风。沃拉-沃拉就是望风的命，他的梦想是像同伙一样，能进到屋里捞一把，把口袋塞得满满的。可是每次行动，总是轮到他站在寒冷的大街上望风，时时冒着被夜间巡逻警察捉住的危险，经常冻得浑身抖颤，牙关磕打，手脚还得不时地活动，以防冻僵，嘴里叼支香烟，装装样子，也借此壮壮胆。沃拉-沃拉是西西里岛人，瘦高的个子，经常哭丧着脸，总带着一种黑白混血人特有的忧伤表情，手腕裸露在袖口的外边。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每当要偷东西时，他全身穿戴都很讲究，帽子、领带和风雨衣穿着得整整齐齐。一旦出现情况要逃跑，他就用双手提起风雨衣的左右下摆，仿佛是要张开双翼飞腾似的。

“沃拉-沃拉，望风去！”德里托翕动着鼻孔吩咐道。

沃拉-沃拉悻悻地离开了。他心里明白，如果他不服从，德里托会继续翕动鼻孔，而且越来越快。一旦动作中止，德里托的手枪就会对准他的脑袋开火。

“喏！”德里托招呼杰苏班比诺。杰苏班比诺顺着德里托的目光看见了一扇离地较高的窗户。窗户的玻璃早已被打坏，上边只糊着一张硬纸板。

“你爬上去，跳进屋里，然后给我打开门。”德里托命令杰苏班比诺，“注意千万不要开灯，不然外边会发现的。”

杰苏班比诺非常敏捷地攀登了上去，宛如猴子爬光滑的墙壁一样利落，他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就把纸板捅破，把脑袋探了进去，这时他嗅到一股气味，他使劲吸了几口气，顿时一种糕点的特殊甜香钻进了他的鼻孔。此时此刻，他体验到一种极端的冲动，这比他每回渴求尽快、尽多获得赃物的欲望还要强烈得多。这是一种他从未体验过的抓心挠肝的急切感。

“这里面一定有甜点心。”他心里这样想。

他已经有许多年，或许从战争爆发以前，就没有尝到这些应当

吃到的美味点心了,这一回若不尝到甜点心,他肯定是不会罢休的,他跳进屋里,里面漆黑一团,他一脚踩上了一部电话机,一把扫帚插进裤筒里,然后又倒在地上。甜食的味道愈来愈浓,但他仍然弄不清楚是从哪里散发出来的。

"这里的糕点一定特别多。"杰苏班比诺心里想。

他伸出一只手,在黑暗中摸索着去给德里托开门。突然,他的手缩了回来,心里感到一阵恶心,他觉得手指触摸到一个又柔软又黏糊的东西,很像是个海生动物。他的手停顿在半空中,手上滑溜溜又湿乎乎的,就像碰到麻风病人糜烂的肉体,滑腻得令人心里发麻。他觉得手指间好像还夹住了一个圆圆的东西,像是瘤子,可能还是毒瘤。他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但眼前依然是沉沉的黑暗,伸手不见五指。尽管两眼一片黑,鼻子却能闻得到气味。他终于明白,他碰到的并不是什么动物,而是甜美的蛋糕,手上沾的是奶油,指间夹住的是一只蜜饯樱桃!

他赶紧伸出舌头去舔自己的手,另一只手继续向四周摸索。触到一个结实而又柔软的东西,表面有薄薄的一层细颗粒。啊!这是油炸煎饼!他一面不停地摸索,一面把煎饼整个塞进嘴里。"嘿!"他不禁惊奇得叫出了声,因为发现饼里面还有果酱。这地方太棒了,无论把手伸到哪里,都会摸到各式各样的糕点。

杰苏班比诺忽然听见离他很近的地方,传来一阵叩门声,这是德里托在外面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杰苏班比诺赶紧蹑手蹑脚地向发出响声的地方走去。他的手先是碰到蛋白夹心饼,随后又伸到杏仁甜食里。门打开了,德里托用袖珍手电筒照了一下他那胡子上还沾着奶油的脸。

"这里全是点心。"杰苏班比诺赶忙说道,生怕别人不知道。

"现在不是谈点心的时候,"德里托绕到他的身后冷冷地说,"没时间废话!"

凭借手电筒的一缕光柱,他们在半明半暗中向前走去。无论

电筒照到什么地方，眼前出现的都是一排排的货架，架子上摆着一排排的托盘，上面放着各种形状、五颜六色的点心。有奶油蛋糕，那厚厚的奶油的光泽宛若点燃的蜡烛流淌下来的白蜡，还有一组组排列整齐的大面包和堆成一座座古堡似的果仁饼。

杰苏班比诺忽然产生一种强烈的惊恐的感觉：他害怕来不及饱餐一顿，在未品尝所有品种的糕点之前就不得不逃走，惟恐他眼下享有的幸福在他的生活中仅仅持续短暂的瞬间。他看到的糕点越多，他的这种惊恐感就愈加强烈。随着手电筒的移动而展现的新的储藏间和新的糕点仿佛都横挡在他的面前，使他寸步难移。

他急不可耐地扑向货架，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他每次都硬往嘴里塞进两三块点心，也根本顾不得品尝什么滋味了，似乎这些糕点是穷凶极恶的顽敌，是离奇古怪的妖魔，把他团团包围了，他正同它们进行着激烈的搏斗厮杀，他必须借助下巴颏去奋力突破这个由各色糕点组成的包围圈。半切开的面包张开黄色的大嘴和无数只小眼睛，向他扑过来，奇形怪状的圆面包像食肉植物的花朵一样开放着。此时此刻，杰苏班比诺竟恍然觉得自己被点心吞噬了。

“保险柜，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保险柜！”德里托拽了一下他的胳膊说。

德里托一边往前走，一边顺手牵羊地时而拿一块多味点心，时而又把一只蛋糕上的樱桃塞进嘴里，然后又啃几口奶油蛋糕。他的动作异常麻利，尽量不耽误他的主要任务。他关闭了电筒。

“外面很容易发现我们。”他说。

他们走进糕点店的售货厅，那里摆着玻璃柜台和大理石的桌子。路边的街灯映得屋里明晃晃的，因为商店的保险铁门是网状的，只要用手在眼睛上面稍微遮住一点光亮，便可以看见外边的房子和树木。

“现在该撬保险柜了。”

“你这么拿着。”德里托把手电筒交给杰苏班比诺,要他把电筒朝下拿着,以免外面看到光亮。

德里托全神贯注地用铁棍撬着锁,杰苏班比诺乘机捞起一大块葡萄干糕饼,马上像吃面包似的大口咬了起来。但他很快就腻烦了,随手就把刚吃了一半的糕饼扔在桌子上。

“把电筒举高点!你这蠢猪干什么呢!”德里托咬牙切齿地斥责杰苏班比诺。虽说这种行当声名狼藉,但德里托喜欢有条不紊地去干,从来不马马虎虎。可这一回连他自己也禁不住欲望的诱惑,便往嘴里塞了两块饼干。一块是萨沃依饼干,一块是巧克力饼干,但始终不停下手里的活计。

杰苏班比诺用一块块果仁饼干和托盘上的垫布搭成一个灯罩,把两只手腾了出来。他看到一些蛋糕上用奶油写着“庆贺命名日”的字样。他环顾四周,琢磨着如何下手,他先用手指头在每个蛋糕上抠一点巧克力奶油,然后把手指舔干净,末了,他想出一个好主意,几乎把脸孔埋进蛋糕里去,开始从蛋糕的中心逐个地咬上一口。

他陷入了狂热的境界,简直不知道如何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竟然找不出把所有的蛋糕都尽情享用一番的办法。现在,他索性趴在桌子上,把许多蛋糕压在身子底下。他真恨不得扒光衣服,赤条条地躺倒在蛋糕上,美美地睡上一觉,再在上面翻几个筋头,永远也不离开。可惜,再过五分钟或者十分钟,一切都将成为过去。他或许今后一辈子再也不会和糕点有缘分了,只能像小时候那样把鼻子紧紧贴在点心店橱窗玻璃上,可怜巴巴地望着蛋糕。如果在这里至少能待上三四个小时,那该有多美呀!

“德里托,”他问道,“快天亮的时候我们再离开不行吗?难道会有人发现我们?”

“别冒傻气啦!”德里托已经撬开保险柜,正在一堆钞票中翻找什么,“在巡警到来之前必须离开这里。”

恰恰在这个时候，响起了敲玻璃的声音。月光下，只见沃拉-沃拉把手伸进金属拉门的网眼里直接敲打着玻璃。店堂里的两个人立即惊恐地跳了起来。沃拉-沃拉赶忙打手势要他们不要惊慌，并用手比划着，表示想和杰苏班比诺调换一下。屋里的两个人向他挥舞拳头，示意叫他赶快离开商店门前，如果他不是发疯的话。

德里托此时发现保险柜里只有几千里拉，不由骂了起来，又向并未给他帮上忙的杰苏班比诺发了一通火。杰苏班比诺似乎已无法控制自己了，他用嘴咬着果馅奶酪卷，一个一个地摘着蛋糕上的甜葡萄吃，用舌头舔着糖浆，葡萄汁弄脏了衣服，还溅到柜台的玻璃板上。他对甜点心已经感到有点腻烦了，胃里的酸水开始往上翻腾，而且伴随着要呕吐的感觉。他恍惚觉得，那些油炸煎饼化成了海绵块，鸡蛋饼变成了灭绳纸。他眼前展现的全是一具具糕点做就的尸体，在殓尸布上腐烂着，或是在他的胃里溶化成混浊的浆糊。但他还是不甘心也无法就此罢休。

德里托怀着一腔被人愚弄的怒火，又转身去撬另一只柜子。此时他顾不上自己饥肠辘辘，面前的糕点对他已失去了任何诱惑力。沃拉-沃拉从商店的后屋走进来，嘴里骂骂咧咧，嘟囔着谁也听不懂的西西里土话。

“有巡警?!”其他两人吓得面如土色。

“我们换换，该换人了!”沃拉-沃拉仍用土话嘟囔着，不断地发出“哼、哼”的声音，来表示他对不公平待遇的愤慨：他们两个在屋里饱餐一顿，而让他一个人在严寒中挨饿。

“快走！望风去!”杰苏班比诺生气地吼道。他自己吃饱了，这使他变得更自私、更刻薄。他惟恐这种甜美的享受被人搅扰。因此他对沃拉-沃拉的要求感到非常恼火。

德里托心中明白，给沃拉-沃拉调换一下是合情合理的，但他也知道，杰苏班比诺是不会轻易被说服的，而没有人在外望风，这里就一分钟也不能再待下去。因此，他掏出手枪，对准了沃拉-沃

拉。

“赶快回到你原来的位置上去，沃拉-沃拉！”他命令道。

沃拉-沃拉眼看希望落了空，满心沮丧，刚要转身离开，但转念一想，何不趁机拿些糕点再走呢。于是，他双手抓了好几块松子杏仁饼。

“笨蛋！如果你手里拿着糕饼被他们抓住，那你怎么解释呢！”德里托厉声斥责他，“给我全都放下，赶快滚！”

沃拉-沃拉委屈地哭了。杰苏班比诺此刻心里起了厌恶他的感觉，顺手抄起一盒祝贺生日的蛋糕向沃拉-沃拉掷去。沃拉-沃拉本来完全来得及闪开，可他非但不愿躲避，反而乘势把脸往前凑去，让整个蛋糕都糊在自己的脸孔、面颊、头发、领带上。他快活得笑了，转身跑了出去，忙用舌头舔着粘在嘴巴四周的蛋糕，舌尖一直舔到鼻子和颧骨。

德里托终于撬开了贵重的柜子，开始往口袋里装钞票：他的手指沾上了果酱，黏黏糊糊，他气得直骂娘。

“快点，我们该走了。”他对杰苏班比诺说道。

可是，杰苏班比诺并不想把这大好时机轻易地放过去，因为这一顿美餐足够他日后向其他同伙和玛丽·托斯卡娜炫耀许多年的。玛丽·托斯卡娜是杰苏班比诺的女友。她的腿颀长而光滑，身材和脸庞却有些像马似的。杰苏班比诺喜欢她，因为他随时可以像一只大猫似的蜷曲地趴在她的柔软的肉体上。

沃拉-沃拉又进来了。他的第二次出现打断了杰苏班比诺的遐想。德里托掏出了手枪，沃拉-沃拉见状赶紧报告说：“巡……巡警来了！”说完撒腿就往外跑，双手还紧紧提着风雨衣的下摆。德里托捡了最后几叠钞票，三步并作两步跑到门口，杰苏班比诺落在了后面。

杰苏班比诺还在想着他的玛丽，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才想起来，他应当带些糕点给她吃，因为他从未送过她什么礼物，而当她

知道他在糕点店饱餐一顿却空手而归时，会大发雷霆的。他又踅了回去，偷了一些用糖、蜜饯和巧克力制成的蛋糕，塞在衬衣里面，紧贴着前胸，但他马上意识到这蛋糕太软了，又手忙脚乱地找了一些比较硬的糕点，揣在怀里。蓦地，他瞥见商店玻璃窗上有警察的影子晃动。警察发现有人正往胡同口奔逃，其中一名警察朝着那个方向开了一枪。

杰苏班比诺急忙藏身在椅子后面。警察们没有击中目标，显得很失望，他们往路旁的商店里张望。突然，他们发现这个店铺的门是敞开的，便都走了进来。顷刻间，店里挤满了荷枪实弹的巡警。杰苏班比诺猫着腰蹲着，怀里蛋糕上的蜜饯水果挤了出来，为了不让它掉下来发出响声，他赶忙把香橼果和甜梨吞进肚里。

巡警们察看着被窃现场和货架上横七竖八的糕点，下意识地不时用手捏起几块散落的点心放进嘴里。他们的动作格外小心，怕搞乱了破案线索。几分钟过后，这些本该缉拿罪犯的警察，便都无所顾忌地狼吞虎咽起来。

杰苏班比诺也趁机大口大口咀嚼着，但警察们比他吃得还起劲，也就盖过了他的咀嚼声。杰苏班比诺感到前胸和衬衣之间有种黏稠的液体在流动，他又产生了要呕吐的感觉。怀里的蜜饯汁把他搞得惊慌失措，所以过了好一阵他才发现通往门口的路是畅通无阻的。至于那帮警察嘛，事后自然可以编造说，他们看见一只花脸猴子，因迷路跑到店里来了，弄坏了盘子和蛋糕。当警察们终于清醒过来，从包围他们的各色糕点中挣脱出来的时候，杰苏班比诺早已无影无踪了。

杰苏班比诺找到了玛丽。当他解开衬衣时，胸前的蛋糕已变成一种新奇的什锦糕饼。他们在一起一直待到天亮，他们躺在床上，一点一点舔着，一块一块地吃着，把奶油舔得一干二净，把蛋糕吃得一点渣子也没剩。

弄错了的车站

对于那些居住条件糟糕得令人厌恶的人来说，寒冷的夜晚最理想的去处自然是电影院。马科瓦尔多迷上了彩色电影，因为巨大的银幕足以展示最宽广的画面，辽阔的草原，连绵的山峦，非洲的丛林，鲜花遍野的岛屿。他每一部影片都要连看两遍，直到电影院关门他才不得不离开，但他的脑海里依然萦绕着那些自然景观，他似乎依然在呼吸着那些鲜花绿草的芬芳。

在这个细雨濛濛的夜晚打道回府，在车站等待30路电车，突然苏醒的意识：他的人生风景，仅仅是电车、红绿灯、半地下室、煤气炉、晾晒的衣服、仓库、包装间——这一切，顿时使他方才感受到的电影的辉煌，化作了一团失去光泽的、灰暗的愁云惨雾。

那天晚上，马科瓦尔多看的影片是描写发生在印度森林里的故事：从沼泽的灌木丛升起迷茫的烟雾，蛇群顺着藤蔓爬行，盘踞在莽林掩盖的古老寺庙的雕像上。

走出电影院，马科瓦尔多睁眼朝街上望去，随即又闭上眼睛，而后又睁开。他什么也看不见，绝对是什么也看不见，真是伸手不见五指。他在电影院里的时候，一场大雾降临城市上空，这场雾浓密、厚重，吞噬了世间万物，消融了一切声音；大雾把空间压扁了，使它丧失了距离和范围，它把亮光驱入黑暗，使之变成了失去形态的、捉摸不定的点点光斑。

马科瓦尔多不由自主地朝30路电车站走去，一头撞上了一块广告牌。此刻，他反倒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浓雾把周围的世界一

笔勾销了,他得以把银幕上的种种景象保留在自己的视觉里。寒冷也有所缓和,云雾仿佛一条毛毯,几乎把城市包得严严实实。马科瓦尔多裹紧他的大衣,他觉得自己得到了外界感觉的神助,他如今仿佛在真空中滑翔,并且能够用印度、甘地、丛林和加尔各答的形象来给这真空粉饰润色。

电车驶过来了,发出缓慢的铃声,活像一个幽灵。周围的东西全是模模糊糊地存在着,马科瓦尔多坐在电车的最里边,背朝其他乘客,盯视窗外,偶尔有一些朦胧的光点和比黑暗还要黑的影子,穿过虚无的夜色。这一切,对于那个晚上的马科瓦尔多来说,真是美妙之极的机会,他可以借此睁着眼睛做梦,不管走到哪里,他都可以在眼前这广阔无边的大银幕上永不停歇地放映电影。

他这么想入非非,竟没有注意电车驶过的车站。他突然问自己,眼下到了什么地方;他扭过身来,只见车厢里已几乎空空的。他透过窗玻璃仔细察看,琢磨窗外隐隐闪过的光点,终于断定,下一站他该下车了。他赶忙跑到车门口,匆匆下了车。

他打量周围,试图找到一个认路的标记。他的眼睛能够搜集到的少许的光和影,却无法构成他熟悉的地点。他下错了车站,他不知道,他现在身在何处。

如果碰上一个行人就好了,可以请他指点路径。不过,在这样偏僻的地方,又遇到这样的鬼天气和时候,简直连一个人影也没有。末了,马科瓦尔多终于看见了一个影子,便等待他走过来。不过,他越走越远了,也许他穿过了马路,或者他只是在马路中间行走,也可能他并不是什么行人,而只是一个骑车人,骑着一辆没有车灯的自行车。

马科瓦尔多高声喊道:

"劳驾!劳驾!请停一停!您能告诉我,潘克拉齐奥·潘克拉齐埃蒂大街在哪里?"

那影子继续朝远处移动,在几乎失去踪影的时候,回答道:

“朝那……”

可是马科瓦尔多没有听明白，他指的是什么方向。

“朝右还是朝左?”马科瓦尔多嚷道，可他也不知道，他是否是冲着虚无嚷嚷。

回答，或者说回答的尾声，传了过来：

“……方向!”

其实，由于彼此看不清楚对方的位置，所以即便那人影指出向左还是向右，也等于白说。

马科瓦尔多现在朝马路对面的人行道走去，那里不太远处闪现出一丝灯光，可实际的距离却很远，需要经过一个广场，广场中间是长满青草的安全岛，还有指示车辆转弯的箭头，这是惟一能辨认出来的标记。已是夜深时分，不过还应当有一两家咖啡店、酒店在营业。熠熠闪烁的招牌刚显出“酒吧”的字样，便倏然熄灭了。黑夜像一道金属帘门，瞬息间遮住了原先光闪闪的玻璃窗。他这时才明白，酒吧关门了，而且离他很远。

马科瓦尔多需要寻找另外的灯光来辨别方位。他朝前走去，但他不晓得，他走的路是否正确，他也不晓得，他去追寻的灯光，可就是方才闪现的灯光，或者它会出现在别的什么地点，或者干脆捉摸不定。他在一重漆黑的、又略呈乳白色的雾尘中行走，这雾尘是如此的细密，以致他觉得雾尘透过大衣，钻进了身子，他像掉进了一个筛子，像海绵吸水似的浑身浸透了雾尘。

他追寻到的灯光，原来是透过一家酒店烟雾迷蒙的玻璃门射出来的。酒店里座无虚席，酒吧柜前也站着人，也许是照明不佳，也许是大雾渗透了进来，这里的人影也显得模糊不清，就像电影里看到的古代或僻远地区的酒店。

“我要去……也许你们知道……潘克拉齐埃蒂大街……”他向顾客们打听。

酒店里一片喧闹，酒醉的顾客们大声狂笑，认定他也喝醉了。

他腼腆地提出的问题，他得到的回答，也同样是模模糊糊、含混不清的。为了暖暖身子，他起初向侍者要了，或者说那些站在酒吧柜台前的顾客吩咐他要了四分之一公升葡萄酒，随后，又是半公斤，几位顾客拍拍他的肩膀，又请他喝了几杯。总而言之，当他从酒店走出来的时候，他比原先更糊涂，更不清楚怎样走回家去了，大雾也比任何时候都更浓地淹没了茫茫大地和一切色彩。

拖着被酒暖热的身子，他走了足足一刻钟。走着走着，他不时觉得需要往左或往右走几步，以便掌握人行道的宽度，需要用手去摸摸店家的墙，如果他还确实沿着人行道行走，确实还有店家的墙的话。走着走着，他脑子里的迷雾好像稀淡了，而街上的迷雾则更稠浓了。他记得，酒店里的人指点他说，再往前走一段路，约摸一百米，然后再向人打听。不过，他现在不晓得，从酒店出来以后，他究竟走了多远，也许，他仍然是围着那安全岛转悠。

这里似乎是无人居住的地区，周围的砖墙很像工厂的围墙，拐角处竖着一块指示地名的路牌，可悬吊在马路中央的路灯无法把光线投射到路牌上。马科瓦尔多很想看清牌上的路名，便爬上了有着“禁止停车”标志牌的杆子。他从杆子的顶端探出身子，把鼻子贴近路牌，可地名的字迹已经褪色，他随身没有带火柴，否则只要擦亮一根火柴就可照见。路牌上方的那堵墙显得平坦、宽阔，马科瓦尔多从“禁止停车”标志牌的杆子上纵身一跃，登上了墙面。他站在墙的边缘，隐约看见一块发白的大告示牌。他沿着墙面的边缘向前走了几步，走到告示牌跟前，只见路灯照耀下，告示牌的白底上赫然显出几个黑字：“严禁行人通行”，可他竟没有从这块告示牌获得任何启示。

墙的边缘相当宽阔，可以放心大胆地在上面行走。说实话，走在墙上比走人行道还要好，因为路灯在黑暗中投下一条光带，正好照亮他的脚步。走了一段，墙消失了。马科瓦尔多迎面碰上了一根柱子，他拐了个九十度的弯，又继续朝前走去。

一路上，马科瓦尔多不断遇到拐角、凹角、岔口、柱子，他的行走路线呈现出不规则的图形。他不止一次地认为，那墙已经到了尽头，不料马上发现，它又朝另一方向延伸。弯弯曲曲地走了一程又一程，他已经晕头转向，不晓得该从哪里跳下去，重新回到马路上。跳下去……而如果墙和马路高低悬殊，那怎么办呢？他在一根柱子前蹲下来，试图察看一番墙下的情况，但没有任何光线能照见下面黑漆漆的一片。也许墙和马路的高低只有两米，可现在简直像是万丈深渊。他只得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

出路很快显现了。那是跟墙面相连的一片发白的平地，他踏上平地，走了几步，心想这也许是一座建筑的水泥屋顶，一直伸向黑暗深处。他马上后悔踏上了这块平地，如今他失去了任何借以辨别道路的标记，他离开路灯愈来愈远，他每走一步都可能走向屋顶的边缘，或者再往前，跌入虚无。

那虚无确实是无底洞。往下看，只见远处点点灯光闪烁，如果那是路灯，那么地面一定还在更深的低处。马科瓦尔多好像悬吊在一种难以想像的进退两难的空间。突然，上方显出了绿色和红色的灯光，排列成星座似的不规则形状。他抬起头察看这些灯光，不知不觉一脚踩空，径直朝虚无坠落下去。

“我完蛋了！”这一可怕的念头在他的脑子里闪过。说时迟，那时快，他却一屁股跌坐在一片柔软的地面上，他的双手触摸到了青草；他倒在一片草地的中央，安然无恙。那些低处的灯光，他起先曾觉得很远很远，原来是紧贴地面的无数串灯光。

贴近地面安装灯光是颇为少见的，不过倒也给他指明了道路，走路方便多了。眼下，他不再脚踩青草，而是脚踏水泥地，一条很宽的水泥道路穿过草地，被紧贴地面的那些灯光照得清清楚楚。周围，却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五彩的亮光在高空不时闪现和消失。

“水泥路总会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的。”马科瓦尔多暗自思忖，沿着水泥路走去。他走到一个岔路口，或者说交叉路口，每一条岔

路边都亮着贴近地面的小灯，路面写着斗大的白色数字。

他泄气了。周围平坦的草地和迷蒙的烟雾不见了。如今选择往哪个方向走还有什么意义呢？就在这时，他看见一束跟人一般高的光线闪动。他看见一个人，确确实实是一个人，好像穿着一套黄色工作服，双手挥动两块像火车站站长指挥列车运行的信号牌。

马科瓦尔多朝此人跑去，还没有到他跟前，便气喘吁吁地说道：

“喂，请您告诉我，在这样的大雾天气，我该怎么办？请听我说……”

“不必担心，”那位穿黄色工作服的人平静而热情地回答，“千米以上的高空没有雾，您尽管放心走吧，扶梯在那边，朝前走，其他人都上去了。”

这几句话虽然说得不明不白，可马科瓦尔多深受鼓舞。他特别高兴地听到，附近还有其他的人。他便不再多问什么，赶紧去追赶其他的人。

那穿黄色工作服的人神秘地预告的扶梯，其实是一张梯子，梯级很方便，两边挡板在黑暗中泛着银白色。马科瓦尔多登上了扶梯。在一扇小门的门坎上，一位小姐彬彬有礼地向他问好，他觉得这份温情不可能是向他表示的。

马科瓦尔多连声说道：

“向您致意，小姐！太好了！”

他浑身浸透了寒气和潮气，如今竟能找到一个休憩的场所，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他走了进去，一双眼睛被灯光照耀得睁不开来，他连忙眨巴眨巴眼睛。他发现这不是什么住家。那么，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呢？他相信他明白了，他走进了一辆公共汽车，这是一辆长长的、有很多空位子的公共汽车。他坐了下来。他平常不坐公共汽车，而乘电车回家，因为电车的票价便宜，但这一次他在一个僻远的地区迷

了路，这里只有公共汽车通行。真幸运，看来这是最后一班车，让他赶上了！座椅很柔软，舒服极了！马科瓦尔多现在意识到了，他以后将永远乘坐公共汽车，虽然乘客要受到某些限制，因为他此刻听到扩音器里宣布："请不要吸烟，请系上安全带……"还有，汽车启动时，发动机的声音太喧闹了。

一位身穿制服的人在座椅之间走动。

"对不起，检票员先生，"马科瓦尔多问道，"您可知道，潘克拉齐奥·潘克拉齐埃蒂大街可有一站？"

"您说什么，先生？第一站是孟买，然后是加尔各答和新加坡。"

马科瓦尔多环顾四周，只见其他位子上端坐着留大胡子、头上缠大头巾的印度人。也有个别的妇女，身裹绣花的莎丽服，额头上点着吉祥痣。

窗外，夜空里繁星点点。此刻，飞机穿过一层浓浓的云雾，正朝晴朗的高空飞去。

黄蜂疗法

冬天过去了,它给人们留下了风湿病痛。午间微弱的阳光给人们带来了欢娱,马科瓦尔多坐在公园里的一张长凳上看树枝发芽,以消磨时光,等着午后再去上班。一个穿着打满补丁的大衣的驼背小老头走过来坐在他的旁边:他是里齐耶利先生,已经退休了。他孑然一身,一个人生活,也是坐在长凳上晒太阳的常客。这位里齐耶利先生不时地抽动一下身子,嘴里喊着:“哎哟!”他裹在大衣里的身躯显得更驼了。冬天的寒冷和潮湿使他落下了风湿病、关节炎和腰痛病,病魔一年到头不断地折磨着他。为了安慰这位可怜的老人,马科瓦尔多就对他谈论起他自己和他妻子以及他的大女儿伊索丽娜患风湿病的各个不同阶段的情况,他那可怜的女儿健康状况极为不佳。

马科瓦尔多每天都带着用报纸包着的午餐;他坐在长凳上,打开纸包,把已弄皱了的那张报纸递给迫不及待地把手伸过来接的里齐耶利,并说道:

“我们看看有什么消息吧。”即使是两年以前的过时消息,他也同样有兴趣。

就这样,他们有一天读到了一篇介绍用蜜蜂毒汁治愈风湿病的文章。

“可能是用蜂蜜。”总抱乐观主义态度的马科瓦尔多说道。

“不,”里齐耶利说,“这里说的是用毒刺的毒汁。”于是他又给他念了好几段。他们长时间地讨论着蜜蜂和它们的功用,还议论

着采用这种疗法需花费多少钱。

从此以后，马科瓦尔多走在街上时，总是竖起耳朵留心听着各种嗡嗡声，凡在他周围飞舞的昆虫他都盯着看。他注意到一只腹部饱满、身上带有黄黑两色条纹的黄蜂在空中盘旋一阵之后，就钻进了一个树洞里，随后其他的黄蜂从里面飞了出来：那种飒飒的响声和成群黄蜂的飞进飞出说明树干里有一个完整的黄蜂窠。马科瓦尔多就开始捕捉起黄蜂来了。他随身带着一只圆柱形的玻璃瓶，瓶底还留着足有两指厚的果酱。他打开瓶子，把它放在树旁边。很快就飞来了一只黄蜂，在瓶子四周嗡嗡地飞动，在果酱甜味的引诱下，它钻进了瓶子。马科瓦尔多动作敏捷地用一个纸盖捂上了瓶子口。

他一看见里齐耶利先生便说道："快，快，我这就给你扎一针！"马科瓦尔多让他看那装着黄蜂的小瓶子。

小老头迟疑不决。但马科瓦尔多说什么也不愿推迟试验，坚决要在他们常坐的那张长凳上给小老头治疗：病人连衣服都不用脱。里齐耶利先生怀着恐惧和希望撩起了大衣、上衣和衬衣的边角，从破棉毛衫的一个洞口露出他腰痛的部位。马科瓦尔多把瓶口对准了，抽去了瓶盖。起初没发生什么事，黄蜂在瓶子里不动。莫非它睡着了？为了让它醒过来，马科瓦尔多敲了一下瓶底。这一敲真管用：黄蜂马上向瓶口冲去，把毒刺扎向里齐耶利先生的腰部。小老头疼得直叫，猛地站了起来，像是受检阅的士兵一样走起正步来，一边揉搓着被刺的部位，一边冒出了一连串骂人的话："妖怪……魔鬼……"

马科瓦尔多感到十分满意，小老头可从来没有这样威风凛凛地挺起过胸膛。但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有名警察一直在那里使劲地盯着他们。马科瓦尔多挽起里齐耶利的胳膊，吹着口哨，远远地离开了那里。

他瓶里又装了一只黄蜂回家了。要说服妻子接受黄蜂毒刺的

治疗，可真太费劲了。但最后他成功了。过了一会，妻子只是抱怨黄蜂刺得她灼痛难忍。

马科瓦尔多尽心竭力地捕捉黄蜂。他给女儿扎了一针，又给妻子扎了一针，因为必须按疗程治疗才能奏效，后来，他决定在自己身上也扎一针。孩子们嚷嚷道："我也要扎一下！我也要扎一下！"大家都知道，小孩子就是这样爱凑热闹的。但是，马科瓦尔多让他们提着玻璃瓶子出去捕捉新的黄蜂，以满足每天的需要。

里齐耶利先生到家里来找他。他是跟另一个小老头乌利科骑士一起来的，那人拖着一条腿，求马科瓦尔多马上开始给他治疗。

消息传开了，马科瓦尔多现在有条不紊地工作着。他总是留有半打黄蜂备用，那些装黄蜂的玻璃瓶都排放在一个搁板上，一个瓶子里只装一只黄蜂。他把瓶子像针管一样按在病人的腰背上，然后撤去瓶盖。待黄蜂蜇刺完后，他就像一个老练的医生一样，从容自在地用蘸过酒精的药棉在刺过的地方擦揉。他家里只有一间屋子，全家人都睡在里面。他用一扇屏风临时把屋子分隔成两部分，一边是候诊室，一边是诊疗室。马科瓦尔多的妻子在候诊室里接待患者，收取酬金。孩子们就提着空瓶子，跑到黄蜂窝所在的地方去捕捉黄蜂，以保证治疗。有时候，黄蜂蜇了他们，他们几乎都不再哭了，因为他们知道，让黄蜂蜇一下对身体有好处。

那年，风湿病痛像章鱼的触角一样在居民中蔓延，马科瓦尔多的疗法出了名。每到星期六下午，他那简陋的阁楼里还挤着一群受病痛折磨的男女患者，他们把一只手捂在腰背或胯部，有的衣衫褴褛，像是行乞的叫花子，有的看上去像是阔绰人家，他们都是慕名而来的。

"快，"马科瓦尔多对他的三个男孩说道，"快，你们拿着瓶子，再捉些黄蜂来。"孩子们去了。

那天阳光灿烂，无数黄蜂在街上嗡嗡地飞着。孩子们往常都是在离那棵有黄蜂窠的树稍远的地方捕捉少数几只黄蜂。但那

天，米凯利诺为了逮得快点，逮得多点，就在树洞边逮起来了。“得这样干。”他一边对兄弟们这么说着，一边把一只黄蜂赶到他刚放在那里的瓶子上去想捉住它。但那只黄蜂总是停下又飞走，而且逐渐停歇在越来越靠近蜂窠洞口的地方。现在，它又索性停落在树洞口的边缘上了。正当米凯利诺要把瓶子放在那里时，只觉着两只大黄蜂向他猛冲过来，像是要蜇他的脑袋。他躲避着，但毒刺蜇得他疼得直叫，他手里的瓶子掉了。自己惹下大祸所引起的惧怕心理很快使他忘记了疼痛：瓶子掉到黄蜂窠里面去了。开初的一刹那都没有飞出来。而当黄蜂窠里涌出黑压压一大片东西并发出震耳的嗡嗡声时，米凯利诺连喊叫的力气也没有了，他往后退了一步：被激怒的黄蜂全部出动成群地飞出来！

兄弟们听见米凯利诺发出一声吼叫，并见他没命地奔跑着。他一溜烟地朝前跑着，跟在他后面的那团黄蜂群就像烟囱里冒出的滚滚浓烟一般。

一个被追赶的孩子往哪里跑呢？当然往家里跑！米凯利诺也这样。过路人都来不及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只看见一群黄蜂和一个拼命在街上奔跑的小孩，还伴有震耳的嗡嗡声。

此时，马科瓦尔多正在对他的病人们说：“你们再耐心地等一会，黄蜂马上就到。”当门打开时，一窝黄蜂闯入了屋子。他们居然都没有看见把脑袋一头扎在脸盆里的米凯利诺：房间里到处都是黄蜂，病人们挥动胳膊竭力想赶走它们，但无济于事。不过风湿病患者的动作却奇迹般地敏捷轻巧，那僵硬的关节在剧烈的运动中也变得灵活自如了。

消防队员们来了，而后红十字会的也来了。马科瓦尔多在医院的病床上，他那被黄蜂蜇得红肿起来的脸人们都认不出来了。对于躺在医院其他病床上的患者们的大声咒骂，他连气都不敢吭。

高速公路上的树林

冬天的严寒以千姿百态出现在大地上：在海上它像一群骏马在奔驰，在田野上它像一群自天而降的蝗虫，在城市里它像一把利剑划破街道的上空，凛冽刺骨的寒风从窗缝里钻入了冷如冰窖的屋子。那天晚上，在马科瓦尔多的家里，最后的一点劈柴烧光了，全家人裹着大衣，看着炉膛里行将熄灭的炭火，他们每吸一口气，都喷出团团雾气。他们都不再说什么，这团团哈气像是替他们在说话似的：妻子吐出的一口口长长的哈气像是一阵阵的叹息；孩子们全神贯注地吹着团团哈气，像是在吹肥皂泡；马科瓦尔多却一蹿一蹿地往上吹着哈气，像是突然产生又很快消逝不见的一个奇怪的念头。

马科瓦尔多终于下了决心："我去找劈柴，可谁知道能不能找到?"他把四五张报纸掖藏在外套和衬衣之间，大衣下面掖了一把缺齿的锯子。就这样，他在黑夜中出去了，在家里人满怀着希望的目光注视下离家而去了。他每走一步，报纸都发出瑟瑟声，锯子还不时地从大衣领子里露出来。

在城市里找劈柴，谈何容易！马科瓦尔多很快地朝两条大街之间的一个街心花园里走去。那里空无一人。

马科瓦尔多一边一棵棵地仔细打量着光秃秃的树木，一边心里惦记着冷得牙齿直打架的亲人，他们正眼巴巴地等着他的劈柴呢……

冻得牙齿直打架的小儿子米凯利诺正在看从学校图书馆借来

的一本童话故事。书上讲到一个木匠的儿子拿着一把斧子到树林里去砍柴。“我知道该到哪里去了,”米凯利诺说道,“到树林里去!那里有木柴!”他生在城市,长在城里,从来没有见过树林,即使从远处也没见到过。

说干就干,米凯利诺与两个兄弟商量好了:他们一个拿斧子,一个拿钩子,一个拿绳子,告别了妈妈,出去寻找有树林的地方。

他们在灯火通明的城里走着,除了房屋,他们看不见别的东西:哪里有树林呀!连影子都看不见。街上行人寥寥,但他们不敢问哪里有树林。于是,他们来到了看不到有城市楼房的地方,街道变成了一条高速公路。

孩子们在高速公路两旁看到了一片树林:一片奇形怪状的树林的茂密枝叶挡住了他们的视野。在疾驶而过的汽车灯的照耀下,一根根的树干细长细长的,有的笔直,有的歪斜;树冠有的扁平,有的宽展,真可说是千姿百态,光怪陆离;树枝的形状有的像牙膏,有的像刮胡子刀,有的像人脸,有的像奶酪,有的像人的手,有的像酒瓶,有的像奶牛,还有的像汽车轮胎,四周密布着由字母构成的叶簇。“太好了!”米凯利诺说,“这就是树林!”

弟兄几个着迷似的看着月亮从那些奇怪的阴影里露出头来:“多美呀!……”米凯利诺马上提醒兄弟们别忘了出来的目的是找劈柴。于是,他们砍倒了一棵形状像是黄色报春花的小树,把它折成几段带回了家。

马科瓦尔多回到了家,当他看到炉火烧得很旺时,深为自己没有找到一根劈柴而羞惭。

“你们是从哪里搞到的劈柴?”他指着已快烧尽的广告招牌大声问道。那广告牌是用胶合板制作的,所以一会就烧完了。

“在树林里!”孩子们说。

“哪个树林?”

“高速公路那边的那个树林。那里树多的是!”

马科瓦尔多一看那么容易就弄到了劈柴，而且家里又没有劈柴烧了，所以他就效法孩子们，重又拿起锯子，走出家门，也来到了高速公路上。

路警阿斯托尔福视力欠佳，夜里，他骑着摩托车巡逻时，必须戴上眼镜才成。但他没对人说过，怕的是影响他晋级。

那天晚上，有人告发说：公路上有一群顽童在拆毁广告牌。路警阿斯托尔福出发去巡查。

阿斯托尔福滴溜溜地转动着一双近视的小眼睛，在公路两旁仔细巡查。他沿路看到的都是密密层层、奇形怪状的形象，它们似乎是在告诫他，又像是在向他招手示意。他突然看见一个顽童爬到了一个广告牌上。“喂！你在那里干什么！马上给我下来！”那顽童一动也不动，而且还对他做着鬼脸。阿斯托尔福走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一个奶酪的广告，上面还有一个在舔舌头的男孩呢。“不错，不错。”阿斯托尔福说道，接着就疾驶而去。

过了一会，在一张大广告的阴影中，出现了一张惊慌而又忧郁的脸孔。“站住！您别想溜！”但没有溜：原来那是画在一只长满鸡眼的脚上的一张痛苦的人脸。原来是鸡眼药的广告。“噢，对不起。”阿斯托尔福说着便开车走了。

治偏头疼的大广告是一个头疼得两手捂着眼睛的巨大的人头。阿斯托尔福过来了，摩托车车灯照见了爬在顶端的马科瓦尔多，他正用锯子拼命地想锯下一长条木头来。灯光照得他睁不开眼睛，马科瓦尔多缩着身子，一动也不动地待在那里。那锯子已锯到额头中间了。

阿斯托尔福仔细地审视了一番，说道：“噢，对了！斯塔帕止痛片！一幅十分出色的广告！妙极了！上面那个拿着锯子的小人儿，意味着偏头疼使人的脑袋疼得像是要被劈成两半似的！我一下子就看明白了！”他又满意地离开了。

四周是那么寂静和寒冷。马科瓦尔多欣慰地叹了口气，重新又在广告牌上骑好坐稳，继续干他的活。在月光皎洁的夜空中，回响着锯子锯木头的那种低沉而又微弱的声音。